

## 主编简介

戴维·李 ( *David J. Lee* ), 曾就学于伦敦经济学院、利物浦大学和伯明翰大学。在谢菲尔德大学和艾塞克斯大学担任过社会学讲师, 1977年在艾塞克斯大学担任高级讲师。他发表过许多关于教育、培训、技能和职业分层的文章。著作有: 《社会学问题》[同霍华德·纽比 (Howard Newby) 合作, 1982年]; 《为青年计划》[同丹尼斯·马斯登 (Dennis Marsden)、简·邓库姆 (Jean Duncombe) 和彭尼·里克曼 (Penny Rickman) 合作, 1990年]。他为《简明牛津社会学词典》(1994年) 撰写了 80 多个词条。现已退休, 以研究社会学为乐趣。

布赖恩·特纳 ( *Bryan S. Turner* ), 曾在利兹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和进行研究生学习 (1963~1969年), 在阿伯丁大学和兰开夏大学担任讲师 (1982~1988年), 后来担任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他曾在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任亚历山大·冯·洪堡学会会员 (1987~1988年), 随后在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担任社会科学教授 (1988~1990年), 在艾塞克斯大学担任教授 (1990~1993年)。1993年, 他回到澳大利亚担任社会学基金会主席, 在迪津大学任艺术基金会会长。他也是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成员, 曾担任澳大利亚社会学协会主席 (1994年)。

他的主要著述有: 《韦伯和伊斯兰教》(1974年), 《马克思和东方主义的终结》(1978年), 《献给韦伯》(1981年), 《宗教和社会

理论》(1983年),《身体和社会》(1984年),《公民权和资本主义》(1986年),《医学权力和社会知识》(1987年),《地位》(1988年),《马克斯·韦伯,从历史到现代性》(1991年),《调节身体》(1992年),《东方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全球主义》(1994年)。他是《企鹅社会学词典》的合作者。他是《理论文化和社会》编辑委员会创始人之一(1982年),《身体与社会》杂志共同主编(1995年),《公民研究杂志》创始主编之一。

## 本书撰稿人 (按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科莱姆·布鲁克斯 (*Clem Brooks*), 是位于布卢明顿的印第安那大学社会学副教授。他曾发表关于政治态度、投票和阶级意识的文章。他目前正在致力于美国政治行为基础变化的研究和当代美国自由主义演变的研究。

罗斯玛丽·克罗普顿 (*Rosemary Crompton*), 英国莱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 曾担任过肯特大学社会学高级讲师。她的著作包括《阶级和社会分层》、《经济和阶级结构》(同 J. 格贝合作, 1977)、《白领无产阶级》(同 G. 琼斯合作, 1984)、《性别工作和社会变化》(同 K. 桑得森合作, 1990)。

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 (*Terry Nicholls Clark*),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和社会学计划委员会主席。他的著作包括:《倡导者和资助者: 法国大学和社会科学的出现》、《城市金融和城市政策研究》(五卷)。

彼得·克里福德 (*Peter Clifford*), 牛津耶稣学院成员、牛津大学数学统计高级讲师。他擅长于社会、医学和物理科学的数学模型的统计。

杰弗里·埃文斯 (*Geoffrey Evans*), 纽菲尔德大学欧洲研究中心成员, 曾任伦敦经济学院讲师。他于 1987 年和 1992 年是英国选举研究小组成员, 是《了解政治变化》的合著者 (Pergamon, 1991)。他撰写了许多关于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的文章。从 1992 年起, 他

致力于东欧的调查研究。

**约翰·H·戈德索普** (*John Goldthorpe*), 牛津纽菲尔德学院正式成员。他以前关于社会分层的著作包括《富裕工人丛书》(同戴维·洛克伍德及其他人合著, 1968~1969), 《现代英国的社会流动和阶级结构》(第2版, 1987)(同罗伯特·埃里克森合作), 《常规流动: 工业社会的社会流动研究》(1992)。

**安东尼·希思** (*Anthony Heath*), 牛津纽菲尔德学院成员。他是选举和社会趋势研究中心的主任之一。他擅长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他的著作包括《起源和目的》(1980)、《社会流动》(1981)、《英国如何选举》(1985)和《了解政治变化》(1991)。

**罗伯特·霍尔顿** (*Robert Holton*), 南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多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社会学副教授。他的著作包括《城市、资本主义和文明》、《经济和社会》、(同布赖恩·特纳合著)、《塔尔科特牧师论经济和社会》、《马克思·韦伯论经济和社会》。

**迈克·霍特** (*Mike Hout*), 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调查研究中心主任和社会学教授, 从1985年起在这里工作。他撰写了30多篇关于社会分层、政治社会学和人口统计方面的文章。他和伯克莱的5位同事撰写了《了解美国不平等: 超越贝尔曲线争论》(1996)。

**西摩·马丁·利普塞特** (*Seymour Martin Lipset*), 乔治曼森大学公共政策教授。他的著作包括: 《政治人》、《阶级、地位和政党》、《农业社会主义》、《第一个新国家》、《革命和反革命》、《无理性的政治》。他担任过《公共意见杂志》编辑, 国际社会学协会的政治社会学研究委员会主席。

**杰弗·曼扎** (*Jeff Manza*), 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

**戈登·马歇尔** (*Gordon Marshall*), 牛津纽菲尔德学院成员。他的著作包括《长老会和利润》(1990, 1993), 《为社会学唱颂歌》(1990)。《现代英国的社会阶级》(合著 1988), 主编了《简明牛津社会学词典》(1994)。

莉迪亚·莫里斯 (*Lydia Morris*), 艾塞克斯大学社会学教授。她多年来一直从事失业、劳动市场变化和性别关系研究。她的著作包括《家庭工作》(1990)、《危险的阶级》(1994)、《社会分工》(1995)。

约翰·迈尔斯 (*John Myles*), 佛罗里达国立大学社会学教授。他是《统治的关系》的合著者(1994)。

简·帕库斯基 (*Jan Pakulski*),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他撰写了关于西欧和东欧的社会运动、社会分层和社会变化的许多文章。他的著作包括《社会运动》,《后现代化》(同 S. 克鲁克和 M. 沃特斯合著)。

雷·帕尔 (*Ray Pahl*), 英国坎特伯雷肯特大学社会学研究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是《劳动分工》(1984)。

约翰·斯科特 (*John Scott*), 艾塞克斯大学社会学教授, 此前是莱斯特大学教授。他的著作包括《公司、阶级和资本主义》(第2版, 1985)、《有案可查之事》(1990)、《谁统治英国?》(1991)、《社会网络分析》(1991)和《贫穷和财富》(1994)。

艾德南·图尔根 (*Adnan Turegun*), 加拿大安大略渥太华卡来顿大学社会学讲师。

马尔科姆·沃特斯 (*Malcolm Waters*),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他撰写了关于社会理论、社会分层和长期社会转变的文章。他的著述包括《阶级和分层、后现代化》、《现代社会学理论和全球化》。

约翰·韦斯特加德 (*John Westergaard*), 谢菲尔德大学名誉退休教授,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访问教授。他的著作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1975)、《剩余之后》(1989)和《谁获得什么?》(1995)。



## 序 言

本书的形成源于两位主编之间相互交流已经发表的一些著述的过程。这种交流使我们认识到，实际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的意见都是不同的（我们各自写了本书的结论，作为这种分歧的实际表达）。在局外人看来，这种对意见分歧的承认也一定存在于整个社会学界——社会学家的“争论”可能是一个适宜的集合名词。争论行为在大家熟悉的阶级分析这一社会学研究领域是尤为明显的。但无论如何，我们非常友好地编辑了这本书，相信强烈的分歧对于知识的发展是富有建设性的。我们记得，正是马克思同蒲鲁东、米尔和萨伊的彻底的意见分歧，首先产生了现代阶级理论。

熟谙阶级分析本身就表明了为什么分歧对于这一题目如此重要。许多社会学家倾注其一生研究阶级，却对一些同行的结论缺乏善意，认为他们一直在浪费自己的时间，他们这样做也不利于看到一些同类学科（如历史）的研究者最近已决定完全放弃阶级这一术语。

我们编辑这本文集的理由，是最近这场关于阶级的辩论浓缩了当前关于社会学探询本身之未来实质和方向的辩论。我们希望看到，从这里收集的批判和研究中，社会学和阶级分析最后能够更加相互依赖并更加适应。而且，虽然我们关于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观念的态度实际上不一致，但是我们对于本书各章的内容

却有着潜在的相同看法,那就是,如果不考虑阶级分析这一术语,在现代社会中也仍然存在着关于不平等和不公正这样的重要问题。它们需要得到更广泛地关注,而不仅仅限于社会学杂志的读者。

我们完全肯定地认为,这本书得以形成的真正功臣是艾塞克斯大学计算机服务中心的一些人员,特别是布雷特·吉丁斯(Brett Giddings)和格林·丹尼尔斯(Glyn Daniels)。正是他们的细致耐心和熟练技术,使我们能够克服复杂多样的电子“恐怖”问题,包括现代国际学术协作中的“超现实”情况:杂乱的电子邮件、莫名其妙的文本转码方法、奇妙的Windows、导入的根病毒和损坏的磁盘。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每一篇文章最终变成了老样式的纸面文字。这时我们想起了斯蒂夫·贝尔提出的著名问题:“是否存在没有纸张的文本呢?”

我们也感谢艾塞克斯大学社会学系的Fuller Bequest研究基金,在我们为本书筹措资金出版时提供了慷慨的资助。

我们同时也感谢那些在我们低迷困难的时候给予鼓励的人们,或那些给予帮助和建议的人们。特别是(完全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罗斯玛丽·克罗普顿(Rosemary Crompton)、杰伊·格什尼(Jay Gershuny)、约翰·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鲍勃·霍尔顿

( Bob Holton )、乔治·克伦科维奇 ( George Kolankiewicz )、戴维·洛克伍德 ( David Lockwood )、雷·帕尔 ( Ray Pahl )、简·帕库斯基 ( Jan Pakulski )、戴维·罗斯 ( David Rose )、约翰·斯科特 ( John Scott )、马尔科姆·沃特斯 ( Malcolm Waters ) 和约翰·韦斯特加德 ( John Westergaard )。我们特别要感谢本书的所有作者,他们慷慨同意使用、修改他们的文章,甚至为本书专门撰写新的文章。他们也都自愿及时地回应我们的打扰。莫尼卡·洛因 ( Monika Loving )、莫林·罗兹 ( Maureen Rhodes ) 和黛安·斯特里亭 ( Diane Streeting ) 在我们于电脑方面一筹莫展时帮助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苏·艾洛特 ( Sue Aylott ) 从不介意我们使用她的打印机。艾德里安娜·李 ( Adrienne Lee ) 不仅经常鼓励我们,而且提供了英国初等教育领域中阶级关系的许多例子。最后,我们由衷感谢在朗曼的编者,她耐心而真诚地促进了社会学的辩论。

戴维·李

于英国柯彻斯特

布赖恩·特纳

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的季隆

1995年6月



# 目 录

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为《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 徐崇温 /1
主编简介 /1
本书撰稿人 /1
序 言 /1
主编导论：无阶级的神话和阶级分析的“死亡” /1

## 第一部分 后共产主义世界中的阶级

总 论 阶级比喻和胜利的个人主义 /29
第一章 阶级分析还有前途吗？ 马克斯·韦伯 与自由主义对阶级之礼俗社会解释的挑战 (罗伯特·霍尔顿)/32
第二章 社会阶级正在死亡吗？ (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 西摩·马丁·利普塞特)/52
第三章 后工业社会中阶级的继续存在 (迈克·霍特 科莱姆·布鲁克斯 杰弗·曼扎)/62

- 第四章 阶级的死亡或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死亡?  
(简·帕库斯基)/76
- 第五章 社会分层系统中的演替:对“阶级的死亡”之辩论的  
贡献(马尔科姆·沃特斯)/90

## 第二部分 英国社会学和阶级分析

- 总 论 阶级结构、阶级定位和阶级行动 /109
- 第六章 皇帝是赤裸的吗?  
——关于社会学理论充分性的一些问题  
(雷·帕尔)/111
- 第七章 充满希望的阶级分析前景  
(约翰·H·戈德索普 戈登·马歇尔)/122
- 第八章 对戈德索普和马歇尔的答复(雷·帕尔)/137
- 第九章 性别和阶级分析(罗斯玛丽·克罗普顿)/143
- 第十章 阶级分析:回归到未来么?(约翰·斯科特)/157

## 第三部分 阶级研究

- 总 论 阶级研究和阶级解释 /171
- 第十一章 1979年以来英国的阶级:现实、理论和意识形态  
(约翰·韦斯特加德)/174
- 第十二章 资本主义发展的模式(约翰·斯科特)/197
- 第十三章 阶级结构比较研究  
(约翰·迈尔斯 艾德南·图尔根)/210
- 第十四章 阶级、下层阶级和劳动力市场  
(莉迪亚·莫里斯)/226
- 第十五章 发达工业社会的阶级和政治

(约翰·H·戈德索普)/240

第十六章 20 世纪英国的阶级不平等和教育改革

(安东尼·希思 彼得·克里福德)/254

第十七章 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社会阶级和利益形成

(杰弗里·埃文斯)/272

## 主 编 结 论

弱阶级理论或强社会学? (戴维·J·李)/299

资本主义、阶级和公民身份(布赖恩 S. 特纳)/311

译者后记 /321

参考文献 /323

## 无阶级的神话和阶级分析的“死亡”

戴维·李(David Lee) 布莱恩·特纳(Bryan Turner)

众所周知,1995年1月初,日本神户港周围发生强烈地震。几天后,英国的《卫报》发表了一篇关于这场灾难的特别报道,它的标题显得很拙劣:“日本穷人承受着终结中产阶级神话的地震”。报纸上还配发了两张引人注目的照片:一张是在城市中心拍摄的,呈现的是公寓楼的废墟,以及在冷风中无家可归的受害者;另一张呈现的却是一个富裕的郊区,这里宽敞的房子大部分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富人们只是略微降低生活水平而已”。看来这场地震只是对那些收入和生活方式难以应对灾难的人造成了重大冲击,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也揭示了日本社会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对于那些熟悉关于日本劳动力市场分工的社会学研究的人来说,以及对于知晓关于日本社会-经济不平等模式的最有用资料的人们来说,这篇报道的结论一点都不令人奇怪。然而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市民(约有90%)还是经常把自己说成是属于“中产阶级”(《卫报》,1995年1月26日;参见Ishida 1993)。

社会调查发现,在其他的工业化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较容易辨别出中产阶级,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问题

被提出的方式。在欧洲,这里虽然经历了许多起源于阶级的政治和社会话语,但据报道,人们还是更多地愿意根据“我们”和“他们”来看待社会——特别是在英国( Marshall et al.1988:143~147)。在这里,人们的脑海里甚至还存在着关于阶级的较大程度的模糊认识,而且他们还是根据政治形势和调查的方法来看待阶级变化( Marshall 1983)。民众围绕阶级这个术语产生的模糊和混乱,反映在学术领域中。一些作者现在建议干脆抛弃“阶级”这个词,原因是关于“阶级”的各种各样可能的政治和哲学的含义使得它对于独立的分析没有什么用处了(如 Calvert 1982,Hindess 1987)。

因而确实毫不奇怪的是,所谓的“阶级分析”在社会学领域也应经常地被严肃置疑。“阶级分析”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的范畴。实际上它并不比任何一种社会学研究有更多的意义,因为其他的研究也试图区分和解释阶级划分和(或)在经验上衡量它们的影响。它曾经受到三种颇有影响的传统社会学理论的支配: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以及影响程度相对较小的功能主义。然而,在使用这些可选择的理论观点作为关于社会分层之经验研究的基础时,至少直到目前,在主流社会学中还存在着一种最为自信的专家观点。一位著名的美国理论家和方法论专家把阶级描述成是社会学的“惟一自变量”( Stinchcombe 援引自 Wright,1979:3),尽管这带有较大程度的不认真的夸张色彩。一位即将担任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主席的人这样写到(基于对“社会分层”的大量调查研究):“这绝不是社会学需要辩护和认错的领域”( Newby 1982:2)。

然而,依令人吃惊的不同的批评者看来,这一工作的正确性现在都要受到质疑。这正反映了社会学本身看来存在的无序现象。它经常分裂为两个派别:一方面是那些社会学的专职研究者,他们试图通过进行大量的经验研究来发展社会学的知识,并希望把社会学的规律宣布为是一种关于社会的科学;在另一方面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也即人类社会,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社会学必须保持

在自身规律的范围内，它的结论和“发现”——包括那些关于社会之阶级划分性质的见解——不是逐渐得到证明的，而是应被严肃地质疑。

当然，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得以存在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对于理解它的优先性和——现在看来——失败与缺陷来说是特别重要的。虽然在工业革命早期，“阶级”这个概念被自由的政治经济学家和保守的社会评论家没有多少争议地使用，但是随着马克思对它的使用，所有这些很快发生了变化。在马克思那里，阶级变成了革命性政治的关键性概念。他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是社会借以实现变革的工具。因而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声名和权力的扩展，阶级的这些旧的话语被替代了。首先强调的是它在资本和劳动之经济和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性，而后是在自由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激烈的全球对抗中的重要性，这最终导致了冷战。

阶级分析的这种社会和政治环境现在已发生了迅速和剧烈的改变。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使得集权统治、环境破坏和侵犯人权的历史被曝光，也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理论框架在知识分子圈内成了问题，甚至对于它以前的许多支持者来说，在感情上也难以维系了。在西方，20世纪80年代采取的缩小国家对经济干预范围的政治纲领，挑战了社会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是剥削性的和充斥阶级特征的论点。减少国家对经济干预表明了既有的工业社会经历着全球萧条和跨国投资的重组。有一类自由主义的新闻记者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却宣布资本主义现在已是既存的惟一取得胜利的世界经济制度，而且历史的终结已经到来了（如 Fukuyama 1992）。这样，虽然所谓的社会“无阶级性”仍然还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支配了社会学阶级分析许多年的问题——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条件下之不平等之不同观点的相对正确性——突然间失去其力量。难道“阶级”和“资本主义”这样无论如何是19世纪的概念在20世纪晚期社会发展的张力下还没有消失吗？如果真的还存在的话，

阶级分析还剩下什么可做呢？

正是围绕着人们对最后这一问题的辩论，我们首先考虑的就是编辑一本这样的集子。对于许多社会学家来说，不管他们实际上是否亲身进行过或正在进行着阶级分析，答案仍然是：“还有很多”——尽管发生了上面所描述的那些变化。他们中的许多人试图使阶级分析摆脱由意识形态所激发的辩论的束缚，把它退回到一种关于现代不平等之性质和原因的经验的、非教条的甚至科学的考察领域。他们具有受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所启示的特征。从事这种阶级研究的人声称，他们早已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关于阶级结构发展图式的缺陷。正如这一立场的著名支持者约翰·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及其在牛津纽菲尔德学院的同事在本书中所主张的那样，资本主义社会也许没有被革命的反抗所分裂，但事实表明它并不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理解了阶级不平等的存在和稳固，这样便给了社会学家一个继续研究的议题，甚至在我们所生活的“后马克思主义”时代也是如此（参见本书第七章，第十四到十六章）。但是我们很快就清楚地看到，这种类型的阶级分析也受到了批判。

然而，我们已经准备好投入到关于阶级本身的辩论中去。在这样做之前，我们先区分出两种对阶级分析的批判。我们认为这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参加辩论的人并不总是能够清晰地加以分辨。第一种——我们没有打算对其进行系统地考察——我们将称之为“无阶级的神话”：关于现代工业国家中阶级权力和特权之实际分配的具体观点。第二种——我们作了较多的考察——是传闻的“阶级死亡”：关于阶级是否仅是社会-政治热情的一个比喻，或实际上仅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概念和工具等这样的理论与方法论问题。

## 无阶级的神话

诸如阶级“逐渐消亡”的论断，对于自由主义者捍卫自由市场或

“资本主义”民主并回应其批评者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对围绕无阶级问题的争论进行研究,也显现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对这一问题认识上的含混性。人们一般认为,最早的关于无阶级的神话起源于19世纪末期的德国,当时爱德华·伯恩斯坦试图说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根据他所认为的那个时代的实际社会环境来调整战略(Bernstein 1899)。伯恩斯坦对于当时群众经济处境的改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在社会主义劳工运动内外成了“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依据(参见如Crosland 1956)。伯恩斯坦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已经发生的论断,承认工人阶级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他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资本主义造成的技术进步),指出中产阶级的规模扩大了。他反对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议会政治进行改良,而不是采取革命方式推翻它。技术的变化,中产阶级的发展,收入的增多,社会流动和政治与社会分化——这些论题在20世纪前半叶也被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作者所关注和研究(较好的概述参见Goldthorpe et al. 1987一书的导言)。这样的见解在美国的学者那里也是被认为正确的。同欧洲相比,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较高,社会主义的政治论说和阶级冲突影响较弱,关于少数民族和共同体差异的分析要强于对社会阶级的分析。

也正是在美国,另一种颇有影响的无阶级神话形成并延续着:关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的论题。伯利和米恩斯(Berle and Means 1932)关于美国制造业公司的经验性研究是这方面的先驱,他们声称股份公司的发展和大型工业企业的增长使得旧式资本家的重要性被边缘化。对企业的控制权转移到专业的管理者手中,他们被雇用是根据“能力主义”(也就是根据有证书的技术能力),因而其权威并不主要依赖于对公司的法律上的所有。这里,马克思本人及其20世纪早期的追随者(尽管他们身处不同于欧洲的环境,具有不同的政治目标)也已认为,所有者的利益被管理者和金融资本的有效控制所代替(Hilferding, 1910; Lenin, 1916)。由于接受了这样的变化及其管理



革命的潜在意义，他们便为自己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承担了一个任务，即必须解释资产阶级是怎样能够保持其连续性和资本主义性质的。相反，自由主义理论家从那时起发现很容易得出结论说，因为资本持有现在实际上来源于普通工人的储蓄、保险金和退休金，所以资本所有权已经变得高度民主化了，资产阶级已不再存在（最近的例子参见 Saunders 1990）。

这两种影响很大的神话意味着，马克思关于阶级形成的论说，以及他对阶级的“预测”，都不能维系下去了：阶级无论是作为由生产资料的拥有和非拥有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客观社会分裂，还是作为具有潜在反抗“阶级意识”的经济利益群体，都停止了它的存在。早在1959年，社会学家就被强烈地要求忘记关于阶级的一切（Nisbet 1959）。在冷战岁月里，这样的观点尤其是被美国社会学家纳入更详细的阶级“消亡”的理论中。它所具有的明显的政治含义是：资本主义不再可能处于革命动乱的危险中，相反的是共产主义很可能要发生改变（Kerr et al. 1969）。

## 无阶级、公民身份和后现代资本主义

正如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关于阶级逐渐消亡的理论从来就不乏强烈的批评者，并且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为出人预料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政治的复苏所动摇。然而在刚刚过去的20多年里，西方政治中新自由主义新右翼兴起，知识领域也发生了广泛地转变，其中包括这样的主张，即到了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主义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以致阶级分析的术语都成了多余的东西。正如本书所展示的（参见霍尔顿、帕库斯基、沃特斯和特纳所撰写的章节），这些论断不仅在美国有吸引力，在澳大利亚也是如此，克鲁克及其同事把美国描述为上述变化的缩影（Crook et al.1992）。

这里包括以下四种关于无阶级的“新”神话：大体按照出现先后

的顺序,它们是公民身份、后工业主义、后福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 公民身份

实际上,对民主和公民权的研究长期以来是关于阶级不平等研究的必要辅助。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制度性不平等和巨大的社会不平等(也即社会阶级的存在)同并行的一套与民主参与和公民权相关的制度(也即福利社会)之间的密切结合。马歇尔(T. H. Marshall 1981)把福利-资本主义说成是“复合社会”,认为福利和市场如果最终是现代资本主义中不可协调的成分的话,那么它们就都是不可缺少的。他的分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了社会学的传统,理论的阶级分析必须解决关于民主过程和公民身份(作为政治成员的一种形式)的基本问题。就“公民权”(和福利)降低了阶级划分的显著性而言,它为一种无阶级神话经常提供潜在的支持。

然而近来一种较为普遍的自由主义观点认为,与实际情况相比,公民权和不平等之间的不可相容性很明显被夸大了,而且基于市场的不平等与政治市场地点的自由之间具有一致性(Holton and Turner 1989)。也就是,经济市场为实现机会平等提供了最好的制度环境,但机会的平等与收入的不平等是完全可以相容的(Turner 1986)。议会制度也发挥着一种政治市场空间的功用,这里各种政党竞争权力和影响,同样也有不平等的政治结果。在这种自由主义的框架中,在经济领域内作为一个消费者的选择自由,是民主领域政治个人主义的必要成分和支持,而且它们的共存使得那种对不平等的激进政治解释成为赘余。

### 后工业主义

后工业主义思想吸收了早期自由主义理论关于20世纪工业主义之知识精英管理的逻辑。在后工业社会里,诸如理论知识等而不是私人资本的形成,成为社会的轴心原则,成为社会创新和政策发展的基

本源泉。这种思想特别是与丹尼尔·贝尔的著作（Daniel Bell 1973、1976）联系在一起。他试图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变化如何同经济的发展密切相连：作为经济活动之基本形式的制造业已经减少，服务业大幅度增长，农业领域也相应地衰减。这种知识的轴心原则赋予专业性和技术性的职业以优先地位。贝尔认为这形成了一个新阶级，这也使大学里的知识分子发挥新的作用，即新知识的生产者。后工业社会理论也引起了关于阶级分析的多种争论，涉及新中产阶级的重要性、技术人员的作用、劳动力的非熟练化、新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知识工人在生产中的重要性。

### 后福特主义

关于“后福特主义”论题在稍后的几年内就发展起来了（Piore and Sabel 1984；也参见Wooded ed, 1989）。后福特主义，人们认为其代表了一种具有现代世界经济特征的、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形式。当代世界经济的特征就是高度全球化和非国家干预。新形式的“无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运行并不是以民众的充分就业为基础的，而是在劳动力的使用上实行较大程度的被人们称为“弹性专业化”的机制，而且后福特主义生产体制是高度自动化的，以把某种程度的灵活性引入专用的机器设备的使用。后福特主义也依赖于工作人数的灵活性，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本身也是高度非干预性的，主要依靠半熟练的劳动力，而他们是在非合同的基础上被买到的。在后福特主义条件下，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大量的妇女涌入就业领域。例如在英国，20世纪90年代妇女就业人数约占全部劳动力的44%。随着妇女进入劳动力的队伍，她们抛掉了许多传统的社会角色，特别是原来在家庭领域内的角色。当前，妇女在许多社会领域中的解放也伴随着离婚率增高和家庭破裂。随着核心家庭的衰落，也产生了贫穷的女性化，这是因为大多数单亲家庭实际上由妇女支撑的。

在后福特主义社会，经济和家庭之间的实际联系被认为是瓦解

了。许多现代社会的右翼批评家谴责战后时期的福利社会,说它造成了把男人从家庭中赶出来的无意识后果。奈森·格莱泽尔(Nathan Glazer 1988)和丹尼尔·莫尼汉(Daniel Moynihan 1973、1989)曾经特别关注黑人贫困问题,特别研究了被社会隔离和分散的黑人和单亲家庭增多的问题,认为妇女完全依赖社会福利支付来维持生计。当然在北美,后福特主义瓦解了阶级共同体,而这种阶级共同体原来可以成为对抗社会制度的基础。欧洲的理论家也接受和提倡后福特主义的意义和影响,认为这些结构性的变化标志着那种作为有组织的、充分就业的和具有内聚力的社会群体的工人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例如,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安德烈·高兹就在自己对这些发展的著名评论中宣布要告别工人阶级(Gorz 1982;也参见Harvey 1989)。

### 后现代主义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即我们正探讨的四种理论发展中的最后一个,显然我们上面所讨论的理论,特别是贝尔的理论,已经参与了关于后现代文化分析的理论发展。例如,贝尔对理论知识和计算机信息作用的强调,在很多方面有助于解释像莱奥塔德(J. F. Lyotard 1984)这样的作家提出的后现代理论。而且,贝尔所关注的消费社会中快乐主义的重要性,也为后来根据新文化实践对日常生活的唯美分析打下了一些基础。尽管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以及后现代性作为一种社会条件还被大量的不确定性理论和模糊概念包围着(Turner 1990),但是人们可以根据社会和经济的术语将其界定为包括这样一种社会,其中社会阶级不再重要了,因为社会结构变得特别复杂,并围绕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和文化等许多种维度逐渐分化。它也是这样一种社会,其中社会划分的重心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和文化领域。因而后现代性就包括诸如观光旅行这样的文化产业重要性的提高,通过新形式的消费主义而实现的日常生活的唯美,根据个人选择而非传统的地点形成的社会认同,个人身份和生活话语的多元化,

固定的生活预期和生活目标的消失。用经济术语来说,后现代意味着一种后福特主义经济,包括具有多种技能的工人的高度专业化的生产体制,分割的市场的高度全球化,依靠新的管理技术产生更精确程度的工业控制。最后,用政治术语来说,产生了自立和竞争的新的意识形态。

一些评论家已经注意到,这些所谓的后现代主题中的许多东西包含着对新右翼政治分析的模仿,这在重新评价“公民身份”问题的重要性上,显得特别明显。在最近对阶级分析的有影响的批判中,克拉克和利普塞特有些与众不同,他们的论述仍然停留在关于福利增长的观点上——以及人们熟悉的关于工人阶级要通过富裕和教育获得解放的主张上(参见本书第二章,还参见 Clark, Lipset and Rempel 1993)。然而,后现代主义分析观点的矛盾之处在于,那些在 20 世纪晚期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社会阶级再形成的过程,也是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社会公民身份形式(在马歇尔主义框架内)的条件。这种公民身份和权利出现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和政治政策的条件下:关于充分就业之重要性的共识,教育领域进行民主革命的倡议,家庭的维系,对社会安全保障的总体要求等。但人们越来越普遍地认为,对“福利”公民权利的支持,诸如传统的家庭和民族国家,看来正趋于消失(Roche 1992)。福利政府缺少足够的能力对现在的内部移民行动、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或各种法律与政治权威的全球化做出充分反应。因而身处德国社会环境中的贝克(Beck 1992,1994)和生活在英国的安东尼·吉登斯(Giddens 1990)都认为传统的阶级、公民身份权利和资本主义等范畴的含义看来过时了,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词汇来描述 20 世纪末期社会的分化的结构、个人主义化的过程和减少干预的社会和自然环境。

然而,所有这些无阶级的新神话及其对社会学概念结构的含义,在与经验性阶级分析有关的学术圈内并没有获得多少支持。他们抗议上述相关作者的主观臆测倾向,指责他们武断地构想社会发展的方向,所有社会都按这个方向前进,就好像它们肯定是既成事实一样。他们指出,后福特主义、后工业主义和关于从生产向“消费分化”转变的

观点,已经引起了许多反驳性的批判研究和讨论。许多捍卫传统形式的阶级分析的观点,正如本书中霍特(Hout)等人以及韦斯特加德(Westergaard)、戈德索普(Goldthorpe)和马歇尔(Marshall)的文章所论述的那样,认为自由主义的和后现代的无阶级神话一直忽视严肃的实证研究的发现,这些研究越来越采用复杂的资料搜集与分析的方法,而且它们已经可以充分地证明阶级划分在新世界秩序中的存在。因而基于这样的见解,阶级划分的存在及其对人们生活的重大影响是一种客观的事实,社会学可以把它们构建起来。但这又把我们带到围绕阶级社会学所产生的概念性问题的讨论上来。

## 👉 阶级比喻的死亡? (1) “强”阶级理论

我们上面描述的这些反对意见,部分是由于以下可以理解的感觉所激发的,即阶级分析的批评者被一种强烈的政治愿望所驱动,企图掩盖广泛存在的经济不平等研究证据,因为这不符他们的意图,而经济不平等却一直存在并确实在不断扩大。然而这些阶级分析的批评者面对这种指责的回应,是否定或撤回任何关于不平等程度减小的观点,坚持说他们主要关注的是阶级分析的捍卫者在使用阶级这一术语作为解释工具的时候采取的方式是变动的、不连贯的或模糊的。

在社会学中,可以把阶级术语的使用方法粗略地划分为“强”和“弱”两种。强阶级理论,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是主要的典型,被认为是采取了整体论的方法:也就是,在历史变革和社会及其机构的整个组织中,阶级在某些意义上说是原因的因素。它侵入了每个人的生活,即便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就是阶级得以持续的原因。相反,弱阶级理论则拒斥关于阶级的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的观点或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独立的实体的论断。这种研究阶级的方法就是迈尔斯和图尔根所说的“位置的”(positional)方法(参见Myles和Turegun在本书中的章节)。阶级首先在经验上只是可以辨别的个人群体,它

们具有某种共同的分析上的重要条件(如他们拥有财产或能够挣得高薪的技术)。韦伯的阶级社会学是这种解释的最早代表。它们反映了马克思·韦伯致力于社会学解释方法的研究,也反映了他下面的这种见解,即阶级成员身份与有意义的或共同的行动之其他方面的任何联系,人们必须视其为非必然的,而是或然的。这种立场包括更少地把阶级作为解释性概念的渴望,在考虑“阶级形成”问题上更为如此。它认为阶级的形成是一个有目的的过程,其中阶级成员依照各种方式(例如通过支持某一个特定的政党)共同行动,并通过这样做,形成了韦伯所所谓的“社会阶级”。

现在,这种阶级解释中的广义分野,可能被认为是作为整体的社会学理论长期普遍存在的“解释失败”(explanatory failures)现象的一个例证(参见 Holmwood and Stewart 1983)。解释失败源于两种互不相容的解释社会现象的方式的并存,这表现为“结构”(structure)和“行为”(action)方式的区分。我们粗略地说,结构的方法把因果关系的优先性归于社会生活持久的、超越个人的和普遍性的特征,诸如经济的和共同体的组织等,当然也包括阶级。行为的方法则经常否定因果“结构”的存在,把广泛的社会过程描述为个人的目的和努力的结果,而不是后者的原因。可以说这两种方法最终都不能令人信服,因为每种方法都倾向于衰变为另一种方法,或导致其信奉者最后对于任何一种惯常意义上的解释的可能性都持不可知论的态度。也许这就是阶级分析中使用的大多数理论所存在的问题:“强”阶级方法依赖于“弱”阶级方法,反之亦然。

而且,正如霍尔顿(Holton)在本书第一章中指出的那样,“阶级”这一术语本身经常是道德和政治目标的不准确的比喻,这首先导致了它的解释失败。然而,正如霍尔顿自己表明的,他在这个方面的主要目的是: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的“强”阶级解释方法呈现出许多被实际证明了的困难。这不仅仅是它所预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发生,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由于它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结构性地

位)转变为“自为”阶级(通过追求其所谓的客观的阶级利益)的很著名的论断,掩藏了他的思想中的真实断裂。什么是广泛的社会变化与个人意识和行动之间的因果联系呢?马克思自己的著述中包含着自相矛盾的答案。主要的是,如洛克伍德(Lockwood 1981)在其著名的文章中认为的,马克思用一种反映了19世纪功利主义的假设掩盖了问题: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是他们对其可以客观确认的(阶级)利益的理性追求所引导的。然而在另一些时候,他又信奉一种“思想如白纸”(mind-as-blank-paper)的、视人为木偶的行动主义。马克思本人就把人类说成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结构的载体。可以说,这些矛盾的行动理论导致了后来的马克思追随者中有了“人道主义的”和“结构主义的”区分。

当“强”阶级解释衰微之时,捍卫最初理论的典型回应,特别是求诸于非必然的历史与倾向性因素,使得行动偏离其“真正的”轨道。例如,革命之所以没有发生的原因,被解释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由于强烈的民族主义导致劳工运动分裂,或者是由于战后“资产阶级”国家或大众传媒的权力——其中的潜在意义是,罩在资本主义剥削上的这些面纱最终会被揭开。公民权问题也提供了另一个例子。许多激进的批评家拒斥公民权,认为它只是统治阶级的一个策略而已(Mann 1987),是罩在生产方式之“实际的”结构不平等之上的意识形态面纱。然而,这样的观点却没有考虑公民权的不同形式和福利国家的不同发展模式。例如,公民权传统在北美民主和法国革命中采取了积极的和激进的方式,而在英国却具有相对消极保守的特征(Turner 1990; 关于福利资本主义不同世界的论述,参见 Esping-Andersen 1990)。

的确,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的复苏,马克思的世界观被作了激进的重新解释,以用来解决这些粗糙的解释失败和更有效地解释现代事件和制度。然而,可以明确地说,理论的和事实的研究却走上了相反的方向。时而潜在时而明



显的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著述中包含着完全抛弃作为一种解释概念之阶级的倾向。正如贝克尔在其一篇重要的评论中指出的,关于阶级利益和政治行动之间必然联系的假设已被认为是“简化论的”,也就是说,认为它在社会经济组织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之间先验地假定了一种非常严格的决定性因果联系(Becker 1989)。然而,这样的理论策略自觉或不自觉地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发生了向那些“弱”阶级(如韦伯的理论)理论靠近的转变,这种理论认为阶级意识和阶级利益对于历史环境和有目的之行动的作用不是必然的。

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后的马克思主义给实际研究带来的颇有价值的激励,是强化而不是削弱了阶级解释的运用。无阶级的自由主义神话遭到激烈的抨击。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开始重新审视财富、所有制和公司控制的经验结构。运用马克思主义概念的阶级解释被扩展到比以前更广泛的社会学题目的分析中——特别是在文化研究中,以及在关于教育、城市主义和犯罪学的社会学中。同时关于阶级话题的社会学辩论也增多起来,像E.P. 汤姆森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这样战后代后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从事关于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研究。

这个时期另一重要的知识发展是关于所谓的“非熟练化”(deskilling)的辩论。哈里·布雷弗曼,一位学术圈外的马克思主义者,向惯常的观点发起挑战。惯常观点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无产阶级已经被取代了,因为机器消灭了许多从前的体力工作。布雷弗曼认为,办公室的机械化同工厂中的情况大体一样,造成熟练劳动的非熟练化——因而许多所谓的白领(中间阶级的)工作,甚至包括管理本身,实际上也被“无产阶级化”了(Braverman 1974)。这一论点在电子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也引起了强烈共鸣。布雷弗曼重新诠释马克思关于不断无产阶级化之论题的尝试,把严肃的阶级分析的注意力引向“劳动过程”之复杂性的研究,也就是在不同职业群体之规模的总体变化背后,私人企业和工厂中变化的技术和社会组织的研究。

然而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于学术活动中吸收了许多以前的学生激进分子,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研究之间发生了实质性的相互渗透。例如,布雷弗曼出版了颇有争议的著作后,许多关于历史上和现代的劳动过程的详细研究很快就证明了他的思想的简单化特征(如 Wood 1982)——发展到这个时候,以致人们很难说这一阶级分析的新分支中什么是明显“马克思主义的”。

但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复兴的最显著的例子可能是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埃里克·奥林·怀特的著作(主要参见 Wright 1978,1985)。怀特的方法之所以是独特的,不仅是因为他在解决马克思主义解释 20 世纪晚期工业主义中出现的一些被承认的困难方面具有创造性,而且还在于他愿意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做是一系列科学的假设,它们能够而且实际上应该经受得起先进的经验方法的检验。怀特的著作中有数不清的总结和批判,他把自己同学院马克思主义中的所谓“非废话的”或实证的流派联系在一起。这些著述中包括一本重要的,由怀特本人主编的《关于阶级的辩论》的书(Wright ed. 1989b)。重要的是,怀特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发表了一些方法论上较为复杂的著述,他试图把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广泛体系纳入到精确的分析框架内,使得一般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范畴(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向“主流的”社会学界表明这些范畴在美国社会中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他通过对相互矛盾的阶级地位的阐述,试图解决 20 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给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带来的特殊困难:诸如重体力工作的相对减少和“白领”中间阶级的兴起。他还发起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比较调查研究项目,目的在于证实自己的衡量阶级的计划。这一项目运用了从一些工业国家收集来的大规模的数据系列,至于研究结果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了他的最初的计划框架,对此人们仍有争论。但是怀特开始从根本上修改自己的计划,他运用新马克思主义对剥削概念的重构,采用了理性选择和博弈论的方法(Wright 1985)。

毋庸置疑的是,怀特细致而复杂的著作是对美国现存的无阶级神

话之自由主义理论的严肃挑战。然而值得指出的是，正如霍尔顿 (Holton)、迈尔斯和图尔根 (Myles and Turegun) 在各自撰写的章节中指出的那样，怀特吸收了诸如阶级“位置” (location) 的观念和从“资产阶级”实证主义传统中发展起来的解释策略，因而他淡化了“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征和历史关注，以致新韦伯主义者能够接受他的著作中的这种趋同立场 (参见 Marshall et al. 1988, 第二章)。但不管怎样，即便到了 1989 年，怀特仍做出了明确的“强”马克思主义阶级解释，以反对经验主义的阶级分析。他坚持认为：

如果不与相应的微观层次上的概念连接起来，马克思主义的抽象宏观层次上的阶级概念的解释能力就会大打折扣。这些微观层次上的概念是同个人的生活和条件紧密联系的。……如果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要保持理论上的力量和政治上的有效，那么它看来有必要继续努力在具体的微观层次上铸造概念。(Wright, 1989: 314)

怀特与戈德索普不同，他相对来说较少地介入这里所描述的关于后共产主义的概念争论。尽管如此，他同其他一些激进地批判资本主义的人一样，仍然明确地坚持如下立场，即共产主义的崩溃无论如何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知识和理论的独特性都没有什么牵连。然而本书中突出的是，曾经是怀特同事的霍特，以及曾经捍卫马克思主义之经验可行性的英国社会学家韦斯特加德，在各自的章节中都准备以一种天主教的方式来界定阶级，以便把各种类型的阶级分析支持者团结起来。

## 阶级比喻的死亡？(2) “弱”阶级解释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考察马克斯·韦伯关于社会不平等之

理论观点的权威性对阶级分析的支持者和批评者所产生的同样重要的作用。在过去的 50 年里,争论中的许多方面都与对韦伯理论进行详细地重新阐释有关,尽管韦伯的著述是不完全的且最终有些含混。

当韦伯的著作被译为英文广泛使用(尽管不完全)时,韦伯(以及他的同代人埃米尔·涂尔干)在学生眼里是对世纪之交德国政治中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的典型人物。他试图与马克思主义的纯粹政治纲领分离(得以“拯救”出来),并认为这些理论仍然保持着科学价值(参见《主编导论》,Weber 1948)。在他们试图声明阶级逐渐消亡的过程中,20 世纪 50~60 年代的自由主义作家特别运用了韦伯的两个主要观点:“分层”(schichtung)和“地位”(stand)。如果用英文大体上来表达的话,可能不太精确地对应为“stratification”和“status”这两个词。依韦伯看来,分层首先表示的是在不平等的或有等级之分的次序群体中对个人或家庭的再划分。因而“阶级”就从其仅同所有权相联系的意义上扩展出来,容纳进包括“拥有”职业技能在内的其他形式的经济利益,因而阶级只是分层的一种形式。然而同等重要的是地位分层(status stratification),它不仅包括以宗教或法律权利为基础的划分,而且也包括尊重、消费和“生活方式”的分配不平等。

韦伯的著作使得美国和其他地区的较为老练的自由主义社会学家接受了如下观点,即韦伯所理解的一些阶级不平等将继续存在下去,这是劳动力市场运作的结果。但他们中有许多人认为,随着阶级的重要性逐渐减退,“分层”则变得以消费和生活方式为中心的地位划分而进行。然而这种意义上的地位不平等实际上是一种比喻,表示的是连续集上点与点之间的层级次序,而不是两分的断裂(Ossowski 1963)。人们设计出了一些衡量职业“地位”的标准,在美国则成了原则性设计,通过它来测度“社会背景”及其对生活经历的影响,特别是个人在不同声望或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社会流动(参见 Glass ed. 1954; Blau and Duncan 1967)。与此同时,工具主义的理论家则设计

出了芝加哥新古典经济学派人力资本理论的社会学版本。他们认为，在市场社会中存在的残留的阶级不平等与其说是所有权的划分，还不如说是一种社会角色及其充分发挥作用所要求的训练和天资的功能重要性 (Davis and Moore 1945; 参见 Karabel and Halsey 1977: 导论)。可以说，后现代主义者关于沃特斯所所谓的“分层的延续”系统 (本书第五章) 的观点，植根于这些传统的自由主义的功能主义者对韦伯思想的评判中。

然而也是根据韦伯的著作，一个主要是由英国社会学家构成的群体提出自己的见解，试图对这些自由主义的功能主义者关于无阶级神话的实际和理论的充分性发起挑战 (关于这方面的评论参见 Gallie 1990; 美国的例子参见 Collins 1971, 1975)。正如韦斯特加德 (Westergaard) 在本书第十一章指出的，对社会阶级进行研究是现代英国社会学得以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因。可以说，这与英国独特的工业资本主义历史及其社会和文化历史中相对浓重的阶级差别特征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激进的英国史编纂都是由阶级研究所主导的，尽管这一传统现在也遭到了挑战 (Cannadine 1992; Joyce 1995)。

在它的主要代表戴维·洛克伍德 (David Lockwood) 和约翰·戈德索普 (John Goldthorpe) 的著作中，英国新韦伯主义的阶级分析反对 (正如韦伯那样) 马克思主义 / 唯物主义的史观中关于“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之关系的理论。然而它认为，韦伯把冲突看做是社会秩序中国有的，而且把所有形式的社会分层都看做是“权力分配的现象”。阶级分层而不是地位分层是市场资本主义的特征，原因正如韦伯自己在一篇著名文章中提出的，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市场位置”是作为个人“生活机会”的“原因成分”发挥作用的，所以阶级首先是来自可以确认的个人市场位置之原因成分的统计集合体。戈德索普特别反对支配美国分层研究的“地位连续统” (Status continuum) 方法，并设计了自己的阶级分层法，它吸收了洛克伍德关于职业的“市场”位置和“工作”位置的著名区分 (Lockwood 1958; Marshall 1990;

Goldthorpe, 本书第 250 页)。结果便形成了系统的和日趋比较性的研究计划,像怀特那样使用了庞大的数据系列以设定精确的测量程度。使用这种方法,在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这样的社会,可以用客观度量的阶级来解释社会群体的形成(或阶级“形成”),而且能够预测社会流动、教育、政治态度等。

然而正如本书第二部分所揭示的,在最近几年里,戈德索普和其他人所使用的新韦伯主义阶级分析“研究计划”的基本方法,没有能够避免遭到尖锐的批评。下面我们试图对争论的问题做出较为中肯的评价。

毫无疑问,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目前反科学主义非常盛行,在英国社会学界尤为如此。其影响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的激进分子对实证主义哲学和主流社会学之科学热情的攻讦。例如,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激进分子拒绝社会的科学这一概念,认为它只是“资产阶级的”或“男性主流的”的意识,并试图复苏 19 世纪或更早时期的那种哲学争论,即我们关于社会的知识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推动了这一学科内的方法危机的出现,同时伴随的是对语言的重新感兴趣和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家们反实证主义的写作(这一方面的评论,参见 Giddens 1976)。这导致了一种使用“人道主义的”和“定性的”方法进行研究的普遍偏好,并乐于贬低大规模调查的正确性。许多著名的人士都信奉“自省”(self-reflexivity),将其作为社会学工作所有领域中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方法论战略(例如 Giddens 1976; Bourdieu 1993)。这种“自省”在原则上排除了表明阶级是现代社会的客观(也就是不以观察者的意志转移)特征的可能性。然而对于阶级分析的坚持者看来,这种方法的相对性自我矛盾的,有玩弄文字之嫌,是社会学家回避研究统计数字和阅读图表的借口。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社会学领域本身的反科学主义为一些人向社会“科学”的理念发起政治挑战铺平了道路,随之而起的这种挑战却

是来自右翼方面，而不是左翼。随着所谓的新右翼思想的兴起，主流的阶级分析发现自己被卷入对所谓的“颠覆分子”的总攻中，这些分子被说成是在超然的专业主义和学术专家的表面下掩盖着反资本主义的计划。社会学界的新右翼批评家们，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在该学科内担任重要职位，试图揭露社会学过于沉迷不平等，据说这模糊了由市场驱动的工业社会的更为积极的方面，误导和扩大了社会剥夺的实际程度（Berger 1987, Marsland 1987）。在英国，甚至用于产生阶级研究“发现”的统计方法也被攻击为是在整个社会学界建构未经检查的左翼共识（如 Saunders 1989, 1995）。

可是，哲学和政治的问题只是为辩论提供了一个环境，还不是争论的核心内容。在英语文献中，许多阶级分析的最正直坦率的批评家本人过去都对阶级社会学做出了贡献，他们说自己广义上接受那种表明生活机会与职业的或社会—经济的不平等间之持续强烈联系的方法和结果。他们所质疑的是把这些结果都描述成是关于“阶级”的那种习惯。考虑到现代社会中存在着不平等的许多根源——性别、种族和年龄歧视等——有什么理由说阶级应成为一种优先的解释术语呢？

这方面的一个特殊例子就是女权主义的社会学家对传统的阶级分析提出的批评。正如克罗普顿（Crompton）在下面（本书第九章）对这种争论所作的评论那样，对她所所谓的以雇佣为基础的“阶级”关系进行的分析，远不是理解家庭结构的关键，它本身也只有通过参照男人和女人之间不平等的家庭劳动分工才能得到说明（也参见 Davidoff and Hall 1987）。类似的争论也围绕“种族”和民族划分的历史而展开。正如安希尔斯（Anthias）在对后一问题所作的有影响的评论中所指出的那样：

在“种族和阶级”的表面下存在着许多不同的问题，涉及阶级形成的过程、种族形成的过程、种族主义、排外，以及社会地位和不利条件等。这样的问题不可能在种族和阶级的联

系下一并消解，因为它们包括对更广阔的社会过程的考察……“种族和阶级”争论的术语本身就经常潜含着这样的答案，即其中一个对另一个施加某些有效性和决定影响，或两者完全独立，否定任何联系的存在。这两种情况的出现，或多或少都是由问题提出的方式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结果。（Anthias 1991:20）

她进一步认为，如果只是简单地询问“阶级”与“种族”之间的联系，

就是合并了不同层次的分析，包括概念的和经验的。这种合并源于这样的假设：在分析上把这些范畴分离开来的可能性，在它们的具体体现中得以表达，也就是假设的群体。（Anthias, 1991: 同上）

那么，一旦抽除了同马克思主义的联系，“阶级”这一术语还能包含什么样的解释能力呢？显然，这更多地取决于这一情况，即求诸于韦伯主义的解释框架是否能够避免落入“解释失败”的陷阱。我们注意到，霍尔姆伍德和斯图尔德（Holmwood and Stewart 1983）这样抱怨，一旦不能成功地说明抽象的阶级概念与具体事件之间的联系，社会理论家们便具有这样的习惯——把事情归结于条件和环境的特殊性，以捍卫理论不至于遭到否定。但是当这种批评看起来基本上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和历史的阶级分析时，像我们在本书第六章中收入的帕尔（Pahl）的辩论就导致了“所有”阶级分析上的较钝拙的解释失败，不论它们是属于哪个谱系。的确，正如他后来解释的那样，他的文章是为那些关注城市事务的非社会学读者而写的。他的主要批评目标是城市分析家们把城市问题（剥夺、污染、计划混乱，等等）的存在同抗议运动的兴起联系起来的过分单纯的方法。他们这样做，便启用了帕尔所



所谓的“错误咒语”，把意识和行动都同一个决定性的结构联系起来。但是，帕尔很快便承认了主流阶级分析的意义，而且很可能在新韦伯主义的著述中发现那些证实帕尔观点的段落（例如参见 Marshall et al. 1988:6 和克罗普顿的评论，Crompton 1993:60）。然而在第七章中，马歇尔和戈德索普否定了那种认为他们的著作必然包含这样假设的想法。

实际上可以这样认为，韦伯主义的阶级解释更容易受到对立观点的攻击，也就是，正是因为它不愿意把阶级概念化为本身具有独立性的因果力量，所以就导致它从后门贩运进一系列不充分的“结构”比喻（“分层”、“闭合”、“流动”），以代替那种阐释阶级地位连贯性的理论（Lee, 1994）。例如，许多辩论都围绕着诸如下面的问题而展开：什么构成了阶级本身的界限；什么提供了共同的职业因素，把位置性阶级图式（Positional class schema）包含进阶级的范畴——而不是调查者被强加决定采纳这种特别的分组。从那时起，人们在研究英国的社会流动中就一直对此进行着热烈地争论。戈德索普和他的同事试图把阶级度量标准和地位分层度量标准区分开来（参见 Marshall 1992）。戈德索普对假定的“服务阶级”的分析，也是通过对标志这个特殊的阶级位置的共同特征进行详细说明，以将其同周围的群体区分开来（Goldthorpe 1982；参见 Savage et al. 1992）。斯科特（Scott，本书第十章）试图解决这种界限问题，他部分地通过将其作为阶级标准建构的一个问题，又部分地诉求于韦伯关于社会阶级形成的观点。但正如莉迪亚·莫里斯（Lydia Morris）在其撰写的章节中表明的，当前关于一个低层阶级正在形成的意见已经提出一个可比较的问题，这不是轻易就能解决的，因为它包括对劳动力市场过程（这肯定是韦伯主义的目标？）的更为复杂的理解，而不是那种认为从形式上的标准或仅从“阶级形成”的观点中就能获得答案那样简单。

相关的辩论围绕“闭合”这一概念进行，阶级分析的一些韦伯主义社会学家和韦伯本人都使用了这个概念。韦伯所关注的是理解垄断

如何在控制和管理稀缺资源过程形成的,不论这些资源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通过使用“社会闭合”(social closure)这个概念,他阐述了社会群体寻求增加和控制自己的社会报酬的那些复杂过程,这是通过将接近稀缺资源和机会的能力限制在有资格的小群体内而实现的。这种反对竞争者的对资源的垄断,必然把世界划分成为内部人( insiders )和外部人(outsiders)。

然而,这种韦伯主义的闭合观点同作为个人位置之集合的阶级的观点是不是一致的呢?批评家可能这样认为,它意味的是一系列持久的利益和关系,它们能把跨空间和跨代际的个体成员的意识 and 行动协调统一起来。这种把阶级差异理解为社会闭合的方法由一些新韦伯主义的学者发展起来,比如美国的柯林斯和英国的帕金( Collins 1971; Parkin 1971,1979)。他们两人提出了关于如下探讨的整个问题,即个人在“人力资本”或“市场位置”上的差别是如何同知识分层的出现联系起来的?他们认为,教育的文凭主义是集团内外对稀缺知识资源进行管理、控制和垄断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职业垄断的形成,一般由国家颁发许可证所强化,只是职业排外之总体结构的一个例子而已。例如,帕金在把所有权概念作为社会闭合来讨论时,他诉求于彼埃尔·布迪厄的做法,在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间作出比较。布迪厄在他对教育体制的研究和教育获得之排外力量的研究中,都充分使用了文化资本的思想( Bourdieu 1984;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0)。然而在这里,文化资本的概念和文凭主义也潜含着对阶级的“强”理解,即使它们也很不容易适合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所有权和生产方式的语言。

正是由于这样的难题,便存在许多把强阶级概念和弱阶级概念综合起来的尝试。其中较早的一个例子,就是吉登斯试图设计一种“阶级结构化”理论( Giddens 1973)。曼恩对社会权力资源的重要考察,则试图理解经济结构的阶级是如何同韦伯主义关于意识差异( Mann 1973)、强制、国家形成和军事动员(Mann 1986a 和 1986b)等问题相联系的。特纳对地位的讨论( Turner 1988)则试图把经济阶级分析同将

地位作为文化排斥,将公民身份作为政治参与的方法结合起来。而最为显著的例子是,克罗普顿对阶级和分层研究的权威性评论(Crompton 1993:40~41,102)也退而支持这样解决问题的方式。作为论据,她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学家 E. P. 汤姆森要求我们把阶级作为“实际在发生的事情”(同上第 37 页,参见 Thompson 1968:9)。但也很不幸的是,现在社会历史有了自己关于阶级的辩论,其中汤姆森的方法受到了严厉的责问。这样,正如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关于阶级的经验性工作倾向于合并一样,各种各样的融合和混淆也就在概念层次上发生了。

因而毫无疑问的是,所有形式的阶级分析都变得容易招来许多层次上的批评:理论的,哲学的,以及最重要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学术圈中的政治氛围,即意识形态。在这种批评的核心中,一种韦伯思想的教旨主义是很明显的,它试图把经典的著述从现存各种形式的阶级分析的结构性的背叛中救赎出来。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社会学家能够产生影响,因为他们所采纳的来自波普尔和哈耶克著作的政治理论传统,如韦伯本人一样,都是非常致力于个人主义方法论的。但是新自由主义同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宏大叙事”的批判(Lyotard 1984)交叉重叠,这种哲学视韦伯为其热衷于反讽和相对主义做法的先驱。这样,从根本上重读韦伯再次居于变化的核心——把他作为行为理论家、个人主义者、哲学家和早期的后现代主义者。但是,这真的到了宣布阶级分析死亡的时候了吗——是或者不是?

## 关于阶级的冲突:本书的组织结构

以上问题便是形成这本选编文集的主要考虑。在第一和第二部分,我们重印了关于阶级分析的两本颇有影响和平等交流的集子中的主要文章。第一部分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社会学家的讨论,这些文章主要载于《国际社会学》杂志;第二部分来自英国社会学界的争论,这

是在本书上面所讨论的帕尔的有争议的著作出版后进行的。这两部分涉及了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许多主题和作者。第三部分则包括了一些最近的研究文章,其中大多数是为本书专门撰写的。这些文章为了解决辩论中出现的一些经验性题目,提出了许多关于阶级解释和比喻中的重要内容。每个部分前面都有一个介绍作者文章的简短评论。

整个集子反映了我们这样一个信念,即这些关于阶级分析的严肃辩论将大大加强社会学对现代社会的研究。然而,无论“阶级分析”本身是否还存在下去,在这个问题上,正如我们在各自的结论中所阐明的,我们自己就持完全不同的观点。这样,我们也就最终留给读者去判断了。



## 第一部分

后共产主义世界中的阶级

---

## 第一部分

---

后共产主义世界中的阶级


---

# 阶级比喻和胜利的个人主义

在这本文集的开始部分，就潜存着 20 世纪晚期社会中的个人主义胜利的主题，及其对于阶级社会学在分析上的可行性的含义。所有的作者都出生于或者工作在非欧洲的社会，大多是美国或澳大利亚。这些地区的阶级传统客观地讲是很薄弱的，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价值（“美国之梦”、“幸运国度”）深深扎根于政治和社会文化中。从这种优势上说，这里可能比在欧洲社会更容易断言：被托恩尼斯（Toennies）称谓的法理社会（Gesellschaft）为现实的世界社会秩序提供了总的范式，这种社会是以自主的和法律上“自由的”个人之间客观的、异质的和在很大程度上契约性的关系占主导地位为基础的。而且，在无论是新世界或旧世界的政治自由主义者看来，法理社会是处于不受强制环境中的人们必将“自然选择”的秩序模式。

另一方面，正如霍尔顿（Holton）在其颇有影响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在欧洲的社会理论中，阶级这一“习惯用语”出现于 19 世纪人们对法理社会的稳定性和合理性所怀有的悲观主义。它以及同其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政治学说，体现了一种对礼俗社会（Gemeinschaft）（共同体）以及对被个人主义秩序破坏了的传统形式的怀旧意识。在它的具体形式——共产主义（显然，这并不能与整体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相混淆）中，政治的阶级斗争成为改变历史方向的努力，并规定一种共





## 关于阶级的冲突 *Conflicts about Class*

同体可能再次战胜原子主义的社会条件。那么,现在这种试验的失败是不是就证实了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和社会学中法理社会的个人主义理论之结论的正确性呢?

霍尔顿观点的核心,是他所认为的人们在区分两种情况上的困难:一种是阶级理论中潜在的价值关注,另一种是社会学阶级分析试图发展起衡量和分析阶级的科学程序的努力。然而他却接受了如下立场,即在人们不可能完全地抛弃阶级分析,因为经济的不平等仍然是20世纪晚期法理社会中权力分配的重要部分。但是阶级本身的概念化将会变得越来越“弱”(在“导论”中所使用的意义上说)。

在表现当代社会条件的实质状况与选择一种概念的和评价的框架之间做出任何清晰区分所遇到的那种难题,在以下这些文章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述:一方面是克拉克和利普塞特(Clark and Lipset)对阶级分析所做的批判,另一方面是霍特、布鲁克斯和曼泽(Hout, Brooks and Manza)对他们所作的回应。仔细阅读这些章节,我们会发现双方作者关于阶级的正式定义是非常接近的。他们都愿意在很广泛的意义上把阶级视为个人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它产生于财产所有权或市场优势。但是他们的用法却是非常不同的。克拉克和利普塞特引进了一个单独的“等级”概念,而且明显关注人们对阶级和等级的理解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在他们所称谓的社会“地点”(situses, 或社会机构的段)中的行为,特别是在工作、政治和家庭中的行为。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多得令人惊异的具体观点,其中一些在本书第三部分得到了讨论解决(例如参见戈德索普对政治的讨论)。但是,他们表明主题无疑是,在这些社会地点的每一个领域,分层的瓦解都已经发生了,主要原因是个人主义价值的增长,以及那些曾经支撑阶级共识和阶级斗争的旧的一致性的消失。

另一方面,霍特及其同事则一直将我们的注意力拉回到中心问题上来,也就是,阶级作为现代美国和其他高度工业化社会中经济不平等的一个重要组织原则,在经验上一直是存在的。他们的文章不仅为

最近几年对这个主题的一些基本研究和资料提供了非常有益视野，而且也引证了他们自己的新的发现。

第一部分后面的两篇文章都是由塔斯马尼亚大学的作者提供的，他们两人都撰写过关于社会的后现代化的文章（Crook et al. 1992）。他们的文章紧随克拉克和霍特之间的交流之后发表在《国际社会学》杂志上。第一位作者帕库斯基（Pakulski）指责两位争论者互相谈论过去。克拉克和利普塞特谈论分层的瓦解，而霍特及其同事谈论经济不平等的存在，这在帕库斯基看来是不在争论之中的。霍特等人还在概念上还保留着一些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因素，把阶级看做是客观的物质利益，而帕库斯基认为在发生个人主义化的变化之后，这是不能持续的。至于分层，他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四重含义的阶级概念类型，把描述性和解释性的用法，把阶级的客观和主观方面区分开来。沃特斯（Waters）的出发点也是阶级的概念化同阶级是否存在下去的问题之间的联系。他的计划是雄心勃勃的尝试，不仅要表明分层的瓦解，而且要展示不同分层系统在时间上的连续更迭。他认为这样做，不仅能够保留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作为对现在已被取代了的一系列条件的描述），而且能够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本身是一种被取代了的分层秩序。这两位作者的文章都有效地包含了对一些实质性变化的考察，他们以及其他的作者都相信这些变化是后现代性的特征，而且可能被认为是个人主义化和法理社会所能到达的终点。对这种事情状态的盛赞随之又可能被认为是政治自由主义在 20 世纪晚期采取的形式。

## 阶级分析还有前途吗？ 马克斯·韦伯与自由主义 对阶级之礼俗社会解释的挑战<sup>①</sup>

罗伯特·霍尔顿 (Robert Holton)

阶级经常被人们认为是已经死亡了 ( Nisbet 1959 ) ,或是越来越不能“对社会学有所助益”了 ( 本书中 Pahl 的文章,第八章 )。阶级理论色彩较强烈的许多命题被证明是错误的或有缺陷的,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无产阶级革命的著名预期。同时,那种与阶级相关联的单一的总体不平等理论的主张,让位于对阶级、性别、种族和民族之间多元交织关系的不断强调。然而无论如何,阶级的语言仍然在流行的文化和政治争论中被人们广泛地使用着 ( 例如参见 Crompton 1993:9 ) ,关于阶级的话语仍反复出现于社会理论和社会研究中。

阶级这一术语的含义在通俗文化领域和社会理论领域有很大的

---

<sup>①</sup>摘选 (作者只有较小的修改)自《马克斯·韦伯论经济和社会》(Max Weber on Economy and Society)的第六章,霍尔顿和特纳著 (R.J.Holton and B.S.Turner),伦敦 Routledge&(and)Kegan,1989年。

差别,在前者中它经常与地位同义,而在后者中,它则经常地被看做是与经济权力结构相联系的社会不平等的独特成分。在知识界,对于阶级这一术语也很少有一致的定义或概念解释。同时,政治活动家则把阶级作为一种工具,用来戏剧化地表现自己是民众意见的组织领袖。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使用阶级的语言只能表明知识的混乱,是把分析和浮夸言词等同起来,或是对那种一致持续的知识骗术的概念屈从。

然而,关于阶级的话语能够被长久使用的更可能的解释,在于其强有力的和多方面的隐喻性。隐喻是语言的一种表达形式,是“一个名称或描述性术语被人们移用到一些它并不完全适用的对象上去”(《牛津英语词典》)。在奥索斯基(Ossowski 1963)看来,隐喻的作用在于把直观理解和通常应用结合起来,从而回避了全面和系统的定义。他认为阶级就是这样一种隐喻,能够把范围很广的可能的含义或隐义都聚拢而来。它们包括用于分类的方法论应用,用于指称某一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群体之特质的内聚性强的社会群体,用于表示社会群体之间距离的空间性隐义,以及用于表示社会和世界历史中的冲突与变化之组织力量存在的、更富修辞色彩的政治性隐义。阶级既是世界的一种客观表征——“实际发生的事情”(Thompson 1968:i),同时又是一种主观意念。它的隐喻的灵活性还表现为两分的、等级的和工具性的等这些阶级含义的扩散。

我们有许多种深入研究的方法来揭开阶级的隐喻性。其中之一,就是阶级概念既在基于礼俗(Gemeinschaft-based)的社会解释又在基于法理(Gesellschaft-based)的社会解释这两者中的适用性。换言之,阶级既能用于讨论社会的形成,也可用于表示个人在经济生产和交换结构中的角色和作用。把这一观点扩展开来,我们就可能在礼俗社会—法理社会这一谱系上区分出阶级分析的三种典型的习惯用法。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强阶级用法(strong class idiom)指定在谱系的礼俗社会这端,把弱阶级用法(weak class idiom)指定在法理社会这端,而把其他用法置于两端之间。

强阶级用法可用于对权力、不平等和剥削的关系作结构性的阐释,这同时也是对意识、群体形成以及对作为解放性社会变革之社会运动的阐释。正像在绝大多数传统的阶级分析中那样,这些关系源自对基于所有权的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的基本认识。然而,在强阶级习惯用法中,这些关系不仅仅被归属于经济中,而且还充斥在政治、文化以及其他领域中。强阶级习惯用法表现为对社会的一元解释,由此阶级理论和社会理论是密切相连的。它的最具影响力的表现可见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中,他们强调阶级是历史的动力。

根据礼俗社会关系来描述强阶级用法,其比喻性远远胜于原本意义的使用。这是因为,礼俗社会一词的社会学原本用法一般是与对社会的前现代的特定解释相联系的,这种社会是由血统、血族关系和地缘等结合而成的。而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的分析,则把实际的法理社会关系或“自由”个人的社会作为出发点。然而,强阶级用法正是为了试图界定下面这种社会环境,其中社会又重新战胜了个人的原子化。在这个意义上说,把强阶级用法描述为礼俗社会的阶级观点就较为合理了。

相反,“弱”阶级用法则把阶级视为权力和不平等的一些形式中的一种,它们可存在于任何既定的社会中。这种用法不仅拒绝任何对社会的一元阶级分析,而且也反对任何把阶级地位同群体形态的演变、阶级社会、社会变化以及世界历史过程联系起来的做法。这种方法的典型表现可见于韦伯根据阶级、地位和政党而对权力分配所作的分析。这里,阶级也是起源于经济关系,但这种方法的中心点是关注社会个体所占据的阶级地位的特征。社会阶级的形成只是偶然的可能,但这却为某些意义上的剥削提供了空间。

韦伯的方法是那种被称为激进自由主义阶级观的典型代表。它接受了对现代社会的法理解释并将其作为给定的方法,试图考察出权力不平等影响个体生活机会的市场方面的原因。这就潜在地把法理社会关系作为机会平等的基础,但也为矫正社会条件的阶级不平等留下了

空间，特别是在这些不平等源于市场能力和人力资本禀赋的情况下，则更为如此。阶级的隐喻灵活性使其能够持续地运用于这种极为不同的环境中，尽管它的起源被限定在对经济不平等及其可能社会后果的分析上。

在强阶级用法和弱阶级用法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系列介于二者之间的观点。这些观点的兴起，总的来说是起初形成于19世纪的强阶级用法逐渐式微的结果。阶级仍然被看做是社会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方面，与群体形成、冲突、剥削和变革相联系。另一方面，那种把阶级作为不平等的一元解释和作为历史动力的强烈主张已不再能很自信地前进了。更为典型的是，阶级被设计成为工作场所内经济冲突的一种表现，而一般不能够实现激进的政治表达。这要比弱阶级用法走得更远，因为它不断地强调冲突和集体主义的组织，同时也难以捉摸地去寻找对阶级政治的更强烈的理解。然而，这种探求导致一些人抛弃掉了旧有礼俗社会观的核心要素，比如劳动价值论，同时却保持着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批判，认为它们是不平等的和剥削的。

本章的主旨就是根据韦伯早期关于“弱”法理社会用法的观点，对阶级理论中的礼俗社会因素与法理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做出评价。虽然现在只有相对很少的人还主张强阶级用法，但很显然的是，在礼俗社会—法理社会谱系的“过渡”位置上已经重新聚集起一些观点来。本章所论之处首先在于，任何一种对阶级理论之礼俗社会成分的强调正越来越削弱了。新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自由主义者之间的许多争论，现在都是在法理社会用法的地盘上展开的。非常显著的表现是，在马克思主义和激进主义的话语中采用了理性选择和博弈论的假设。我的论点的一个更显然之处是，关于阶级的法理社会理论为继续存在的阶级分析提供了有限的论据，但这些论据是十分重要的。对现代社会结构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家庭、集团利益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分析，是不能完全舍去阶级分析的。韦伯的激进自由主义遗产在鼓励社会理论家沿着这个方向前进上已经显示了作用，尽管韦伯本人没有能够沿

着彻底的激进自由主义方向来解释市场关系从而把生产和分配同消费联系起来。

## 西方社会思想中的阶级和礼俗社会问题

我们这里很有必要再强调的是,阶级一直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是知识圈内争论的一个社会学概念。阶级的语言,以及在阶级的名义下发动的社会运动,是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化所产生的一个基本特征( Briggs 1976,Williams 1976)。在这一过程中,“阶级”的语言学含义被较大程度地扩展和转变了。起初作为一般分类工具的东西,变成了政治和工业的动员口号和社会分析的话语。在这两种情形下,不平等和剥削的问题都同社会冲突以及如何克服已出现的社会分化问题联系起来。

到那时为止,人们对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的认识,一般是根据级别、顺序和身份的复杂的地位等级。现在,阶级这一新的术语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分工和冲突及其政治行为与文化认同表达的“经济”基础上来。这一转移仍为关于经济过程之实质的准确表达留下了争论的空间。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关于收入分配中交换的不平等关系之相对重要性(如在李嘉图理论中)的争论,与之相对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对生产的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强调。然而,阶级理论中最为基本的“正式”的原则,仍然是并继续是关于社会不平等、剥削、冲突和社会经济关系变化之原因的结构性的定位。不管这些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影响或依赖于政治和文化制度,阶级理论始终是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

我们这样说,就直接面临着一个悖论,即具评价性的、受地位支配的、一般文化价值上的阶级概念和更为学术性的、语言上的阶级概念用法之间的矛盾。不足为怪的是,社会的阶级分类总是和价值评判相关联的。关键在于,人们很难在那种看来是科学的、正式分析程序的阶

级理论与那种潜存价值评判的阶级理论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毫无疑问不是免于价值评判的。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试图确立一个普遍的价值判断标准，正是声称要建立一种社会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由异化、个体原子化和商品拜物教造成的社会问题。虽然交换领域看起来是由那些受制于不被人为干预之自发分配过程的原子化个人所组成的，马克思却在生产领域中看到了一种实质是合作性的企业——尽管目前他们处于高度剥削性的社会条件下。社会改进的潜在力量的形成，不是通过强调个人消费者的市场选择和需求满足来实现的，而是要通过建造一个自由生产者的社会来实现。在这种社会中，个人是完全自主的，但马克思通过一种客观的礼俗社会的劳动价值理论把这些个人集体地联系起来。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具有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农民共产主义的思想来源，它代表着这样一种尝试，即用关于以生产者合作为基础的社会生活的理论解释来取代关于市场交换的法理社会的范畴——价格、工资、利润等等，每一个都服务于自利的社会个体。在马克思看来，我们需要的是价值和剩余价值这样的范畴，以表明市场是植根于更为基本的社会关系之中。在一些社会条件下，更为基本的生产关系可能产生剥削，而在另一些社会条件下，它们本身将为超越剥削奠定基础。然而，这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性的或科学的观点，因为价值和剩余价值这样的范畴包含着强烈的标准判断成分。它们主张劳动——更准确地讲，是生产劳动——的尊严，只适从于市场利润率之非生产性职业的寄生特性，对生活必需品进行选择控制之私人所有权的剥削特性，市场取向之消费的病态实质，以及需要对公平分配原则达成有组织的共识。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应该存在一种共有性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不同的个人需求都可以被衡量并且彼此之间可以互相比较。这里并不认为需求丧失不能比较，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就会瓦解对价值的客观基础的寻找，就会瓦解对一种能够克服“商品拜物教”和消除生产者



异化之社会的重申。在所有这些方面，马克思对个人交换的法理社会关系抱有一种基本的道德同情，因为价值只是主观地同个人的需求相联系。他不能接受把个性的概念看做是脱离社会关系的的东西。马克思坚决否认自由主义会产生出一种社会化个人的理论，能够与社会秩序的存在相一致。这一立场特别具有影响力，以至今天还影响着现代社会理论，其中就包括一个很成问题的公理，即市场交换不能使自身合理化，所以它要依赖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外的合理性资源（参见 Habermas 1976）。

劳动价值论的价值相关特性本身并不否定其社会学功用。但是，这一理论却存在着另一重要的问题，即它作为一种技术性主张的含混地位。我们都知道，马克思的观点认为，我们在哪里看到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和雇佣劳动条件，哪里就必然有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剥削存在。换言之，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并不能获得它增加到潜在商品上的全部价值。劳动所创造价值的一部分被抽出变为剩余价值。离开这一点，就不能进行下一步的资本积累。

正如约翰·罗默（John Roemer 1982）指出的那样，这种观点的一个很大的逻辑错误在于，它能被人们应用到经济活动可利用的任何一种资源上。实际上，任何一种商品通过在生产过程中的价值添加，都能够生产出多于自身所体现价值的价值。如果我们选择谷物作为一种普遍等价物或价值尺度，我们能计算谷物所体现的具体商品价值。从中我们可以得出，只有在谷物被剥削的情况下，经济才能生产出剩余——也就是说，一单位谷物的价值要少于其真实价值。

这一见解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作为普遍等价物的劳动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地位，因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有缺陷的。考虑到这一理论的价值评判相关性，它的意义在于，我们一般来说对人和人类劳动的关注要重于对谷物的关注。这一理论相应的礼俗社会道德意义来自这样的信念，即人是不能被“剥削”的，但可以不关注对物的剥削。如果我们想根据罗默的观点重新创立一种剥削理论，我们就必须要到其他

的地方去寻找。罗默自己的理论运用了本质上具有法理特征的博弈论和理性选择的假设。他认为剥削存在于下面这种条件下：如果一个人或一组人从当前的生产关系中退出时，能获得比自身处于一关系中时更多的利益。这里，剥削并不是同关于一种自由生产者社会的规范性假设联系在一起，而是在于使个人收益最大化的功用最优策略。这一探求正是在寻找使个人收益最优化的一种法理社会形式。

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国家将最终“逐渐消亡”。这一主张再次让人们忆及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农民礼俗社会。在马克思看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生产者只是在必要的条件下才需要国家，而这种国家是与礼俗社会机构不同的。随着后革命社会制度下生产的发展，这种条件也逐渐消失，独立的国家机构也就不再需要了。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对过多工作分工的礼俗性批判，尽管这不是要回归到“原始的”共产主义。

在这些礼俗性的因素中——人们最低限度地需要特殊分工的机构来从事交换调节、社会结构整合、国家管理等等——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代表着新出现的社会力量，它们具有像社会共同体那样的必要特征。此前，无产阶级一直集中在工厂里，在资本积累的强制下，特别是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条件同质化。这种同质化，以及造成的阶级结构两极分化，鼓励集体的情绪去消灭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在自由生产者之道德经济的评判标准下，资本所有者和非所有者之间的社会差异，以及造成的等级性的劳动分工，也就不能维系下去了，因为它违反了生产者之间的礼俗性期望和联系。因为资本需要雇佣劳动才能存在，所以现代无产阶级如果不消灭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就不能作为一个阶级获得解放。然而，无产阶级社会的革命政治动员与准备建立一种人类礼俗社会所需的条件是一致的。在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中，马克思相信自己发现了即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首创行动。

从马克思以来的一个世纪里，阶级的语言经历了双重的不断变

化。一方面,对地位的关注一直持续于阶级范畴中,这反映了凸显道德性征之评价性词汇的延续。另一方面,理论家们一直在寻求一种更具社会学意义的词汇,将其同可观察到的经济生活的结构特征和社会活动联系起来。“阶级”已经变成一个“速记”概念(简单的标识),是在人们讨论社会-经济群体、政治行动和文化行为时,看来还不能舍弃的词汇。而且,其含义和知识功能的模糊性看来正以比以前更为混乱的方式扩散。

“中产阶级”这一普遍使用的术语,从马克思时代以来逐渐凸显于阶级话语中,它是等级因素同劳动分工中结构性位置之社会-经济特征相结合的生动例子。在三种阶级划分的图式中,中产阶级经常具有“上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复合含义。然而在这一框架中,中产阶级的实质和界限从来就不是清晰的。它反映的是土地所有者(上等阶级)、资本所有者(中产阶级)和工资薪水争取者(工人阶级)之间的区分呢,还是指资本所有者是上等阶级,像专家、经理和服务提供者那样的薪水工人是中产阶级,雇佣工人是工人阶级呢?人们是很难理清这些问题的,因为中产阶级这一术语本身既能够表示地位等级顺序(诸如上层的中产阶级、下层的中产阶级等等),也能够作为对具有实质差别的社会-经济位置的结构性解释,尽管使用的是取自通俗文化的术语。

虽然人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阶级的普遍性概念含义以及许多其他的阶级标识包括很强的地位评价性因素,但这并不排除那些主张对阶级进行结构性解释的观点。这样的解释在下面这一范围内是合理的,即个人可以进入的一系列位置的形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强阶级用法中,以及在其所有的礼俗含义中,如果不求助于价值评判的文化标准,就很难把阶级位置的多样性合并在同一范畴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些文化标准,包含着道德的问题,诸如“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相对,产生有机共同体的能力与产生个体的简单相加能力相对,等等。关于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考虑,规范着关于社会

是什么样的这种显然科学性的话语。在这一过程中，强阶级用法的理论家现在发现自己已处于守势，因为在 20 世纪晚期法理社会关系已经发达的条件下，19 世纪的那种礼俗社会成见对市场资本主义的批判看来已越来越不合时宜了。

## 强阶级用法的式微

在近来的社会分析中，强阶级用法的式微表现在三个主要的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对礼俗社会阶级理论的越来越多的拒斥。这一理论把“阶级”描述为具有组织利益性质的，表现在具体的“阶级”代表者或机构之中。这一问题被赫斯特（Hirst 1977）非常明确地提了出来。他认为像这样的阶级是无法行动的，如果根据阶级之间直接的联系和交往，政治也就无法运作。相反的是，我们发现政党、运动组织、工会及雇员组织、暴动群体等等这样的组织团体，它们是“阶级”的最好代表，尽管只是间接的代表。那种认为特定的组织“代表着某一经济地位的阶级的观点，或是简单地接受了关于一个政党、组织或机构代表着某一阶级的主张，或是认为政党的纲领和行动一定符合那个阶级的‘利益’”（Hirst, 1977: 130）。

接受前者的主张，就意味着非常天真地接受了关于组织性的表面浮夸言词。接受了阶级“利益”形成于经济之中并表现在政治上的观点，是假设了一种关于利益的组织同质化，并假定这一利益是独立于“政治”而形成的。这后种选择代表了一种不可接受的经济主义。赫斯特的结论是，“在经济的阶级与政治的（及其代表的）阶级中出现的力量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阶级并没有什么‘利益’，即明显独立于确定的政党、意识形态等之外，以及这些政党、意识形态等要根据这种利益被衡量”（同上，130~131）。

对组织性阶级理论和经济阶级与政治行动之间组织性联系的挑

战是很有冲击力的，因为它们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坚持的观点，而且这一挑战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主流传统观点是批判性的。我们这里认为，它代表着这样一种尝试：既要避免关于阶级是社会—政治意义上的社会共同体的假设，同时仍要继续保留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不平等和政治冲突的观念。当然，还存在一系列其他的观点，究其实质，就是主张生产上的经济不平等可能导致局部的和工具性的冲突，而不是直接的政治动员和激进化（Goldthorpe et al.1969,Mann 1973）。这种批判或导致人们根据非组织性的法理关系对阶级重新定义，或根据偶然的事件把阶级分析作历史相对化阐释，认为经济阶级是要适应社会阶级的（Thompson 1968）。

然而，第二个相关方面的挑战来自于发展起来的历史怀疑主义，它质疑对工人阶级的社会历史作普遍民众式（ouvrierist or rank-and-filist）解释。虽然对基层民众社区层次运动的研究在矫正早期对劳工历史的制度性偏见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参见 Holton 1976），但过分强调这一问题，以至排斥地方主义、工具主义和非经济的社会分化，这造成了对工人阶级历史的过于浪漫化的歪曲。从最坏的结果看，这个流派一直在寻找礼俗性阶级关系的经验证据，却不去验证它的典型性（特别参见英国历史工厂运动的文献）。比较而言，还缺乏像约翰·福斯特的《阶级斗争和工业革命》那样的权威性著作（John Foster 1974），验证在不同的结构条件下阶级形成的力量和局限。相对来说，也缺少像加雷思·斯泰德曼·琼斯关于 19 世纪晚期伦敦工人阶级政治和文化的那样开创性文章（Stedman Jones 1974），研究阶级共同体的消解。

强阶级用法式微的第三个方面的表现，是对劳动价值论以及关于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之区分的支持的衰弱。正如我们看到的，这里的挑战认为这些范畴具有过于强调道德意义的以及经常是形而上的特征。在那种自称是“不说大话”（no bullshit）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种理论把黑格尔哲学、劳动价值论和对阶

级的组织性构建搁置一边，而支持理性选择模型和对制度框架的批判，认为这种框架歪曲了个体利益的成果。

知识氛围中发生的这些变化当然与现代西方社会的结构和文化的变化密切相关。首先，重工业和联合运输领域的职业减少，它们都是通过职业共同体（例如矿工、造船工人和码头工人等）形式组织起来的。职业共同体的衰落显然是与礼俗性阶级观的式微相联系的。这种趋势随着向组织更为分散的服务业工作的转移而进一步加强了。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私人家庭所有制、汽车所有制的扩散和家庭个人主义的总体扩张。家庭所有制，以及相伴随的经济重组，已经瓦解了许多传统的工人阶级共同体。

第二，阶级投票的衰退，以及在一些西方社会中工会和左翼政党成员人数的减少（例如美国的工会、英国的工会和左翼政党等）。诸如女权主义、和平运动和生态运动这样的新社会运动，既不是以工作为中心的（传统意义上家庭之外的付薪工作），也不是有具体的阶级特征的（Feher and Heller 1984, Gorz 1982）。女权主义把性别关系、个性发展和家庭中的性政治理论化，这特别地侵蚀了大规模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和 workplace 导向的“阶级”礼俗社会。女权主义理论不仅拒绝那种关于女性从其丈夫或父亲那里获得自己经济“阶级”的观点（Allen 1982），而且在某些事情上走得更远，以至把阶级重新规定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剥削关系（Wally 1986, Dalphy and Leonard 1986）。

这些变化也促进了更有差异的有产阶级概念的出现。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个组织一致的、完全同一的统治阶级（Abercrombie, Hill and Turner 1980），而 19 世纪中期以来有财产、有资历的社会地位的不断分化，更降低了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强阶级用法，以及那种认为劳动和资本这两个有组织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不断两极分化的观点，现在已被大大地修改了，一个显著的例子可见于新阶级理论或服务阶级理论之中。如果说早期关于资产阶级和经理阶级之间的区分是没有定论

的话,那么现在则有越来越多的要求在基于财产的和基于知识或资历的阶级地位或阶级战略之间作出区分。这样的辩论部分地得到了下面这种认识的支持和鼓励,即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层级分化现象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明显,如果阶级这一概念被用作为理解经济不平等条件下社会群体形成的一种工具的话,那么除了对资本主义进行阶级分析外,很有必要发展起一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分析(Djilas 1966)。

显然,追求确立一种更为普遍的阶级理论的可能性是很有价值的。这种阶级理论不仅仅同私人所有制相联系,而且也同社会主义社会中造成不平等的那些特征相联系。这种探索使达伦道夫建立了一种新韦伯主义的权威关系(authority-relations)标准,来作为阶级划分的一般性基础(Dahrendorf 1959),不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是如此。然而,这种进步是通过抛弃有组织的阶级共同体形态而取得的,它倡导追求在任何“有必要协调的组织”内的阶级分析。

在艾里克·怀特(Erik Wright 1985)的第二阶级模型理论中,共同体观念也消失了。这超越了他的第一阶级模型,主要是因为把所有权和权威关系融合起来。在第二模型中,怀特试图根据不同社会制度下个人控制各种财产的方式来界定阶级(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人所有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组织)。

强阶级用法的消蚀并没有以任何简单的方式导致阶级理论本身的衰落。尽管新右翼口口声声地说要重新设置知识和政治议程的术语,仍然存在一些引人注目的努力要重构“中间的”或“尽可能强的”的阶级理论,它们不再有令人反对的因素,而更加适合于20世纪晚期的社会条件。然而在这样一个时代,“工人群众已发展起反映……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经济计算的制度”(Marshall et al, 1985: 271),新右翼某些领域中重新兴起的自由主义社会哲学的挑战是不容易被轻而易举地规避的。

这种复苏首先是阶级分析家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许多人还继续

把自由主义视为怪异的和过时了的返祖现象，它试图恢复主权个人的神话世界，而这即便在约翰·洛克时代也不曾存在过。然而，这种普遍的反对是错误的。特别的是，它没有理解法理意识中的民众愿望。这一愿望要求承认个人自治，承认私人家庭同强大的文化和政治控制的区别。大众文化并没有经历现代国家扩张的公共功能毫无疑问是好东西的现实，也不是及时地拯救法理社会原子化的工具。所谓的法理社会原子化，却被许多人体验为是一种“自由”——最为突出的是决定自己的价值和目标的自由。

这里可能经常会产生一种幻想，即认为家庭能够在没有对公民权利的潜在公共支持的条件下可以独立存在。同时，正如许多后现代理论一样，原子化问题可以被有效地重塑为文化的多元化。在我看来，就其彰显了多元生活世界之存在的意义而言，这为那种被人们典型误称的原子化提供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社会学基础。但在这个框架内，不平等又是什么呢？是否像那种支持自由主义凯旋的观点认为的那样这一概念应该消失呢，或是它还应该保留一些分析的锋芒？

在这种环境中，考察各种重构的阶级理论在现代社会之法理特征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还能具有多大的力量，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这使那种这里称之为“弱”阶级理论的另一种用法有了发挥作用的空间。然而，这种用法的知识连贯性和解释力量是很难被领会的，除非我们准备接受这一立场，即自由主义在理解经济不平等、社会分化、文化认同和规范秩序的过程中提供了真正科学的洞见。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和自由民主主义政治理论之抽象特征的评论并不代表着对自由主义之最终的和决定性的评判，尽管它们被经常地提及，仿佛表达了一种恒久的和不言自明的真理。这种情况下，我们很有必要去考察马克思·韦伯的阶级理论和经济社会学，将其视为对自由主义的法理性阶级观的一种经典表述。



## ☞ 马克斯·韦伯,市场关系和向法理社会的转变

马克斯·韦伯的著作在“弱”阶级用法的表述中代表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人们对他的立场和主张还存在许多误解,所以这里很有必要澄清他的一些核心观点。首先,韦伯阶级理论的出发点是关于市场——法理社会关系的典型汇集场所——的一般理论,而不是生产方式。市场是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其中稀缺资源得以配置以满足各种目的,这是通过个人的行为实现的。“法理社会”一词意指的是个人的自愿契约组织——是以自愿交换为特征的社会的股份公司。韦伯的市场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奥地利新古典主义,他沿袭了十分重要的方法论个人主义(Holton and Turner 1989,第二章)。

市场可能是工具性目标选择的典型例子,因为它构成了一种清醒的、非人格化的领域,受成本—收益之利益计算的支配。韦伯不是把市场仅当做无情的金钱纽结,其反组织性的、非浪漫的观点,使他把市场当做一种现代理性工具,它既能使人做什么,也能约束人的行为。市场行为中包括的目的与手段、价值和方法的区分,使得成本—收益的考虑和计算不受最后的道德考虑的经常侵扰。这不仅使行为者确定实现既定目的的最好手段,而且也能够在此可能的目的之间进行更为理性的选择。然而,目的结构是分布于个体之间,而不是在共同体中。随着“上帝之死”和这种世俗的西方理性主义的主导,我们正处在必须表明自己的价值、尔后去追求其成功实现的社会环境中。再也不存在有组织的共同体来决定我们的价值,这样也就不存在确定一种劳动价值论的客观基础。虽然个人能够走到一起形成一种自愿的组织,但他们这样做,完全是作为个人的。这意味着一种激进的主观主义以及个人目的的合法性,但不是对目的来源的主观主义理解。这是在社会中产生的。因此,对经济行为的制约就不仅是技术性的——如何运用稀缺资源的问题——而且是文化的:即,选择什么。

另外,正如我们看到的,韦伯的“社会经济学”把市场视为通过权力关系形成的组织。我们不是简单地处理一种非人格关系,而是处理一种有效的理性工具,以把手段分配给各种目的。因为市场同时也提升和约束生活机会,这是权力分配不平等的一个结果。在韦伯看来,这样的不平等被概念化为阶级地位。若没有这种权力不平等因素,也就没有阶级分析的必要了。因为不同的市场结果有可能被归属于个人理性的不同(例如,知识上的差别与判断的错误),或归属于技能上的固有差别。

韦伯关于市场权力讨论的关键是不同的生活机会这一概念。不同的生活机会是所有权上的和对市场资源控制上的不平等造成的结果。对个人生活机会和个人流动机会的强调,当然是完全典型的对阶级的法理构建。韦伯的许多评论家对生活机会这一概念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绝大多数评论都坚持对阶级理论的二元划分,或者以生产为中心,或者以交换和(或)分配为中心。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一般被认为是以生产为中心,而韦伯的阶级理论是以交换和(或)分配为中心(例如参见 Crompton and Gubbay 1978)。然而,当我们试图准确地判定市场关系在哪里能够适合这种两分的时候,这里就为很多混乱留下了空间。

韦伯对市场交换的关注显然重于对生产的关注,这并不排除他和马克思具有某种相同的基础。两个人都对由权力和收入的分配造成的市场不平等之重要性感兴趣。韦伯和马克思不同的地方首先在于他认为市场对于阶级是很重要的(Marshall et al.1985)。第二,韦伯努力做到彻底不需要那种客观的礼俗社会价值理论。在这个意义上说,生产过程中的所有权,不管是怎样的不平等,也没有必要被描述成是剥削的。第三,韦伯始终坚持生产资源配置过程中基于市场的权力冲突,再到收入分配方式以及造成的对主要生活机会(比如教育)的接近。

韦伯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理论的实质,集中于包括权力、所有权和资源控制的不平等的复杂性。这里包括两种不同类型的的不平等。第一

种以所有权维度为中心，拥有的资本资源量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生活机会情况（例如，靠股息生活的人和没有所有权的个人）。韦伯的所有权标准和马克思的类似。韦伯论述中的第二个维度包括对市场技能的拥有情况，围绕这一点，在分析上看，商业阶级的地位形成了与所有权阶级地位的不同。在这第二种维度中，那些拥有市场技能的人，比如经理和专业人员，是与非熟练工人十分不同的。这当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维度，而这是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中所缺少的——能够分析如领薪金教授那样的中产阶级的市场技能，既与资本家不同，也与工人阶级不同。这也预先描述了最近发展起来的新阶级理论（Gouldner 1979）。这种情况下我们强调的是，我们讨论的是阶级位置，而不是此类的阶级。依韦伯看来，这种的位置安排是等级性的，没有必要形成那种二元两分的理解。这种市场中个人权力不平等的等级模式是建构在法理社会的基础之上的。它为人们留下了分析空间，以讨论某些基于市场的不平等是个体之间不同人力资本禀赋的表现，而不是工人阶级共同体所受剥削的体现。从这个方面讲，韦伯的分析实质上是现代的，同个体目标的绩效导向追求相关联。

这样就促使韦伯关注把生产和交换中的权力差别同分配结果连接起来，这是因为他反对马克思关于阶级结构极化的理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私人资本积累是如此有效地使社会极化，以至于分配问题只具很有限的重要性。相同的劳动技能条件使得工人阶级的命运越来越趋于同质化，地方观念和特性被资本的全球结构性支配所瓦解。根据马克思的礼俗社会标准来衡量，资本主义社会总体上的实质特征就是完全的异化。在市场领域，对个体的命运非常冷漠，也不考虑由个体来处置真实资源。这样，也就没有为人们分析受市场不平等之分配维度所影响的社会流动留下任何理论的空间。马克思同样也没有为人们理解私人消费策略留下空间。而个人消费涉及储蓄，涉及购买诸如住房、交通工具、旅行等提高生活水平的物品和服务。

另外，韦伯把像阶级这样的礼俗社会概念的形成问题当做是一种

偶然现象,而不是社会变化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阶级”的概念具有某种相互依存的一致性特征,而它的形成是一系列个人在许多的市场机会中具有同样的流动机会。韦伯把自己身处的 20 世纪早期的欧洲社会划分出四种社会阶级:(a)工人阶级;(b)小资产阶级;(c)无财产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d)通过财产和教育获得特权的阶级(Weber 1978:305)。

虽然韦伯没有更深刻地发展关于社会阶级的讨论,但是由此得出的逻辑推论是,社会阶级的形成至少需要两个起码的条件:第一,在有限系列的阶级位置中移动的共同流动机会;第二,权力差异阻碍向其他位置的流动。

这样,韦伯的社会阶级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一种偶然性的因而在某些程度上是流动性的位置。经济发展过程中进一步的结构性变化可以改变社会流动的机会,引起既存的社会阶级的可能解体,造成新阶级的可能发展。根本不存在逻辑的原因以保证社会阶级的持久,也绝对没有什么空间留给那种根据特殊阶级的“历史使命”对历史作目的论的解释。

韦伯关于阶级解释的最后一个维度涉及被很大程度上误解的阶级、地位和政党之间的关系(关于对这一关系澄清的文献,参见 Giddens 1973:41~52)。韦伯的评论家现在很少倾向于把这三个名词解释为阶级、地位和权力。文献中十分清晰地表明,韦伯的意图是阶级、地位和政党之间进行区分,不是作为社会分层的不同的基础,而是作为既定社会中权力分配的可选择的基础。

依韦伯看来,这种反简化论之多维性的理论支柱是无需证明的命题,即每个人都既有物质利益也有精神利益,二者中的每一个在认识论上都没有优先性。从这方面讲,阶级位置可能同等地处于由地位利益(例如,种族和少数民族劳动市场的关闭)所支配的劳动市场中,因为地位的差异可通过“区分和统治”(divide-and-rule)策略被用于保护权势阶级的利益。通过这种方式,阶级和地位在某些情况下可以

是互为补充的。

关于马克思－韦伯的比较并没有为人们评价韦伯对阶级理论的推动作用提供惟一的优势，因为这些比较未能充分地解释试图扩展和重新界定韦伯遗产的努力。近年来这方面最重要的尝试，是把韦伯关于市场不平等和市场分配结果对阶级结构之影响的关注，延伸到住房和消费的领域（参见 Rex and Moore 1967, Dunleavy 1979, Saunders 1978, 1981, 1984, 1987, 1990a）。这一系列的讨论代表了法理性的阶级理论——弱阶级用法——的重要扩展，以及代表了那种维护中间性阶级用法（intermediate class idiom）之尝试的复苏，以尽可能多地保留强阶级礼俗用法所具有的东西。

## 结 语

在最近的 40 年里，强阶级用法的优势已经瓦解了。在知识的层面看，这一过程的发生至少要归功于韦伯的潜含不明但富有影响力的关于弱阶级用法之法理性概念。当然，这种弱阶级用法并非没有受到挑战。但是，那种试图平衡中间性或“尽可能强的”阶级用法的努力，是以放弃劳动价值论为代价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把理性选择理论利用到了阶级分析上。

即便是吉登斯(Giddens 1973)的较为温和的下述建议，即把阶级分析的重心从经济阶级关系转变到社会阶级形成问题上来，这也似乎显得越来越多余了。在完全成熟的法理关系已在现代消费主义中形成和个人公民权不断扩展的情况下，看来新韦伯主义阶级共同体意义上的社会阶级理念已不再有多少空间了。

这将使我们继续讨论下面的问题，即阶级分析是否应该重构以用来分析职业结构中的社会分层与不平等的关系（对这一选择的强调论述，参见 Goldthorpe and Marshall, 本书第七章）。这一类型的探讨在根据社会流动模式来进一步理解个人生活机会的变化上，是非常重要的

的。然而，正如克罗姆顿（Crompton 1993:116~117）所指出的，围绕戈德索普（Glodthorpe）及其同事的著述所争论的实际问题，并不是诸如社会阶级的东西，而是“就业结构中的长期性发展”，“职业性不平等的继承”，以及“职业作为态度调查中的一个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接下来的结论正如霍尔顿和特纳（Holton and Turner 1994: 801）所表明的那样，是把阶级和职业方法作了过度的区分，“而以更广阔的经济权力和社会行为维度为代价”。从而，阶级就被降至为“只与实际的意识或行动发生非决定性关系的一种统计上的集合”。

所有这些并没有否定市场经济或政治权力结构中的显著的社会冲突的存在。然而，这一般是或者采取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例如，工会、有组织的雇主和国家）之间受规范的冲突形式，或者通过那些关于环境、妇女权利等的社会运动采取非阶级的抗议形式。所有这些看来使阶级越来越成为多余的问题，除非它在弱用法意义上，作为描述产生和再生不平等之经济权力关系形态的工具而存在。

## 社会阶级正在死亡吗？<sup>①</sup>

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Terry Nicholls Clark)

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

新的社会分层形式正逐渐形成。为抓住和理解这些新的发展，我们关于社会分层的许多观点——从马克思到韦伯和其他人——应彻底加以改变。社会阶级是过去关于社会分层著述的关键性主题。然而阶级已是越来越过时的概念，尽管它有时适用于早期的历史阶段。阶级分层意味着，根据一种或多种标准把人们划分为截然不同的层次和阶级。阶级分析在最近的几十年里越来越显得不足了，因为传统的等级秩序已经衰落，新的社会差异也出现了。这些变化的累积影响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分层的性质——要求我们对过去的理论加以切实的修正。

本文首先概述了关于社会分层的来源及其衰落的一些总体性观点，重点强调了阶级的衰落及这种情况在地域上的扩展。这些总体性的结论适用于政治党派及意识形态分歧、经济、家庭和社会流动。这些

---

<sup>①</sup>摘自《社会阶级正在死亡吗？》，有删改，《国际社会学》6:4, 1991年12月, 397~410。

发展变化大多明显地出现在北美和西欧，但我们的观点也有助于解释那些促使东欧、苏联和其他国家发生变化的紧张关系和因素。

我们一般遵循马克思和韦伯的观点，把社会阶级理解为这样一种社会差别，它产生于不同社会领域的人们之结构性的社会经济生活变化之中。社会阶层可产生于对生产资料的不同使用（如马克思所强调），或者是对贸易或消费的不同使用（如韦伯所说）。如果这些社会划分形成不同的主观看法、文化和行为方式，就会产生阶级意识。

如果仔细研究最近几十年里有关阶级方面的理论，我们就会感到阶级发生了何等明显的变化。当然，这些理论中论述的变化不是直接显露出来的，因为绝大多数理论家声称自己直接承袭了马克思和韦伯的理论。但实际上很多人基本上变换了阶级这个概念，朝着我们所说的“分层的分裂”。（the fragmentation of stratification）这一方向发展。这里我们仔细考察一些阶级理论和社会分层的情况。达伦多夫（Dahrendorf 1959:157~206）强调指出，很多方面的社会分化并未导致阶级冲突的爆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革命观点，工人阶级应该遭受悲惨的命运并变得更加同质化；资本家们则要联合起来反对他们。可是达伦多夫却强调“劳动的瓦解”：工人们在技术水平上的不同而使他们之间差距加大——可分为熟练的、半熟练的和不熟练的工人。工会常常分化他们，而不是把他们联合在一起。可能更为重要的是白领非体力劳动工人这一“中产阶级”的扩大。马克思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样的中产阶级的存在，并预期他们既有可能发展成为资本家，也有可能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相反，这个阶层却充分发展起来，并且内部产生分化，尤其是低收入的雇员和经理之间的差异尤为明显。达伦多夫本应摒弃阶级这个概念，然而相反，他却保留了这个概念并重新加以界定，把政治和社会冲突中的所有群体都囊括其中，认为“‘阶级’表示的是这样的冲突群体，它们产生于那种必须加以协调之群体中的有差别的权力分配”（Dahrendorf 1959:204）。

同达伦多夫一样，许多作者延用了马克思的术语，但实际上却改



变了这些术语的含义。埃里克·怀特 ( Erik Wright 1985:64~104 ) 试图作出同达伦多夫同样的理解和改变。他的做法是把“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阶级地位类型”划分为 12 个种类, 它们包括: ( 1 ) 资产阶级, ( 2 ) 小雇主, ( 4 ) 专门的管理者, ( 5 ) 专门的监督人员, ( 8 ) 半资格的监督人员, 然后一直到 ( 12 ) 无产阶级。很明显, 这种类型划分不仅仅根据所有权, 同时也包括技术水平和管理责任。令人吃惊的是, 怀特作为一位自我标榜的马克思主义者, 却综合了如此多的后韦伯主义的各方面因素。

这些分析着重强调工作场所内部关系的变化。然而, 工作场所外部的社会关系对社会分层越来越重要。如果无产阶级在吃饭、穿衣和生活方式上的确不同于其他群体, 他们就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或行动表现为在政治上具有显著特征的阶级。在整个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 情况往往如此, 正如小说中和社会学家们所描述的那样。帕金 ( Parkin 1979:69 ) 强调社会阶级的特征在不断淡化, 他认为这就会使“无产阶级地位中的共同成分不断受到侵蚀,” 特别是, “没有了明显的和明确的低等地位的标识, 会使那种遍及各领域的顺从体系无法在直接工作场所之外维系下去。要想辨别出周六早晨大街上熙熙攘攘的购物者是属于哪个阶级的, 必须要有非同寻常的眼力, 而这对前代人来说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了。”

同样的分化趋势也出现在对政治领导层和权力的评判中。那种潜存于马克思、帕累托和莫斯卡的统治阶级理论背后的精英主义和等级性假设越来越削弱了。亨特的《共同体权力结构》在 1953 年发表, 他肯定了许多社会科学家关于上层阶级权力由精英控制的观点。然而在以后的 30 年里, 这种阶级统治的观点被多元的、多维的概念化所代替。这种范式的改变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它是从对国家和共同体权力进行的约 200 项研究中逐渐得出的, 同时伴随着关于权力精英和阶级统治的大量辩论 ( 参见 Dahl 1961, Clark 1975, Clark 和 Ferguson 1983 )。希尔斯 ( Shils 1982:31 ) 强调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认为到 20

世纪晚期，“这些情况看来导致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莫斯卡关于政治阶级的概念将不再适用于我们当前的社会了”。

社会阶级的概念应该抛弃吗？在 1959 年的一次观点争论中，奈斯比特认为，“在当今的美国，阶级概念对于澄清关于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的资料来说，几乎毫无价值可言了”（Nisbet 1959:11）。在同一杂志上，伯纳德·巴伯（Bernard Barber）和邓肯（O. D. Duncan）反驳了奈斯比特的观点，认为他的结论是没有事实根据的，需要进行更深刻的分析和提供更有力的证据。这已经是 30 年前的事了，但直到今天，阶级在社会学家的理论中和评论界中仍然占有突出的位置。我们认为不应把社会阶级这个概念彻底抛弃，而应通过其他因素对其进行补充。


由于很多研究分层的分析家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欧洲，因而他们更久、更广泛地使用阶级分析，而较少据以经验的证明。美国的分析家常常采取守势，认为美国不知为何总是“落后”于欧洲。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者是最直言不讳的，但他们不是惟一持有这样观点的人（如 Wilson 1978）。然而随着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事情发生了较大变化，美国看上去常常更像是领头兵，而不是落伍者。这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显得更为明确了。这个时候，前共产主义国家发生了剧变，首当其冲的是东欧国家，它们试图抛弃由中央控制的等级计划经济，而转向自由经济市场和政治民主。

这些变化对分层理论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最重要的一点是，传统的等级制<sup>①</sup>正在衰退；经济和家庭方面的等级制也仅存在于此前一两代人。有三个基本的命题阐释了这个论点：

(1) 等级制产生并维系着严格的阶级关系。在一个社会

---

<sup>①</sup>关于等级，我们的理解是，根据诸如收入、地位或权力等特定的标准，对个人和亚单元的垂直划分。等级可以是连续性的，把人们从低到高进行排列，但不一定就包括任何明显的阶级。



## 关于阶级的冲突 *Conflicts about Class*

群体中,人们之间的等级区分(垂直的)越大,其阶级层次的划分也就越深。

由于等级制的程度在一个社会中是变化的,我们还认为:

(2)在每一单独方面<sup>①</sup>(或单独的纵向维度,如经济机构、政府组织和家庭),等级区分越大,在知识性的社会关系、文化观点和对社会变化的支持上,如对社会运动和政治行为的支持上,由阶级所规定的模式就最为明显。

(3)但是相反地,等级制越是衰落,结构性的社会阶级关系也就越明显地削弱。

而且在一个社会中,证明等级制已衰落的例证越多,这个社会中的阶级关系就越弱。随着阶级冲突的减少,冲突也就可能随之减少,或者冲突会围绕其他的方面发展起来(例如,按性别)。并不是所有的等级制都能产生对抗行为,只有在人们充分接受了民主进程,才能使反抗行为浮出水面。法律机构、媒体和其他机构越是允许表达或提高社会冲突的清晰度,反对等级制的主题传播得就越广,赢得的社会支持也就越多。

现在我们根据我们的三个基本命题来考虑社会不同方面的分层情况。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都考虑了使社会阶层衰落的具体力量。各层面的累积结果使得社会分层的新体系得以形成。

### 政治:阶级淡薄,分裂加强

政治行为是评定社会分层变化的一个最好领域。它对于马克思和

---

<sup>①</sup>我们修改了从贝诺伊特-斯马利安的著作(Benoit-Smullyan 1944)中获得的“方面”(Situs)这一概念,用以指称社会组织中并列的但却是不同的部分,每一部分都多少有其特定的游戏(或文化)规则。

韦伯的思想来说非常重要,今天看来更是非常鲜明了;人们对它做了详细的研究;它也允许对相互竞争的假设进行检验。利普塞特在他的《政治人》(*Political Man*)第一版(Lipset 1960)中特别强调阶级政治。但在该书第二版中(Lipset 1981,尤其是459页及后面的部分),他重点强调了阶级选举的衰落。对这种变化的很好描述,是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奥尔福德阶级选举指数(Alford Index of Class Voting)所显示的结果。这个指数是基于人们按社会阶级特征对左翼或右翼政党的投票支持比例而得出的。例如,如果75%的工人阶级投票给左翼政党,而只有25%的中产阶级这样做,那么奥尔福德指数值就是50(两个数字的差额)。奥尔福德指数在数据可用的每一个国家,都显然下降了(见Lipset 1981,Clark and Inglehart 1991[修订本])。

是什么在取代阶级呢?传统的左-右维度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虽然人们还提及左的或右的,但它们的含义却不同了。现在存在着两个左翼,但其社会基础各不相同。传统的左翼以蓝领工人为基础,强调与阶级有关的问题;另一个左翼出现在西方社会(有时称为新政治、新左翼、后中产阶级或后物质主义),他们越来越强调社会问题,而不是传统的政治问题。它们集中讨论的问题不再是有关所有制和生产资料由谁控制的问题,并且在很多社会主义政党,甚至是共产主义政党中(在20世纪70年代的意大利,在20世纪90年代的东欧),这些新问题的支持者正在取代旧的。

政治问题会随着富庶而发生变化:随着财富的增长,人们把基本的东西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更加关注生活方式和舒适程度。那些青年人在更为富庶的和等级程度较小的社会里成长,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拥有更多的财富,所以他们应是更远离传统的阶级政治的。

这些趋势与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和阿兰·图来恩(Alain Touraine)所提出的“后工业的”趋势是一致的,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 1990)提出的“后物质主义的”(早期被称作“后中产阶级的”)模式也是一致的——强调通过审美理性和参与关

心达到“自我实现”。斯科特·弗拉纳根 ( Scott Flanagan 1980 ) 提出从传统意识向自由意识转变。但人们不应夸大这些变化：艾伦·马什 ( Alan Marsh ) 在分析了英国数据后指出，“物质主义者”和“后物质主义者”在想拥有足够金钱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后物质主义者的“显著特征是相对年轻、富有、受教育好，并关注思想文化” ( Marsh 1975:28 )。

### 经济组织变化:新市场个人主义的源泉

一种简单但强大的变化影响了经济:增长。经济的增长能瓦解等级制阶级分层。富足能削弱等级制和集体主义,但它却能增强个人主义。收入越多,穷人就越不依赖富人,而所有这些都日益纵容了更为多样和变化的趣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市场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显著地发展。但是随着这种复杂性的增加,会使中央计划更为困难;分散的、对需求敏感的决策成为必然。这些差异特别地影响了像前苏联这样的中央计划国家,但是它们也同样影响到像通用汽车和美国钢铁这样的公司。

许多私人物品源源不断地从多种多样的、半市场导向的小公司流进,尤其是在诸如“思想库”、金融和办公室活动这样服务性强的领域。相比之下,大的公司相对衰退,尤其是那些钢铁和汽车类的传统制造业公司。大约有 2/3 的新工作都集中在人数只有 20 或更少的公司里,很多国家都是如此 ( Birch 1979 )。这些小公司的出现是由于它们比大公司更有竞争力。为什么会这样呢? 技术和管理方式是决定性的因素。

技术和知识基础越是先进,就越是难以进行事先计划和行政控制。在大的公司内是这样,对于中央计划者来说更是如此。技术的变化解释了新经济模式怎样变得不再是公共控制与私人控制的关系问题,而是不可避免地挫败了任何人进行的等级制控制。由于研究及其发展

对新产品和技术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公司的管理者就更不容易对公司进行远距离的指导和决策,而对寻求进行集中计划的外部管理者和政治官员来说就更难做到了(如前苏联的五年计划,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某些塑料公司竟然有1/3的员工在为新产品进行化学研究。计算机、生物工程和机器人技术等,说明了许多领域不一定受预测和中央控制的影响。

这些经济变化对社会分层的重大意义,是传统权威、等级和阶层关系的衰落。同传统的钢铁、汽车等制造业相比,如今的技术不太需要那些非技术工人来进行常规作业,或需要大的中级管理阶层来协调他们。高技术意味着常规作业的不断自动化,同时也需要更为专业的独立决策。更为平等、合作的决策越来越被视为现代社会的明显特征。从分析家哈贝马斯和帕森斯,到丹尼尔·贝尔和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或是那些商业学校的顾问们,他们讲授新“合作文化”的重要性——《寻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Peters and Waterman 1982)一书对此作了论述。该书曾一时雄居美国非小说类销售榜榜首,被美国和欧洲商界精英广泛阅读。甚至前苏联学者早在1969年就指出,“生产力大规模的质变是科技成为社会生产发展中的主要因素的结果”(Richta et al. 1969:39)。正在扩大的职业是白领的、技术的、专业性的和服务性的。阶级结构越来越像中间突出的钻石,而不再像金字塔状。这些职业要求有更高层次的教育。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追求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快速增加。

市场范围越大,单一的决定(优先考虑家庭成员、城市居民或侨民)的可能性的影响力就越小。随着市场在区域、国家、国际方面的扩大,地区的分层等级制就相应地遭到破坏。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里,随着人力、资本和销售市场的全球化,这一发展趋势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大小公司经历了大幅度的合并重组——公司合并力度的加大是因受到一些变化的影响,如跨国公司的增多、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价格上涨及后来的萧条、融资买入、欧元市场的形成,以及全球贸易

的扩大。大量移民的到来,尤其是来自于墨西哥、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移民,促使了美国经济的增长。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以来,20世纪80年代到美国的移民比以往任何一个年代都要多。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瓦解了商业等级制度和阶级分层的家庭主义的——半垄断政治的模式。

### 缩小的家庭

这里许多重要的发展趋势都是和经济发展趋势并行的。传统的家庭已经变小,等级制分层也被削弱。家庭和亲密的私人关系因为具有更多平等性、更灵活的角色和对更广范围行为的宽容,而越来越富有特征。专制的家长式家庭在以后的社会里越来越不能成为社会分层的模式。年轻人不结婚的增多了,他们结婚一般较晚,要较少的孩子。更多的女性在外工作,离婚率上升,父母和祖父母很少和孩子住在一起 (Cherlin 1981, Forse 1986)。和社会人口统计变化并行的是关于家庭的态度和角色的变化。在很短的时间里,孩子和妻子实际上已获得了更多的平等。的确,在过去的20到30年里,对家庭态度的变化比几乎任何其他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变化都要大,尤其是对“妇女应该到外工作吗”这个问题的回答的变化更大。妻子和母亲在外面工作的比率已明显上升,尤其在美国居首位,在很多欧洲国家情况也是如此。

就教育和工作方面来看,家庭作为社会分层之基础的重要性已越来越降低。财富的增长和政府的支持规划给了个人更宽大的选择空间,同以往相比,家庭的许多职能渐渐从家庭中分离出去。因此家庭减少了养育孩子并给他们安排工作的责任。现在在自己家庭的公司(农场或商店等)就业的孩子明显减少了。从19世纪末以来的美国社会流动研究显示,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Lipset and Bendix 1991, Grusky 1986),但60年代以后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霍特(Hout 1988)在文章中复述了菲德曼和豪舍尔

( Featherman and Hauser 1978 ) 的结论,指出始初地位对最终地位的影响从 1962 年到 1973 年下降了 28%,而从 1972 年到 1985 年却下降了 1/3。社会流动研究还显示,孩子事业的成功越来越不受父母所受教育及收入的影响。与此同时,教育对个人独立的影响也加大了。

## 结 论

新的社会分层模式正在形成。我们可以把关键性的发展趋势描绘为“社会分层的分裂”:阶级分层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尤其是那种有明显的阶级区分的生活方式;经济的决定作用下降,而社会和文化因素重要性上升;政治已经较少围绕阶级来组织,而是围绕其他方面的忠诚;社会流动已较少由家庭决定,而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受教育情况。



## 后工业社会中阶级的继续存在<sup>①</sup>

迈克·霍特 (Mike Hout)

科莱姆·布鲁克斯 (Clem Brooks)

杰弗·曼扎 (Jeff Manza)

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 (Terry Nicholls Clark) 和西摩·马丁·利普塞特 (见本书第二章) (1991) 在最近的文章中指出, 阶级讨论的重要性正在逐步下降。他们就“社会阶级政治消亡了吗?” 这个问题给出了明确的肯定回答, 他们重申奈斯比特 (Nisbet 1959) 的声明, 认为阶级分析在严格意义上是针对历史学家的, 历史学家坚持“阶级是一个逐渐过时的概念” (参见本书第 52 页), 新的社会阶层形式正在取代阶级。他们把精心挑选出来的资料为这些重大声明提供证据, 以表明阶级对政治、经济和家庭的影响大不如往日, 他们超出常规的有关社会分层参数在改变的报道, 宣称阶级正在下降, 社会分层碎裂。他们痛惜, 在奈斯比特的文章发表 30 年后, “阶级仍然是社会学家突出讨

---

<sup>①</sup>摘自“后工业社会中阶级的继续存在”, 有删改。《国际社会学》杂志, 8:3, September 1993; 259~277。

论”的理论和评论的焦点，他们力图使这一现象划上句号。克拉克和利普塞特确实声明他们的目的不是“建议完全抛弃它（如阶级），而是由其他因素来补充”（参见本书第55页），然而他们讨论的实质内容就是彻底摈弃阶级，例如，他们从没指出阶级的概念是以何种具体的形式仍然发挥其作用，这就是我们对他们辩论的确切看法。

克拉克和利普塞特与过去的和现在的一些作家一道，从关于趋势的资料跳跃到对未来的推测。死亡和正在死亡的比喻比实际资料更具有决定性了。如果我们否认存在着那种阶级对重要的社会指标——如流动的公开（Hout 1988）——的影响正减少的趋势，尽管我们正同自己的结果相矛盾，但是我们认为那些趋势是阶级政治进程的结果，它既不是不可改变的，也不是不可逆转的。过去25年的阶级研究，揭示了阶级的影响上升和下降趋势的混合。这种混合对于从马克思主义和功能主义维度看待它们的人来说是令人困惑的，马克思主义和功能主义理论在阶级的政治经济中把经济视为因，而把政治视为果。然而，经验主义的记录却越来越清晰地表明，因果关系的指针需要倒转。上升的、稳固不变的、下降的阶级影响的混合，反映了政治在决定诸如阶级结构本身、社会流动体制和阶级选举等这样的阶级分析支柱上的重要作用（Esping-Anderson 1990; Heath 等 1991; Erikson 和 Goldthorpe 1992）。

西摩·马丁·利普塞特的早期著作告诉我们许多关于阶级与政治生活之间的联系，所以他最近对阶级分析的挑战不应忽视。奈斯比特明确地拒绝接受经验主义的研究，他认为“统计方法不得不变得更具灵活性，以使阶级的观点不至于完全消失”（1959:12）。同奈斯比特不同的是，克拉克和利普塞特总结丰富的经验主义资料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然而，我们经过更细致地探究，发现他们引用的多数证据是经过高度筛选的，经受不住严格地推敲。我们尤为忧虑的是，他们完全不考虑其他的证据，那些证据表明阶级这个概念的重要性是持续的，甚至是上升的。总而言之，我们相信维系他们的结论是不可能的。尽管社

社会科学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定义和使用阶级这个概念，我们在下面的讨论中力图证明这个概念是不可缺少的。不管阶级是自变量还是因变量，社会学家都毫不负责地对阶级避而不谈。

## 阶级的继续存在

社会学家并没有发明阶级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对阶级的理解比其他入要多，这主要是通过强调以下这一点实现的，即一个人如何谋生，决定了他的生活机遇和物质利益。我们不同于经济学家，他们几乎只把重点放在收入或财富量上，或放在把生活方式和道德规范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考虑混合起来的常识性概念上（Jencks and Petersen 1991）。兼职的学校教师、半熟练的工厂工人和谋生艰难的店主，可能在他们的报税表上报相同的工资收入，但他们作为挣薪金工人、按小时记酬工人和自我经营工人，其收入来源是不同的，因而也就有了不同的生活机遇。克拉克和利普塞特却极为看重生活方式，他们引用帕金的论点，即“缺乏显而易见、清楚明确的低下社会地位的标识，使一种普遍的顺从体制在直接工作环境外的实施几乎不可能维系下去”（Parkin 1979:69）。我们认为这与克拉克和利普塞特的基本观点是相反的，他们认为地位差别在上升，而阶级却在衰退。

在克拉克和利普塞特的文章中，他们似乎在各个方面都把阶级和等级制度等同起来，但它们却属于不同的范畴。在社会学的用法中，等级制度可指任何社会阶级差别。阶级是指个人同生产资料和劳动市场之间的关系，这是个人收入、财富和社会地位的重要决定因素。因而，我们采纳阶级的一个一般性定义，我们希望这个定义既能与现代版的新马克思主义又能与现代版的新韦伯主义的概念相一致<sup>①</sup>。等级制度或与之相关的概念可被用来解释社会分层的进程，就像埃里克森和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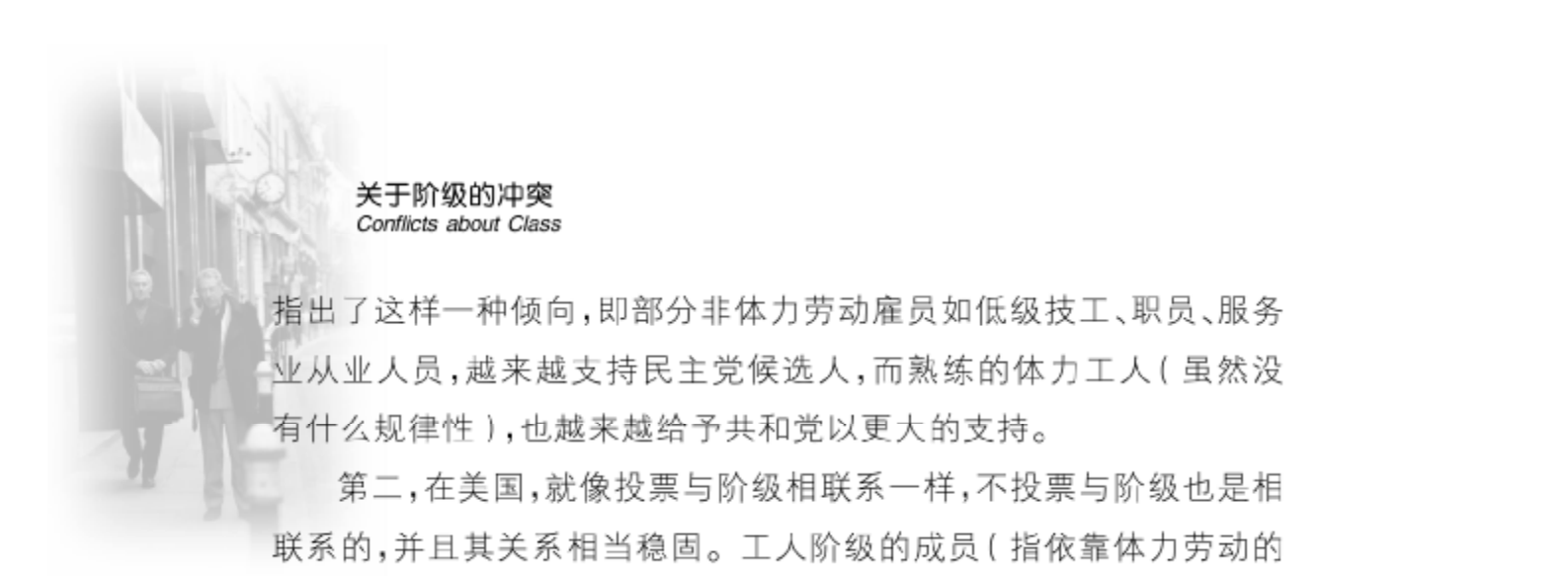
---

<sup>①</sup>我们通过如下分析希望避免偏离我们的主要论点（阶级继续影响着社会分层和政治），即对阶级理论家关于如何最好在概念上和在现代社会中理解阶级的辩论做出分析。

德索普 ( 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 ) 或霍特和豪泽尔 ( Hout and Hauser 1992 ) 认为的那样,但如果把这些概念看做是和被解释因素和解释前提,就必须对其进行单独的定义,它们的关系也要得到详细说明。

阶级是社会学研究不可缺少的概念,因为:(1)阶级是物质利益的关键决定因素;(2)结构上定义的阶级导致或影响寻求带来社会变化的集体行动者的形成;(3)阶级成员身份影响生活机遇和个人行为。第一种是阶级所固有的重要性。另外两种与“阶级分析”密切相关——也就是关于阶级如何影响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调查。克拉克和利普塞特所阐释的,与这里所提的三个方面都有联系,但是他们却不承认每一项都引起不同系列的问题。作为这些混乱的结果,克拉克和利普塞特的观点在分析上使不同的过程瓦解了。

克拉克和利普塞特也把社会发展趋势与描述社会的趋势弄混淆了。诚然,我们的阶级概念在过去的几年里已变得更为复杂。马克思最初的著作关注的重要问题是,人们工作是为了谋生,还是从销售他人生产的产品中获利。而在过去的几年里,这已经由其他不同的观点作了许多补充,但克拉克和利普塞特就忽视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当代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结构的论述承认,除了工人和资本家外,专业人员和手艺人从自己的专业技术中获利,而经理和管理人员从他们的管理资源中获利 ( Wright 1985 )。这正如克拉克和利普塞特本应认为的那样,这些并不只是地位的不同,而是阶级的不同,因为它们详细说明了与劳动市场和物质利益相关的经济作用。此外,他们指出怀特被迫在其阶级结构模式中“综合如此多的后韦伯主义的各方面因素”的同时 ( 见本书,54 页 ), 忽视了怀特关于剥削机制分析的潜在逻辑。当代韦伯主义的阶级理论在承认复杂性时也不否认阶级的存在,韦伯主义者注重“闭合”策略,专业人员和技工使用这些策略来影响劳动市场,以维护他们的集体利益 ( Parkin 1979, Goldthorpe 1987:39~46, 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42~43, Manza 1992 ), 以及通过选举经



## 关于阶级的冲突 *Conflicts about Class*

理和监督者以影响内部劳动力市场 ( Parkin 1979, Kalleberg and Berg 1987 )。尽管社会学家的阶级模式比过去要复杂得多,但复杂本身并不意味着阶级已经死亡或正在死亡。

克拉克和利普塞特关于后工业社会里阶级衰退的结论围绕以下这一声明:“传统的等级制度正在衰落;经济和家庭等级制度现在对人们的限制要比一两代人之前要少的多”(同上,55页)。可是,等级制度从未被明确定义过,而且在他们的表述中,关于等级制度和阶级之间的联系是极为模糊的。克拉克和利普塞特在关于阶级的唯物主义分析和更模糊的“等级制度”概念之间摆来摆去,这样就使讨论的范围远离了阶级本身,这种概念的移动策略使他们很容易得出阶级正在死亡的结论。他们注重等级制度也会潜在地让人误解,因为他们所说的等级制度的衰落没有任何阶级结构的变化,阶级对社会分层制度或政治行为的一般重要性也没有任何变化。克拉克和利普塞特坚持把以阶级为基础的不平等同非阶级形式的分层相混淆,也许结果是,他们便轻易地忽视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不平等方面的一些最突出的方面。首先,他们完全忽视了资本主义社会里高水平的财富由资产阶级控制的显著持续情况。不同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人口百分之一的最富有的人掌握的财富数量的形式,似乎使相当一致的,在不同的社会形式中也是如此(比较数字参见 Wolff 1991;有关美国的情况请参见 Levy 1987, Philips 1991;有关英国的情况参见 Shorrocks 1987;有关瑞典的情况参见 Spant 1987。也请见本书中的 Bottomore and Brym 1989, Zeitlin 1989 和参见 Scott 的文章)。第二,他们忽视财富拥有者影响政治进程的能力,他们或是直接通过资金捐赠、阶级内组织和政治网络、政府部门的渠道,或是间接地通过控制投资决定 ( Clawson, Neustadt and Scott 1992, Domhoff 1990, Useem 1984, 以及 Bottomore 1977 和 Brym 1989 关于直接控制的论述; Block 1987, 1992, Lindblom 1977 关于间接控制的论述)。最后,教育制度在把优先权一代接一代传下去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参见 Baltzell 1958,

Domhoff 1970, Useem and Karabel 1986, Marceau 1977, Bottomore and Brym 1989)。

私有财产仍以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为基础。在 20 世纪 80 年代, 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程度加剧时, 跑在不平等发展最前沿的私人财富, 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通过生产资料所有权建立的。高科技的冠军如盖茨, 商业巨头如沃尔顿 (Walton), 开发巨子如特朗普 (Trump), 他们之所以致富, 是因为他们拥有生产资料。从事套利活动的银行家收取高额费用, 经理们也得到“过度补偿”, 但他们从拥有股票中获取的远比他们的工资高得多 (Crystal 1991)。

对阶级分析的重要检验之一, 就是关于某些阶级比其他阶级更具有物质优势的说明。如果阶级正在消亡, 那么我们会期望现有不同阶级的在职者挣大体相当多的钱, 也就是说, 所有的工资收入不平等都存在于阶级内部了。事实上, 在收入方面的阶级不平等在统计数字上和实际生活中都是非常突出的。例如, 这种情况在最近对美国 18 岁以上成年人进行的电话调查中就得到了证明<sup>①</sup>。在这一调查中, 当前文献中两大主导的阶级研究方案——怀特 (Wright 1985) 的和埃里克森与戈德索普的 (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都被采用了。在怀特的方案中, 资本家阶级位于收入分配的顶层, 而工人阶级仍处于底层。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男性收入比是 4.2 : 1, 女性是 2.5 : 1。怀特的阶级研究计划解释了 20% 的收入差异。性别、教育、年龄和工作时间等因素对一些阶级差异作了调节, 调节过的手段也显示了很大变化。在埃里克森 - 戈德索普的计划中, 也显示了一种很大的变化模式。在男性中顶层阶级的收入和最底层阶级的收入比是 4.9 : 1, 在女性中这个收入比是 3.6 : 1。阶级间差异占全部差异的比率比是 1.7。从上述两个阶级研究计划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阶级结构的变化并没有改变阶级对收入的重要影响。

<sup>①</sup>关于数据和更详细的资料, 请参见本文在杂志上的原稿, 也请参见 Hout, Wright and Sanchez-Jankowski (1992) [Eds]。

中产阶级人口比例的增长以及中产阶级的扩展,并不否定收入不平等的继续存在(Smeeding 1991),也不否定工业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更加贫困化。这种“新贫穷”(Markland 1990)的总体轮廓变得越来越清晰(Wacquant 1993; 参见 Jencks and Petersen 1991, Townsend et al. 1987, Mingione 1991, Engbersen 1989)。在这些社会中长期失业或从事边缘化职业的人口继续存在,由于对居民的多种来源的剥夺而造成的低收入地区也继续存在(Massey 1990, Eggers 1990),所有这些同克拉克和利普塞特所声明的“传统等级制度”衰退的观点都是不符合的。

总的来看,当代阶级结构中始终存在的上层阶级的财富和权力,底层阶级不断增长的贫穷和退步,都表明了克拉克和利普塞特关于“阶级正在死亡”的结论是不成熟的。在我们最熟悉的美国,越来越普遍的情况是,那些拥有特权的专业人士和经理人士住在隐蔽的世外桃源、郊区(通常隐居在大门紧锁的地方)或住在安全的高楼大厦里面,而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们拥挤在越来越危险的城市中心地区——美国新任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在最近的一本书中详细地讨论了这种趋势(Reich 1991, Davis 1991)。只要这样的情况还在发生和普遍存在,我们始终会怀疑那种关于社会学家最好是放弃阶级概念的建议,而不管如何引证其他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阶级的重要性在衰减。

## 社会阶级正在死亡吗? 不是

上述原因足以证明我们的观点,那就是阶级的划分在后工业社会将继续存在。但克拉克和利普塞特很少以阶级划分的存在为基础,而更多地以自己假设的这些社会中三个“领域”(政治、经济和家庭)的阶级影响衰退为基础。我们应说明的是,即使是使用他们自己的术语,克拉克和利普塞特的经验证据也不能支持其关于阶级的重要性正在

下降的结论。

### 政 治

克拉克和利普塞特为了说明阶级的重要性在政治领域的逐渐下降,他们试图证明阶级投票选举已经衰退,他们声称“(阶级投票选举的)奥尔福德指数已在数据可用的每个国家,都显然下降了”(本书第57页)。然而,关于他们数据的以下四个观察结果,瓦解了他们的假设。

首先,他们依赖奥尔福德指数作为衡量阶级投票选举的正当标准的做法,是非常不可靠的(参见Goldthorpe,本书第十五章,就相关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其次,(在奥尔福德指数中)国家之间的差异对他们关于“等级产生和维系了僵化的阶级关系”(Clark and Lipset,本书第二章)的命题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尽管奥尔福德指数存在种种问题,也有对阶级投票的合理评价,如证明了瑞典这个国家中,阶级和投票之间存在着最强的联系(在克拉克和利普塞特提到的5个国家中),而在美国,这一联系是最弱的。可是,在收入不平等方面,根据绝大多数经济指标,瑞典在5个国家中是最平等的,而美国是最不平等的(Esping-Anderson 1990)。其他一些人,帕金(Parkin 1971)、科皮(Korpi 1983)和艾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on 1990),则提出了相反的命题,即瑞典的阶级政治产生的社会政策,导致的是低水平的不平等。不仅数据是不一致的,而且平等和阶级投票之间的顺序也被颠倒了。

克拉克和利普塞特看来假设了一种阶级与投票之间的非中介的联系,完全忽视了工会、社会运动组织和政党在塑造选举条件上的作用,选民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做出选择的。当政党和其他政治组织围绕阶级组织起来的时候,高水平的阶级投票是可以预期的。普热沃斯基和斯普拉格关于那种主要以工人阶级投票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动力的分析已表明(Przeworski and Sprague 1986),这些政



党削弱自己的基于阶级的努力而寻求中产阶级选票的策略选择——利普塞特所提倡的那种趋向(1990)——对其政治支持的社会基础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如果工人的政党抛弃了或妥协了他们的具体利益,难道这意味着这些利益就不再存在了么?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阶级利益仍潜存于政治领域中。

克拉克和利普塞特通过下面这种办法论证了自己关于阶级对政治的重要性正在下降的观点,即他们认为,作为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之特征的传统左右分野已越来越让位于更复杂、更多维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一结论就把关注焦点从作为政治观点之决定因素的阶级,转向作为公共舆论之目标的阶级或阶级不平等。克拉克和利普塞特重复了关于现在有“两种左翼”的断言,即一种左翼基于下层阶级的经济需求,另一种左翼则强调“社会问题”(见本书第57页;Lipset 1960(1981):501)。从这种经济和社会之间的断裂中,他们希望得出的结论是:政治斗争和公众辩论中的阶级内容正在减少。然而这样的结论既没有得到他们所援引的数据的支持,也没有得到现有研究资料的肯定。例如,维克列姆关于阶级和投票之维度的研究(Weakliem 1991),就对克拉克和利普塞特关于政治趋势解释上的经验性不足提出了质疑。维克列姆发现,虽然政治的一种第二维度(可能是后物质主义的)在解释阶级和政党认同之间关系上是必要的,但是它对年长人群和青年人群是完全同样适用的。不同年龄人群中呈现的这种相似性,是与关于“复杂性是崭新的”这一论断相矛盾的。维克列姆在其关于意大利、荷兰和法国的选举趋势的分析中得出的一个重要发现是,“所有的阶级都已向后物质主义左翼方向移动”(1991:1350)。这一发现能使我们拒斥克拉克和利普塞特关于“两个左翼”的断言。在任何情况下,“新”政治问题的出现和再出现,诸如性别和环境问题等,都不意味它们会足以取代或重组像政治左右分野这样的基本维度。

政治战略和策略的复杂性,使得在作为因果力量的阶级与作为讨论话题的阶级或不平等之间做出区分是完全必要的。仅仅是因为一个

问题不是依照阶级或传统左右翼政治来直接表达的,并不意味着阶级在理解这个问题上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卢克尔关于倡导选择和倡导生活的活跃分子的世界观的研究,就提供了一个例证。也就是,一个问题尽管在表面上看并非关于阶级的,但是却部分地转向关于阶级利益和活跃分子的经验之间的比较。如果因为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同人们传统的左右翼政治的认知相一致而成为政治斗争和公共辩论的目标的话,情况又会怎样呢(Sniderman, Brody and Tetlock 1991)?难道关于正当行为或把权利扩展到新类别公民(诸如残疾人群)的辩论不能从“旧的”(阶级)问题——诸如平等或社会民主——那里获取意识形态力量么?

总之,克拉克和利普塞特关于阶级政治的证据是不完全的,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他们未能充分说明“阶级对政治的重要性正在下降”的断言。阶级从来就没有像一些早期的知识传统所假设的那样是无所不能的解释变量。阶级一直同种族、宗教、民族、性别和其他因素一样,只是政治认同和行动的資源中的一种。那种认为阶级的作用大不如前的观点,是因为人们过分夸大了它在过去的重要性,同时低估了它在当前的重要性。阶级之所以对政治还很重要,是因为政治组织还是积极地围绕阶级的主题而组织起来。因而在一些时期,阶级的政治效果可能是潜在的,即便潜在的阶级逻辑没有改变。我们认为其他的社会不平等因素也是如此。例如,种族和性别对于美国社会的社会结构一直是很重要的,但是它们并不经常是政治组织和斗争的核心。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这样说,证据表明阶级仍然是重要的,克拉克和利普塞特未能证明阶级投票和传统的政治价值已经衰微了。

### 后工业社会的经济趋势

克拉克和利普塞特认为,“经济增长瓦解了等级制阶级分层”(本书第58页)。他们认为作为收入不断增加的结果,市场作用在不断增长,还认为“非集中化、对需求灵敏的决策”在增长,以满足更加复杂

的消费者需求(同上)”。至少在一些国家,大公司数目相对减少,机会取向的小企业在增加(Snbel 1982, Piore and Sabel 1984)。我们怀疑他们在这一方面所做的任何其他声明能否经得起认真的推敲。

首先我们看到,克拉克和利普塞特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与早期相比市场性在不断增强的断言,很难获得经验的证明(Block 1990: 55~56),而且作者也没有提出实质性的证据来说明这些,甚至还完全忽略了在20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所有工业社会的国家在稳步和显著地发展(Esping-Anderson 1990)。

即便假设克拉克和利普塞特关于市场性正在增强的断言是正确的,那我们也有相当的理由来质疑他们是如何影响以阶级为基础的会分层的。例如,他们发现最近几年里,小公司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本书第58页,引自Birch 1979)。但他们却没有指出小公司几乎不能给雇员提供全工资、福利和工作安全感,而大公司却不是这样。同时更多不稳定的、低收入的工作也都在聚集在小公司里(Gordon, Edwards and Reich 1982, Edwards 1988, O'Connor 1973, Stolzenberg 1978)。

接着,克拉克和利普塞特又认为更先进的技术使“事先计划和进行行政干预变得很难”,而这些经济变化导致了“传统权威、等级制度和阶级关系的衰落”(本书第二章)。他们对技术的讨论把最乐观的可想像的前景当做真实的东西,忽视了更为复杂的组织模式在后工业社会中已经大大发展起来的事实。使用的新的管理方式来回应高技术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们所处的环境(Zuboff 1988, Shaiken 1984)。在很多公司,经理反对任何向各级雇员转移权力的行为,即使新的“智能机器”在公司里能使决策民主化(Zuboff 1988)。引进新技术和管理方式远没有消除阶级斗争,却经常创造出新的阶级矛盾形式。关于后工业社会的等级制的命运,人们仍然没有作出正确的判断。

最后,克拉克和利普塞特认为,“随着市场在区域的、国家的和世界范围的扩展”,经济增长正在破坏“地方分层的等级制度(本书第

59页)。米尔斯(Mills 1946)在半个世纪前就对这样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认为位于大都市摩天大楼里的决策中心与生产和消费的分散场所之间的鸿沟,是社会分层的另一层次的表现,而不是这些“都结合起来共同破坏了家庭式的、半垄断的商业等级制度和阶级分层模式”(同上),而这正是克拉克和利普塞特所认为的(参见 Featherman and Haus er 1978:482~492,Hodson 1983,Harrison and Blue-stone 1988)。

## 家 庭

克拉克和利普塞特认为,后工业社会里的“小家庭”,“越来越具有平等主义的特征……(因为)等级制分层已经削弱了”(同上)。尽管他们用以支持这些论点的那些事实(结婚和离婚的更多自由,女性更多参与有偿劳动的机会、庞杂家庭安排的减少)显得很重要,但它们并没有提供关于“小”家庭更具平等主义的证据。现代家庭比克拉克和利普塞特所说的更为复杂(Connell 1987:120~125)。关于当代家庭生活研究表明,虽然平等主义的观点比早期要广泛得多,但在很多家庭里还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劳动分工(Hochschild 1989)。例如在美国,有很多证据表明,随着离婚的自由化,以女性为主导的“小”家庭的增多,已导致以女性为主导的家庭的贫困率不断上升(Thistle 1992 第四章, Weizman 1985)。对城市贫民来说,克拉克和利普塞特所赞扬的“小家庭”却是贫困和不平等的主要原因(Wilson 1987)。这部分归因于丈夫和妻子职业的正向关系。虽然家庭内部的差别减少了,但职业造成的家庭之间的差别却扩大了(Bianchi 1981, Hout 1982)。

克拉克和利普塞特在“家庭”的标题下,还提及了最近社会流动的变化,认为“小家庭对个体家庭成员的教育和工作较少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们还认为“社会流动研究表明,在解释孩子职业成功上,父母的教育和收入的影响越来越小”(引自 Featherman and Hauser

1978 Hout 1988)。然而, 克拉克和利普塞特没能对这些变化的根源做出恰当的解释。实际上, 在绝大多数工业社会中, 阶级出身通过教育体系对学生进步所造成的影响要比过去小了, 但是教育分层程度减小的原因, 不是基于阶级的选择少了, 而是很少选择在阶级非常重要的过渡阶段存在的任何一种做法 (Mare 1980, 1981)。麦尔在对 15 个工业社会国家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 只有瑞典、匈牙利和前捷克斯洛伐克, 以阶级为基础进行的选择真正下降了 (Shavit and Blossfeld 1992, Raftery and Hout 1993)。在匈牙利和前捷克斯洛伐克, 政党检验代替了阶级选择。只有在瑞典, 教育分层过程的开放性中才是取得了真正的进步。

同样, 对社会流动的阶级障碍的减少, 也不能归因于“富庶”或其他间接的力量。美国高等教育的普及, 就是一种阶级意识的政策, 是为了有利于下层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出身的子弟而制定的, 从而减少了阶级性的障碍, 并取得了成功 (Hout 1988)。它之所以发挥了作用, 是因为在 20 世纪里, 大学文凭被用于消除阶级出身对职业成功所造成的影响。通过让工人阶级子弟进入大学接受教育, 从而使美国高等教育的普及为那些从中受益的人铲除了阶级障碍。在其他国家, 各种不同的机制影响着社会流动。在瑞典这个社会民主的福利国家, 不仅确保人们拥有更多的平等接受大学教育机会, 还保证获得很好的职业 (Esping-Anderson 1990:144~161)。在匈牙利, 在第一代共产主义者统治下, 为专业和管理职务所进行的政治测试保证了阶级障碍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 第一代之后, 情况就不一样了 (Wong and Houser 1992)。在阶级意识的行为不能带来机会的国家, 如爱尔兰, 阶级障碍没有任何动摇 (Hout 1989:第十一章), 即便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工业化, 但在这方面也作用不大。据说这种工业化导致了“富庶”的增长。那些扩大了平等机会的政策, 无论如何现在因为“纳税人的反抗”而遭到侵蚀, 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而且, 尽管现在断言有点为时尚早, 但它最终会导致阻止社会流动的阶级障碍再次出现。

## 👉 结论：阶级并没有死亡

在最近几十年里，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兴起，阶级结构经历了重要的变化。新的不平等源泉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原有的不平等源泉已经消失。虽然我们在讨论中指出克拉克和利普塞特未能证明社会阶级正在死亡，但这并不意味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或阶级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没有发生变化。在绝大多数国家，近几十年来体力工人阶级已减少，而服务业的劳动力人数的比例却增加了，这种变化是很重要的。这种变化告诉我们，19世纪的阶级模式已不再充分了，然而向更加复杂和多元的阶级模式的转变，并不意味着阶级正在死亡。资本主义社会里以阶级为基础的不平等的继续存在，意味着在可见的未来，阶级的概念必将也应该在社会学研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虽然关于阶级（作为生活机会和政治中的一个要素）的继续存在的研究证据是充分的和令人信服的，但是关于阶级继续存在的解释却不充分。作为专业研究，我们把记录的关于阶级关系的参数提升到更精确的程度，同时也摧毁那些束缚我们研究工作的旧的理论。我们发现，阶级结构比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理论设想的复杂得多，这种理论赋予了阶级机构在社会变革中的原因性作用，却很少诉诸于现代化理论所提出的富庶的平静影响。下个10年的理论问题是：为什么阶级这么复杂？为什么它依赖于政治而不是政治的决定因素？作为公民和社会学家，我们非常愿意生活在阶级不平等已消失的世界里，但是，我们还是援引葛兰西的一段话来表明，即“阶级社会还未消亡，而真正的无阶级社会还没有诞生”。

## 阶级的死亡或 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死亡?<sup>①</sup>

简·帕库斯基(Jan Pakulski)

“社会阶级正在死亡吗？”(Clark and Lipset 1991)(见本书第二章)这一话题触动了疼痛的神经。关于阶级衰退或死亡的任何观点都将引起争论。然而这样的观点主张是很过时的了,应该根据被人们标识为“发达西方”的社会变化和东欧社会变革的经历,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说明。这些过程不仅促使我们去询问旧有概念和理论的适用性,而且也使询问考察的任务变得更为容易了,因为它们减少了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关于阶级的争论已不再来自战壕,它包括越来越多的东欧社会学家,他们刚刚从意识形态和检查制度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克拉克和利普塞特的文章为这样的辩论打开了路径。它指出了衰落的等级制度,衰落的僵化阶级划分,以及最重要的,是在政治领域、经济组织和文化家庭关系中,阶级位置对政治态度与行为的越来越下降的影响力。它以关于“社会分层的破裂”的命题为结论。在作者看

---

<sup>①</sup>有删节。原文为《阶级的死亡或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死亡?》,发表于《国际社会学》,8:3 1993:279~292。

来,这一命题反映了“传统的权威、等级和阶级关系的衰落”,及其导致的阶级分析之解释价值的衰退,特别是在对政治行为的解释上。这不是一种全新的观点,“非平等主义的无阶级差别”的主张有着古老的传统,特别是在美国,那里繁多、密集流动,以及最重要的,阶级意识、阶级组织和阶级政治的明显薄弱,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霍特(Hout)等人(本书第三章)在回应中,为阶级作了强烈的辩护,认为它是物质利益组织、生活机会和集体行为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尽管他们承认“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兴起,阶级结构在最近几十年里经历着重要的变化”,但是他们拒绝“阶级死亡”的观点,并试图证明“阶级之继续存在的——甚或是上升的——重要性”。

虽然克拉克和利普塞特关于社会变化的观点是尖锐的和有说服力的,但是他们关于阶级概念之功用的结论,以及包含这些结论的理论框架,需要作进一步地说明。因为这些结论本身的平淡乏味,他们则造成了一种把注意力从社会理论和社会变化的关键性问题转移到语义学规定领域的危险(如什么是阶级,“死亡”意指着什么等)。霍特等人的反驳看来对克拉克和利普塞特观点中的这些语义学规定作了较为批判的回应,但是对其关于发达社会中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分裂的变化实质,以及这些变化的理论含义所作的评判相对较少。

为了重新聚焦这样的辩论,我这里对以下三个问题做出区分:第一,阶级概念之分析清晰性和功用;第二,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适用性;第三,关于被认为是历史主体的旧的“产业阶级”的重要性问题,这一问题经常被人们混同。

### 阶级的含义:概念的曲张和语义的多元性

阶级这一概念经遭了被沙陶里(Sartori 1970)诊断为“概念曲张”(conceptual stretch)的过程。它的外延(覆盖范围)被扩展了,



这主要是由于被不加选择地应用,同时以牺牲其明晰性和准确性为代价。曲张使得研究衰弱和理论分析瘫痪,因为它使这些研究和理论分析变成了同漂网捕鱼一类的事情。曲张的概念网不加区分地把社会现实的完全不同的方面搅入一个容器内,把阶级理论转变为“每样事情的理论”。概念曲张的另一个不幸的结果是,对不同的人来说,阶级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在这种语义多元性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必然错误的,只要它没有引发学者们彼此谈论过去。不幸的是,看起来这就是当前辩论的情况。克拉克和利普塞特掩盖了较近时期内的一些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重构(例如 Wright 1985),但是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意图:他们把“阶级”和“阶级分层”等同于“不同层级”的持续存留,以及非正式社会关系、文化观点中的阶级定义模式。他们支持社会变革,诸如支持社会运动和政治行为。在这种环境中,他们指向等级的衰落和不平等的分裂,以及被人们明确判断的阶级和政党不结盟趋势。对他们来说,这些过程就代表着“阶级的死亡”(带问号的)。霍特等人则通过选择非常不同的语义规定和不同的阶级概念来回应。他们把阶级界定为“一个人同生产资料和劳动市场的关系”,这潜在地表明,如果个人在经济生存或财富的资源上还不同,阶级就存在下去。这样的阶级概念几乎难以适合于克拉克和利普塞特关于分层的破裂和不结盟的观点。根据霍特等人提出的定义,阶级在所有的现代社会中存在。

我这里不想讨论这些不同的阶级概念的相对优劣之处,而是要提出一种简括的分类阐释,如下页图 4.1 中的描述。在主流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阶级概念与财产关系相联系,被用于解释社会冲突和社会变革。这样的概念和用法——我们可称之为“生成/解释性的”(generative/explanatory)——主要地集中于经济作用,强调极化和冲突,忽视阶级界限问题。阶级在社会的生产过程中代表一种客观的地位,形成这种地位的东西,是被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的“客观的和对抗的”利益。正是这些被归因于结构性冲突的利益,是形成具有历史重要意义的集体行为的主要推动力量,即使它们没有在社会主

体的意识中被明确地表达出来。如果真的表达出来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工人的“阶级意识”的形成是不可避免的——阶级就转变为历史主体,他们能够共同行动,而且最终导致革命性的变革。这样,在“生成性的”概念用法阵营中,人们可以发现这样的区分:一种是结构主义的客观论者,他们把阶级机制(劳动与资本)看做是基本冲突的发生器(如 Althusser 1971);另一种是行动的主观论者,他们把阶级等同于集体行为者,以激进的方式向现存社会状况发起挑战,而不去考虑这些挑战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挑战的形式或行为者的身份(Touraine 1985)。依前者看来,阶级是普遍存在的,但主要隐藏于“经验主义者的”眼光背后;阶级冲突充斥于实际社会生活中,但只是在那些运用正确分析方法的人面前才显露出来(这是事先预设其存在)。依后者看来,阶级也是普遍存在的,但却是确实可感觉到的:在具有一致性的共同体形成并挑战占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和制度的时候,阶级就出现了。

	生成 / 解释性的	分类 / 描述性的
客观论	结构性的机制	经济 / 职业类别
主观的	社会-政治主体	社会-文化类别

图 4.1 阶级概念的分类

同“生成 / 解释性的”情况相反,“分类 / 描述性的”的阶级概念用来概括社会不平等的形式。阶级是社会分层的单位——社会权力、经济生活机会、职业声望等的不平等——但是它们不一定就形成为社会划分和冲突的基础(如生成性解释中的情况那样)。这样的阶级概念化方法主要是从韦伯的传统那里获取灵感,尽管韦伯认真的分析描述(如对阶级、地位群体和政党之间关系的描述,Weber 1978)并不经常得到那些属于分类 / 描述性阵营中的人的尊重。

分类 / 描述性阵营中的客观论者把阶级看做是主要由诸如财富、收入、职业、教育等资源,或其中几项的结合所决定的(如 Broom and

Jones, 1976)。主观论者(人们可称之为“社会-文化论者”)则关注反映在行为者的意识和认同中的不平等,或关注社会不平等及其关系的社会-文化方面——价值、标准、生活方式等——所有这些都能够在持续的和代间再生产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看到(如 Bourdieu 1984)。对于“主观论者”,这些等级潜存着含义,它们通过符号含义被再生产出来,并用“人文系数”(Humanistic coefficient)来研究它们。

这种分类是很基本的,但对于我试图进行的论述来说已经足够了,也就是,当前辩论的第一步应该包括概念的说明。特别是,作为不平等系统之单位的阶级的含义不应该同被理解为社会划分和冲突之基础的阶级的含义相混淆。这样,我们就能以较为系统的方式,讨论关于上述四种阶级含义之间必要联系的假设。

## 阶级的理论重要性:原因和联系

克拉克和利普塞特的错误只是在于错置了批评。他们所批评的——依我看来,是非常正确的——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及其理论和分析框架的适用性和功能。他们对这一框架的三个因素进行了质疑(明确地和潜在地):(1)它的经济决定论和还原论:认为财产关系是社会不平等、分工和冲突的关键性决定因素;(2)认为社会经济不平等和社会文化不平等之间,以及不平等、社会认同和政治行为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因果联系;(3)关于“资本主义逻辑”的观点,认为阶级不平等的累积性质、阶级结构的简单化、阶级意识的形成和阶级冲突的激化。

虽然克拉克和利普塞特这些方面的观点很有说服力(尽管很难说是创新性的),但是他们对韦伯传统的批判,特别是关于其对分析社会分层和冲突的适用性的批判,则说服力要小得多。实际上,克拉克和利普塞特援引赞同达伦道夫、吉登斯和帕金等人的“新韦伯主义”分析,并同意那些被认为显然是韦伯观点的许多成分:(1)社会分层的

“多维性”观点(阶级、地位群体、政党或利益集团);(2)强调阶级的复杂性和分化(包括“中间阶级”的扩大、基于社会闭合(closure-based)的“社会阶级”的形成,以及“收入阶级”的重要性);(3)社会经济不平等、社会文化不平等(地位群体)和社会政治不平等之间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总体上的不平等与意识及行动之间的相对独立性。的确,韦伯主义的下述著名观点,如关于阶级分解的观点、政治冲突的国家主义化(如 Dahrendorf 1959,1988)、市场化、社会闭合(social-closure, Parkin 1979)以及地位认同和“地位政治”的重要性(如 Turner 1988),等等,看来都非常适合于克拉克和利普塞特的诊断。

霍特等人的反驳也存在一些问题。虽然作者承认,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兴起,阶级结构在最近的几十年来经历了重要的变化,但他们坚持认为应继续保留马克思阶级概念中的一些关键成分,而且他们忽视了许多对于克拉克和利普塞特来说是重要的问题:社会分层的分裂问题,阶级不平等和阶级冲突的相对重要性问题等。他们认为“社会阶级组织着物质利益”。然而,也许同等重要的是,还存在许多其他的“物质利益组织者”的事实,以及许多现代冲突是围绕“精神利益”(如发达西方国家中的“新政治”、俄国、波斯尼亚、乔治亚、中东和伊朗等地发生的冲突)发生的事实,却一点也没有给予考虑。关于阶级不可缺少的进一步证据是这样的事实,“结构性规定的社会阶级时会产生导致社会发生变革的集体行动者”。然而,这些行动是如何“时而”发生的这样的关键问题,也没有给予多少探讨。当然,有时人们确实基于自己的经济利益而采取行动,这是相当普遍的——几乎没有一个社会科学家,包括克拉克和利普塞特,会否认这一事实。关键在于,工业化西方国家中政党和阶级非联合化的事实,加之工业化和正在工业化的社会中形成的非阶级性(民族、宗教、种族、地区性的)分裂和冲突的事实,削弱了霍特等人关于阶级的不可缺少性/中心性的观点。最后,捍卫阶级概念(根据一个人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市场的关

系而界定的)的第三个理论证据是,“社会阶级成员的身份影响个人的生活机会和行为”。然而,由克拉克和利普塞特提出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同诸如地位群体、同代人、民族群体、职业群体和宗教少数群体等相比,阶级成员身份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生活机会、认同和行为;第二,同过去相比,现在这种影响的强度如何。这些问题是霍特等人没有能够系统地解决的。

霍特等人提出的支持性证据存在着许多问题。他们强调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继续存在——克拉克和利普塞特也没有否认这一事实(而且从这个问题讲,任何人也没有否认)。他们指出美国的阶级间收入差距是很大的,而怀特早在他的12种阶级划分中就对此作了衡量(Wright 1989b)。毫无疑问,这12种阶级划分要比怀特早些时候的6种阶级划分(Wright 1985)是前进一大步的。毋庸置疑的是,24种阶级划分一定还会更好。但问题在于,在什么意义上说这样的阶级图式变得同职业地位图式难以区别,以及它们提供了什么更有利的或前进了的东西。

## 西方工业化社会中阶级的解体

像怀特这样的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被迫在自己的“阶级图式”中多样化地讨论阶级,以便抓住复杂的经验结构和事实。这一情况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它支持了克拉克和利普塞特关于社会分层之破裂的论点。但是,对这样的问题作更为系统的探讨,那么能够揭示的不仅仅是克拉克和利普塞特所指出的那些变化,而且还有关于“社会分层破裂”和“阶级解体”的其他一些方面和机制。在已经工业化的西方社会,这些近期的变化主要包括:

### 1. 小型财产所有权的扩散

过去10年里大多数西方政府推行的大规模私有化方案,不论其党派色彩如何,导致了小型财产所有权的扩散,这使得有所有权和无

所有权范畴之间的区分(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很重要的)变得进一步模糊。例如在英国,国有部分的40%多都已经被私有化了,有超过100万的公共住房承租人变成了所有者,股票持有者的比例从占全部人口的1/20增长到1/5多(如Naisbitt and Aburdene 1990)。独立经营者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增长迅速,资本集中程度呈下降趋势(OECD, 1992)。退休金和养老金计划的扩大——主要投资于工业股票——也加深了所有权界限的模糊。这种趋势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在20世纪的前一半时间里,所有权的扩散及模糊将超过股份公司扩展的影响力。

## 2. 工作技能的文凭资历化和职业的专业化

这些进一步弱化了旧有的阶级划分,特别是所有者-工人的二元划分(如Parkin 1979)。一些分析家指出,一种新的、有独特地位的“知识阶级”已经形成,其成员被看做是潜在的统治者(如Bell 1973)或是对工业资本家的主要挑战者(如Berger 1987:66~69)。另外一些人把专业化看做是对关于社会结构之阶级模式的一种替代(如Perkin 1989)。

## 3. 国家调控的削弱,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

过去,国家干预把半重商主义的保护同支持市场的国内调控和福利再分配结合起来。这些措施对于社会不平等和冲突模式的影响作用,有许多文献作了很好的论述。而近期的朝着公民权扩大和公开贸易方向变化的趋势所产生的影响,有待于人们做出深入的分析。然而,它的一些结果现在已露端倪,而且这些结果已经使阶级的划分进一步消蚀。公民权的扩大——特别是多种“特殊地位权利”的扩大,诸如土著人、少数人种群体、妇女——把生活机会同政治上规定和法律上保护的权力连接起来。如特纳(Turner 1988)和沃特斯(Waters 1989)指出的那样,这进一步使社会分层模式破裂,并产生了新的分化和冲突。像工会这样的阶级组织失去了支持(Golden and Pontusson 1992)。与此同时,合作性经营的拆分和市场的全球化产生了对抗性的回应,捍卫国家曾保护的权力,而这往往超越了旧有的阶级划分。例如,澳大

利亚汽车工业的所有者、经理和工人形成了联盟，以捍卫保护性关税——也就是捍卫利润、薪水、工资和工作。

#### 4. 增长的消费和消费导向

在克拉克和利普塞特强调富足的重要性的同时，一些人则强调大众消费对变化的大众价值观和价值取向的影响（Inglehart 1977, 1990, Inglehart and Flanagan 1989）。应该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引起大众消费扩张的原因中，收入的增长至少应该同消费品价格的下降同样重要。这导致了作为消费者的人们的利益（降低生产成本和价格）同作为生产者的人们的利益（争取获得高工资和薪水）之间发生紧张的关系。就是这种紧张关系，可能导致人们讨论已久的传统的阶级—政党之联盟关系的削弱（如 Crewe and Denver 1985, Dalton 1988, Dalton et al. 1990）。

#### 5. 大众传媒影响下的“想像的共同体”的形成

阶级消解的最显著方面，可能是由于人们所谈及的非阶级的“想像的共同体”的形成而造成的（Anderson 1983）。虽然它们曾经很重要和突出，但这些共同体现在看来则分化了：人们开始认为自己是拥有共同关注的共同体的成员（如绿色派别人士）、共同习惯的成员（如不吸烟者）、共同趣味的成员（如素食者）或其他一些可归属特征的成员（如黑人、妇女）等。这样想像的共同体提供了某种认同，鼓励形成具有某种一致性的感觉，而且在较大程度上比过去更加促进了共同行动。尽管人们对这些想像共同体的扩散作了很多讨论，但是对旧的认同，包括阶级认同，还缺乏更为彻底的考察分析。

#### 6. “新社会运动”和“新政治”的动员

最后，当代政治分析中的一个显著的题目，就是人们在“新社会运动”和“新政治”的标识下所研究的政治激进主义的崛起。研究者的主要观点是：这种激进主义所动员的并不是阶级成员，忽视传统的阶级问题和与阶级有关的组织，产生政治分裂。这种分裂超越了旧的与阶级相关的左—右谱系划分。无论是“新运动选民”的构成，还是这种

激进主义的公开性问题以及类型特征，都不能用阶级的术语来分析（如 Pakulski 1993）。代之的是，贝克尔等人（Baker 1981）、达尔顿（Dalton）、艾伯拉姆森和英格尔哈特（Abramson and Inglehart 1992）则强调新政治中发生分化的重要性；其他的分析家则倾向于选择诸如“地位集团”（status blocs, 如 Turner 1988）和“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 如 Cohen 1985）这样的概念。

概而言之，对当前阶级分析的回顾要求对旧有的阶级概念进行重大的修正，这些概念已被现实世界的发展所超过（Myles and Turegan 本书第十三章）。一种对身份认同所作的研究（在澳大利亚进行的）得出结论说，“阶级认同在推论上的显著特征几乎是微不足道的”（Emmison and Western 1990: 241）；在澳大利亚进行的另一项对不平等和政治激进主义的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认为，政治冲突，以及总体上的政治激进主义，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受阶级位置和阶级认同的影响（Graetz 1992: 157）。这些结论使人们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功用产生很大的怀疑。

## 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分层与冲突

历史的一个冷酷讽刺是，那种在现实中力图实现马克思信条的努力却瓦解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可信性和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适用性。国家社会主义的经历——它的形成、运作和崩溃——使人们对财产所有权和市场关系与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冲突形式之间的因果联系的力量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首先，所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都形成了很大程度的不平等和明显的社会分层形式，在很多方面与西方社会的情况类似，而且缺少大规模的私人财产和市场关系。第二，所有这些国家都经历了激烈的冲突，而且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显得尤为尴尬的是，它们都以革命性剧变的方式崩溃了。更以为甚的是，在“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s）之前发生的冲突和革命动员反映出



的“精神利益”要多于经济地位和“物质利益”。这些革命有助于恢复诸如“市民社会”、“政治共同体”和“同代人”这样的替换阶级概念的术语(如 Pakulski 1986)。第三,共产主义崩溃和前苏联、南斯拉夫等“半帝国”解体之后所发生的冲突也不与阶级图式相适合。它们是围绕着民族、种族、宗教、地区和国家资助等问题而展开的。所有权和市场的复兴并没有导致阶级划分、冲突和分裂的再形成。换言之,阶级理论对于分析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不平等、冲突和变化,似乎没有多少用处。那些试图修正“阶级观点”的努力,导致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进一步概念曲张或弃置(Radaev and Shkaratan 1992)。

这样,就共产主义兴衰的经历而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已经死亡了。它被证明是一种令人困窘的死亡,因为它在解释现代主要类型社会中的分层模式和变化上都彻底失败了。阶级理论也不能解释为人们所争论的这个世纪中最为重要的社会变革。

## 作为主体的阶级:旧工业阶级的消亡

克拉克和利普塞特文章的另一个维度——并不总是同其他观点明显分开——是关注旧的阶级主体的衰落: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特别是后者,一直被看做是阶级的主体,而且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政治和总体性社会变革的绝大多数理论,实际上关注的是工业无产阶级。因而工人阶级的衰落——它的分化、认同的淡化、非联合化,等等——经常被认为是整体阶级主体的衰落。

这一衰落的事实——根据社会-经济、社会-文化和社会-政治的特征,以及意识、认同和团结一致等方面情况——看来是无可争辩的。在从达伦道夫(Dahrendorf 1959)、贝尔(Bell 1973)到高兹(Gorz 1982)、欣德斯(Hindess 1987)的著述中,对此都作过很好理论阐述。我这里不再重复他们的论述,只是想概述一些总体的观点。

虽然产业阶级的表现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所有情况相伴随,正如马克思正确指出的那样,但是阶级形成具有明显特征的社会-文化实体和政治共同体的程度是非常不同的。英国是阶级强烈和多样化表现的突出情况;但是在北美、中东欧和东南亚地区,并未经历过这样强烈的和范围普遍的阶级表现(Berger 1987: 第七章)。尽管工人在重工业领域(特别是造船、钢铁、铁路和矿业)的集中是阶级表现的第一位重要的条件,但是其他方面的条件在广泛的意义上说也是政治性的。特别是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形成过程,以及它们后来融入政府联合治理结构,都为工人阶级提供了清晰表达的组织、意识形态和纲领的“上层建筑”,从而使工人阶级得以确立巩固。正是这种阶级的“上层建筑”,而不是它的经济结构基础,使工人阶级成为如此重要的历史实体、也正是这种上层建筑的瓦解,标志着人们所说的阶级政治的消亡。

我现在简要评论一下那些使阶级的组织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遭受侵蚀的最近发展的过程,这是目前人们评判不足的。20世纪早期的制度化和组织化过程,在政治意义上包含了职业分化和扩散的过程。这表达了职业利益,并将它们聚集(引导和集中)到广阔的工会和政党政治的平台上来。这导致了“阶级的国家化”(nationalisation of classes,也就是国内市场调控加上自由主义的法律-政治框架的约束)、联合治理的发展和福利权利的扩大。特别是联合治理,有助于确立和巩固社会实体、行动方式和不平等的形式(这与现代意义上的“阶级”相关)。在20世纪上半期,这种制度性的巩固是同经济危机和紧张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相伴随的。联合治理的包容有助于缓解这些冲突;它所导致的不仅是阶级的制度化,而且是阶级冲突的“国内化”(Lehmbruch and Schmitter 1982, Schmitter and Lehmbruch 1979)。

然而,所有这些政治包容措施也导致了正在进行的社会-经济分化与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社会-经济分化瓦解着阶级的统

一,而政治组织的发展则重构阶级的统一。这样,阶级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重构,发生在结构的—经济的安稳状态(也即生活机会和利益的共同化)迅速消失的时候。传统重工业(造船、铁路和矿业等)的瓦解,加上快速的职业分化、迅速发展的第三领域中非体力职业的扩散,以及加速的社会流动,都开始瓦解联合治理经营的结构。这些结构越来越变成了空壳,更多地依靠官僚惯性和政治保护来维持,而不是更多地依靠广泛的经济利益共同体。被人们指称的“新政治”——联合治理的松散、政党联盟的瓦解、非工会化、“新社会运动”的动员和半利益团体的增多——都是“阶级主体”销蚀和瓦解的症状表现。“阶级死亡”这一说法看来较恰当地概括表达了这些变化。克拉克和利普塞特挑选了政治分裂、经济组织和家庭作为变化的主要领域,认为这样的变化——包含在“社会分层之分化”的标识下——降低了阶级的政治重要性。“死亡”(用克拉克和利普塞特的话说)的主要是旧的工业阶级:旧的社会—经济划分,代表这些划分的旧的制度性主体,以及反映这些的旧的区分认同形式。于是在这些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分析大厦就失去了许多基础。然而,有的人可能认为,旧的工业阶级的死亡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枯竭并不一定意味着抛弃“阶级”本身,它可以被理解为关于社会分层和冲突分析的许多分析范畴中的一个。

这种观点当然被一再地提起,如戈德索普的论述(Goldthorpe 1987),以及近些时候的马歇尔的论述(Marshall et al. 1988)和戈德索普和马歇尔(Goldthorpe and Marshall, 本书第七章)的论述。然而,尽管他们选择了一种“温顺的”(humble)的阶级分析——没有关于历史和政治行动的简约化理论——他们仍然坚持把阶级置于社会分析之中心舞台的优先位置。他们赋予阶级的这种中心的——如果不是垄断性的——作用,同韦伯主义分析的多维性是不相容的。

如果确实要保留的话,那么,阶级的概念必须要同马克思的理论和来世学激进地分离开来,而且它必须失去其作为主要社会学概念的

优势地位。正如这里分析的那样，这可能意味着韦伯主义社会分析的复兴。这种复兴不像新韦伯主义的“阶级分析”，而是把社会结构经常看做是阶级的经线和地位的纬线的相互交织，而相互结合的政党关系是它的装饰。

# 社会分层系统中的演替： 对“阶级的死亡”之辩论的贡献<sup>①</sup>

马尔科姆·沃特斯(Malcolm Waters)

关于“阶级的死亡”的辩论打开了“阶级是否存在”这个简单问题的讨论,而且这一讨论部分是关于阶级的概念化本身。根据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阶级可被概念化为集体性行为主体的系统,它由于财产所有的巨大差异而产生于工业资本主义。这些行为主体根据各自各自的利益相互斗争,以确定财产关系。一些作者坚持认为,这样界定的阶级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中心性的和非常重要的因素(如 Hout et al. 本书第三章, Miliband 1989, Wright 1985)。但是阶级也可以被概念化为简单的社会-经济的不平等,这种方法包含一种概念

---

<sup>①</sup>有删节。原文发表题目为“社会分层系统中的演替:对‘阶级的死亡’之辩论的贡献”。《国际社会学》,9:3,1994。较早的版本题目是“从阶级到政党再到地位”,在1993年7月9~11日在英国莱斯特大学举办的关于“世纪末期的阶级、地位和政党”研讨会上发表。早期的文本曾在澳大利亚的弗林德斯大学的《社会学方法》上发表,也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学派》上发表过。本文是关于“阶级的死亡”研究项目成果的一部分,这项研究我是在塔斯马尼亚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同简·帕库斯基(Jan Pakulski)和加里·马科斯(Gary Marks)共同进行的。我要感谢许多同事所作的评论,特别是简·帕库斯基和戴维·洛克伍德(David Lockwood)。

的扩张,不仅包括财产所有权,而且还包括产生于就业关系和劳动市场中之地位的任何形式的不平等(参见本书第三章和第七章)。这种观点上的分歧导致产生了关于作为重要社会力量的阶级之死亡的两种可能的主张。一种主张认为,在我们称之为福利国家的社会机构中当阶级被驯化的时候,它也就完全地消失了;另一种主张则采取极端的立场,认为阶级不管如何界定,其社会作用日趋下降或微不足道了。

本文在这场辩论中采取的是一种激进的且理论性很强的观点立场。它不认为人们应该抛弃阶级这个概念,也不趋向于以下这种观点,即认为阶级的概念应该同其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分离并扩展,以变成纯粹经验性的和或然性的东西。总之它认为,社会分层的可能基础是多维的,并存在于阶级-政党-地位(class-party-status)的三联体中。韦伯首先预示了它们的最为重要的可能性。而且,分层顺序展示了竞争、支配和随时间演替的模式。阶级只是在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才是支配性的分层模式,而从那时起,我们所见证的并不是“阶级的死亡”,而是它服从于其他的分层秩序。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占优势地位的秩序并不是集中于私人所有权和生产,而是集中在国家和组织系统上。然而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占优势地位的分层模式从国家和组织转移到文化项目及其过程上来,转移到那种集中于生活方式和价值认同的精神性共同体上来。

随之得出的结论是,以阶级为标志的社会之观念应限制在一种特殊的历史结构中,其中由生产关系规定的集体行为主体在为控制财产所有权制度的领域内进行斗争。在这种社会结构之外,就业关系或劳动市场地位在决定社会回报方面仍继续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如果不是大多数情况下的话),这些将是由除了财产所有权之外的其他因素决定的,包括组织的地位、技能和资历,或价值认同的社会价值。根据这样的思想,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可被理解为并非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是社会分层秩序之间的竞争和斗争的历史。本文的大部分内容就是对这种思想的发展。

## 分层系统中的演替

社会存在着多样的分层秩序，它们之间可以据其社会优势而相互替换。这种思想最初来源于韦伯：

商业阶级产生于市场导向的经济中，但是地位群体却产生于组织的框架中，他们通过其垄断的圣餐仪式，或以封建的方式，或以等级-世袭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取决于占主导地位的分层模式，我们才据以说是一个“(地位)等级社会”或是一个“阶级社会”。(Weber 1978:306~307)

韦伯关于西方社会分层演替的思想可以作如下丰富和扩展。前现代社会是由封建等级所主导支配的，它们是在法律上和宗教上被认可的地位群体，控制着物质的、文化的和政治的权力。随着利息或地租收取者和商业阶级的产生，这种地产等级制度被打破了。后者通过建立市场来夺取前者的特权。在现代社会早期，地产阶级和新阶级并肩存在着，进行着关于财产权的可让与性与世袭性、关于地位与作为交换基础的契约之间的斗争。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从“地产(等级)的”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在这第二种社会形态中，新的地位群体把自己确立在财产所有权、职业、民族或其他的社会成员范畴的基础之上。等到他们取得成功的时候，他们便缓和了通过市场把社会建构到阶级中去的程度。

本文基于支配与服从模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个为人们所共同认可的社会范围或领域之间的转移，论述了四种可能存在的分层模式：

1. 在一种地产等级社会(an estatist society)里，这三个领域是混合在一起的，没有一个能够单独居于支配地位。社会的阶层、等级都置

身于分散和地方性的关系中,这同时包括生产关系、政治权威、道德评价和消费权利。

2.一种阶级社会(a class society)是被纳入利益群体之间的支配和斗争模式中,这些利益群体产生于经济领域。在人们熟悉的马克思的术语中,阶级将是财产所有者和劳动力的出卖者。占支配地位的阶级能够获取国家权力,并通过使国家弱化来维持自己的统治阶级地位。到被支配阶级采取集体行动时,它们具有反叛的或革命的特征,目的是为了通过消灭私人所有权来推翻这种统治阶级。文化是随着阶级的划分而划分的,也分成为支配与被支配的意识形态,高级与低级的文化。

3.一种命令社会(a command society)是受政治和国家领域支配的。在这种社会中,重要的阶层可以被概念化为权力集团。社会主要由一个单一的集团来支配,这个集团是由政治的—官僚的精英构成,它们对一个或多个处于从属地位的人群集团进行权力控制。这些集团在横向上形成正式对立的党派体系。精英集团可能或由一个政党领导团体构成,或由联合的政党领导团体构成,它把政党领袖同其他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领袖联合起来,包括经济的和文化的集团。精英们利用国家的强制权力来调控其他两个领域。国家通过把私有财产转变为公有财产来支配整个经济,虽然这不是整个的转变。同样,阶级通过确立同政党的联系,基于政治的而不是产业的方式来组织自己。同时,文化领域可以在国家的保护伞下或在国家创立的垄断组织的庇护下统一起来。这样它可以转变为一种工业的或大众的文化。

4.在一种地位—习俗社会(a status-conventional society)中,社会分层形成于文化领域。社会阶层是生活方式或基于价值的地位共同体。它们可以形成有差异的价值认同模式、身份、信仰、符号含义、趣味、意见或消费。由于这些资源的短暂和脆弱的本质,基于习俗、地位共同体的社会分层系统看来是移动的马赛克,它能够破坏其他两个领域的稳定。国家因为不能获得大众的支持而被削弱了,而经济因为既



不能控制其工人也不能控制市场也被削弱(在社会意义上说)。由于价值和功用导向占优势地位,国家和经济便都被非集中化(分散化)了。这些价值和功用导向是根据习俗确立的,而不是根据集体的利益。

这样看来,演替模式现在已经很清楚了。韦伯为我们迈出了第一步。等级社会由于种种原因,经历了初步形式的分化,阶级和市场组织在这种社会中出现了。第二步演替的发生,是在无财产的工人阶级成功地获得了国家政权,或夺取和确立了重要的权力地位的时候。国家被权力集团和代表它们的政党重构和加强,它们把自己的调控影响扩展到整个社会。这样,第三步演替就成为可能。其中,地位群体必须发展成为国家的服从者和政治支持者,这样才能削弱国家,在文化价值控制的基础上确立社会支配地位。演替过程中出现的每一个阶段,并没有使前一阶段中的阶层消失。阶级并没有在命令社会中消失,而是通过国家被重构和(实际上是)再造。同样,在地位-习俗社会中,阶级和集团仍然是文化秩序中的实体(参见 Lockwood 1986: 12)。

我们现在对每一个演替作实质性的考察,并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当前时期正在进行的演进和转变。这样做的意图并不是要提供一个历史概略图,而是要表明:从一种秩序向另一种秩序的转变,是危机及随后重构的结果。这里主要关注的是资本主义西方社会,虽然得出的结论也适用于以前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

## 从等级到阶级

封建制是欧洲等级社会的主要形式,它是以社会分层排列的混合为基础,把四种资源结合在一起:劳动、土地、暴力工具和宗教合法性。它的起源是由骑士建立的对地方部落人群的保护行为。骑士们从农民那里窃取了土地,为它们提供武力“保护”,以换取对其劳动-服务的占有。这种剥削形式后来逐渐发展完善起来,导致了土地租佃关系和服务交换之等级制度的形成,它把农民和君主联系起来。这种制度是

这样获得宗教合法性的：君主被认为是作为上帝的佃户而获得其王国的……因为全部土地最终是来自上帝，租佃关系就在宗教的效忠仪式中得到了巩固。这样，封建社会就分化为三个层级——贵族、农民和知识分子——尽管只有前两者是真正重要的。人的等级身份是出生的时候就确定了的，因而等级是封闭的、同级发生联系的和可继承的。等级界限是在习惯、法律和宗教中确定的，并且它们通过使用武力而得到认可。

在封建社会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央国家政权是软弱的，而且在被骑士（爵士）掌握的时候要比在君主手里时更为稳固。爵士阶层指挥农业生产，招募军队，支持教士。国家仅仅是贵族土地所有者的联邦，通过由精神和宗教认可的租佃关系松散地结合在一起。这种松散的联邦只是在一种统一的宗教合法性形式存在的时候才结合起来。到了17世纪，这种形式已不再适用，欧洲社会饱受贵族之间展开的内战的折磨，这些贵族分子根据宗教划分为派别（Kossallek 1988）。最为典型的解决办法是加强和扩大君主权力，这样就建立起专制的国家。于是贵族就围绕着君主结合起来，君主成为世俗法律的唯一来源，在职业官僚和军队的支持下进行治疗（Mann 1986:476）。

但是在一些情况下，集体行动者会在其他地方形成，他们能够利用贵族的弱点……

一种建立在商业而最终是制造业基础上的经济制度，首先导致了商业资产阶级后来是工业资产阶级的产生。这些阶级起来反对贵族和君主权力。正如安德森（Anderson 1979:142）证实的那样，英国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统治下的专制国家在17世纪中期“被资产阶级革命剥夺了”。英国的资产阶级在1688年成功地使君主制度“立宪”。资产阶级革命在其他地区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如美国1786年的革命、法国1789年的革命），但是对等级制度造成的结果大体相同。

兴起的资产阶级试图使商业和工业生产从国家和宗教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这样也就从贵族制度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它们试图确立新

的宪法：可让与的私人财产、契约、正式的自由雇佣劳动、商品形式、货币，以及开放的市场。为实现这个目标，贵族或被驱逐出国家（如英国1832年的改革宪章），或被全部消灭（如1789年的法国革命）。他们在农业贸易中的特权被剥夺（如1846年英国谷物法的废除），它们对农业劳动的广泛控制被放宽（如1834年英国贫穷法修正案；1865年美国奴隶的解放）。在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日渐从经济和市民社会领域退出。它像专制君主国家那样不拥有财产，但要在财政的基础上进行征税。因为资产阶级非常有效地使无产阶级服从于工业环境和条件，所以国家的税收主要用于协调资产阶级的集体行为，这主要是为了军事和贸易的目的。

文化也以同样的形式发展起来。许多情况下超越了贵族创办的限制，在资本主义文化再生产的新的世俗化场所——大学——里发展起来。大学作为主要机构组织之一，努力使那些具有等级差别的兴趣和生活方式融入已被人们熟悉的高雅和大众文化之中。无论是古典传统的文化还是前卫文化，都不能为处于从属地位的无产阶级所接近。这样，文化也同样地形成了阶级划分。

## 从阶级到命令

从这里开始，我们讨论的问题就更具有争论性了，因为许多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文献经常主张阶级仍然具有显著的地位和作用。这里提出的相反观点是，到19世纪末期的时候，在许多社会中都发生了从阶级向其他方面的重要转移。总之，相对于经济生产来说，国家的重要性和权力的增长，对取代资产阶级作为集体行动主体的支配性地位具有重要的作用。

为了探究查明危机的实质，我们不妨同意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趋向于自我灭亡的观点。他们认为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已经被由自己的需求所决定的一系列事件所推翻。这里不想对其进行

详细讨论,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恢复依赖于在已丧失了权力的无产阶级中间培养政治忠诚、经济奉献和技术技能。然而,正是这些资源的发展和提高,造成了无产阶级重新获得了权力,这样阶级的再构就进入了一个扩张的周期(Stewart et al. 1980:227)。工人阶级获得了物质的、技术的和组织-政治的资源,使得自己有能力挑战资产阶级。

在西方,这种挑战最初是在经济-工业领域开展的,但工人阶级在这里被击退了。工人的工会没有能够驱逐资产阶级,而且这些劳动组织本身的存在也受到了威胁。这样,自由资本主义面临着一个僵局,看起来是慢慢地止步了。资本家阶级用尽了生产领域中所有可以利用的剥削和控制手段。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由于没有实现希望的变革,他们要做的就是退出自己的劳动。

未受多大破坏的工人阶级组织作了横向转移,将其注意力转移到政党政治上,试图取得国家,以有效地克服危机。待到他们成功以后,便将社会依照现在普遍所指的那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Hilferding 1910 (1981), Lash and Urry 1987, Offer 1985)或“联合主义”(Lehmbruch 1977, Schmitter 1974)方向转变。因为这时的工人阶级相对来说已变得强大起来,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他们能够利用自己早期同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所达成的妥协。

在我们考察西方出现的命令形式之复杂性和多元模式之前,我们先简略回顾一些纯粹“国家主义”的结果。在这些地方,工人阶级相对软弱和没有权力,于是被迫通过暴力手段夺取了国家。这些国家垄断之社会的最著名例子就是前苏联及其卫星国、古巴、越南和朝鲜等小的国家,以前的法西斯德国以及意大利和西班牙,还有现代的亚洲国家主义的社会,包括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新加坡。有事实证明的是,这种类型国家主义的社会组织正趋于衰落,但是还仍然有许多其他的现代例子,世界人口中大概有1/3到1/2生活在这种政权之下。在每一个这样的社会,国家利用强制或调控手段于经济和文化的直接组织过程。在每个例子中,国家的组织和符号化是同控制它的政党紧

密相连的。帕库斯基 ( Pakulski 1986:18~20 ) 用 "Partocratic" (可译为“政党贵族的”) 来指称这种社会制度, 因为它们强调“忠诚和政治与意识形态‘专家’, 而不是管理或技术专家” ( 1986:19 )。

在西方, 资产阶级能够迫使工人阶级达成妥协, 这是在克鲁克等人 ( Crook et al .1992:84~85 ) 所称谓的“大休战” ( Grand armistice ) 中进行的。这种休战是在国家的庇护下进行的。国家在这里是作为超阶级的或阶级中立的权力中心而出现的。这样, 国家就获得了合法性的提升, 能够把它的影响扩展到以前没有到达的福利和文化领域。而且重要的是, 国家把大企业和有组织的劳动包容到一个单一的权力网中。对于资产阶级来说, 这意味着接受国家干预和经济调控, 甚至它的部分国有化, 它们换得的是一些权利和绝大部分私人所有制的物质利益得到维护。对于工人阶级来说, 意味着接受经济领域中的从属地位, 换取的是主要关注提高经济安全的渐进的政治改革纲领。在西方, 由于阶级没有被彻底重构, 它就越来越服从于权力集团体制, 这种集团致力于控制国家政权。

然而, 国家发展的程度在整个西方社会是不一致的。特别是在美国, 联合主义的程度要低于西欧和日本。这可能是因为在, 虽然内战摧毁了南方的半封建社会, 但美国社会的绝大部分不是后封建的。在欧洲和日本, 等级关系已经被包容进了阶级模式, 而且能够通过阶级文化的发展, 具有加强和再造它们的实际后果。

在联合主义的或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中, 国家是扩张的和具有干预作用的, 即便是在美国。( 它的发展 ) 导致了三个政治阶层的出现: 官僚政治精英, 它们控制国家资源的分配, 确立优先的消费进入; 自主性和特权相对较少的公共服务工人这一类; 以及依赖于国家的地位较低的市民阶层。垄断资本主义把阶级重构进三个平行的阶层: 公司的主管和高级经理; 白领工人和主要领域的体力工人; 边缘化的劳动, 经常是体力的服务性劳动。加起来, 公共和私有领域的等级, 趋向于横向地融入三个集团: ( 1 ) 官僚的 - 政治的 - 管理的精英 ( BMPE ), 包括那些

在组织中掌握着与其数量不成比例之份额权力的人,他们控制着社会(米尔斯称之为“权力精英”(Mills 1959),伦纳(Renner 1978)和戈德索普(Goldthorpe 1982)称之为“服务阶级”);(2)公共和私人领域中“被一体化的(中间的)群体”,白领工人和主要劳动市场上的体力工人,他们获得的报酬和接受的剥削大体平衡,要通过划分派别的群众政党和劳动组织向国家组织系统贡献自己的忠诚、劳动和纳税;(3)边缘化的、受剥削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被排斥的群体”(或“下层阶级”),他们是依赖国家救济的人和边缘化雇员,特别是包括妇女、少数民族和种族成员,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政治权力和支持体制之外。

## 从命令到习俗

在当前的历史环境中,与国家紧密相连的集团形式正趋于瓦解。在原来奉行国家主义的俄国和东欧社会,国家的失败和瓦解要比其他地区显著得多。但是我们这里集中讨论的是西方的联合主义国家结构,它经历了内部产生的“国家危机”,这大体相当于19世纪末期发生的内部产生的私人资本主义危机。克鲁克等人(Crook et al.1992:92~94)指出了一些原因:(1)权利要求群体不断增长和扩大的需求没有市场能力,超出了国家的供给满足能力;(2)权力的不断加深的非人性遮盖了责任的重要性;(3)因教育的提高所培养的政治支持反而导致了民众关注后物质主义价值,而这恰恰是反对国家的;(4)行政体制的扩张达到这种程度,以致它们所消费的资源多于到达要求者手中的资源;和(5)正是用于矫正市场失败的调控手段却造成了市场瓦解。

结果,国家在三个方向上失去了自己的力量、作用和有效性(参见Crook et al. 1992:97~104):(1)它正被分散化为更多的自治地方和民族同质的地区;(2)它正在地区或全球层次上同其他国家联合起

来；(3)它正经受着市场化和私有化造成的分化后果的影响。

当作为意义和管理之中心的国家衰落的时候，权力集团和政党也随之瓦解了。对官僚的—政治的—管理的精英和被一体化的群体构成的挑战主要是文化的。官僚的—政治的—管理的精英是依靠技术资历和意识形态获得合法性的——他们之所以统治社会，是因为他们的绩效和教养。这种合法性由于被称为“雅皮士”的地位群体的出现而受到了挑战(Lash 1990:18~25)，这种挑战在特征上正是文化性的。雅皮士运用后现代文化把大众文化的因素提升到精英地位，并且拓宽和扩大了精英文化表演的听众队伍。我们已经看到了正形成的“后文化”选择和差异，其中没有任何一种特殊的形式能够声称具有优势地位。这种文化转变发生的时候，正是官僚的—政治的—管理的精英的组织基础开始瓦解、国家开始衰退并转而在产业领域缩小规模的时候。

同样，被一体化群体也一直经历着内部的分化，但在这里却有其起因的特征。它在传统上是围绕男性养家活口之人的政治和经济参与而组织起来的。这种政治上的一致性由于少数群体权利要求的出现而受到了挑战，这些少数群体由于性别、年龄或民族的限制而遭到排斥。男性产业工人和白领工人已经撤退，变成了仅是一种另外地位群体，他们关注的是最大化消费，而不是各集团间形成共识的领导因素。在许多社会里，他们的政党政治忠诚也因而转移到了右翼方面。而且，对消费的整体性关注使得个人意识非集体化，倾向于不愿投入利益团体的行动。在这些情况的背后，正形成着对政党政治的不信任和集团同一性的下降。这种集团同一性的下降在私人领域体力工人形成利益团体的过程中尤为明显。工会化水平(劳动力参加工会的人数比例)在绝大多数西方社会都在降低，罢工水平也是如此。在美国，作为公共生活因素之一的工会实际上已经消失。

工人阶级在命令分层秩序下曾成功地侵占了国家，而这却最终为工人阶级自身的边缘化铺平了道路。它曾成功地使那种被称为争取公

民权的普遍性运动制度化( Marshall 1973 )。起初,这些主要应用于体力工人的核心领域,这些工人是宪章团体中的成员。然而,公民权却使机会平等制度化,因而也容许来自这个核心之外的权利要求。这样,我们便看到了基于性别、年龄、民族、种族、性偏好和生理残疾等形成的集体行动。这些集体行动主体是文化的共同体,是具有共同特征的暂时的人群结合,这些特征超越了他们各自特殊的社会背景,他们彼此间通过某种共识联系在一起,或者可能是通过大众传媒的形象来发生联系的。

集体行动表达的载体是已经出现的新社会运动。就其与国家相对立而不是试图获得国家而言,新社会运动区别于传统的政党。就其坚决反对联合的—官僚的—技术的(即以国家为中心的)价值范式而言,它又区别于“旧”社会运动。而且,他们采用组织的方法,通过对价值立场的大众传媒以提高意识。这些价值立场一般来说是高度普遍性的、倡导人道的和权利取向的。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些新社会运动在西方的兴起和影响,包括公民权、生态、和平和女权运动等,是不乏人们的支持和关注的。在欧洲,积极支持新社会运动的人大约占全部人口的20%,公众同情的约占60%( Crook et al. 1992:141 )。这样的比例足以让传统的政党羡慕。而且,他们在公共政策领域迫使从对利益表达问题的关注转向对普遍的价值问题的关注。

国家的衰落还包括社会分层从社会——结构环境中获得了总体的解放。这样,分层就明确地表现为文化的而不是社会的,关注生活方式而不是生活机会,关注消费而不是生产,关注价值而不是利益。当致力的主题、兴趣和风尚发生变化的时候,出现的分层模式将是不固定的和变化的。它将是地位共同体的多重组合,而不是少数封闭的社会单元。任何共同体的成员不是要依赖于个人在生产或控制系统中的位置,而是依赖于地位成就、在价值实现领域获得的社会价值形式、对符号资源的控制、在话语流通中的位置以及节制的行为。这种成员形式要视大众参与、行动状况和接近文化资源情况,以及在物质产品消费



上的表现与挥霍情况而定。

这样的地位形成与安德森 ( Anderson 1983 ) 所描绘的“想像的共同体”经常具有相同之处。它们并不包含现实中的共同地位,也不包含密集的个人间关系网。但是可以通过大众交往和大众传媒来确立。大众媒介仿真是一种工具,能使从未谋面的人们认为自己是具有共同归属特征,或共同政治关注,或共同消费偏好的共同体成员,也就是说具有同道和共同身份的感觉。关于“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化”的文献强调地位符号支配不平等模式的方式:“在‘消费社会’,地位的含义,如同规定社会存在的标准一样,越来越趋向于简单化,并与‘社会地位’的含义相一致。然而‘社会地位’也是根据权力、权威和责任来衡量的……我们这个社会的特点就在于,其他的认知系统都在迅速地消退,主要是因为‘社会地位’这一代码的绝对优势”( Baudrillard, 1988:19 )。菲德斯通 ( Featherstone ) 也同样地强调文化方面:“我们正进入一个没有固定的地位群体的社会,它采纳了生活方式……那种固定到特殊群体的情况已经被超越了。这明显是向后现代消费文化迈进……(它)将更加表明社会分工的不重要,最后将表明作为重要参照点的‘社会’的终结。( Featherstone, 1987:55~56 )”

这些习俗的共同体需要人们仔细地加以甄别,以区分于以前的地位排列形式。它们不像地产等级和世袭阶级那样由法律或宗教所决定,也不能把它们归于诸如性别或民族这样的范畴,实际上它们也不类似于“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经济地位”可能被认为是阶级集团的文化的或公共的方面。它们却明显地是自由选择的和倡导共同性的,它们的作用是动摇和分解这些更为“确定的”文化模式。我们在描述这一过程时,可参考这样的模式中两个最为明显的例子:民族和性别。

在阶级社会中,民族被占主导地位的两个经济阶级所强烈否定:被资产阶级所否定,是因为民族会威胁商品化关系的集中性;被工人阶级所否定,是因为民族是分裂性的(例如在马克思那里,就否定民

族团体的历史意义,认为它们是民族主义的残余,已经被历史车轮无情碾碎了)( Parkin 1979:31 中援引)。在命令社会中,民族被重组和政治化了。惟一合理的民族是同民族-国家相符合的东西,其他类型的民族则遭受被同化、融合、压迫、迫使迁移或甚至屠杀的命运。然而在当前的变化中,民族正回归为一种新权力,在瓦解阶级和国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在前国家主义社会表现得最为明显,最典型的如前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南斯拉夫和前苏联。这里国家的形成要服从于民族忠诚,也服从于与市场民主相关的价值认同。然而,西欧国家的内聚力也经受着少数民族的同样威胁,如在加泰罗尼亚(西班牙东北部一地区——译者)、佛兰德斯(包括比利时的东佛兰德省和西佛兰德省以及法国北部部分地区——译者)、尤斯卡迪、伦巴底(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地区——译者)、苏格兰、阿尔斯特(被北爱尔兰及爱尔兰共和国所分割——译者)。第三世界的国家也经常经受民族冲突的折磨。

性别地位的转变也大体是同样的方式(Brenner and Ramas 1984, Waters 1989)。在阶级社会,妇女被排除在决定阶级成员资格的生产关系之外,而被限制在家庭领域里。在命令社会,社会和文化再生产被认为是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交给家庭由个人决定,而是由国家组织为“医疗、教育和福利”。然而在当前社会条件下,性别却具有了更为选择性的属性,以至于什么是阳性和什么是阴性的界限都变得模糊——性别不再像以前那样要从职业和家庭内部劳动分工上来评判。更为重要的是,性别受性偏好、职业导向、分娩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内部差异和分化更大了。

我们现在转到文化是怎样削弱国家和阶级这一总的问题上来。借助大众媒体的大众行为和民意动员能够有效地驯化国家。国家不再依赖于从周围获得稳定的政治支持,因而必须培养这种支持。我们在经济领域也看到了同样的变化趋势。由于被称为“后福特主义”和“弹性专业化”发展的影响,管理和劳动的功能正重新结合在一起,淡化了传统的产业区分(如 Kern and Schumann 1984)。工业正变得“文

化化”，集中关注决定、判断、知识和信息，而不是技术、官僚和控制。

## ✎ 结论：社会分层的未来

我们在这里能不能具体地指出贯穿这些过程的一个总体趋势呢？最有启示价值的分析是贝克关于工业主义非传统化的见解。贝克认为，迄今为止我们所描述的现代社会，实际上是后封建的，它还保留着传统的成分，包括性别归属和亲属关系的作用，以及更重要的，阶级文化和一致性。根据这种见解，如果工业主义确实是现代化的，阶级认同将不是稳定的，阶级成员身份也不会在代际间再产生出来。依照他的观点，阶级体制正经受着个人主义化浪潮的冲刷，这表现为大规模失业、工业重构和非技术化现象。这些迫使人们“做出不同的抉择，包括选择自己愿意认同的群体和亚文化”（Beck 1992:88）。现代社会被个人主义化和社会化这两种过程所包围。前者表现为这样的事实，个人变成社会产生不平等的单位，后者表现为个人正追求加入“新的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发展趋势（Beck 1992:90）。结果就是这个社会矛盾的“个人化的雇员社会”。

以上关于地位—习俗社会的讨论表明的应该是，虽然贝克所提观点的主旨是正确的，但是社会应被看做是越来越由暂时的但却是具有公共性的地位群体所构成，而不是全部是个人主义的。非传统化这种力量可以更好地表述为“市场的完善化”。我们一般都过于匆忙地得出如下结论，认为马克思关于劳动商品化的论述或韦伯关于阶级是市场之现象的论述说明的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伊始，社会报酬的取得就完全市场化了。所有这些论述所意味的是，市场是被启动了，但并不是它们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完善的。后来发生的从阶级到命令的转移还是进一步削弱了在获得社会报酬方面的财产阻碍力量。由于在大规模的组织中建立了行政和管理命令的很长链条，流动机会则快速增多（当然，这确实可能造成怀特所说的“组织资源”的垄断，但是同所有—管

理集一身的资本家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相比,这种资源的分配要广泛得多)。


而在新兴的地位秩序中,能力、绩效和价值追求获得的报酬,是由文化的经济决定的,而且也不是深陷在封闭的模式中。归属和习惯的影响越来越同生活方式、价值认同、消费模式、话语模式和团体成员身份相分离。现在,这些正成为社会分层的自由流动货币,逐渐取代财产和命令能力。这种秩序将发展起甚至更为信息化的联系,更趋于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为交往和群体形成开辟了新的机会。在话语能够同时为地球上其他任何一个居民所用的社会里,地位共同体的力量将势不可挡。这样,新兴的地位-习俗社会强调选择、灵活、公开和可变性,而其中许多已经同后现代文化联系在一起。



## 第二部分

英国社会学和阶级分析

---



## 第二部分

---

英国社会学和阶级分析

---

## 阶级结构、阶级定位和阶级行动

正如我们在引言中指出的那样,对阶级的关注及其争论在英国社会学界尤其突出。这一显著特征有时被作为英国社会独特性的一个例证,而不是被视为广泛的社会学学科中阶级分析特征突出的表现。然而直到最近,多数英国学者本应抛弃这种看法。但是,帕尔于1989年在相对来说较深奥的《国际都市和地区研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生动但颇具争议的专栏文章,引起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诸多知名的人士(数量多得令人吃惊)也一直准备着挑战英国的正统,这使得“主流的”阶级分析家们感到自己处于一种防守态势。他们这种强烈的情绪,可能反映了对职业或专业身份的捍卫,但更为可能的解释在于英国的政治形势本身。撒切尔政府引入了一套更为粗暴的社会秩序形式,从而迫使工党——该党存在的问题总是能够影响英国的阶级分析——用修正的目光来审视其基本思想。

本部分选印的论文表明,与本书第一部分涉及的问题相比,英国的争论关注的是更为具体层面的问题。帕尔(Pahl)最初的讨论是从阶级解释问题出发的,虽然非常笼统(即使本文被略去的段落中也暗示着许多具体的后现代主义论题)。帕尔的主要目标的确一直是试图超越社会理论中结构与行动之间的传统分野,并沿着吉登斯在其“结构化”理论中所倡导的基本理论线索来改变阶级分析的方向。他还引



用了历史学家 E. P. 汤普森的著作和论述,作为同样精神的体现。

帕尔的文章迅速招致了反驳观点的到来 (Marshall 1991),而这篇论文以及帕尔所作的简短回应,在随后的学术会议和研讨会上引发了激烈争论。在此,我们选印的是戈德索普和马歇尔于 1992 年在英国社会学会的主要杂志《社会学》上发表的、对阶级分析理论的著名辩护,以及帕尔在同一杂志中做出的回应。戈德索普和马歇尔在否认了自己的理论同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强”命题的任何实质联系之后,他们的观点看来只是关注当代社会是否存在阶级这样的具体问题。但是,他们在写作中所依据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学和社会研究方法观点,它认为一种解释的核心在于其预测经验联系上所具有的力量,正如定量数据所揭示的那样。这样,他们的文章对本书中其他一些文章关于阶级问题的纯粹概念困扰表现出敌对情绪。帕尔的回应文章,实际上就是指责戈德索普和马歇尔提出了一种根本没有阶级理论的阶级分析。

在帕尔的回应和斯科特 (Scott) 对于争论的评述之间,我们穿插了一篇罗斯玛丽·克罗普顿探讨阶级和性别问题的论文,该文与这里的讨论有很大的关联。克罗普顿也倾向于支持抛弃结构/行为分野的策略。她的文章以回顾女性主义的阶级分析批判为开端,讨论了英国社会学界长期争议的关于在戈德索普和马歇尔所运用的阶级图式中妇女的阶级定位问题。她在提出了自己对于阶级分析不同层面的类型划分后,指出自己的看法与早期的立场不同,认为社会实践的性别特征是如此强烈,以至深深地融入了所有层次的阶级概念化之中。

斯科特的评述试图将争论中的问题纳入自己对韦伯早期阶级理论的总体辩护中,特别是韦伯关于阶级地位分析和社会阶级分析的区别。斯科特认为,运用这一区分,阶级分析理论中的许多争论都能够得以解决。同样,关于阶级研究的分析单位的争论——无论它是个人或是家庭,也能够以相同的方式得到解决。这样,斯科特就否定了克罗普顿文章的结论。

# 皇帝是赤裸的吗？

——关于社会学理论充分性的一些问题<sup>①</sup>

雷·帕尔 (Ray Pahl)

在社会学中，经常运用一种结构—意识—行动的链式理论。这一理论从具体环境下人们的物质条件和生存环境出发，经由人们对这一环境所固有的剥削或弊端的共同意识，从而导致最终能够排除、改善或改变令人厌恶的社会制度、压迫关系或其他什么社会制度。这种社会行动链式理论的主要内容可以总结如下：

结构 → 意识 → 行动 (SCA)

其基本思想是，在一类人群——甚或更经常使用阶级一词——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存在着某种固有的东西，它使人们——显然是通过一种决定论的逻辑——能够对自己所处的受压迫、受剥夺或受剥削的环境产生一种激进意识。一旦这种意识取得支配地位，人们就将其设想为一种变革力量（而不是宿命的屈从），这股力量在导致社会变革的

<sup>①</sup>文章节选自《皇帝是赤裸的吗？城市和地区研究中社会学理论充分性的一些问题》，载《国际城市和地区研究杂志》，13:4:1989，第709~720页。起初，戴维·洛克伍德的一篇关注推演环节缺失的文章——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多数论著的中心论题，促使我研究这一议题。我也承认，我从安东尼·吉登斯的思想中受惠颇多，他一贯主张行动和结构划分的理论核心是存在问题的，并且做了大量工作，试图通过其“结构化”理论来解决许多难题。

政治和暴力行动中得到充分展现，而社会变革将消除那些最初引发不幸的社会环境。这是一种基于来自下层力量的集体组织模式，被统治阶级或人群由此夺取上层阶级的权力或决策权。在这一模式中，“意识”看似一个介入的干扰变量，并被认为是不应该完全机械地由结构来决定，但很少有人认为这种链式理论中的这些环节是存在问题的。

在接下来的部分，我将指出的是：结构、意识和行动的链式理论中的缺失环节尚未被发现，尤其是作为一种概念的阶级在社会学中不再具有任何作用。显然，我试图促进辩论和引发争论：我的目的是批判性的，但同时也是建设性的。因为恐怕有些人会认为只有社会学才依靠自我怀疑和反思，我想如果看到其他学科中也表现出某些质疑先前那些理所当然的概念性范畴的迹象的话，将是非常令人振奋的。例如在经济学领域，最近在学科内部出现的某些批评观点，在我看来绝对具有颠覆性。莱斯特·索罗（Lester Thurow 1983）对于经济学家们关于劳动力市场理论的毁灭性攻讦是如此具有说服力，以至于人们很难像在认为任何事情都未改变的状态下还能继续探讨劳动力市场。在随后的部分，我将如索罗在经济学中所做的那样，在社会学中开始进行同样的工作。没穿衣服的皇帝们（或者至少比他们所认为的穿得要少很多）应该在小男孩发现之前就要如实说明……我不会对我的论战姿态表示歉意。

## 阶级分析中的结构、意识和行动

SCA模式被直接或潜在地应用于许多层面。例如，在最近关于城市的分析中，它被运用于擅自占住空房者、同性恋者、单身父母、那些毗邻挥发大量有毒废物的工厂而居的人们，以及在具体城市或乡村环境中感到在某些方面被压迫、歧视或欺骗的任何社会群体或部类中。研究这些环境中“兴起”的“城市社会运动”的分析家们，经常把SCA作为将自己的描述性阐释进行“理论化”的一种方式。但他们在这样做

时通常都很含蓄，因为正如皮克温茨（Pickvance 1977）提醒我们的那样，被认为是“社会基础”的那些擅自占住空房者以及受污染侵害的人们等，他们借以转变为一股“社会力量”（这是指某种形式的城市“社会运动”）的机制和过程是相当复杂的，相关的分析并不能对此做出明确的说明。“城市社会运动”的研究者们，很少对显然相似的社会基础以及其他地方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进行比较研究，很少探究一些具体的环境和过程。这些环境和过程在一种环境下把社会群体转变为社会力量，而在另一种环境下这样的群体仍然受着压迫者的荼毒。在城市环境中进行的这样的研究试图强调一些特殊性的因素——例如一个具有特殊能力的行政长官或者具有超凡才能的政治领袖，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激励了一定条件下的社会群体，而这些社会群体与其他地方同样受剥夺的群体相比，能够随心所欲地得到于己有利的好处。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结构、意识和行动之间的联系。

但是，这一模式本身的灵活性，也使它可被适用于民族国家层面——例如，当人们期望特定社会结构中的“工人阶级”掌控历史，并从共同意识发展为革命行动的时候。这一模式也可以适用于那些国家集团，如欧共体、经合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共产主义国家集团”和第三世界等。对此，有人认为社会结构之间的差异过分制约和掩盖了社会结构内部的差异，但在这一抽象层次上看，社会力量转变为社会行动的具体过程是如此复杂和乏味，以至于任何头脑有些灵活的人，都把这些具体的过程服务于多种多样的目的。但是，这一模式很少被用于解释从上至下的革命（今日之苏联？）或由社会结构上层发起的社会变革（撒切尔的英国所发生的变革？）。人们认为，结构产生意识的情况更易发生在无权人群中，而不是有权人群中，但对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却并不清楚。SCA 模式传统上习惯采取一种浪漫化的态度对待受压迫者，并忽视统治阶级的利益及其分裂情况。但公平地说，这仅仅是一种传统做法，而并不是这一模式本身的固有特征。因此，关

于那些处于统治地位的人群更容易认识到结构定位中的意识问题的说法,仍然是存有争议的。

那些含蓄或直接运用这一模式的人,很少承认 SCA 链式结构中的各环节尚未经过充分的理论论证。正如洛克伍德表明的那样 (Lockwood 1981),它是建立在一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行动理论的观念基础之上的。而这也表明,作为这一模式之来源的马克思的理论,对行动理论也没有充分的阐释。

### 阶级:新研究和旧教条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社会学文献探讨了围绕 SCA 模式所产生的疑问和难题。(一些最有用的论述——包括洛克伍德的文章——于 1988 年发表)结果,阶级概念也得到了许多作者的认真考究,尤其是某些女权主义批评家,对于那种毫无疑问地将阶级用作一个关键性解释变量的习惯做法进行质疑。

正如马歇尔及其同事 (1988) 指出的那样,很难构设一组能将这一领域各种模式和假设都囊括其中的单一的阶级分类。美国的 E.O.怀特和英国的戈德索普在这方面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工作,也许设计出一个具有一般有效性的方案。他们各自为其所在国设计了一组看似可行的阶级分类图式,但遗憾的是,他们的观点似乎并不一致。在怀特分类的经理人和管理人中,有 15% 被戈德索普归于一般体力雇员和非体力雇员之中。马歇尔等人 (1988) 指出,“在这两种分类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同观点”,他们认为,“不能简单地对这两个方案进行比较”。但很奇怪的是,他们并不想找出这些不同之处。当然戈德索普和怀特会提出,因为他们的目的不同,所以他们的方案也没有理由应完全一致。可能并不存在“正确的”阶级分类:在既定分析中的实际分类,将取决于提出和解决的问题如何。

令人悲哀的是,经验研究者在试图进行阶级分类之前,并不总是

先行确定其研究的问题。那些希望阶级这一概念为己所用的人所做的工作,一般将其同 SCA 模型协调起来,并运用这一模型来界定结构。那种认为贫困是社会阶级分类本身的一个基本定义要素、并认定穷人就是指工人阶级的理论,是没有什么分析价值的。这里还存在着许多显然是循环推理的危险,认为社会经济条件产生“阶级”,而阶级又被转而用于解释同一社会经济条件。与一种假定的阶级结构相关的分析上的区分,只有当它带来对于相关问题的更深入的理解时,才具有一定的意义。社会学家之所以关注资产阶级化或无产阶级化,并不是因为他们仅仅关心改进阶级分类的方案,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社会过程——如果存在的话——会经由改良或革命的进程而导致重要的社会变革。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职业声誉或收入和财富分配是否发生了变化,而在于这些假定的变化是如何根据意识和行动而产生的。

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回到熟悉的 SCA 模型。那些忙于将个人、家庭、职业或不同就业关系进行分类,或者尝试对这种分类的代际间或代际内的流动进行测量的社会学家们,只是局限在结构分析阶段,即模式中的 S 阶段。这对于意识和行动而言,可能重要也可能不重要。

一种普遍观点认为,那些很少获得社会经济资源的人们,愿意投票支持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多资源的政党;而那些具有得天独厚优势或认为自己具有这种优势的人们,会试图努力保住他们所拥有的或他们认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长期以来,政治社会学家将这一简单的认识作为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的基石。但许多人认为,在更加丰富多元的社会中,这种划分方法与建立在地区、种族、宗教、性别和民族基础上的特殊目标和价值相比较,其意义就显得越来越不重要。这显然是从那种根据个人、家庭属性的分类,转向了依据其态度和价值的分类。如果这两种分类能够协调一致,那么显然就会很方便了。真是这样的话,根据经济地位就能判断人们的社会态度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所以传统的阶级分析家们就面临着极大的困境了。

解决困难的一种方法,就是将所有的问题都归因于人们的错误意

识,即由于受到种族、宗教、性别、短期优裕生活的影响,人们未能认识到自己“真正的”利益。因为女权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以及持其他意识形态立场的人士就这一问题做出了更为清晰的阐释,所以玩弄这种理论把戏的精英主义观点及其秘密预言,在其社会共同体内部被接受的程度较之从前就有了极大地下降。这些研究者们由于未能完成这种建立在“真正”或“潜在”利益基础上的迂回战术,所以他们被迫转而关注“身份”的概念,或者关注人们从个人或集体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实际方式了。这一方法使得广告商和市场研究者设计出了各种基于“生活方式”的分类标准,创造出了诸多反映他们所谓的新社会现实的术语。他们强调的重点从群体转向个人、从阶级转向群体、从生产者转向消费者。人们的市场行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被用来同义反复地界定自己的市场行为。阶级斗争中的集体,被“开放市场”中的个人所取代。从斗争转向市场的社会发展图景,似乎对社会学家认识世界的方式产生了影响,但人类社会并没有像这些语言所描述的那样发生改变。语言中的这些变化强调的是生活方式与行动之间的联系,但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忽视了结构问题。这种生活方式的分类,只是建立在由日常一般调查所搜集的诸多共同看法基础上。这些分类是特殊的、实用的,并不是源于任何清晰的理论取向。但它们与建立在社会经济群体基础上的分类相比,似乎更有助于理解人们花钱消费的目的。因此,市场研究者之所以把阶级抛弃掉,是出于经验而不是理论的考虑:阶级只是不再发挥作用了。显然,这些关于生活方式的分类对于分析同贫困直接相关的剥夺问题时,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市场经济无论如何都是很少关注穷人的。按照市场研究者的标签,那些拥有金钱和声望的人被划分成不同部分,这样建构的生活方式也就自我永存了。如果人们受到激励而采纳一种与众不同的消费模式以体现其独特身份,他们就会对证明和维持这一既定的模式怀有极大的兴趣,因此,这种生活方式一旦确立,就具有自我永存性了。然而,他们也需要为新产品而开拓新的市场,这样就将会出现这样一种发展倾向,即出现一些假定

的创新者，他们逐渐瓦解正在形成中的这样以生活方式为基础的身份，而建立起新的身份来。这样，所有这些类型和范畴就可能都是短命的。

这些生活方式分类与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朗，而那些认为自己并不属于极其贫困人群的人，其投票行为可能是不稳定的。在传统的语言中，使得最好的经济协议得以运转的，正是在于雇员——无论是经理人还是体力工人——的“阶级利益”。但是，假设特定类别的人（经理人）会由于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忠诚而与“国际资本的利益”结盟，就如同认为其他类别的人（工人）会因为信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反对国际资本的利益的看法一样，都是相当幼稚的。这些广泛的意识形态信仰，在实践中可能会屈从对于民族国家内的医疗、住房、教育以及以持信用卡消费等一系列实际的和实用的考虑。生产关系虽然国际化了，但商品的消费——无论它们是在何处生产——看来仍然是地方的和国家的。这就解释了消费利益作为一种选举政治力量的重要性。

总之，阶级作为一种政治和社会变革力量是存有争议的，因为 SCA 链式理论中的各个环节并没有进行充分的理论论证，而且也没有经验表明这一模式在实际中有多大的关联。其次，阶级作为一种分类工具，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少数特权人群的生活方式。而当我们考察社会结构的另一端时，它也不能对理解残酷的贫困化事实有所助益。最后，显然几乎不能为了进行国际比较而对阶级这一概念进行操作。

## 当代社会学解释中信奉阶级之普遍价值的起源

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理由来说明阶级作为一种解释工具在当代分析中的弱势地位。首先，阶级分析是 19 世纪的英国人发展起来的，当时制造业的集中以及生产关系结构的愈益明晰，使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更加鲜明，而国家干预和国有企业就业的重要性显得



微不足道。其次，民族国家看来成为更为统一的实体，因此，由一个革命阶级来掌握国家控制权的前景，似乎是一个进步的阶级获得具体和持久利益的一条相当令人激动而实际的发展道路。

20世纪近几年的经验形势显然是完全不同的。当那些制造业从业人员下降到只占整个劳动力的 1/5 时，“传统”体力工人在数量意义上的重要性不可避免地降低了，而新技术工人和服务业工人在就业结构中的比例逐渐扩大。当然，这些新的群体——无论他们形式上的社会地位如何，即使是各种经理人——可能也只是如其 19 世纪的先辈那样屈从于资本的需要。但是对他们而言，情况并非如此，而这种认知是不能仅被作为一种错误意识被抹杀的。建立在制造业基础上的阶级模型，必然与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难以适应。

此外，在经济上通过多国和跨国公司而在政治上通过欧共体等组织而形成的经济关系全球化，已经使那种无产阶级可以在国家范围内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事情成为时代的错误。如果不想在 1992 年统一市场建立过程中作壁上观的话，欧洲任何明智的民族无产阶级都会主动与其他国家的对应力量提出保持团结的建议。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可能由于国家对经济生活控制的削弱而丧失更多的利益。作为一种替代的选择，资产阶级也可能从国际协定和联系中看到更大的利益，因为他们能够从更为广阔的市场获利并得到更为廉价的劳动力。确切的资产负债表，在各国之间可能是不同的。鉴于可能发生实际阶级行动的自然舞台的不确定性，那么其他形式的认同和社会意识正在逐渐获得更大的实践相关性，就不令人奇怪了。

### 无所不包的阶级概念削弱了其潜在效用

当然，我并不是说应该忘却阶级：我只是想表明，如果这一概念不再能够发挥什么有益的作用的话，我们就应该停止按照它假设的作用采取行动。如果天真地坚信这样的观点——即只要我们竭力坚持它，

阶级最终会再次具有主要的分析价值——并没有什么益处。例如,关于工人阶级的死亡率高于中间阶级的说法,可能是由许多完全不同的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对此应该进行不同分析。我们所看到的差异,可能与恶劣的住宅条件、缺乏足够的食物、特殊的就业条件以及其他多样的文化和经济环境有关。将阶级引入分析过程中,对于虚假而误导的社会理解来说,还是有好处的,同时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逻辑和原因。

如果阶级术语被运用于一种社会变革理论的语境中——经由这种变革,意识发展起来并导致行动的发生,一个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那么,我们显然是又回到了SCA链式结构中的联系环节问题上。另一方面,如果为了对劣势人群进行跨国比较研究,而将阶级作为一个方便的标签或代用品使用,那我们又重新回到了一个关于定义问题的不令人满意且不具确定性的观点。最后,如果只是为了限制年龄和性别的死亡率变化,而对劣势人群命运的改善予以关注——就像在斯堪的那维亚国家愈益发展的情况那样——那我们就不是只对口号感兴趣,而是需要理解收入、住房条件等与死亡原因之间的准确关系。“阶级”这一术语并不能有助于我们在经验层面的认识和理解,因为例如在苏格兰和芬兰,那些拥有类似阶级地位的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机遇。

这里存在着一个令人遗憾的悖论:阶级概念经常被用于代表它们的那些人,却没有机会和能力运用它作为一种动员力量。而当金融家和寡头等一小部分特权阶级的利益受到影响时,这些范畴却能够被人们以各种策略来有效地动员其集体力量。当然,他们强烈反对关于自己是在阶级术语下行动的说法,他们认为,使用这一术语并不必要,而且也可能引人反感。社会学家可能还认为,他们按照阶级意识对这一过程进行分类,就是在分析中加入了某些独特的东西。但我们还是很难看出,他们通过这样做,到底在分析中加入了些什么特殊的東西。譬如,城市金融家试图反对那些建立在法律、政治或工业权力之上的范

畴的侵入时——这些权力想要对他们进行约束或限制——可能会采用其他显得华而不实的术语来对其行为进行辩护：他们会坚持国家利益与他们的利益的相互联系，强调进攻或入侵的基础是误导的或错用的，等等。但这些理由甚至并不能使那些最不疑心的记者信服。社会学家坚持将阶级引入分析之中，这就提出了到底能够从对这一分析的关注中获得什么东西的期望，但如果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人们就会因为这个概念已成为了一个过度滥用以至没有意义的术语而轻蔑地摒弃使用。

为了不被误解，我必须澄清的是，迄今我所写的任何内容都不是要表明资本主义没有产生一个阶级社会。等级、财产和阶级之间的区分是根本的，比较社会学将继续以这种区分为基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固有的利益冲突基础之上，而在资本和劳动内部也分别具有层级的划分。我将其作为一个公理。我对阶级的实际作用提出疑问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说明阶级这一概念在比较和历史社会学的更高层面的分析中不再具有价值。但是，阶级概念的惯常说法，经常被错置且变得多余，由于不恰当和不加批判地被运用，这一概念已经贬值了。我的立场同 E. P. 汤普森在 25 年前提出的观点非常类似：

那些鼓吹大量概念的社会学家们，让时间机器停止运转，并走到轮机仓去查看。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地方给阶级定位或分类。他们只能发现一群拥有不同职业、收入、地位等级的人群。当然他们是对的，因为阶级不是机器的这个部分或那个部分，而是机器一旦开动后的运转方式——不是这个利益或那个利益，而是利益之间的摩擦——是运动本身、热量和雷鸣般的噪音。阶级和阶级是一种文化的和社会的形成（经常可以找到制度的表现），不能抽象、孤立地而必须按照与其他阶级的关系来给它下定义；阶级的定

义最终是通过时间即行动、反应、变化和冲突的过程做出的……阶级本身不是一件东西，而是一种发生。(Thompson 1965: 357)

许多社会学报告中的理论面临着成为传统附庸的危险——这同苏联社会科学家在公开化和新思维以前的那段时间里，所发表的技术论文中的马列主义开场白非常相像。

难道前述内容意味着我已经把社会学理论赶出了对城市和地区的分析了吗？我并不这么认为。相反，我认为我已把社会学理论放回到城市和地区的分析中去了。我的看法是，社会学者的做法好似 SCA 链式理论中的联系环节是不言自明的。一旦认识到仍然需要探索这些联系环节，一个旨在推进理论认知的重要研究计划就能够得以开启。从家庭、亲属联系以及所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市民社会组织等非正式社会网络中，人们为了实现各种目标而参与自愿性的一致和集体的行动。这些非正式的团体和协会在苏联最近的政治变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在许多传统政治分化的路径正在瓦解的国家中，它们也是一支潜在的力量 (Yanitsky)。这些社会团体中的绝大多数是按照议题结成的，并且以本土为基础。

这些非正式协会是否构成了锻造链式理论之联系环节的材料，还很难说。当前对这些协会和以地区为基础的团体和网络的研究，并不是直接关注于填补 SCA 模型的理论空白。但是，也没有理由说不应该这样做。或许在对我的挑战的回应中，那些致力于这些课题研究的人们将受到激励，以清楚地表明他们对以 SCA 模式和阶级分析模式为中心的社会理论内容所做的具体贡献……让我们给皇帝穿上衣服。

## 充满希望的阶级分析前景<sup>①</sup>

约翰·H.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

戈登·马歇尔(Gordon Marshall)

阶级分析的前景如何呢？最近，一些著名的批评者从不同立场撰文驳斥这一方法，认为阶级分析不能令人信服，也不再具有应有的成效了。我们的著述经常成为批判的对象。但在本文中，我们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对这些指责作出回应，而是为了坚持我们的论述所代表的阶级分析。因为我们认为，阶级分析的发展前景远未枯竭。

本文包括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们试图根据自己的理解来阐释阶级分析的性质和目的，尤其是把它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阶级分析进行区分。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在我们看来，一些批评者——包括欣德斯(Hindess 1987)、霍尔顿和特纳(Holton and Turner 1989)以及索恩森(Sorensen 1991)——并没有对此做出恰当的区分；而另外一些人——最著名的是帕尔(Pahl 1989, 本书第六章)——根本就

---

<sup>①</sup>本文经过删节。首次刊发的题目是《充满希望的阶级分析前景：对最近批判的回应》，载《社会学》，1992：381-400。由于对论文的初稿提出了有益的批评意见，本文作者对乔夫·伊万斯(Geoff Evans)、A. H. 哈尔西(Halsey)以及雷·帕尔(Ray Pahl)表示感谢。

没有加以区别。此外还有几位作者,他们已经不再信任自己曾经忠实信奉或者至少是曾表示同情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但如今显然难以面对任何其他的阶级分析。高兹(Gorz 1982)、霍布斯鲍姆(Hobsbawm 1981)、鲍曼(Bauman 1982)、卢克斯(Lukes 1984)和奥菲(Offe 1985)是明显的例子。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我们将运用自己的阶级概念,通过回顾当前研究中三个主要领域的研究结果,进而说明阶级分析的持续相关性。在此,我们试图更为具体地反驳帕尔的下述观点(见上文,第112页),即在现代社会,“阶级分析作为一种概念在社会学中已不再具有任何有益的作用”;以及霍尔顿和特纳的观点,即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是,阶级用语的持续作用可以根据阶级修辞的隐喻特征,而不是任何清楚的、理性的说服力作出说明”。

在我们看来,阶级分析主要关注阶级结构、阶级流动性、基于在阶级的不平等、基于阶级的行动之间的联系。更具体地说,它要探究由劳动力市场和国民经济不同部门的生产单位中的就业关系所规定的地位之间的相互联系;一段时间内个人及其家庭在这些地位中的分布和重新分布过程;以及他们的生活机遇、所获得的社会身份及其所追求的社会价值和利益。如果这样理解的话,阶级分析并不是指对于任何特殊阶级理论的承诺,而是指一项研究计划——根据拉卡托斯的一般看法(Lakatos 1970)——在这项研究计划中,完全不同并且确实是相互对立的理论可能得以阐明,然后根据它们的启发和解释力量对其进行评价。

也许有人会问——一些批评者的确也这样做了(参见Holton and Turner 1989:173)——为什么应该首先进行这一计划呢?我们认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一计划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具体的方式,来研究那种经常引发社会学想像力的以下两个方面的相互联系:也就是,一方面是作为历史上形成的宏观社会结构,另一方面是作为个人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的日常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模

式。用怀特·米尔斯的话来说 (Wright Mills 1959),正是这些相互联系使人们把传记写作同历史联系起来,“把个人问题”同“公共议题”联系起来。从一种分析的观点来看,这一计划也保证了这样一种解释的便利:它能够运用几个明确的概念,如阶级地位、阶级起源、阶级流动或静止,以解释个人在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正在发生或没有发生的许多事件,以及他们对此做出的反应。

但是具有优先性的,仍然只是吸引力和发展前景。无论阶级分析的研究计划如何有价值——是进步而不是退步的——仍必须由其产生的结果来决定。这并不包括任何关于阶级概念之特殊地位的假设。相反,研究计划也必然包括对一些相关理论的具体思考,如阶级关系对于生活机遇和社会行动的重要性实际上正在减小,而其他的关系和特征——例如由收入或消费、社会地位或生活方式、种族划分或性别所界定的关系和特征——具有或正在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

显然,这种阶级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阶级分析迥然不同。但是,在同后者的论战过程中——有些批评者或者因为对后者深感失望,显然是过于简单化地宣告了阶级分析的死亡。因此,在进一步论述之前,我们认为阐明我们所理解的阶级分析中所不包括的四个要素是重要的——虽然在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版本中仍然可以看到这些要素。

首先,我们的阶级分析概念并不包含历史理论。这种历史理论将阶级冲突作为社会变革的发动机,因此在连续发展阶段的危机时刻,一个特殊的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就是工人阶级)承担起通过革命行动变革社会的“任务”。批评者往往倾向于认为这样的历史理论实际上或潜在地存在于阶级分析本身之中(参见如 Pahl, 本书第六章, Sorenson 1991:73),欣德斯甚至宣称他在戈德索普(1987:28~29 Heath et al. 1991:第五章)的《英国的社会动员》一书中发现了一种历史主义立场。但事实上,在那些积极参与我们所认为的阶级分析研究计划的社会学家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受自由主义启发的学者,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强烈地反对这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尽管

这一研究计划实际上还未正式组织起来,并且它还保留了很大的争论空间(参见 Goldthorpe 1971, 1979, 1992, Korpi 1978, Marshall et al. 1988:第十章, Esping-Anderson 1990:第一章, Haller 1990)。确切地说,它强调的是民族国家走向现代性的多种发展道路,以及阶级形成和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因为本质上的偶然性——而表现出的多样性。

第二,我们所理解的阶级分析并不包含阶级剥削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所有阶级关系必然并且绝对是相互敌对的,一种“批判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就能够从中直接获得其客观的基础。虽然我们所理解的阶级分析的解释必然把冲突视为阶级关系内部的固有特征,但这并不需要坚持劳动价值论,或者坚持任何其他带有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剥削概念的学说。而且也不像索恩森(Sorensen 1991:73)认为的那样,一个阶级的优势必定经常是另一阶级的劣势。实际上,最近人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关于下面这种社会条件的理论讨论上,在这种社会条件下,阶级关系更多地是被作为一种正和(或负和)游戏,而不是简单的零和游戏。这一兴趣反映在关注“阶级妥协”所发挥作用的大量研究上,它被认为在诸如劳动关系或国民政治经济学和福利国家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功用(参考 Goldthorpe (ed.) 1984 中的文章)。

而且,那种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提出的观点,无论是功能主义社会学家或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认为阶级的不平等实际上能够通过各种机制促使实现所有人的更大福利。这样的观点需要经验的考察,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拒绝。接着,这样考察的结果被认为对任何一种关于阶级不平等的道德评估都是直接相关的。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的影响远远不及罗尔斯所构建的“差异原则”(Rawls 1972)。

第三,我们所主张的这种阶级分析并不接受以阶级为基础的集体行动理论。根据这一理论,阶级结构中具有相似地位的个人会自然地发展出一种共同的阶级地位意识,而这种意识反过来会推动他们展开



共同行动以寻求其共同的阶级利益。实际上,从奥尔森进行的重要研究开始,对一般集体行动理论发展中的认识,已有效地使那些从事阶级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案)的人,背离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他们不是期望以阶级为基础的集体行动的发生(当这种行动没有发生时,则诉诸于“错误意识”的观点),相反他们集中关注非常特殊的条件的确立,这种条件必须在这种行动被认为可能发生之前就应用了——因为个人的理性——甚至在共同利益实际上得到承认的地方也是如此。这样,当帕尔(本书第六章)认为阶级分析家们“很少关注存在问题的”链式理论中的各个环节,而盲目重复“结构—意识—行动”的“咒语”时,过去十多年来发生的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

接下来,我们可以再说一点,最近的研究已再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像帕尔、霍尔顿和特纳这样批评家所操作的那种以阶级为基础的集体行动模式,即革命的“冬宫风暴”模式,或者建立在工场或社区中的地方团结基础上的工人阶级行动的礼俗社会模式。如果真的需要给出一个“后奥尔森”分析的集体阶级行动范式,那么这也应当是那种新合作主义政治经济条件下的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例如瑞典的工人阶级集体行动——这一集体行动呈现出完全不同并的确是截然相反的特征。从本质上看,这种集体行动(或者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无行动)包括工人阶级接受其所在工会联合会参与政府的工资调节政策,通过禁止使用地方或部门的讨价还价权力,表现出一种广泛的阶级团结。这样,作为对限制工资政策的一种补偿,工人阶级的领导人追求完全就业、再分配社会福利政策等更为普遍的工人阶级目标(参见 Pizzorno 1978, Stephens 1979, Korpi 1983, Goldthorpe 1984, Scharpf 1984)。从这一新的出发点来看,意识—行动这一环节至少是被重新思考了。用艾尔斯特(Elster 1985: 347)的话来说,阶级意识就是“在实现阶级利益的过程中克服搭便车问题(the free-rider problem)的能力”。

最后,我们所理解的阶级分析并不包括一种简约的政治行动理

论——不论集体的还是个人的。根据这一理论,这种行动仅仅是阶级关系的一种直接表达,是对社会结构所决定的特定阶级利益的追求。同时,由于许多阶级分析家对意识—行动环节的理解改变不小,所以他们也在理论发展的影响下(例如 Berger (ed.) 1981),转而寻求提出一种关于意识(或者至少是利益意识)和结构关系的新观点。恰当地说,被抛弃的是这样的观念,即对阶级利益的认识和关注直接地或“客观地”源于阶级地位。而且,阶级地位被认为是只能产生潜在的利益,尽管这样的潜在利益也可能产生自各种其他的结构性定位。这样,个人是否能够首先寻求实现其阶级利益而不是其他利益,将首先取决于他们所采用具有的社会身份,因为——用比松诺(Pizzorno)的话来说——“身份先于利益”。虽然在这种身份的形成中,各种社会过程如流动过程是非常重要的,但要强调的是,由于阶级利益是政治动员的基础,因此政治运动和政党本身必须运用其意识形态、纲领和策略,在这一过程中扮演关键的角色(参见 Pizzorno 1978, Korpi 1983, Esping-Anderson 1985, Marshall et al. 1988: 第七章, Heath et al. 1991: 第五章)。

欣德斯在提及上述某些作者时坚持认为(1987: 第六章),在对待政治问题上,非马克思主义者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其阶级分析也受到了简化论的困扰。但是,他的说法很难具有说服力,因为他只是宣称他提及的这些作者转向了简化主义的立场,但并没有尝试引用或具体参考他们的言论以对此进行详细的说明。此外,他没有解释为什么那些并不捍卫阶级斗争历史理论的非马克思主义者,会被简化论所吸引或难以完全拒绝这一理论。虽然一些个具体的分析可能关注社会过程而不是政治过程在阶级形成或分解中所发挥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政治过程的重要性。的确,欣德斯所提及的这些作者都曾强调过政治的自主性甚至政治的首要性,以反对他们认为是不适当的“惟社会学论”。例如,他在提及艾斯平-安德森和科皮的文章时(Esping-Anderson and Korpi 1984)宣称(1987: 99)“阶级利益被

视为资本主义关系结构中客观给定的东西”，这是没有根据的，艾斯平－安德森的核心观点与此完全相反（Esping－Anderson 1985）。

根据上述几种否认性的声明，我们所认为的阶级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相比，无论在知识上还是政治上，可能是一种有限得多的规划。的确，在一些特定的方面，它显然并不是来源于任何一般的阶级理论或受这种理论的指导，或者也不是要寻求成为更为广泛的社会或历史理论的基础。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实际上赞同怀特（Wright 1989b: 313~323）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进行比较所得出的结论。但是，正如我们试图捍卫的那样，阶级分析的希望在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虽然阶级分析的支持者可能坚持不同的阶级概念和理论，但他们致力于通过研究本文开头部分提出的那类问题，以及通过较之先前更能恰当地解决他们固有困难的方法的研究，来对这些概念和理论进行验证。具体而言，如果阶级分析研究计划的主要关注点是研究阶级（相对于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在塑造生活机遇和社会行动模式上的重要性，以及试图探求一段时间内在这一方面可能发生的任何变化，那么就必须具备如概念界定、数据分析和数据收集之类的许多必要的条件。我认为这里至少要重视三个必要条件，这既是因为它们内在的重要性，也是因为批评家们经常不能充分地认识这些重要性。

首先，为了避免阶级与其他可能相关因素的混淆，必须使阶级概念的界定具有可操作性。霍尔顿（上文）认为，“社会地位因素”经常进入“阶级话语”中，但是他并未重视过去十几年来（从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立场）人们为塑造阶级概念以及为在分析上形成一个更令人满意的阶级分类标准所做的努力。帕尔（上文）指出了怀特和戈德索普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但随后又试图贬低他们，因为他认为这些是“令人遗憾的，它们看上去并不适合”。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既不令人惊讶，也不让人烦恼了。但帕尔未能认识到，阶级分析家的关注点恰恰在于对那些相互冲突的概念方法进行评价，并的

确是运用合理的程序来进行评价的（参见 Marsh 1986, Marshall 1988, Marshall et al. 1988, Marshall and Rose 1990）。阶级分析家们的兴趣显然在于决定哪种分类标准在表述所研究的因变量变化方面是最为有效的——其部分原因是，那些试图贬低阶级影响的人，经常根据那些在分析和经验方面最不使人满意的分类标准来作出结论。帕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为他也极其错误地指出（1991:128），遵循哪种方法并没有什么影响（另外的例子参见 Saunders, 1990:221）。

第二个必要条件是，应该着手进行那些真正具有多变量特征的分析，并且应该认真思考那些因果“结构”问题。例如，如果有人宣称阶级的解释性作用正在减弱，并且已经被关于消费模式或生活方式之差异的解释所超越。那么，这种宣称显然是要求进行多变量分析以作为其经验评价的基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帕尔以及霍尔顿和特纳（1989:185~192）提出了这一问题——在帕尔那里，似乎实际上已经决定反对阶级分析——但他们都没有认真思考相关多变量分析得出的研究成果。

帕尔一再特别强调的观点是，那种简单地表述阶级和因变量之间存在的联系的做法，“可能是把由许多完全不同的过程合并了，而对这些过程本来应该进行不同的分析”。但是，帕尔在此只是提出了他显然并不熟悉的诸多议题。其一议题是，在任何情况下——如通过因果路径分析——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表明阶级的影响受具体干扰变量的调节。另一议题是，作为或多或少是近似的因果因素的理论意义。与帕尔（1991:128）的认识相反，即使是按照他所设想的完全成功的阶级“解释”，那也不一定降低阶级在社会学上的重要性。因而，没有人会认为如较低的教育程度、投票支持工党以及遭受慢性支气管炎等直接原因都是同等重要的。但是，只要这些不同系列的直接原因中的一个环节涉及个人和家庭在非熟练工人阶级中的定位问题，那么，阶级的重要性不是消失了而是加强了。阶级影响的普遍性突显出来。

最后一个必要条件是，阶级分析及其所使用的数据，必须包含一

一个时间维度。帕尔(本书)和霍尔顿(本书)都试图指出,在当前各种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发展趋向下——重工业和制造业的衰落以及服务业的兴起、“传统”工人阶级社会的瓦解、“家庭利己主义”的增长,等等——阶级分析正在丧失其解释作用。但是,他们在做出这种论断时,却从那些合理的、有事实依据的变化转向了其他没有充分依据的变化;至于阶级影响本身,他们并没有提及那些人群分析或者纵向研究和组群研究的结果,而这些结果对于他们的社会定位能够提供充分的经验支持。更确切而言,据说他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双重性历史思考倾向”的极好说明,而这正是马歇尔等人(1988: 206)明确告诫的:也就是说,根据这一倾向,“在过去那段阶级对抗时期里的共同的、团结一致无产阶级,反对当今分裂的、消费导向的工人阶级”——但在某种意义上,无论在社会学还是历史研究中,这一倾向都是没有基础的。

## 一些说明性结果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我们关注阶级分析研究计划中三个领域的研究结果,虽然是非常概括性的。我们认为要对任何一种严肃的批判进行回应——如果它的最终目标是试图证实阶级分析在现代社会研究中不再有什么用途的话,情况尤为如此。我们将依次讨论阶级流动性、阶级和教育,以及阶级和政治党派。

### 阶级流动性

研究阶级结构中而不是地位等级中的社会流动性,首先必须做出一种概念性的选择(Goldthorpe 1985)。但是,如果坚持了这种观点,所得出的结果在社会学上就不是没有意义的。

为了当前的目的,我们可能主要强调的是不同国家背景下的阶级表现出非常不同的“流动性特征”。也就是说,在流入观点看来,是那些构成当前成员的人的阶级出身的同质性;在流出观点看来,是某种

成员身份的保持力或“持续力”，无论是个人一生的时间还是代际之间（Featherman and Selbee 1988, Featherman, Selbee and Mayer 1989, Mayer et al. 1989, Jonsson 1991, 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第六章）。例如，现代社会的服务业阶级或工薪阶层，其构成倾向于高度的异质性，但在代际内或代际之间也具有很强的保持力。与之相比较，工人阶级在构成上更具同质性，而农民阶级更是如此。但这些阶级却表现出较低的持续力，尤其是在代际之间。其他阶级如小资产阶级和日常非体力雇员，其同质性、工作生涯以及代际间保持力的结合也是不同的。

这种流动性特征看来具有双重起源。其一，它们反映了阶级——按照在国民经济不同部门中的雇佣关系来定义——在与这些经济部门结构性发展的关系中，倾向于遵循不同的发展或衰落的轨迹或“自然历史”，而在某种程度上按照地位或声誉来定义的阶级并不沿循这样的发展轨迹。其次，它们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不同的阶级倾向于同不流动或流动的具体“倾向”相联系，这些倾向独立于所有的结构性影响之外。应该指出的是，后一发现只有在对流动性表格的分析上取得技术进步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这种技术进步允许在“绝对”率和“相对”率之间做出关键性的概念区分（比较 Hauser et al. 1975, Hauser 1978, Goldthorpe 1987）。

阶级所展现出的这种独特的流动性特征本身就表明，它们的界定完全可以采取不再武断的方式。而一些批评家试图阐明的“边界问题”，也比他们所认为的更易处理。当然，人们可以对例如霍尔顿（本书第一章）的论断，即“在不依靠评价性文化标准的条件下，很难将多样性的阶级定位进行归类”的根据提出质疑。（需指出的是，我们在此并不是支持布雷格（Breiger 1981）以及其他实质上是“韦伯主义者”所赞同的分析程序。在他们看来，阶级边界实际是在对流动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决定的。无论韦伯的研究中是否郑重承认这一方法，我们认为它过分呈现出经验主义，并且有可能导致一些重要的解释性

难题的出现。)

此外,正是按照阶级的流动性特征,阶级形成才能够在基本的“人口统计”层面上来评估(Goldthorpe 1987)。换言之,就是按照一段时间内存在于个人或家庭同特定的阶级定位之间联系的程度和性质来进行评估。这样,它也被认为是可以决定阶级(作为集体)发展出独特的亚文化和“社会化能力”的潜力,即便(重复先前的观点)政治因素的重要性也必须得到承认。这种亚文化和社会化能力是阶级身份得以形成的关键的先决条件(Featherman and Spenner 1990)。也就是说,这里为通过系统的经验研究来分析阶级形成或瓦解的过程提供了一种方法,并正在积极地运用这一方法。这不是认为——用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阶级形成在某种意义上是历史既定的。这也不是主张——用帕尔或霍尔顿和特纳的话来说——在现代社会中,阶级分裂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至今所出现的迹象的确清晰地表明了存在一种更为复杂的情况。

### 阶级和教育

那些宣称阶级对于个人生活机遇的影响正在削弱的观点,它们经常使用的一个有力武器就是教育。按照那些理论,工业社会——用霍尔顿和特纳的话来说——被认为是对阶级分析提出了“自由主义的挑战”,工业主义的真正“逻辑”需要教育的提供和接受教育的机会逐步拓宽,而接受教育的程度应该成为在经济生活中取得成功的关键的决定因素。这样,人们期望阶级出身与教育程度之间的联系被削弱了,尽管教育程度与阶级发展目标之间的联系加强了,并且认为接受教育程度本身就能够协调(或使之合法化)阶级出身与阶级发展目标之间大多数可能继续存在的关系(例如参见Kerr等1960, Blau and Duncan 1967, Treiman 1970, Kerr 1983)。也就是说,存在着一种从“封闭的”阶级社会转向更为所谓的“开放的”精英社会的进步趋势。

但是,依照迄今所累积的研究结果,对这种自由主义预期的支持

极少能够令人印象深刻。在多数国家中,很少甚至根本不能看到人们所构想的这种阶级与教育之间相互关系的长期性变化(尤其参见 Shavitt and Blossfeld (eds) 1992)。而且,关于流动性研究的另一跨国研究结果也提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代际间阶级流动的相对比率表现为高度的时间上的稳定性(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第三章)。例如在英国,至少有四项独立的分析表明,在本世纪这一比率根本没有发生变化——当然,在较大的流动性趋势方面,也没有发生变化(Goldthorpe 1987:第三章、第九章, Hope 1981, Macdonald and Ridge 1987, Marshall et al. 1988:第五章)。因此,即使出现了社会选择变得更为精英化的趋势,也没有迹象表明它会对产生更为平等的阶级流动机会会有什么影响。

在对这一议题的研究开展得更为广泛的英国,哈尔西(1977)最早指出,虽然教育同工作生涯的成功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本世纪中间几十年里是明显存在的,但是由于阶级间获教育的差异程度不断扩大,以及由于伴随其产生的阶级出身对于阶级发展目标的“直接”影响力(那些不是通过教育调节的影响)几乎或根本就没有降低,这种紧密联系已经被抵消了。根据随后建立在更广泛的纵向数据和更为精确的分析方法的研究,看来很难支持这种阶级间教育差异实际有所扩大的观点(编者按:也可以参见本书第十六章,Heath and Clifford的文章);探讨的议题反而变成是否这些差异实际上没有发生改变,或者在某些方面这些差异变小了(Heath and Clifford 1990, Jonsson and Mills 1993)。更多的议题转向如何判定受教育的程度。但随后出现的,是人们对下面这种所谓的大众化发展倾向产生了怀疑,它认为获得教育的程度是目标性阶级的更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越来越多地根据功绩来进行职业选择的情况——至少就这是由教育资历文凭所界定来说——是很难看到的(参见 Heath, Mills and Roberts 1991, Jonsson 1991 对瑞典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类似结果)。

总之,将教育视为一种“消除阶级”的力量,仍然证据不足。相反,



我们所提及的研究,是特别反对通过“精英主义”来缩减阶级不平等的任何倾向。如果教育在决定工作生涯机会方面确实变得更为重要,那么具有相对优势地位的阶级成员就会运用其优越的资源,以确保他们的子女能够在教育程度上保持竞争性优势;或者如哈尔西(Halsey 1977: 184)所指出的那样,“可归因的力量用‘成功’来作为表达自己的方式”。此外,一种看来更为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如果阶级间教育程度的差异在一定意义上消失了,那么在更具优势的阶级内,就会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家族资源来对抗精英主义选择的威胁,以帮助子女维持其阶级地位(参见 Marshall and Swift 1992)。需强调的是,我们在此并不是认为教育体系及其机能的变革一定不能缓和阶级不平等:只是没有理由认为——如自由主义理论家所期望的那样——这是某种程度上工业社会发展所固有的社会过程之自发的、渐进的结果。的确,在那些仍然相信工业主义同日益增加的教育程度以及相对流动机会的平等之间有某种联系的人当中,这种联系现在被认为不是源于发展的必要性,而是作为包括政治因素在内的多种因素偶然发挥作用的结果(例如参见 Treiman and Yip 1989, Ganzeboom, Luijkx and Treiman 1989; 比较 Müller and Karle 1990, Jones 1991 and 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

### 阶级和政治党派


[……]

**编者按:**在《充满希望的阶级分析前景》原文的这一部分中,戈德索普和马歇尔继续讨论第三个研究领域,即他们认为那些主张“阶级分析在现代社会中不再具有有益作用”的人应该指出的领域,也即阶级和政治领域。约翰·戈德索普专门为本书撰写的论文是第十五章,该文涵盖了更多的新近材料,并且特别是针对前面部分中克拉克和利普塞特的观点而作的。因此,这里省略了戈德索普和马歇尔最初所进行的讨论。

## 👉 结 论

在本文中，我们试图从两个方面对新近的阶级分析批判作出回应。首先，我们认为，批评者们并没有恰当地区分马克思主义版本的阶级分析以及研究计划所理解和提出的阶级分析。作为强烈攻击前者的各种批评观点，不适用于对后者的批判。这并不令人感到吃惊，因为阶级分析是被视作摆脱了历史哲学和“批判理论”纠缠的经验社会学研究领域，它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应而发展起来的。其次，通过参考三个研究主题，我们试图表明，关于阶级分析的研究计划产生的结果，有力地否定了帕尔以及霍尔顿和特纳的说法，即作为一个概念的阶级不再发挥有益作用，它仅仅具有修辞价值而不具有科学价值。值得指出的是，在本文中我们引用了大量以我们所理解的阶级分析为例证的新近著作，但这些批评者都根本没有提到这些著作。

最后，可以指出的是，我们所研究的这两种主要观点的发展线索，在一定意义上重合了。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阶级分析是理解长期性社会变革的关键：阶级关系尤其是阶级冲突为社会变革提供了动力，对其动态变化进行研究是深刻理解历史运动的关键。但是，作为研究计划的阶级分析，不仅与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理解完全不同，而且其产生的结果也提出了一种关于当代社会阶级关系的真实影响的新观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现在所得到的研究结果的一个共同主题，是阶级关系的稳定性而不是其动态变化。这些结果揭示了与阶级相联系的不平等，以及阶级间不同社会行动模式的显著的持续性发展，即使是在经济结构、社会制度和政治危机的急速变革时期，这种持续发展也是存在的。对这种稳定性的揭示——主要是因为数据分析方法的进步以及我们所指的在数据集合构建方面的进步才得以实现——反过来具有两个重要含义。显然，对于工业社会中那些或多



关于阶级的冲突  
*Conflicts about Class*

或少地期望阶级以及阶级分析能够自发“消亡”的自由主义理论家而言,新的问题产生了。但与此同时,阶级分析支持者的理论关注点也需要在根本上重新调整。他们必须关注的,不是通过阶级关系对社会变革做出解释,而是要理解作为强烈抵制社会变革之基础的那些过程,而这些过程正是由这样的阶级关系所提供的。

## 对戈德索普和马歇尔的答复<sup>①</sup>

雷·帕尔 (Ray Pahl)

没有阶级理论的阶级分析会有一个有希望的前途吗？英国的社会学有一个长期的传统，即追求那种把个人的生活机会同明确界定的社会位置联系起来的目标。仅仅表明变量之间的联系，还是不能很好地适合这个传统，不论其使用的方法多么复杂和严格。这一传统中的社会学家坚持谨慎保守地同他们认为最重要的范畴相联系。这样，阶级和教育获得就具有既定的优势成为可被接受的范畴，同各种对生活机会的度量方法发生着联系。

那些在这一学科之外的人，由于不受传统的或理论的顾虑的限制，探索研究其他的变量。近期在对与死亡率相联系的变量所作的研究中，有两个变量被加入到为社会学家所热衷的前两个变量所在的行列，即家庭所有和使用汽车。虽然二者之间有相互关联，但是它们对死

---

<sup>①</sup>本文摘自文章《没有阶级理论的阶级分析具有希望的未来吗？对戈德索普和马歇尔的答复》，《社会学》杂志，1993年5月，27:2，仅做很小改动。作者感谢那些抽出时间对本文作出评论的人，特别是要感谢 Rosemary Crompton, Jay Gershuny, Chris Pickvance 和 Peter Taylor-Gooby。

亡率有一定程度的各自独立的影响。看起来使用汽车是同低死亡率最为正相关的变量。拥有汽车这一变量的显著性甚至这样表现出来,即便是在非体力的家庭所有者中,那些拥有两部汽车的人要比拥有一部汽车的人有较低的死亡率(Goldblatt 1990)。然而,尽管这些结果能经得起方法的和统计的最有力的批评,但很少有社会学家会抛弃掉自己的传统忠诚。没有理论基础的结果就会被认为是盲目的经验而被拒绝。

但是,如果我决定用另一种建议来反对那些关注汽车拥有方案的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者,试图建立一种基于身高分析的更可行的方案,以表明在其他所有变量中,身材较高的人易于在职业结构中再生产自己,具有较好的教育机会和大体相同的选举倾向,这样身材较高的人的优势模型就非常经得起批评了。可是,当然我没有理论上的先入之见,所以我就预计到自己会招致社会学家们的责难了。但是戈德索普和马歇尔在其为阶级分析所作的不能令人信服的辩护中,正是做了这样的事情:他们声称“不包括什么阶级概念之特殊地位的假设”(本书,第124页),但是,他们承认自己不能完全地不具偏见性,而且说“阶级的概念应该重新清晰界定具有可操作性”(本书第128页),这样界定的条件是,“阶级分析家有明显的兴趣决定哪种分类在表明考察中的因变量的变化上是最有效的”(本书第129页)。这样,就导致了戈德索普和马歇尔非常依赖于统计的方法了。他们这种从阶级理论上的退却,促使我加强自己早期回应戈德索普的观点,即我认为需要用批判来替代阶级分析中的痴想。

这里很有必要强调的是,我曾撰写的论战性文章《皇帝是赤裸的么?》是为了在那些研究城市和社会运动中的人中激发起辩论。他们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即从既定的物质条件中产生的共同意识导致既定的行为,也就是城市的社会运动。许多关于社会运动的研究在分析和阐释动员过程方面都显得虚弱。尽管戈德索普和马歇尔可能正确地看到了主流社会学领域往昔赢得的胜利,但是我的文章在其撰

写的环境中还是有力量的。我很吃惊地发现自己触痛了怎样一根脆弱的神经。

在他们的文章中,戈德索普和马歇尔看来结成了统一战线。但在他们的早期作品里,是有分歧的。我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分歧是否已经解决了。我在他们共撰的文章中发现的含混,部分取决于(如果不是完全地)他们是如何就以前的难题达成的妥协。现在我就转移到这些难题上来。

## 作为人口统计范畴的阶级

在其对社会流动的著名研究中,戈德索普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职业和就业地位结合起来,然后把这样界定的主体分配到人口统计的范畴中去(Goldthorpe et al. 1980)。马歇尔论述了戈德索普的这种操作方式,似乎他完全领悟了后者的真谛。他强调,戈德索普

表明他已经把每一种适当的阶级位置分派到每一种职业名称和就业机会的结合中。他据以研究的是可用的官方统计信息、专题研究资源等,这些都集中关注被研究的个体典型的市场和工作地点:例如收入的水平和来源,其他金钱的和非金钱的利益、经济安全程度、经济提升的机会以及在权威和控制体系中的位置等等(Goldthorpe and Payne 1986:21)。实际上,从未展示给我们“讨论中的可用证据”(Marshall 1990:59)。

戈德索普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构建了七个人口统计的范畴,然后把它们标上阶级的名称。然而,这些“阶级”并不能被认为是等级性的分类,尽管他在文章中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论述。这样,就误导粗心的读者想到别处去。戈德索普声称这七个范畴或群组在其符号下并不具

有理论的含义：它们仅是最好地被描述为像知更鸟、红雀、花冠鸟、布谷鸟和其他这样的东西。在其对这些程序的评价中，马歇尔承认

不奇怪的是，许多人对下面的事实感到（和继续感到）困惑，即流动被理解为在“戈德索普的阶级”之间进行，这样的范畴同早期霍普—戈德索普测量法中的范畴没有什么联系。  
(Marshall 1990:55)

戈德索普显然拒绝使用这样的测量法，因为它不适合他现在的工作方案。在那个时候，戈德索普想从布劳和邓肯的个人主义方法（Blau and Duncan 1967）出发把辩论继续推进，也想把格拉斯关于结构的与交换的变动性之间的区分加以改进。他毫不怀疑地认为，如果他具备了这些群体——他指称其为结构，这会更加适合他的研究目标，因为他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把焦点从地位转向“阶级”。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对数据的考察显然会使人想起戈德索普关于男性及其家庭之代际和职业的变化轨迹模式，以及一个比社会连续体更适合这个模式的群组模型。这使得戈德索普具有了强调“结构的”约束的机会。

现在，戈德索普显然更多地论述说，这些不同的工作和市场位置之结合的群组，看来加强和促进了职业继承。从他的观点出发，正如我曾经指出的那样，赋予这些群组的标识是没有特别意义的。群组是存在的。存在着一种社会结构，并像他们可能说的那样，布丁存在的证据就在于它在被食用。

但是这样的群组为什么能够存在下去呢？戈德索普和马歇尔宣称它们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阶级，是因为他们在其方案中没有致力于建构任何阶级理论。他们只是建构一些人口统计的范畴，发现这些范畴对实现其方案的目标很好用。然后他们颇具回顾性地宣称，相关性或连续性构成了理论。这样的程序看起来令人疑惑，好像等于认为就业关系的总汇就是就业关系的再生产。

当然,如果处于给定的就业关系集合或群组——不论你怎样称呼它们中的那些人,由于其共同的位置而开始获得一种共同的意识,那么一些人就可能希望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物质条件和意识形态之间是相关的。但是戈德索普和马歇尔现在坚决地拒绝


……以阶级为基础的集体行动理论。根据这一理论,阶级结构中有相似地位的个人会自然地产生出一种共同的阶级地位意识。这种意识反过来促进他们展开共同行动以寻求其共同的阶级利益(本书第125页)。

为了对他的追随者公平起见,戈德索普或许应该很坦率地承认,当他做出如下断言时,就已经改变了他的观点:

因为在他们所体现的关系中,利益和价值是经常发生对立的,所以阶级结构就被看作是社会冲突的不可避免的根源。这种社会冲突同阶级的形成和动员过程——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政治运动的出现——相互作用,在历史上经常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Goldthorpe 1985:467)

当然我一点也不认为改变观点就应该受到谴责,但是我发现戈德索普的“有希望的未来”那篇文章是很难达成妥协的,因为作者看来想避开所有的理论争论,而主要去关心统计的和方法的严格。由于作者撤退到“很有限的规划”(本书第128页),所以他就只是考察建构的变量与其他变量相关的重要性,这样就很难有什么可以辩论的了。这里我重复一下自己撰写的早期文章的观点:我发现自己很难理解那种没有理论的阶级是如何成为有用的理论工作的。当戈德索普和马歇尔声称在一种阶级结构中研究流动性“是必须先验做出的概念选择”时(本书第131~132页),于那些对作为一种理论概念的阶级感兴趣





## 关于阶级的冲突 *Conflicts about Class*

的人来说,他们有理由想更多地知道这样的选择是如何做出的。

作者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想要探究阶级的形成,但不想坠入“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陷阱:这种方法就是通过系统的经验研究来积极实现,以对阶级的形成或瓦解进行调查”(第132页)。依我看来,这是运用“系统的经验探究”作为避免在理论辩论中不站在任何立场上的手段而已。

那么作者在缺乏任何清晰的理论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假设自己界定的群组不仅仅是优势特征之积累与再生产的非常复杂过程的代理指标呢?当前就业关系实质上看来就是一个很小的屏幕,在上面难以投射社会学分析的重要问题和内容。他们拒绝将自己的代理指标理论化,那么这就鼓励我把对他们的责问更具体化了:皇帝真的是赤裸的么?

## 性别和阶级分析<sup>①</sup>

罗斯玛丽·克罗普顿(Rosemary Crompton)

阶级分析“领域”中争吵最烈之处多是由谈论过去的人引起的，而不是彼此之间的争论(Crompton 1993)。特别是许多与阶级和性别相联系的意见分歧的发生，都是因为没有很好地认识两种不同的阶级分析的差别。一方面是相对抽象的理论，认为“阶级”是影响历史发展的社会力量(例如马克思和韦伯的理论阐释)。另一方面是关于阶级结构、意识和行为的经验调查。这种经验性工作最突出的是宏观层次上的方法，根据其在就业结构中的位置，把就业人口(有时是个人，有时是他们的家庭)划分到“阶级”中去(我和其他一些人将其描述为“就业汇集的”方法)。

我继续论证说：历史上抽象的阶级分析方法并不一定就因为其缺乏对性别的关注而遭致批评。这是因为它们是与阶级相关的理论，而不是同性别相关的。然而，性别对于“职业汇集的”方法来说，的确是一个问题，因为这种分析所依赖的就业结构本身就与性别密切相关。

<sup>①</sup>本文是作者专门为该论文集撰写的。

由于这种方法明显地不承认这一事实，便遭致了女权理论家的广泛批评，他们经常把阶级和“父权制”的概念同女性就业这样历史的和现实的问题联系起来（Walby 1986）。

然而，根据阶级分析领域和女权主义方面的发展，重新审视和修改我以前关注的问题，看起来是很合理的。实际上，我已经决定不再依循同样的论述结构，尽管我将要讨论同样领域的问题。

现在很难说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关于阶级和性别的辩论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一些最著名的阶级分析家的立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阐明了，但是一些版本的“就业汇集的”阶级分析同更为历史系统的或过程性的阶级分析方法之间的鸿沟却变得很明显。如果这些不同方法的信奉者承认分歧并彼此更有效地交流的话，那么最近几年的辩论或许就能更好地为人理解了，虽然说不上问题已经被解决了。

女权主义的辩论也同样发展着，尽管它逐渐远离了自己曾经同阶级分析共涉的领域。可能是因为社会学领域中总体上从阶级的撤退，女权主义内的辩论也倾向于远离关注社会结构影响的唯物主义解释，朝着更集中地关注个人的和社会的构建的男性和女性的实质方向发展。我愿意接受——实际上我在 1989 年就这样做了——男性和女性是由社会建构的这样的观点，但是这里我所强调的是，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无论如何也不应小看结构性因素的重要性。

## 社会学中的阶级和性别

我这里首先从总结以前的辩论说起。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领域是社会学中第二波女权主义者的批判矛头首先指向的目标之一（Barker and Allen 1976, Kuhn and Wolpe 1978）。这并不令人奇怪，因为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阶级和分层对社会学来说总体上仍然是重要的问题。然而，尽管那时发生的理论和经验的辩论非常激烈，但是事后得承认，在社会学领域，对阶级概念的理解、它的实际运作和经验调查等，

还存在着许多混乱。

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在英国社会学界,许多关于社会阶级的经验研究,广泛地说,是被看做与男性就业研究相同的( Goldthorpe et al. 1969; Roberts et al. 1977; Goldthorpe 1987; Blackburn and Mann 1979; 关于美国的情况,参见 Blau and Duncan 1967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学家都是不假思索地反映主流的、同劳动的性别分工相联系的“男性养家活口”的假定。“男性养家活口”模型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即资本主义的工业主义的发展是与一种特定形式的劳动的性别分工相联系的。在英国(以及在包括美国的其他国家),这还包括越来越把女性排除在有酬劳动力队伍之外,并形成一种男性和女性活动之“各自领域”的特殊意识( Davidoff and Hall 1987 )。女性的领域就是家庭和家内劳动;男性的领域就是有酬工作和市场。这样,对“阶级”的研究就集中于男性上。在家庭经济命运的考虑上,女性的有酬劳动(如果有的话)就被认为是次要的,她们在家内的劳动根本就不在考虑之内( Stacey 1981 )。

然而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女权主义者提出声明,指出对女性家庭劳动关注的缺少,使得她们对整个社会的生产贡献被极大地边缘化了。由于对她们的工作视而不见,女性的重要贡献被贬低并被认为是不如男性的贡献大。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已婚女性进入有酬就业队伍中,那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男性养家活口”的假设看来也越来越不合时宜。所以女权主义者进一步指出,应该根据女性自己的权利赋予她们以“阶级地位”,而不是在传统上那样使其附属于身边最近的男性养家活口者。也就是,是她们自己的工作,而不是她们的男性伙伴的工作,决定其阶级地位( Acker 1973, Allen 1982, Stanworth 1984 )。但是,职业隔离(即男性和女性分别集中于不同的职业)的持续看来使确立一种新的阶级模式的工作很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在这样新的阶级模式中,女性和男性在个人层次上是平等的。

这样,就业汇集的方法就特别地被当做“男权主义”被批判。女权

主义者认为，它确实忽视了女性的家庭工作，否定女性在阶级结构中的地位，把她们看做是男性的附庸。这是通过下面这种大体相同的手段实现的：(1)把家庭作为阶级分析的单位，(2)把家庭单位的阶级看做是“男性”养家活口者的阶级。两个问题的产生，都同近年来两种最有影响的就业汇集式阶级分析的模式密切相关——约翰·戈德索普和埃里克·奥林·怀特的阶级分析方法。

戈德索普和怀特都设计了一种以就业为基础的阶级图式，他们将其描述为“关系的”(relational)——也就是反映阶级关系的真实情况，而不是像记录员——总经理那样的阶级划分(Marshall 1988)。诚然，戈德索普否认自己的阶级图式构建有任何的理论前提(Goldthorpe and Marshall, 本书第七章)，但是有两个因素同以前版本中的职业地位密切相连：就业地位(雇主、自己经营或雇员，等等)和职业的“市场”与“工作”位置特征[另一个重要的影响是洛克伍德的《黑色工人》(Lockwood 1958)]。这种方法把职业次序看做是性别中立的，根本不考虑职业隔离问题。然而在许多人们熟知的职业例子中，“市场”位置(特别是根据工作性质和提升前景来理解)主要取决于这一职位规定是男性的还是女性的。在这种理解中，就认为男性和女性不能享有同样的“阶级”地位，即便他们拥有相同的职业标识。文秘职业的工作，即女性最经常从事的工作，在这里是最好的例子(Crompton and Jones 1984；关于同把文秘性工作视为女性专属工作相关论述的女权主义观点，参见 Valli 1986)。这样，戈德索普的方法看来是不尽合理的。

“分析单位”问题源于把女性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显然不加辨别地纳入“传统观念”的框架。如人们所看到的，首次纽菲尔德调查就没有在女性中取样，只是把她们作为“妻子”，并一般认为个体女性的“阶级地位”就是她们最接近的男性的阶级地位。戈德索普认为这一程序得到如下事实的支持：阶级分析的适宜单位是家庭，而家庭的阶级地位最可靠的标志就是作为家长的男性的阶级地位。女权主义批评

家则认为,这种经验的方法模糊了女性对家庭所作的贡献,既忽视了女性在有酬就业队伍中数目的快速增长,也没有看到女性越来越多地成为家长的事实。

与戈德索普相反,怀特的阶级图式明确地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为基础。它一开始就是根据工作的内容设计的,并在此基础上划分出“工人”地位中的办事职员工作(然后认为一般由女性承担这样的工作)。而且,怀特的方法是以个人而不是家庭作为阶级分析的单位。就女权主义者提出的批评来说,怀特的方法也许是较为合理的。然而,怀特对女性家庭工人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同戈德索普使用的方法很相同。怀特认为,不在有酬就业队伍中的女性可被划分到一个“推导出的”阶级位置上,也就是,她们采用其“男性养家活口者”的阶级地位(Wright 1989)。

所以,尽管戈德索普和怀特经常被认为是代表着完全不同的阶级分析理论方法,但是就他们对待性别问题上的方法而言,他们的研究中存在着许多相同的地方。两个人都集中关注女性的政治偏好问题,特别是都同她们的男性伙伴的偏好相比较。实际上,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对家庭是阶级分析单位的维护,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样的经验发现,即女性的政治态度一般和她们的男性伙伴的政治态度非常接近,而不是基于她们自己的职业(或阶级)。怀特认为,尽管性别在理解和解释人们的具体生动的生活经验方面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不能推论说性别就应该包括进抽象的阶级概念中(Wright 1989:291)。这种把阶级和性别在分析上的区分,可被看做是更一般方法的一部分,即戈德索普和马歇尔(Goldthorpe and Marshall 1992)所运用的就业汇集方法,其中“阶级”的持续重要性表现在“阶级效果”的经验证据中。

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曾论证说(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女性相对的社会流动率(也就是社会流动性)和男性的非常接近,正如戈德索普的阶级图式所测量的那样。他们认为,这表明“阶级”对于

职业命运的影响，于男性和女性是相同的。所以，男性和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同经历，是性别不同的结果，而不是阶级。这样，他们的方法（包括对一种表面上“无视性别”的阶级图式的使用）就得到了确证。这种立场同怀特的非常一致，而且有意思的是，也利用了同维护抽象的“阶级理论”一样的逻辑（我在1989年的文章中论述过）。也就是，他们指出因为（阶级汇集的）阶级分析是关于阶级而不是性别，所以就不能责问他们为什么不能解释与性别有关的现象了。

### 阶级分析的层次

虽然女权主义的批评集中于性别之间的劳动分工以及相关的就业结构，但是有必要提及的是，那种认为阶级本身可被充分地纳入就业结构中的假设，只是总体的“阶级分析”社会学中的一种方法而已。因而“就业汇集”的方法可被归入更广泛的关于阶级和分层的社会学中。正如下页表 9.1 所显示的那样。

我所谓的就业汇集方法（层次 2）很典型地属于在国家层次上进行的大样本调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把个体分派到一种“阶级”模式的位置上（经常以他们的工作或职业为基础），然后把这些位置汇集到总体的阶级结构中。怀特和戈德索普就是这种方法的典型代表，因为他们收集了非常广泛的调查数据，并根据他们自己做出的社会学含义上的“阶级”图式进行分析。然而，这种看待“阶级”的一般性方法被广泛使用，特别是在关于不平等的经验讨论中使用的诸如记录员—总经理模式那样的“直观的”或“常识性的”模式（值得强调的是，女权主义的批评也指向这些“直观的”阶级模式）（Marshall 1988; Crompton 1993; 后者的例子请参见 Reid 1981）。实际上，关于阶级分析的就业汇集方法被人们描述为过去 10 年里的“霸权的”方法（Savage et al. 1992, 也参见 Cyba 1994）。也就是，它被当做是整个“阶级分析”的代表，这在对帕尔批评的回应中明显表现出来（本

书第七章)。

表 9.1 阶级分析的层次

分析层次	调查方法
(1)阶级形成	变化的社会-历史分析(Thompson 1968)
(2)就业结构中的阶级位置	工作汇集的大数据系列(Goldthorpe 1987, Wright 1985)
(3)阶级意识和行为	特定群体的当代案例研究(Newby 1977, Savage et al. 1992)

然而,在更为广泛的整体阶级分析框架中,还包括对阶级形成的研究(层次1),它经常是历史性的,详细探讨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中具有自己特征的群体的出现和发展——例如,洛克伍德对英国职员工人的考察(Lockwood 1958),伦纳对服务阶级发展的研究(Renner 1953),博尔坦斯基对法国官僚阶层的研究(Boltanski 1987),等等。受第二波女权主义影响的许多早期的研究和著作实际上采用类似的历史方法,对向资本主义的工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公共和私人领域女性和工人所发挥的作用进行发现和再发现。

对阶级意识和行为的研究(层次3)在以某一特定的职业群体为对象方面,同层次1的研究具有交迭之处。但是在层次3的研究中,是用现代经验研究来补充历史方法——例如,对被考察群体的定量调查分析(Newby 1977)。例如,考虑到白领“中间阶级”在阶级理论中的重要地位,经验研究经常集中于职员、行政和管理阶层的工人(Crompton and Jones 1984, Smith 1987)。

这样,在社会学中对阶级和分层分析的经验方法中,我们可以区分出两个分支(Crompton 1993:110)。一个分支(层次2)主要集中于对大数据系列的定量分析上,另一个分支(层次1和3)则倾向于使用多种方法和案例研究。社会学中这些阶级分析的不同方法,是社会科学领域中与“阶级”相关的更广泛话语的一部分。在我撰写的早期文章中,则将其描述为两种不同的模型:一种阶级分析过程,是把结



构和行为在分析上区分开来(如 Dahrendorf);另一种模型则否定这种在分析上区分的可能性(近期的讨论,参见 Joyce 1995)。一些同性别和阶级相关的意见分歧之所以发生,就是不承认这些差别的结果。

特别是,依照许多对阶级与性别之区分感兴趣的人看来,一种关于“阶级”和“性别”的严格分离看来越来越显得不合理——特别是涉及层次 1 和层次 3(阶级形成,阶级意识与行为)。有酬工作的结构依赖于无偿工作的补充结构,同时也与按照性别确立的劳动分工相联系。因而,就业领域中的阶级形成同公共和私人领域中劳动的性别分工密切相连。所以,希望探讨性别和阶级之联系的女权主义社会学家,试图考察公共和私人领域之变化的相互作用的实质,这通过不断增加的女性就业显现出来。对那些于这些与性别相关的问题感兴趣的人来说,同阶级分析的“就业汇集”方法相联系的辩论看起来并未取得特别的成效。已婚女性有酬就业人数的增加和与此相关的家庭动力的变化,被看做是二战以来西欧和北美所发生的重大社会变化之一。然而,“阶级分析”的就业汇集传统却对这些现象不作任何讨论,并实际上竭力地远离它们(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88)。

为理解这种混乱,这里有必要承认,就业汇集方法只是代表了阶级分析之复杂整体的一个分支。特别应该记得的是,尽管在现代社会中就业是阶级地位的非常重要的代表性体现,但是工作或(和)职业的汇集本身并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阶级”。不论阶级形成还是阶级意识与行为(即层次 1 和层次 3),都非常依赖于组织和过程,而仅靠宏观层次上的调查分析是很难充分考察和把握的。家庭、社区和工作场所——以及工会、政党和其他社会运动——需要那种通过定量和定性之案例研究、人种学研究和样本分析的分析 and 调查。在英国社会学界,具有这种经验研究的重要传统:戈德索普和洛克伍德等人的“富裕的工人”研究,纽比对农业工人的研究,海因兹对地区政治的研究,希尔对码头工人的研究,克罗普顿和琼斯对文秘职员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工作都强调阶级形成过程的重要性,以及在阶级形成和阶级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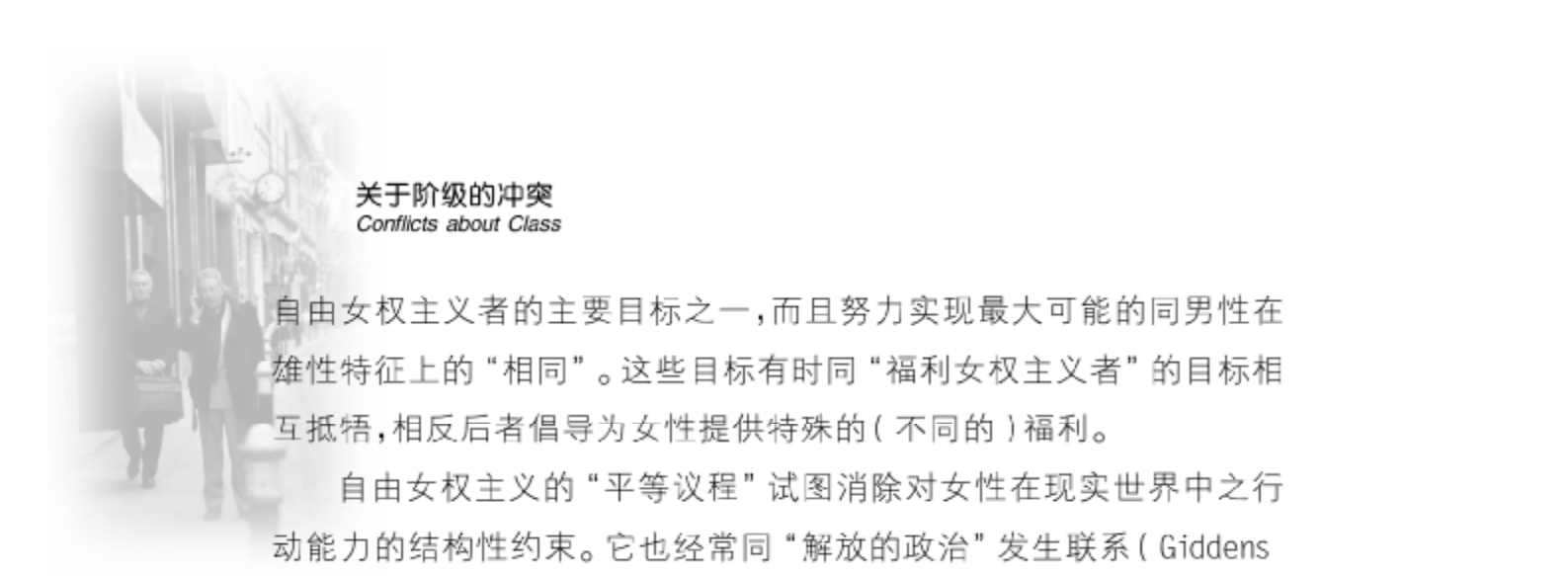
识与行为之间可能发生或不能发生的联系。

关于阶级形成以及关于阶级意识和行为这样的人类学和案例的研究表明,在现实中,阶级和性别的过程是难以摆脱相互关联的,它们之间不是彼此分离的现象。例如,女权主义历史学家描述了阶级和性别结构从工业化伊始就相互并行的过程;资产阶级家庭的妻子是如何在家庭生产单位内逐渐地从一位合作工人转变为文雅精致的“家中天使”的(Davidoff and Hall 1987)。类似地,“服务阶级”在20世纪的出现,也依赖于公共和私人领域劳动性别分工之特殊结构的形成(Crompton 1989)。阶级和性别之间这样实际上的相互关联,看起来同就业汇集方法中下面的这种执拗的观点发生冲突,即阶级和性别之应该被看做是彼此分离的现象,而且女性的阶级地位应被看做是男性阶级地位的反映。

然而,在看待就业汇集方法引进对阶级与性别之区分的研究时,尽管有必要防止扭曲,但它仍然是结构性社会不平等之研究的重要因素。我在其他著述中论述说(Crompton 1993),阶级和分层分析的重新确立要求把表9.1中所显示的三个层次重新融合起来,以及同他们所使用的不同的典型方法结合起来。同样,我认为对性别产生的不平等的研究也必须抓住同样的多样性。可是,性别本身的内容就为这种复杂性增添了一种深层维度。现在我们正要转到这些问题上来。

## 平等和“差别”

“平等”和“差别”表述了女权主义内经常存在的紧张关系。如果女性同男性完全平等的话,她们是否应该尽可能地努力按照男性的行为模式来塑造自己的行为模式呢?相反,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别是不是应该被明确地承认呢?例如,为母亲女性提供特别的保护等。平等和差别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在女权主义政治和受女权主义思想影响的政策发展中,一直是经常出现的(Bacchi 1990)。“平等议程”一直是



## 关于阶级的冲突 *Conflicts about Class*

自由女权主义者的主要目标之一，而且努力实现最大可能的同男性在雄性特征上的“相同”。这些目标有时同“福利女权主义者”的目标相互抵牾，相反后者倡导为女性提供特殊的（不同的）福利。

自由女权主义的“平等议程”试图消除对女性在现实世界中之行动能力的结构性约束。它也经常同“解放的政治”发生联系（Giddens 1990）。这样它就把自己集中于女性解放，为女性争取进入高等教育机构和职业培训，就业的平等报酬和机会等。简而言之，它的目标就是为女性争取完全的“公民权”。为女性争取平等的权利和地位的过程，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在英国，《平等报酬法案》直到1976年才被纳入法律文本中，而能完全地进入精英教育机构和职业（如牛津剑桥大学）则来得更晚。但是在西方，女性在法律上之机会平等的实现过程在近些年里实际上已经完成了。

但是，尽管“平等议程”取得了很大成功——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宣称它已经实现，在男性和女性之间仍然存在着物质上的差别。人们一直承认，女性通过平等议程努力争取进入的许多机构，实际上都是严重“性别倾向的”——也就是，更有可能地间接歧视女性。在有酬就业方面，这个问题显得特别突出。在“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其他国家紧随之）痛苦地确立的就业结构，是一种全日制工作和不可分割的就业模式（Thompson 1964）。结果，工人阶级的斗争不仅仅是工作日时间的缩短，而且也努力争取“家庭工资”——也就是，在妻子不能从事有酬工作的情况下，能够充分支持一个家庭的工资。事后来看，这一过程可被描述为家长制消除的过程（Hartmann 1982）。但是根据许多包括在这一过程中的人看来，一般不怀疑家庭工资的获得是男性和女性共同斗争的结果（Humphries 1984）。然而，女性同市场工作的日渐隔离，把有酬就业视为男性专利，这些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例如，“公民”可以运用的许多权利和利益，对于就业的公民是可用的，但不是普遍的权利（Pateman 1988）。即便在女性能够就业的情况下，婚姻、养育孩子以及其他传统上分派给女性的家庭责任，也使个体女性难以

成为全日制的和终身的工人。这在前社会主义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些国家,女性充分就业被认为是国家的义务,但是同“双重负担”相联系的困难意味着,前社会主义国家中性别上职业隔离的总体情形,同资本主义西方国家的情况非常接近。例如,在国家社会主义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表明,女性的(不是男性的)家庭责任使她们难以获得进行向上的职业流动所要求的更高资格(Heitlinger 1979)。

所以,对平等的关注同对决定女性地位之结构约束的重要性以及消除它的必要性的强调,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我在本文的早期版本中所强调的那样(1989),许多这样的辩论,以及同阶级分析相联系的当代辩论,都是围绕如何认识父权制生产模式的可能性和父权制的“制度”及相关机构而进行的(Walby 1990)。

然而(可能是因为性别不平等的持续存在,尽管这些约束被广泛地消除),近期西方女权主义的著作则较多地集中于探讨性别差异的构成。许多这样的研究都吸收了对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不平等(差别)问题所做的文化和心理解释,而不是结构性解释(如Chodorow 1989, Pringle 1988)。的确,在女权主义的政治辩论中,“差别”的含义是非常重要的。西格尔认为这反映了女权主义政治中正在增长的本质主义:“女权主义分析已经转向新的对男性的暴力和寻求竞争权力之必然性的强调……一种启示录般的女权主义出现了,它描绘了女性美德和男性邪恶之间的摩尼教战争,除非‘女性’的道德和价值取得胜利,否则灾难和死亡必然降临。”(Segal 1987)更严重的是,正如梅纳德指出的,女权主义逐渐远离物质主义模式和社会结构解释,这造成了一种不幸的倾向,它使男性和女性之间继续存在的性别等级和不平等变得模糊起来。

因而,在对与性别相联系的不平等的研究中,我认为我们既不能否认这些紧张和矛盾[也就是差别和平等(作为相同的同义)之间],也不能认为我们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抉择。但是,我们需要养成一种敏感性,以对性别不平等所由体现的经验方法进行关注。对消除女性

之结构和法律的约束的强调,将集中关注它们消除的经验结果。这些结果必然都要用“相同”这一标尺来衡量,也就是女性与男性之条件的相同或等同的程度。对这些结果发生作用的过程进行调查,必然要强调男性和女性之差别的构成。

因而,我们可以在以下两者之间画出并行线:阶级和分层社会学中实际的分裂和性别不平等研究中潜在的分裂。有观点认为,对重要群体或“阶级”的形成和构造过程的调查,变得同宏观层次的调查研究者所做的“阶级”(或职业)结构研究隔离开来,这样的结果之一就是彼此之间的不了解。以此推断,可能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即对性别构成应作的必要关注和解释将导致对差别的过分强调(的确,在女权主义学术圈子内,各种版本的新本质主义成为有影响的部分)。结果,“性别”以及相关的性别特征在学术话语中有时看起来变得易变和实际上的不确定。然而,尽管“性别”及其表现存在着心理和文化的细小差别,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就男性和女性之间社会和物质不平等之经验研究而言,生物学上的性征仍然是重要的指标。如果我们希望对不平等得到缓解的程度进行调查,那么直接的雄雌比较是我们具有的最有用的向导。

所以在实践中,我们在进入性别题目的研究时,有必要同时关注平等和差别。女性同男性既是平等的,又是不同的。特别是,避免辩论的两极分化是非常重要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是在文化上和心理上建构的,完全的雌雄同体从来就不是容易获得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记取的是,它们构成了有价值的东西,而且对男性和女性具有不同的影响。

## 讨论和结论

在前面部分,首先论述了英国的阶级和分层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一个(很大程度上未被承认的)分裂的过程,不论层级研究

方法还是经验研究方法,都是如此。简而言之,这可以描述为两个方面之间的分裂过程:一方面是宏观层次上的就业汇集方法,主要集中于阶级(或就业)结构;另一方面是关于阶级形成与意识的宏观和微观的社会-历史研究、案例研究和人种学研究。其次,论述了在女权主义对性别差异和不平等的研究方法中,也发生了大体相同的分裂情况。可能是因为受到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学中的许多经验研究都受“第二波”女权主义的影响,在解释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时,都倾向于强调结构性约束和限制的重要性。这样,“平等议程”就同“解放政治”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但是,最近的著述却倾向更多地集中在这样的方法上,即积极地构建男女之间的“差别”,而不是强调结构的影响。这些学术话语的转变在政策辩论中也同样发生了——例如在“机会平等”的语言中,就存在着从“实现平等”向“评价多样性”转变。

多样性的意义是不能否定的。问题是——正如女权主义者经常意识到的那样——性别(和种族)差别是等级性排序的。女权主义者在其主张“雌性”特征的优越性时,就可能颠倒这种等级秩序。然而实际情况仍然是,“雄性”特征——彼此间分离、理性、同权力和统治机制相联系——多数情况下都是同物质上的成功相联系的。因此,对“差别”的沉涵信奉可能导致对物质不平等的强化。

即便关于“女性和职业阶级”的辩论看起来没有获得特别的成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停止探讨关于就业与性别的相互影响对物质不平等之构成的重要影响。能够就业,对于任何一种关于男女之物质不平等的解释来说——不论是总体性的还是具体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女性从事有酬工作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但是很普遍的是,女性所从事的有酬工作的范围和种类,还是受她们家庭中地位状况的显著影响(就男性的情况来说,就不是这样)。这本身就是那种认为女性应该承担大部分家庭责任的观念造成的结果。

所以让我们回到这个观点上来,即“在职业结构中,‘阶级’因素

的影响不能同性别分离开来，后者是职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因素”（Crompton 1989:582）。就那种宏观层次的、以职业为基础的“阶级结构”测量而言（也就是职业汇集方法），这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把职业划分到阶级范畴中去的时候，这种方法还存在着把“阶级”和“性别”严格区分开来的问题。正如我们看到的，这种方法的践行者——戈德索普和怀特——所以就主张在他们的调查中应把“性别”和“阶级”分离。在逻辑上说，他们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实中面临着实际难题。

不论如何，看来怀特尝试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图式”的雄心在当代复杂的就业结构的海滩上接连受挫和搁浅，又陷入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沼泽中（Wright 1990）。戈德索普始终在维护自己的立场，但是这种维护首先就包括一种对平衡的强调，而不是变化。若采用这种方法，职业结构中的重要变化和发展，如女性就业人数的增加，就被忽视了。这样，他的立场就越来越远离“阶级分析”的层次1和层次3的方法了。就我们对性别/阶级之相互影响的社会学理解而言，这是可惜可叹的。

所以相反的是，我在最后概括时强调职业结构之变化的、在社会意义上建构的实质。社会结构不是“不成问题的原材料”，调查者可以随意在上面置放阶级方案和图式。它是调查的目标，而不是被想当然的出发点（Crompton 1989:584）。坚持这种立场的意义是，我们应该关注“性别”和“阶级”（或职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试图保持两者的分离。我们这里坚持认为，在20世纪末期随着“公共”和“私人”之间的界限越来越被侵蚀，及其特征性的“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界限的消蚀，我们应把这种情况反映到自己的经验社会学中。这并不意味我们正见证着阶级分析的“终结”（正如一些人断言的那样，如Hall and Jaques 1989, Pahl 1989——参见本书第六章）。相反的是，我们认为最好的前进方法就是采取一种更为灵活的阶级分析方法。

## 阶级分析：回归到未来么？<sup>①</sup>

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

戈德索普和马歇尔在对他们的观点提出的诸多批评面前，为韦伯的阶级分析理论辩护。同那些认为阶级分析已经死亡的人相反，他们认为阶级仍然是英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结构特征，阶级分析对于社会学事业来说仍然非常重要。帕尔则认为，他们的观点没有得到证实。如果阶级分析真的还有未来的话，那么它的基础必须建构在更加坚固的基础之上。我相信，帕尔的许多观点本身就是没有基础的，但他有一点是正确的，即他认为韦伯的阶级分析理论和方法被许多理论的问题所困扰，亟需加以解决。我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突出地强调这些最为紧迫的问题，并尝试提出解决它们的方法。我的观点是，如果阶级分析真的具有“希望的未来”的话，那就必须得回归到韦伯的理论基础上去。

英国社会学

第二部分

和阶级分析

<sup>①</sup>最初发表的题目是：“阶级分析：回归到未来”，《社会学》杂志，28:3，1994。



## 韦伯主义的理论基础

韦伯阶级分析方法的核心，是关于“阶级状况”(class situation)和“社会阶级”(social class)的区分。尽管这个区分在戈德索普和马歇尔的文章中并不明显，但它对于他们的理论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未能明确地讨论这方面的问题，这就为帕尔的批评敞开了大门。阶级状况(阶级位置或阶级定位)是生活机会的实在的“原因成分”，韦伯认为“在市场中的那种机会是决定性的，为个人的命运提供了一般性的条件”(1914:928)。戈德索普和马歇尔(参见本书第七章)把阶级状况看做是包括市场状况和工作状况这两个维度，它们是“通过劳动力市场和生产单位中的就业关系”来确定的。

这样在经济上构成的阶级状况，在任何社会中都组成一个五彩缤纷的万花筒。当韦伯试图在历史的和比较的调查中讨论阶级分析的用途时，他便从阶级状况转向了社会阶级。在经济上构成的阶级状况包含生活机会中实际的因果成分的地方，社会阶级实际上——在某些条件下——就是社会编组或分类，它形成了集体行为的基础。韦伯认为，一个社会阶级包括“一些阶级状况的总和，其中个人的和世代的流动是容易的和典型的”(1920:302)。这样，社会阶级就是相互联系的经济上构成的阶级状况的汇集，它们的界限可以从代内和代间的社会流动、联姻和信息交互作用等证据中辨别出来。依戈德索普和马歇尔看来，社会阶级可以通过“个人和家庭在各种各样的阶级状况中的分布过程”来界定。这种关于阶级状况和社会阶级之概念上的区分，使得他们认为社会阶级的边界可以通过“不再武断的方法”来确定(参见本书第七章)，这是通过对阶级位置之间“绝对的”和“相对的”流动进行复杂的测量来确定的。这样，社会阶级的形成是一种“人口统计的”过程：社会阶级的边界是由“一定时间内个人或家庭与特定的阶级地位之间存在的联系的范围和内容”所确定的(本书第七章)。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戈德索普和马歇尔开始了他们为阶级分析所作的辩护。他们认为最近的一些批评意见没有能够削弱阶级分析的研究计划,这一计划

探究由劳动力市场和国民经济不同部门的生产单位中的就业关系所规定的地位之间的相互联系;一定时间内个人和家庭在地位中分布和再分布到过程;以及他们的生活机会、所获得的社会身份及其所追求的社会价值与利益。(本书第123页)

## 从阶级的撤退

帕尔(参见本书第八章)没有考虑到这些理论观点。他阅读了戈德索普和马歇尔以前的许多著述,认为他们放弃了任何为自己的研究计划概括出理论基础的尝试。他主要关注的是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关于阶级的相互竞争的概念?它们的解释功能应如何同非阶级因素的功能相比较?帕尔对戈德索普和马歇尔观点的最初反对意见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他援引了一系列实际上是无可争议的论述来批驳。戈德索普和马歇尔承认在他们的研究中“不包括先验存在的阶级的假设”(本书第七章)。这意味着,为了检验阶级或其他一些因素是否“在显示被考察的因变量的变化中是最有效的”,就有必要“在操作的最大可能性上明确界定阶级的概念”(Goldthorpe and Marshall,同上;Pahl,本书第八章)。对于帕尔来说,这种坦率和明智的经验方法显然是不能令他满意的,他把这种方法视为“从阶级理论的撤退”。看来似乎是帕尔本人更喜欢阶级分析家,而不喜欢预先判断阶级分析的重要性,不喜欢忽视解释的有效性,不喜欢吸收含混不清的概念。

但是,帕尔文章的要点是要指出一些理论问题,他在戈德索普(1987)和马歇尔等人(1988)以前的著作中也发现了这些问题。他对

这些问题的讨论在下面这一断言上显然是不公平的,他认为戈德索普和马歇尔“没有致力于建构任何一种阶级理论”,他们“只是建构一些人口统计的范畴,发现这些范畴很有用处……然后颇具回顾性地宣称,相关性或连续性构成了一种理论”。( Pahl 1993:255 ~ 256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两位作者都坚定地把自己置于韦伯主义的传统之中,他们是根据通过市场和工作状况构建的阶级地位来这样做的,运用日常的就业和财产关系来确定市场和工作状况。但帕尔对下面这点的强调是正确的,即戈德索普和马歇尔在关键点上,都倾向于从任何一种作为自己经验研究之结果的理论化上撤退回来。的确,他们有时候看起来离开了自己的理论基础。

例如马歇尔及其在埃塞克斯的同事在研究中,在阶级定义上都非常小心地回避任何一种“本质主义”,但是他们的这种拒斥态度却容易否定自己的理论基础:

因为我们并不坚持任何本质主义的阶级定义,所以我们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经验性的问题。哪一个社会阶级的概念能够最好地描述集体行为、共同的生活方式和信念以及联系模式的实质呢?(1988:26)

显然这是本末倒置了。我们在相互竞争的阶级概念之间不做出选择,只是以它们的解释能力为基础。社会学家的任务不是根据解释力量来形成定义,而是为了达到以理论为基础的概念,然后再评价它们的解释力量。马歇尔及其同事提倡的明晰战略,没有为否定那些或许根本没有理论基础的其他阶级概念提供任何基础。戈德索普也不能完全脱离这种理论撤退的干系。例如,他在对基于“个人”和“家庭”的阶级分析方法进行比较时,倾向于对两者在预示力量基础上的抉择。他声称,“如果阶级地位被看作是由家庭中的男性家长的就业情况所决定的,而不是他或她个人的就业情况,那么我们就能够获得……一个

更好的对个体状况的预测。”(1984:494)这或许是事实,或者不是事实,但它几乎同“阶级”的理论定义完全不相干了。

这里说说帕尔给出的一个例子。他说,假若能够表明对人的身高的分类测量要比职业范畴更能对生活方式和生活条件具有预测和解释的力量,那么戈德索普和马歇尔是否就拒绝市场和工作状况而去根据身高的范畴来重新界定“阶级”呢?我想答案显然是“不”。他们一定会在强有力的理论上反驳这样的阶级定义。不论“身高”概念的解释力量如何,他们一定会说它的影响是与阶级不同的。如果真的证明了阶级的解释力量比身高还差,那么阶级分析就同样糟糕了。然而任何这样的经验发现都不可能为那种根据身高重新界定阶级的做法提供基础,因为它只是为了保留“阶级”分析的语言。但是他们也许还会认为身高本身也是阶级状况某些方面的显示指标。例如,源于阶级状况的生活机会可能包括饮食方式和其他生活条件,这些有利或不利于身体的发育,而且这些条件会在代际间再生产出来。

戈德索普和马歇尔表明的一些立场,看来把这种经验的阶级再定义作为一种可能性,这就使得帕尔认为他们的观点没有理论基础。实际上,马歇尔及其同事确实承认自己的立场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他们还说,“就社会阶级得到关注的地方来说”,他们不是“完全的相对主义者”(1988:494)。但是,他们似乎并不认为以下两者之间的矛盾具有多少意义:一种是对清晰的、源于理论的阶级定义的提倡,一种是在各种概念之间的选择看作是纯粹经验的东西的研究方法。他们的声明混淆了最为正确的地方,即阶级分析的研究计划包括不同阶级理论之间的比较和检验,这要“根据它们的启发和解释力量”(Goldthorpe and Marshall, 本书第123页),而且只是在这些概念植根于市场、就业和生产关系之理论框架的地方。其他的东西不仅仅是“阶级”的事情,除非它们完全拒绝任何关于术语和理论的连贯性的努力。

帕尔的观点并不令人信服,尽管他很有效地凸显了韦伯主义研究方法的模糊性。但是,这种模糊性本来是能够通过方法的理论基础

多加明确关注就可以解决的。戈德索普和马歇尔的观点中存在的最大难题,实际上并不在帕尔指出的范围内。这些难题可以在其他许多批评家的评论中可以看到,这些批评家研读了同韦伯主义研究方法相关的著述。这些问题包括从经济状况中形成的人口统计意义上的社会阶级、作为分析单位的个人和家庭、性别和阶级之间的相互联系等。我想要论述的是,对这些问题的持续讨论将支持韦伯主义的研究方法,但只有在它的理论基础继续成为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时,情况才会如此。

### 从阶级地位到社会阶级

我已经表明,“阶级地位”和“社会阶级”之间的差别在韦伯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中居于核心的地位。然而很奇怪的是,研究者却很少关注这个差别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的难题。值得回顾的是,社会阶级是人口统计上界定的社会地位的组群,组群中的流动是“容易的和典型的”。那些旨在辩明社会阶级的边界和建构社会阶级图式的研究计划,应该运用关于代间或代际的职业流动、家庭构成和阶级地位间非正式交互作用的材料证据。在这样的人口统计分析中揭示的组群将包含社会阶级。然而戈德索普、马歇尔或他们的同事在进行的任何研究都没有采用这种方法策略。

例如,戈德索普根据 124 个“职业等级单位”的群体所建构的阶级地位模型(1987),被转换为人们熟悉的 7 种社会阶级,但在这种转换中并没有明确使用关于流动情况的数据。戈德索普只是对这些事情作了自己的职业性判断。当然,对职业性判断的运用可以进行争论,但戈德索普有很好的理由采用这种方法策略,而不是实用的经验数据。即便一个数据系列像纽菲尔德研究中使用的那样庞大(10 309 位男性被问者),但是一个关于阶级地位的 124/124 矩阵包含许多具有很小总计值的元,这样就很难得出任何一种重要的、关于阶级地位间人

口统计联系的结论。从这样的分析中得出的结果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经验上是靠不住的。由于这样的原因，看来戈德索普得出的结论是，合理的程序应该是做出一个关于社会阶级之边界的、信息包含广泛的职业性判断，然后通过考察在社会阶级中辨识出来的流动模型，找寻一个事后的经验证明（在他的最新版本中，戈德索普得出了 11 种社会阶级，替代了原来的 7 种阶级。他区分社会阶级的方法逻辑是相同的）（Goldthorpe 1985）。

从理论的观点来看，这无疑是次优的方法。但如果考虑到它是可为社会科学家们使用的一种典型的测量方法，那么它就可能就是惟一可行的。如果不能使用很大的样本有规律地重复纽菲尔德研究的测量工作，就无法达到关于人口统计过程的直接经验调查的理想方法<sup>①</sup>。这样，对社会阶级的边界进行职业性的判断是无可指责的，只要它被看做是直接经验调查的一种形式，只要它是使用合适的人口统计数据来检验所辨识的边界之有效性的一种尝试。然而只有在把阶级地位和社会阶级之区分的理论基础始终牢记在心的情况下，这一目标才能实现。

所以最为重要的，就是要理解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的逻辑，然后努力做到能最好地运用这一次优方法。

## 个人和家庭

关于女性和阶级分析的许多争论中存在的核心问题，是下面两种观点之间的对比：一种是诸如戈德索普等人的观点，把家庭作为讨论阶级问题的分析单位（Goldthorpe 1983）；另一种是诸如马歇尔等人

---

<sup>①</sup>即使可以假设数据能够在矩阵的元间均匀地分布，对 124 个阶级位置的调查也要求大于 300 000 的样本，以保证每个元中 20 人。如果保证每个元中 50 人，就得需要大于 750 000 的样本。因为社会阶级的存在意味着数据不是在整个矩阵中均匀分布的，所以就需要一个大的样本，以进行具有合理基础的统计分析。

的观点,把个人作为分析单位( Marshall et al. 1988 )。这样的辩论掀起过多次热潮,但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这也许反映了以下相互矛盾的事实,即就某些方面来说,这两种立场都是正确的。我要论述的是,个人是划分阶级地位的基础,但家庭作为人口统计的单位,对于社会阶级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

戈德索普曾经有力地论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家庭是分层系统中报酬和发展前景的单位,家庭成员的阶级地位取决于主要养家活口者的地位。他指出,这是因为“只有某些家庭成员,主要是男性,作为其参加劳动力市场的结果,在阶级结构中具有直接决定性的地位”( 1983: 468 )。其他的家庭成员,特别是女性,因为不经常地和有限地参加劳动力市场,因而对于家庭生活机会来说不能做出独立的贡献。社会分层关注的是整个家庭的命运,家庭成员的生活机会来自“家长”的市场和工作状况。

当然,“家长”一词的使用应受到挑战,但是戈德索普使用这个词是用来代表他所说的“主要养家活口者”。当然“家庭”和“家计”也是不能互换的。戈德索普在他的分析中始终使用“家庭”一词,认为非核心的家庭生计和其他类别的家计是不重要的。实际上,这些差异对于社会阶级的人口统计形成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这里得出的真正结论适用于使用的任何一种家计概念,而且涉及戈德索普在下面问题上的含混:主要养家活口者的阶级状况是家庭社会阶级的决定因素呢,或仅仅是它的经验显示呢?他的许多数据分析表明是后者,但是他却明确表示倾向于前者。只有认真严肃地对待韦伯关于阶级地位与社会阶级的区分,才能解决这种含混不清的问题。

我在上面已经表明,韦伯把阶级地位看做是属于个人的:生活机会的界定同享受生活的个人息息相关。这样,当我们关注阶级地位的时候,就必须使用“个人方法”的划分。而家庭则是一个人口统计单位,它的亲属关系模式进入到社会阶级的人口统计构成中。当分析涉

及社会阶级时，我们究竟如何把具体的个人分派到社会阶级中去呢？马歇尔等人提倡个人方法（Marshall et al. 1988），他们认为，如果阶级地位依赖于个人究竟如何被包含到劳动和资本市场中的话，那么我们也必须以个人自己的阶级地位把他们划分到社会阶级中去。这种观点忽视了阶级形成中的人口统计方面，也低估了阶级地位和社会阶级之间的区分。

就把个人分配到阶级地位上去而言，正确的途径当然要遵循马歇尔及其同事们的方法，但必须承认，个人同时也是家庭和家计的主要成员，他们形成了社会阶级的单位。因为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对其社会阶级地位发生作用，所以对于人口统计研究来说，理想的解决方法就是调查联姻以及社会流动，这样就能得出表明社会阶级的结果，这样界定的社会阶级反映了家庭所有成员之阶级地位的结合。这就得承认希思和布里顿在其“跨阶级”家庭讨论中提出的问题（Heath and Britten 1984）。但是要承认的是，所有的家庭都是“跨阶级地位”的，但是没有一个家庭是“跨社会阶级”的。

在实际中，这样的研究一般是不可能进行的，因为很难获得合适的人口统计数据。因而，研究还得诉诸于次优的方法，即选取一种家庭社会阶级的指示器。为了确定社会阶级地位的这种指示器，就有必要使用我们的职业性判断，以产生同详尽完全的分析大体相同的结果。正是根据这一点，一个人的职业可被看做是他或她的家庭中所有成员的社会阶级的指示器。例如，戈德索普在他的始初论述中，选取了家庭的男性“家长”（1984），并认为埃里克森的“主导”和“工作时间”处于“可能方法的列表中”（Erikson 1984），其中家庭方法具有操作性（Goldthorpe 1984: 494）。戈德索普认为，一个家庭中“主导的”劳动力市场参加者的阶级地位，就成为整个家庭之社会阶级的可靠指示器。但是，这种指示器的使用必须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这仍然是阶级分析尚未解决的任务。不论找寻社会阶级指示器的结果怎样，韦伯主义的理论基础仍然是：个人占据着阶级地位，但家庭进入社会阶级的



形成。

## 性别和阶级

关于性别和阶级的争论,可能是韦伯主义研究方法引起的所有问题中最为重要的。这方面辩论的中心问题,是能否把“性别”同“阶级”的变量分离开来。这一问题成为关于阶级分析的个人与家庭方法之间发生混淆的重要原因。的确,马歇尔及其同事把性别和家庭的相互依赖作为他们采用阶级划分的个人方法的证据。他们认为“性别在建构阶级系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影响到男性和女性的生活机会分配、阶级形成和阶级行为”(Marshall et al. 1988: 73)。

就业领域并不是同性别无关的。由性别造成的职业隔离导致了某些职业获得的报酬要比其他职业的报酬低,这只是因为它们被看做是“女性的工作”——报酬更多地是由“可能的责任内容”来确定,而不是根据工作的技术内容(Crompton 1993: 93, Scott 1986)。克罗普顿近期关于这方面对阶级分析的重要性的讨论总结说,现存的职业分类模式不能为把个人划分到阶级地位中去提供可被接受的基础,因为它们不能承认女性职业的具体特征(Crompton 1993:118)。这些模式不应仅仅是关于拥有工作者的市场和工作状况的研究方法,它们也应反映他或她自身的个人属性。这一事实导致许多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也应把市场的性别属性纳入到我们关于阶级的概念化中。


尽管性别和职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互联系,但是我要论证的是,这样的结论是没有理由的。作为职业之性别属性的对市场的限制,包含着地位因素对市场运作的侵扰。韦伯主义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应该基于对阶级和地位的清晰的概念区分。韦伯自己就强调,“当所有决定性的或相互作用的关系在其重要性中被去除的时候”,阶级地位“就明显是最为有效的了”(1914: 930)。这种“去除”在特定的分层系统中还没有发生的事实,说明我们还没有理由抛弃这种概念区分,

因为它能使我们理解性别和市场的相互依赖关系。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坚持认为“地位”因素穷尽了性别对社会分层的重要性,或性别范畴就是“地位群体”(Lockwood 1986)。我的观点是,职业的性别属性可被理解为是对源自性别的地位区分的一种反映(我这里不能充分论述这一点,但是与性别相关联所产生的阶级分析问题,也可以从与年龄或种族的相互关联中产生)。

我的观点并不是拒绝职业分类,也不是否定克罗普顿所说的“以职业为基础的阶级”(1993),而是力图使其变得精练一些。我们在分析上努力把“市场”和“工作”状况的因素同性别和其他地位性的因素区分开来(后者在特定的条件下修改前者),这是很重要的。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为关于职业的性别属性的观点遍及各个方面。如果说这一过程已经存在了的话,它也不是以其纯粹的形式被人们看到的,但这正居于最理想类型的韦伯主义方法论的核心。任何一种关于阶级和地位因素之相对重要性的判断,以及关于市场过程本身对个人生活机会的作用的判断,可能都很难做出,但重要的是要努力这样做。社会学家必须在分析上把“阶级状况”同“地位状况”区分开来,而且必须使用有效的数据来探索使这种区分具有操作性的正确而可靠的方法。一种区分的困难并不能成为抛弃这一区分的理由,而应该成为进一步努力提炼它的动力。

## 👉 结 论

阶级分析确实存在着发展前途,在关于阶级分析的诸多辩论中也的确存在着一条引向未来的道路。在过去大约 10 年的时间里,这样的辩论困扰着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但是,迈向未来必须以清晰的理论框架为基础。我已经论述过,回归到韦伯关于阶级地位和社会阶级的区分,为迈向未来提供了最可靠的基础。在戈德索普和马歇尔等人的各类著作中,这一理论框架是潜在的——经常也是明显的,但是他们



**关于阶级的冲突**  
*Conflicts about Class*

却未能揭示出它的概念意义,这就为韦伯主义研究方法的批评者打开了大门,同时也意味着他们未能有力地回应这些批评者。我试图论证韦伯主义研究方法的发展必须遵循的方向,为的是填补它的理论空白,并为阶级分析确立更为坚固的经验基础。

## 第三部分

### 阶级研究

### 第三部分

#### 阶级研究

## 阶级研究和阶级解释

至于本书的这一部分,我们首先应该清楚的是:在原则上和长时间内,不存在社会学中摒弃阶级研究的现实可能性。要理解阶级分析的局限和力量,就必须彻底熟悉关于阶级分析的不同类型和发现。第三部分文章的主旨就是为这项工作提供重要的实例。在每篇文章中,除了它们内在的信息价值外,这些文章还表明,在实际生活中那种“强”与“弱”阶级分析形式的简单区分是很难成立的。绝大多数作者都对“阶级”作了非常复杂和微妙的理解。

在第十一章,作者约翰·韦斯特加德(John Westergaard)从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经验视角,对英国社会的不平等的程度作了全面彻底地调查。然而他认为,如果对多数其他高度工业化的国家进行类似详细地考察,也将产生可以类比的发现。他的文章还不能被简单地认为仅是描述经济不平等问题的,这一章还尽力表明:阶级关系实际上要比其他划分来源更具有解释上的优先权,而那些阶级分析的批评家们自己就犯了总体解释上过于简单化的错误。

韦斯特加德在文章中采用的是很广义的阶级定义,相反,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在第十二章把阶级集中理解为(资本)“所有权利益”,以解决20世纪晚期工业主义中经济权力究竟如何构成这一实际重要的问题。他令人信服地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所有权和控制

权分离的假设,同时那种同样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模式也应消除。实际上,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在节选的迈尔斯和图尔根(Myles and Turegun)对阶级的比较研究所作的评论中,他们的主旨之一就是认为需要抛弃掉关于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简单化的“单一线性”理论。在本章从中选取的原来那篇文章中,他们在前部分覆盖了同斯科特文章同样的领域,但没有后者那么详细。我们这里吸收他们的讨论,主要是因为他们比较地考察了最近的阶级分析中其他一些关键问题。这些作者理解使用的阶级概念,能够远离那种狭隘的“位置”的(实际上是“弱”理解)阶级观,认为这种阶级观的方法回避了对社会-经济变化方向的理解。

在第十四章,莉迪亚·莫里斯(Lydia Morris)对劳动市场分析作了案例性研究,特别是集中于失业和所谓的底层阶级。如果考虑到“市场境遇”在韦伯的理论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让人奇怪的是竟然有很少的新韦伯主义阶级研究者尝试进行这种劳动市场调查。她令人不安地概括说,在长期失业背后存在的复杂因素面前,职业性的阶级图式并不是很有说服力的。

第十五、十六和十七章都是由英国牛津大学纽菲尔德学院的作者专门撰写的。这三位作者密切合作,把阶级理解为“可度量的阶级境遇”,他们使用的是约翰·戈德索普设计的阶级度量图式。正如我们在导论中看到的,戈德索普的名字已经变成了新韦伯主义阶级分析的同义语。戈德索普自己考察了所谓的与阶级相关的投票的衰落,在这个问题上,正如他指出的那样,许多批评家使人迷惑地把它当做阶级认同的指示器。促使他撰写这篇文章的,是克拉克和利普塞特在《国际社会学》杂志上对霍特等人文章(本书第三和第四章)的回应(Clark, Lipset and Rempel 1993)。克拉克、利普塞特和雷姆培尔在文章中重复了政治行为中阶级认同的观点,并用许多新的资料支持自己的见解。戈德索普则运用了甚至更广范围的比较资料来挑战他们。他总结说,“阶级死亡”的辩论是关于相互竞争的社会科学概念的,而不是关

于社会-政治现实的。安东尼·希思(Anthony Heath)和彼得·克利福德(Peter Clifford)对英国教育领域阶级差别发展趋向之最新研究的结果作了描述。他们的文章很好地描述了极为复杂的区别和这种资料分析所使用的方法,特别是关于相对的和绝对的阶级差别之重要区分。最后,杰弗里·埃文斯(Geoffrey Evans)把我们带回到关于后共产主义世界的阶级这个主导论题上来。他考察了前共产主义国家中阶级形成的问题,列举了从9个国家获得的大量而独特的样本资料。



## 1979年以来英国的阶级： 现实、理论和意识形态<sup>①</sup>

约翰·韦斯特加德(John Westergaard)

本章关注的是一个难题。一方面,关于阶级的事实——在英国和许多其他国家——表明,自从1980年以来,不平等在迅速扩大;然而与此同时,各种流行的理论和有影响的意识形态看来都几乎说着与事实相反的话语。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但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理论却开始否定它,或着说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了规定最近辩论调子的这些评论家、政治家和学术理论家,那么阶级不平等就丧失了它的社会的、道德的和政治的力量。

我在这里努力做三件事情。第一,我对那些否定阶级的理论和意识形态提出挑战,这是通过概括那些能够有力反驳这些理论的事实来进行的;第二,我要揭示这些理论中的错误假设,以及依我看来是用理

---

<sup>①</sup>本章是1992年12月在东京一桥大学所作的三篇演讲的删节和修改本,演讲稿以英文发表在《社会研究 杂志》(1993年第25卷)上;日文翻译本加上一个评论(译者和编辑是Masao Watanable),由东京Aoki出版社1993年出版。我非常感谢杂志编辑、著作出版人和Watanable教授,支持和同意我发表这一节略本。同样观点的扩展了的版本成为J.H.韦斯特加德的著作《谁得到了什么?》(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一书的第三部分。

论掩盖事实的假设；第三，我要考察目前否定阶级的理论背后的一些社会原因和力量。

我将集中考察英国，因为我最熟悉英国，但考察美国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在美国，随着经济不确定性的不断加深，贫富之间的差距，权力的集中和权力普遍缺乏的差距，在近些年来也都是扩大了。同时在那里，阶级在社会理论中的地位在关于理论、意识形态和政策的辩论中变得比以往越来越弱。或者我将考察西方政治范围中相对的另一端——瑞典，这个国家就在10~15年前，无论在理论还是政治上，首要关注的问题转向劳工运动，希望把国家经济“社会化”，进一步减少阶级差别。然而现在的情况表明，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在今天的瑞典已变成被人遗忘的梦呓了。在这个国家，如今的政治-经济氛围也是趋向于把阶级的分化搁置起来。这样，我讨论的主旨至少包括整个西方社会的范围，尽管我是使用英国的资料详细加以论述。

我事先还需要说明的是，我使用的“阶级”概念是什么含义的。我用这个概念表示产生于一个社会的经济组织中的一系列社会分化：源于对稀缺资源配置进行控制和获益的制度安排。这样，说人们处于不同的阶级中，是因为他们在这个经济组织中处于不同的和不平等的地位。这就意味着在生产和分配秩序中的不平等地位。我之所以加上这一点，是为了说明我所关注的问题决不是概念上区分的微妙，譬如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如果马克思强调生产中的地位，那么他也就必然同样强调分配的影响作用——这是通过剩余价值的占有和对劳动的剥削实现的。同样，如果韦伯强调在分配中的地位，那么在他论述处于不同阶级中的人们的不平等“生活机会”时，他也把这些不平等主要看作是在生产中处于不同地位所造成的结果。而且，马克思和韦伯实质上认同阶级在以下两方面上的重要区分，也就是作为一种经济范畴的阶级和作为一个社会-政治群体的阶级：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理解的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尽管韦伯对这一区分没有提出相应系列的术语，但他和马克思一样采用的是阶级分析的逻辑

辑,在考察群体形成及其可能的政治影响之前,先通过考察生活条件来辨别各种范畴。我在这里也将这样做。

这样依我看来,阶级结构首先是人们生活条件中的情况,这是由他们在经济秩序中所处的不平等的地位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在英国,阶级结构是得以强化了。那么此后——仅是此后——而来的问题是:这种作为范畴之阶级的强化是否和怎样转变成为政治的或半政治的群体区分呢?作为我的观点的一部分,我认为那些流行的否认阶级的理论和意识形态所犯错误中的两个较为明显的错误,一是混淆了经济范畴问题和政治群体形成问题之间的差别,二是他们从政治群体形成的新的复杂性中,天真地推断出作为经济范畴的阶级已经消亡的结论,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推断。

## 历史背景

为了说明上述推断是如何违背事实的,我这里还是从简要概括英国的阶级不平等的历史开始:主要是 20 世纪 80 年代发生变化之前的情况,回溯到 40 年代。我之所以把 20 世纪 40 年代作为开始,因为它是一个转折的年代。在英国同在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结束带来了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安排。开始是一个联合政府,而后是一届工党政府,当时只是遇到主要来自对立方保守党的一些抵制,它们致力于推行“社会重建”政策。这特别地意味着两件事情:一个是凯恩斯主义——导向对经济的公共管理,以帮助增长,保持较高的企业盈利和劳动就业水平。另一个是公共福利供给的广泛改革,这是为了保证每个人都有基本的最低收入,即便是失业的、疾病的或退休的;让每个孩子免费上学,以使其发挥个人的最大能力;对于更有能力的,帮助他们接受高等教育;而且,可能是最为激进的,把医疗保健作为对全体公民的免费公共服务。在此后的 30 年里,有一些零散的措施添加到改革方案中,有一些则被废止了。特别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两大

主流政党都一致积极参与到管理经济上来，这主要是通过与企业 and 工会领导人努力进行“联合主义的”合作来实现的，以希望在拉回价格和工资通胀的同时保持经济增长。和其他国家一样，这种国家、资本和劳动三方之间关系的起伏波动造成了阶级结构的紧张，以及在国家经济这块蛋糕中应分享多少份额的争论。但是至少在英国，这种三方的联合主义并没有造成什么重要和持久的新变化，而且 20 世纪 40 年代形成的“阶级妥协”的主要特征也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70 年代。

这在对阶级不平等模式的影响上表现得较为明显。开始的时候，战前的状况发生了对于普通工人和贫穷人的有利变化。有组织的劳工在劳动市场上获得了新的力量，在公共事务上有了更多的声音。同战前相比，极端贫困现象更减少了——甚至很少见到了。阶级之间的、以及阶级内部不同阶层之间在实际工资上的不平等也变小了。然而这种平衡的变化在 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没有持续下去。尽管设想要建立一种比战前较新和较温和的制度安排，但是阶级不平等在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和 70 年代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缩小（总的情况参见 Westergaard and Resler 1975）。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私人财富的所有仍高度集中在仅 5% 的成年人口手中，他们占有全部私人财富的 40%，特别是占有大多数私人持有的企业资本股票。（中央统计局，《社会趋势》，22，1992：表 5.21）整个实际工资的不平等，以及在不同阶级——和职业的——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在这 30 年里相对来说一直没有多大变化。征税本身并没有改变原来的社会模式，这主要是因为收入累进税被形式不太直接的递减税所折扣。从比例上看，福利收益的确使穷人的实际工资比富人提高的多，但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关于“贫困再发现”的研究表明，许多人仍然生活在官方保障的最低水平的边缘，甚至以下（Townsend 1979）。除了这些持续的不平等，教育供给——首先是 20 世纪 40 年代，第二次是 20 世纪 60 年代——证明没有多大力量来降低个人机会的阶级性不平等（Halsey et al. 1980；Goldthorpe 1987；本书中 Heath and Clifford）。甚至不同阶级

人群之间的死亡风险的差别也相对地非常恒定 (Townsend and Davidson(eds) 1982)。

“相对的”这个词在这里很重要。总的来说,这30年是经济增长的岁月。绝大多数人分享了这种增长,处于阶级结构中所有层次上的人都发现他们的生活条件和机会有了绝对的提高。正是特别地考虑这一原因,约从1980年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步伐已蹒跚不稳,脆弱的英国经济仅在刚过去的10年里遭遇了两次长期的萧条。与此同时,英国社会中生活条件的阶级性不平等实际上再次扩大了,结果在过去的10至15年里,许多人已经被排除在分享经济增长的实际份额之外,尽管经济增长还在持续着。

### 1980年以来的变化:原因

在这些剧烈的变化背后存在着两个方面的直接原因:一方面是经济的,另一方面是政治的。经济方面包括一系列经济行为的转变,这是全球性的变化,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明显。增长在各时期和世界范围内变得更加不稳定。传统的西方资本主义“帝国”面临着来自日本企业的越来越严峻的挑战,现在还受到来自其他东南亚地区企业的挑战。生产分工模式、金融和服务市场、商品和劳动市场等领域 的变化加快了。资本跨国组织的发展继续超越到目前为止大部分仍限于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政治组织和集体性的劳工组织。最后,世界范围内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陷入了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或晚期开始的经济行为长周期或“长波”的下降阶段,重新复苏仍然很不确定(例如 Tylecote 1992)。


由于诸多复杂的原因,英国经济特别地面对着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因而从政治方面看,英国政治和政策的反应表现出它们自己的强烈特征(尽管在许多方面同其他西方国家的发展情况一样)。在1979年的全国大选中,由保守党中的激进右翼派领导的政府上台——并延

续下来。正是由于这一点,我的标题中把 1979 年作为分水岭。在大约 35 年里,这是第一次由政府激烈地和公开地对 20 世纪 40 年代战后社会重建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政治的“阶级妥协”发起挑战。

事实证明,这种政治上的突然转变对阶级结构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从 1979 年以来,政府的政策已转向扩大私人企业在自由市场上的主动性范围。这方面的主要措施包括:对工会权力做出法律上的约束;削减以前保护低收入劳动的措施;采取其他形式缩小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将以前的公共企业私有化;减少直接征税以刺激主动性;主要依赖市场竞争以保持增长和维持产业纪律。与此同时,激进右翼的首相及其顾问们试图减少公共支出,特别是福利的提供(尽管没有完全地取消);鼓励私人进入住房和退休金提供等领域,还在一定程度上进入医疗提供领域。

这个结果使得“作为范畴的阶级”的形式显著地尖锐化起来,因为政策是有针对性地增加经济的不平等。确实,这只是工具性目标而不是目的本身。政府宣称政策转变的目的是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扩大个人选择和个人责任。但是,收入、利润、退休金、实际工资等各方面扩大了差别被明显地接受为是实现目的的必要手段;财富也被说成是对成功的私人企业的回报。然而非常令人吃惊的是,这些政策的布道者们同时急切地努力否定或忽视给许多人造成的后果,大多数人实际上从这样的成功中分享到很少的东西,甚至什么也没有得到。

衡量这些结果的一个很好的尺度就是实际收入分配。我将从考察全日制就业的工资和薪金开始——这方面有详细的数据可用。它们表明,从 1980 年到 1990 年,上层 10% 的白领雇员的收入实际增长了约 40%。顺着工资收入阶梯向下的每一层,这一增长的比例几乎都顺阶递减:无论是体力雇员还是非体力雇员,无论是妇女还是男人。即便是收入最好的 10% 的蓝领工人,他们实际工资的增长也只是上层白领工人的 50% 左右。而且,和后者 40% 的增长相比,中等蓝领工人的实际工资在整个 10 年里只增长了 10% 多;而工资最低的 10% 的蓝领工人实际上几乎没有获得任何东西(计算数字来自于官方 1990 年新



## 关于阶级的冲突 *Conflicts about Class*

收入调查的每周税前工资的基本数据,A部分,表 A.15.1。各项中的零售物价指数用于把 1980 年的工资数额转换为 1990 年的价值)。这在最通常的意义上说就是明显的阶级分化;在整个范围内阶级之间的差距扩大了。

接下来我考察一下税收变化以及公共福利利益变化中获利和损失的分布情况。对差不多同一时期(这里是从 1979 年到 1989 年)的情况做出的全面衡量,显示大多数家庭得到了一些净利(Johnson and Stark 1989)。但是对于那些只依赖国家基本保障金或失业金的多数家庭来说,基本上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这些人在有工作的时候,也当然处于劳动市场的底层。相反,在 10 年里从税收和公共福利变化中获得的全部净收益中,差不多有一半(46%)流向 10% 的最富裕家庭,其余的大部分则流向紧接其下的 10% 的家庭。而从超过“中等收入”到最贫穷的 60% 的家庭,从公共货币体制调整的收益分配中总共才获得了 20% 的份额。其中贫穷家庭获得 1/5,中等家庭 3/5,二者合起来还不到最好的 10% 家庭获得的一半。这种情况或类似的情况,是过去的十多年里经常重复发生的实际情况。

现在把所有这些综合在一起,算上所有权收入,我们就看到了所有来源的实际收入变化的整个情况。根据详细的计算方式,得到的评估结果也许有一些差别,但是总的结果是无可置疑的。从 1979 年到 1991 年,最上层的 10% 家庭的实际收入增长了 60% 多,其下的 10% 的较好的家庭的实际收入增长了 40% 多(《政府答议会问》,《独立报》,1993 年 10 月 11 日)。但获益比例则沿着这一序列向下稳定地变小。即便是在紧随其下的低于中等的 10% 家庭中,实际收入在 12 年中仅增长了 20% 多一点。而在 10%~20% 的最贫穷家庭中,最好地讲,获得的收益是边缘化的,或实际收入实际下降了(社会保障部,1993;也可参见 Townsend 1991; Jenkins 1991)。所以,以下两个事实是很明显的:第一,出现了新的明显的收入两极分化。1/5 最贫穷的家庭在全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的 10% 下降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的 7%，而 1/5 最富有的家庭所占的份额从 37% 增加到 44%：后者是前者的 6 倍，而且这还是在家庭结构调整以后的情况（《社会趋势》1992，表 5.19）。这样人们可能不奇怪的是，有证据表明在这个时期里死亡率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差异也拉大了（Whitehead 1987）。第二，并不仅仅是最贫穷的人没有获得什么利益，实际的富裕增长仅是限于最上层和接近上层的人。比“中等收入”略高的人的实际收入的增加是很小的。除了少数最富有的，几乎其他所有的人在全部分实际收入中所占份额的比例都下降了。这一点对于我后面要讨论的事情非常重要。

对我的观点的再次检验是对所有权分配的考察。这里，你可能预期出现另一种趋势，因为政府的政策支持对住房的更广泛的所有权，以及通过出售以前的公共企业使更多的人持有企业的股票。然而答案却是否定的：从整体上看，各种私人所有的股票实际上变得更加集中了，而不是分散（《社会趋势》1992；表 5.21）。例如，5% 最富有的成年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拥有所有个人可交易财富的 36%，到了 80 年代末，他们所占的比例则上升到 38%。如果不把住房的价值计算在内，他们的份额从 45%（此前下降趋势的转折点）上升到 1989 年的 53%。<sup>①</sup>

上述所有这些都概括出英国目前阶级不平等加剧的趋势。在这些趋势的后面，潜在的是阶级权力结构和阶级政治的转变，我将在后面对此进行讨论。这里我先考察一下当前社会学理论和观点的变化情况，因为它们声称阶级分析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

## 关于阶级之社会特征的争论

阶级这一主题及其广泛的分支在很长时期里是英国社会学研究

<sup>①</sup>在删略过程中，第一部分被省去的部分包括下面内容的讨论：关于社会流动的趋势；“无阶级”概念的空泛，因为它只是被理解为“机会”，甚至连机会的平等都没有考虑。



的重要内容。这一领域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是英国社会学界对这一学科国际性发展进程的主要贡献。然而在英国社会调查询问中,也经常对阶级所被赋予的社会特征进行批判。当然这不完全是新的现象。20世纪50和60年代关于所谓的“中产阶级化”的讨论就是这方面的早期事件,激发讨论的原因也大致和目前相同。在50和60年代,正如在20世纪80和90年代一样,作为工人阶级正式代言人的工党连续在三四届大选中失败,那时修正主义的理论家和评论家就做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认为,如果工党丧失了选票,那么这一定是因为工人阶级消失了;如果工人阶级消失了,那么阶级的划分也就瓦解了。这种论断实际上是庸俗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简单倒置做法,它们直接地从“自在阶级”推导出“自为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理论同庸俗马克思主义一样,从它们所认为的“自为阶级”的消失中推断出“自在阶级”的解体。两者都同样地混淆了根据经济范畴划分的阶级和作为政治群体动员的阶级,都犯了过于简单化的错误:一方面认为工人阶级的激进行为必然源于工人阶级从属地位;另一方面则认为工人阶级激进行为的缺乏必然反映了工人阶级从属地位的消失。

但是我认为仅仅凭借这种概念的争论是不能驳倒这种新的修正主义的。我将要深入仔细地考察它们的观点,并主要从经验上进行分析。正如本书中所有章节表明的那样,真正的问题是:是否因为其他的划分现在代替了阶级划分,阶级就很快失去了显著的特征?或者阶级的划分仅仅是在绝大多数富庶人群中划出少数孤立的穷人?两种观点交叉重叠,但我这里要先考察一下第一种推断其他划分超越了阶级划分的观点。

一些观点可被不太严格地描述为“人口统计的”那种。例如它们认为,现在年龄划分要比阶级划分更能成为经济不平等的重要源泉,据说特别是因为老龄人口占据了贫穷人口的大部分。确实,英国1/5最贫穷家庭中的40%是退休的人组成的(《社会趋势》1992)。但是由此得出的上述结论是错误的。一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是

讨论的重要时期), 老龄贫穷人口的相对比例实际上在减小, 而不是上升。原因很简单, 是由于新的严格的劳动市场使得失业和低工资就业人口的总数急剧膨胀, 而这些人目前处于贫穷之中。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 老龄本身并不必然带来贫穷: 正是由于处在阶级结构所决定的环境中才出现贫穷。那些到年老的时候面临贫穷威胁的人, 大部分是从靠工资生活的工作上退休的人——在英国, 甚至包括熟练的蓝领工作, 或普通级别的白领工作——因为这些工作使他们很少或不能获得国家提供的最低保障的权利。相反, 那些从薪水职业上退休的人能够得到较多的退休金, 而且他们在职业等级中距顶端越近, 退休金当然也就越高。实际上, 退休金制度安排仍然是明显地按照阶级划分的(参见如人口普查和调查局的《家庭调查总体情况》, 1988年; HMSO, 1990)。工作生活之后的阶级不平等是与进行工作时的阶级不平等是一致的, 前者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后者。

关于根据年龄讨论的话题就谈到这里。而另一种也是“人口统计”风格的观点, 试图把所观察到的家庭之间的收入不平等解释为家庭构成差别的函数——因而反映的是不同的“收入需求”, 而不是阶级差别造成的。实际上这种观点, 简单地说, 同我前面列举的那些数字没有什么关联。这些数字表明了从1980年起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快速增大, 但它们被标准化后, 正是除去了家庭规模大小差别、孩子数目和年龄的差别对“收入需求”造成的影响。但是这种观点还存在另一种解释。它强调已婚妇女就业人数的直线上升, 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30年或更长时间——至少在英国, 目前每4个处于工作年龄阶段的妇女中就有3个在劳动市场上。这种观点于是声称, 家庭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并不是由挣收入的家庭成员所做工作的“等级”造成的, 而是由家庭中有效挣得收入的成员数目差别决定的。因而这种观点认为, 妻子是否从事全日制工作, 还只是部分时间工作(正如英国从事工作主妇中的一半那样), 还是根本没有付薪的工作, 这是起决定作用的事情。因而这种观点得出结论说, 个人或家庭的生活“战略”正在取代阶级,

成为决定家庭收入的主要因素(参见 Pahl 1984; 本书第六章)。

然而,这一结论还是与现实证据不相符。当然,挣收入成员的多少确实影响家庭收入,但是其结果强化了阶级影响,而不是削弱这一影响。(参见 Bonney 1988a 和 1988b; 也参见 Dex,1985)首先,从历史上看,已婚妇女中带薪就业人数的增长在“中等或上等”阶级中要比工人阶级中多得多。主要原因在于,许多工人阶级的主妇在很早以前就从事付薪工作——而那时大多数中等或上等家庭仍然维系着妻子必须呆在家里的惯例(参见 Westergaard and Resler 1975: 第六章,第二部分)。因而,新的“双重收入”(dual earning)使中等和上层家庭的收入的提高多于工人家庭收入的提高。其次,实际情况是——同过去不同——双重收入在中等和上层阶级的已婚夫妇中要比在工人阶级中更为普遍。尽管差别不是很大,但是其结果则更加扩大了阶级差距,而不是缩小了它们。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这些差别看来反映的是阶级的机会差别。这里能提出的证据不是很充分,但毫不奇怪它表明的是,上层或中等阶级的家庭主妇的状况相对要好一些,因为她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选择是否或怎样从事付薪工作。相反,当工人阶级的家庭主妇仅仅从事部分工作日的工作或根本不能就业时,这主要是因为她们没有现实的其他选择。他们没有交通工具从家庭到很远的工作地点去上班;她们在当地能找到的工作种类非常有限,而且经常是没有很好保障的兼职工作;照料孩子的公共设施也很缺少;较贫穷家庭依赖国家补助所得到的要比妻子的低工资所得还少。所以,个人或家庭“战略”选择范围本身就依赖于所处的阶级。从阶级阶梯从上到下,选择范围也就越来越窄。

## 性别划分

讨论妇女就业问题,实际上是开始讨论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即阶

级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参见 Crompton and Mann (eds) 1986; Crompton, 本书第九章）。许多修正主义的理论观点都推断，现在阶级的划分已经不明显了，因为性别划分取代了它。当然，性别不平等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但是新修正主义观点认为，性别不平等现在变得越来越明显和有力量了，因为妇女越来越挑战它；特别是，英国绝大多数妇女，甚至已婚妇女，在其工作年龄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置身于劳动市场——显而易见的是，同男人相比，她们在劳动市场的各个层次上，都处于不利于她们的现实和惯例之中。

妇女同男人相比之不利地位的一个主要表现是，总的来看，她们的实际有效收入较低。这反映了她们面临着来自劳动市场内外的各种障碍：连续工作和报酬限制的障碍，妇女天生就应在私人 and 家庭劳动中发挥作用之传统界定造成的障碍。可能令人奇怪的是，这里还反映妇女优于男人的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多数妇女能比男人活的时间长，死亡较晚；但在工人阶级中，老年则面对着可能由于缺乏足够的养老金而生活贫困的很大风险。正是由于阶级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的相互作用，这又是广泛存在的。性别差异确实是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在概念上同阶级差别是不同的，而且也不仅仅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它们是交织在一起，强化了阶级结果，而不是削弱它们。

我在前面已经举出了一个例子。事实是，中等和上层的家庭主妇同她们的工人阶级“姐妹”（可以这样称呼的话）相比，能发现更多的选择自由来应对家庭生活的束缚。我这里要更深入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一旦置身劳动市场，妇女则和男人一样面对着同样的不平等。总的来看，收入和工作条件的差异在雇佣妇女中和在雇佣男人中一样，都是巨大的，这是由其所处“阶级”的工作决定的。升职机会和降级风险在妇女中同在男人中一样，没有太多的差别，这是由个人在阶级结构中的工作层级和起始点所决定的。差别在于，妇女在各个层级上经常要比她们的男性同行遭遇更差。在各层次的工作上，她们的收入倾向

于更少,她们的养老金(如果能够得到一些的话)倾向于更低,她们的职业机会更为有限,她们面对的普通级别工作的禁锢和降级的风险更大,而且她们更比男人可能从事部分工作日的劳动(如果要考察这些方面的更多证据,请参见《社会趋势》1992:表 4.8;Marshall et al. 1988:表 4.6 和 4.9;Goldthorpe 1987)。然而在所有这些中,没有一项是停止了阶级结构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劳动市场的阶级结构对于妇女和对于男人来说是相同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同一种结构——区别主要在于,妇女要比男人更被迫地固定在日常普通工作的位置上。

总之,可以把我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逻辑点概括如下:当妇女们从事付薪工作时,像现在英国大多数妇女一样,她们多数情况下能找到的是远远低于阶级结构中较高档次的工作,而且这要比男人差的多。这表明妇女的地位仍然从属于男人,尽管现在改善了一些。但是,这也同样表明了阶级结构的持续。然而,我仍然把它作为我的一系列观点中的最后环节。假如已婚妇女所做的工作同她们丈夫的工作没有什么联系——或甚至倾向于“补偿”它,情况将会如何呢?假如职业妇女经常同从事蓝领工作的男人结婚,或反之,情况又将如何呢?这样,若根据家庭条件来衡量,阶级的不平等必然会更加凸显。

答案很简单:这些情况会发生的,但只是很少发生。大约 2/3 的从事“服务阶级”工作的妻子是同诸如专业人士、经理等这样的丈夫结婚,而几乎不会有一个蓝领的丈夫。如果你使用一种三组工作划分的方法——“服务阶级”、中间阶级和核心工人阶级——那么你就会发现,许多“双重收入”夫妻明显是“混合阶级”的:目前英国大约有 50% 的双重收入夫妻是这样。这种情况对于如下问题具有潜在意义,即在阶级结构中,主要的界限该如何确定呢?但是这样表面看起来是“混合阶级”的婚姻中约有 4/5 是如下情况,这种混合之所以形成,只是因为一方属于“中间阶级”的位置——大多数是妻子,她们从事较低档级别的、前途很有限的“白色工装”工作(“white-blouse” job)。这种大部分是日常工作种类的女性职业,使得妇女能够同处于所有三

个阶级群体中的男人结婚，如果这种类型工作内的差别不太明显的话。但是双方工作种类差别很大的婚姻——服务阶级与核心工人阶级——是很少见的。而且根据统计资料，妻子的就业阶级同她们的丈夫的就业阶级是密切联系的（关于这里概括资料的主要部分，参见 Goldthorpe 1987 和 Marshall et al.1988；也可参见 McRae 1986）。所以，这样根本就不存在对阶级划分的总的违背。同样，性别的不平等和阶级的不平等相互作用：其中一个并没有取代另一个。

## 其他划分

修正主义理论还指出其他的划分，据说它们现在也超越了阶级划分。关于种族划分——特别是根据皮肤颜色的划分——我这里作一简短的评论。在今天的英国，黑色和棕色皮肤的人确实处于不利的地位：存在着新的和恶劣的种族不平等。但是这些种族不平等无论如何也取代不了阶级不平等。一方面，种族划分——这一点上和性别划分很类似——的具体表现，在较大程度上说正是它的受害者在生产和分配的经济秩序中的较低地位：也就是说处于阶级结构中。另一方面，尽管存在着对他们的诸多共同歧视，英国的“有色少数群体”仍然横跨许多职业领域，以至于不能形成一个单独的经济类别群体。他们也按照文化被划分；黑皮肤的加勒比人要比棕色皮肤的南亚和东非裔人更集中在较低级的地位上。第三，他们的数量——约占总人口的 5%——较少，无论如何不至于给英国的阶级结构打上深深的种族差异烙印，而这种差异就是阶级结构，美国人是这样，更不用说南非人（关于这个议题，有许多文献可以参考。令人信服的分析，参见 Solomos 1989）。

但是修正主义者还假设了其他另一种划分，并声称它越来越使旧的阶级划分失去重要意义。这就是所谓的按照消费模式进行的划分。这种观点认为，当前生活条件的真实鲜明差别来自于：拥有充足私人资源的大多数人具有掌握自己生活的充分权力，而缺少这些资源的少

数人则不得不依赖一般是数量很少的公共提供。这种形式的修正主义理论部分地谈到私人养老金计划的增长、超过国家医疗提供的私人医疗保险、私人汽车拥有,等等。但是它们也特别提到了住房私人所有的快速增长(特别参见 Saunders 1990a, 也参见 Saunders and Harris 1990; Dunleavy and Husbands 1985)。

当然,私人对住房的拥有在20世纪80年代比以往发展得更快。今天在英国,约有2/3的家庭或者拥有对自己住房的完全所有权,或者通过长期贷款购买了。甚至在不熟练的蓝领工人中,这一数字比例也超过了40%。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阶级划分让位给了拥有住房的大多数人与少数租房者(主要是公共住房的承租者)之间的区分。毕竟,相对贫穷的人拥有的是相对普通和价格低的住房。他们从国家那里获得较少的税款减免以帮助他们购买住房(参见如《社会趋势》1992:表5.11)。在诸如经济萧条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失去住房,而且不能支付抵押款项。总的来看,当总体的私人资源——也就是说,实际收入——仍然是高度不平等的时候,来自私人资源的“消费权力”仍然是高度不平等的权力,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变得越来越不平等了。消费权力毕竟是一种金钱权力:很简单,富有的和过舒适生活的人要比普通的挣工资者更多地拥有这种权力,更不用说那些没有工作的贫穷的人了。住房拥有并不能摆脱这些广泛的“消费权力”的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同以前一样仍然来自经济阶级结构(关于对那种把住房拥有同假想的新消费主权等同起来的结论进行批驳的研究,参见 Forest et al. 1990)。

### 下层阶级的隔离与大众的富庶?

那种认为通过新的消费权力实现解放的观点,是同下面这种观点并行的:即接受一些关于不平等增长的证据,但却认为这些不平等标志着旧的阶级划分的瓦解。在原来阶级划分的位置上,假设出现了一

种新的划分,即少数“下层阶级”同社会其他部分的划分,他们是由于道德堕落或经济剥夺而被隔离出来。而“社会的其他部分”据说包括无阶级区分的大多数人,他们由于共同经历了增长的富庶而形成了一致的群体。当然仍然还存在着一种区分,但这是新的区分,只是把穷困的和最贫穷的人同其他人群区分开来。根据这种时髦的假设,没有什么别的划分在将来要比这种划分更重要:没有什么其他更有持久的划分了,诸如日常普通的雇佣劳动者与从事高级职业的经理主管和专业人士之间的区分;或更广泛地说,上述这些人同依靠特权和权力而处于最上层的精英之间的区分。我这里需要对这种假设进行认真的考察。原因有二:其一,它包含了当前其他反对阶级的观点的一些主题;其二,很明显,这里正是学术上的社会理论同更广泛的公共议论相互重叠的地方。从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和政治气候发生转变以来,两者便部分地有了共同的声音。

在各种版本的“下层阶级议论”(underclass talk, Westergaard 1992)中,有一种把现在的贫困说成主要是一种文化现象,作为一种“下层阶级文化”扩展传播(Murray 1990)。作为这种文化载体的人不想好好工作:按照这种理论,失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这些人选择了在正常婚姻之外生活——因而他们在单亲家庭的贫困中抚养子女,并把自己不正常的生活方式传给了孩子。他们是倾向于违法和犯罪习惯的人群,是堕落成为一种不负责任地依赖公共福利提供的群体。然而却有许多事实证据表明,绝大多数失业的人希望获得一份有报酬的工作,但是却无法找到;单亲家庭在各阶级结构中发展扩散,因而对家庭经济条件的影响是不同的;违法和犯罪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并不是和阶级对称的,它们产生于恶劣的物质条件,而不是造成这些条件;当贫穷的人依赖公共福利供给时,并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环境力量所迫。所以以下这种见解是错误的和武断的,即声称失业、婚姻不稳定、违法犯罪和依赖国家福利等,一起构成了单一的群体,然后又形成了一种自我选择的生活方式。这种“道德卑劣”版本的



下层阶级谈论，复活了那种关于体面社会之下的“危险阶级”的陈旧观点，显然根本漠视造成贫困的主导性结构原因（参见如 Bagguley and Mann 1992; Mann 1992; Walker 1991）。

这种观点在政治上有右翼的起源和要求，并不是一种非常不同的下层阶级理论，我把它称为“被排斥的贫困”类型。实际上，这解释了贫困形成的结构原因。用政治话语来说，它在中左力量中能引起共鸣。下层阶级的贫困不是自己选择的，而是环境力量造成的（参见 Field 1989; Hasley 1987; Townsend 1993）。但是它认为，这些人不再是更广泛的工人阶级队伍中最贫困的，而是几乎长期被排斥在雇佣工作世界之外的人，或者处于这个世界的边缘。他们之所以越来越被排斥在社会大多数之外，是因为他们很少获得或根本不能分享几乎其他所有人都能享受的“富裕”的增长。但是，也存在一些对这些描述的正确判断。无论怎样界定贫困，贫穷人数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增加很快。我已经列举了原因和支持它们的事实证据。它确实意味着，目前工人阶级内的不平等变得尖锐化了，在工人阶级之上的阶级内部也是如此。

但是如果说工人阶级已经不再真实地存在了，则完全是另一种事情。这种观点的理由是，现在工人阶级已经深深地分裂：一方是显然越来越被排斥的下层阶级；一方是数量众多的从事日常工作的人，即便他们名称上仍然是雇佣劳动者，但是越来越成为“中产阶级”，越来越难以同以前被认为是他们之上的阶级区分开来。我先分析前一方面。没有工作的人或处于工作边缘的人，现在确实可能接近生活于隔离的、贫穷的和被排斥的世界之中，两极分化最终会达到这样的状态。这是经验研究的问题，尽管到目前为止经验证据对此还没有提供多少支持。例如，退休的工人——约占贫穷人口的 40%，不论怎样界定贫穷——很难构成一个阶级，以同活跃的但养老金权利很少的雇佣劳动者区别开来，而且他们以前就属于这个人群。工人阶级内部的个人流动要比上述观点所意指的要多：失业和就业之间的流动；熟练和非熟

练的雇佣工作之间的流动(如 Goldthorpe 1987; Westergaard et al. 1989)。而且,熟练和非熟练劳动之间还存在着许多条件的共同性,至少在英国是这样(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 Marshall et al. 1988, 如表 4.6 和 4.9; 也参见早期概括的关于职业养老金供给的证据)。还有,虽然劳动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分裂了,但最近的研究显示,不存在分裂增大的简单模式和较明显的一般趋势(如 Gallie 1988)。

推断无工作和最贫穷的工人形成了新的隔离人群,这种观点部分地可被认为是一种假设,但迄今为止看来,至少它是不正确的。当这种观点和如下观点——在假设的下层阶级之上,旧的阶级划分现在已经越来越没有意义了——联系起来时,更多的错误会显现出来。这第二种观点特别是以下面的信念为转移,即在大约从 1980 年以来的新的分配制度下,几乎是除了最贫穷之外的其他所有的人,差不多共同地享受着不断增长的富庶(如 Halsey 1987; Saunders 1990)。但这种信念显然是严重错误的。正如我在前面表明的,在 20 世纪 80 年代,实际工资和实际收入的增长是很小的,即便是处于中间部分的人群也是如此。而绝大多数人或实际上有所损减,或其所得远远低于统计上的平均数。这些数字经常被虚假地当做大众富庶迅速增长的证据。这种“国内平均数字”当然是统计上的人为产物。它之所以很高,只是因为富有之人——许多主管、经理、成功的专业人士,以及人数最多的,在商业和金融领域上层的人——的财富增加很多。这就是经济阶级结构中总体分化的极端方面,也是最有力量的一方。

## 上层阶级的特权和权力

关于 1980 年以来上层社会经济权力的增长,我已经说了很多了——例如,大约有 50% 的实际收入增长来自最上层的 1/5 人口(即便是在最全面的统计数字系列中,财富顶端的奖金收入也被隐藏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只可能从关于董事们的薪水、股票认购权以及此类收

入的特别报告中获知一二)。上层的权力也有很大程度的增长,这不仅仅是在非常特权必然带来非常力量的意义上来理解的。私人企业的权力随着自由市场政策的推行当然得到发展。这里仅举一个例子。企业在公共教育和医疗管理领域中的权力持续提高;更一般地说,“成本-效率”这种企业经营方式在公共领域事务管理中广泛蔓延。而且,“自由的”市场实际上是由寡头独占——如果不是垄断的话——的趋势所引领的,尽管政府一直声称要支持广泛的竞争。对原先国有企业的出售,更确切地说,是把原来的公共垄断转变为私人寡头的独占。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小型企业有很大发展,但是主导性的资本权力仍然集中在大企业手中。在英国,则特别集中在大型金融机构的手中,以伦敦城市银行为中心。而且正是它们的活动——而不是处于衰退中的制造业领域的活动——造成了上层和近于上层人群金钱收入的最大程度的增加。

工会则被无情地除去了最为一般的协商作用,而这是它们在“三方合作”时期所拥有的。这种“关闭”(lock-out)是市场内在固有的反对“劳动垄断”、反对工会领导权力官僚集中的本质特征。在这一过程中,私人企业在公共管理领域中的权力实际协商作用则变得更大了,如果说它还不太明显,这是因为它较少通过正式程序来进行。企业在这方面的主要代表是来自上层企业和机构中的小圈子内的上层人物。

这些大的公司和机构,包括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现在则是私人企业的主要股票持有者。它们的上层人物领导着这些企业资产的主要配置,他们掌握的权力来源于庞大的公司资产,而不是自己的私人财富,尽管他们能够从较高的管理薪金、董事咨询费、交易佣金、花费补贴以及实际的私人股票和资本收入中获得较多的财富。除了一些“报纸头条”上的企业大亨外,他们行使的权力——在市场上的和通过与政府达成谅解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非个人的”(特别参见Scott 1986,1991和下面的第十二章)。但无论如何,这种权力是很大

的。它是为了个人和家庭利益的权力，以及为了更广泛的资本和阶级利益的权力。

而且，这些权力远远超出了他们之下的主管、经理和职业专家一般管理的范围之外，这些人也从当前的实际收入分化中获得了切实的利益，尽管同私人企业中的少数上层指挥者所获得的比起来要少一些。这个“上层阶级”，加上他们的家属，其人数仍然不到全部人口的1%。即便我们加上众多的食利者、政府中的高级官员（中央的而不是地方的，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公共服务和私人企业的世界）、成功的高级职业专家（以及演艺明星，他们获得了巨额财富和一些公众舆论形成的影响，如果算不上相应的权力的话），他们的数量也是很少的。即使再广泛地计算，上层阶级的人数如此之少，他们的资源和特权如此复杂微妙，以至于在大多数样本调查或一般的统计数字中，他们不能被单独区分出来。他们经常倾向于从那里的视野中消失。更由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意识形态气候的转变，由于随之而来的阶级消解理论的复兴，他们则更为模糊难辨了（这种权力的更加集中，从国家权力集中的新趋势中也可以明显地体现出来。国家权力与越来越代表企业利益更紧密地联系——尽管我这里不想详细论述这一点）。总之在整个范围内，阶级结构同以前相比呈现出尖锐的分化，不是像下层阶级理论所说的那样，仅仅限于“较低”层级的人群。

## 政治和工党衰退

这里我们仍然存在着一个迷惑的问题：当“自在的”阶级分化更加尖锐的时候，为什么“自为的”阶级分化却看起来也减弱了呢？英国

较长历史的阶级政治传统，尽管它具有较为温和的特征。那么在恶劣的经济条件下，由激进右翼领导的保守党如何能够连续四届赢得选举胜利呢？的确，保守党并没有完全获得绝对多数选票：最多也只有44%，而其他的反对党派得票之和是多数。但是，工党在1983年选举

阶  
级

第三部分

研  
究

的得票比例却极为糟糕地下降到 28%，而这却是高失业的时期：甚至在 1992 年的选举中，这个比例也只是上升到 34%，保守党却仍然获得了近 42% 的选票。一度流行的理论是：工党的衰落标志着阶级划分的选举模式的终结。然而事实证明这种结论是错误的。如果考察一下详细的调查数据（特别参见 Heath et al. 1985）就会发现，相对地说，政党支持的阶级差异差不多仍停留在以前的水平上：并不是像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那样变化明显；在英国，20 世纪 80 年代的情况同 20 世纪 50 年代～70 年代比起来相差不多。

所以说，工党的衰弱并不是源于整体阶级政治的崩溃。这首先是因为蓝领工人的数量在较长时间内持续减少，而正是这一人群在历史上形成了工党的主要基础。然而这一点只是引出了进一步的问题。许多非体力工人——那些有“工作”而不是“职业”——的处境并不比体力工人的处境好多少。而且尽管从事日常白领工作的妇女经常同处于较好阶级地位的男人结婚，但是这仍然不能充分解释工党为什么不能在蓝领世界之外成功地获得支持。其次，工党对传统蓝领工人阶级的吸引力实际上也是减小了，而不是像一些人从现在的经济分化中估计的那样这种吸引力要增大。实际上，大约在 1980 年，所有阶级的政党的选票都有所流失。这种摆动使得支持工党之比例上的相对差异基本上同以前一样。但这始终是维持在较低水平上，1983 年的情况更为如此。在 1987 年和 1992 年，工党得到了部分恢复。也许在没有保守党持续领先的情况下，结果会更好一些？但是为什么呢？

调查证据认为，工党之所以失去选票最多——1979 年和 1983 年，是由于以下方面的普遍幻灭感：一，它的“治理能力”；二，它的合作主义经济政策的明显失败；三，工党执政末段爆发的罢工；四，一系列的党内争论（参见如 Heath et al. 1985；Dunleavy and Husbands 1985；Westergaard et al. 1989）。但是诸如此类的解释都可以说是停留在问题的表面。我要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工党会如此遭受幻灭感的严重冲击呢？而且如我将要指出的，这特别是发生在民众抗议阶级不

平等加剧的情绪上升和蔓延的时候。总之，这看起来倒是阶级政治复兴的一些潜在力量，这种复兴要围绕对既定的权力和特权的集中发起挑战这一主题而进行。可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呢？

这里可以做出许多推想。首先一点是，工党从来就没有坚定地挑战过既存的权力和特权不平等的状况。尽管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党，而不是激进的党——像西欧许多工人阶级政党发生的总体转变那样。它们获得的长期支持也趋于下滑。如果这里提供了一些线索的话，那在我看来，就是阶级政治变得“制度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阶级冲突历史地被正式承认进入政治领域，而且逐渐形成了政党围绕其进行动员的被认可的主旋律。但结果它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制度化地驯良和变得温和了。妥协，起初仅是作为一种策略来追求，但却经常变成目的。改良，被认为较容易实现，并且能够带来一些有形的利益，不正面挑战现存秩序。然而当正面挑战降临面前，当改良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制度化政治中的阶级内容却已经被抽干了。敌对的政党争夺“中间地盘”，争夺“游动的选票”，也仍然自信地认为能够维持自己原来的阶级支持。这些政党越来越基于工具性的治理能力来发表主张，而不是基于对自己阶级选民之利益的原则地和长期地追求。这样，政治变得——而且现在普遍呈现出——“平淡乏味”，即便不是政治低迷或腐败时期，也是如此。当政治家们和政党降低自己眼光的时候，大多数选民根本不指望从中获得什么。至于选举，当他们投票的时候，也只是以一种实用主义的心态。

在英国，这恰恰适合了激进右翼的一种理念：政府应该少做它们以前所做的事情，而是让市场做得更多。当然，激进右翼也早已准备好去兑现保守党长期以来的主张：优化治理能力，当治理被理解为管理现存的秩序。保守党毕竟是“心态务实”的商人的政党。的确，激进右翼已雄心勃勃地追求自己版本的阶级政治，并且造成了经济两极分化的结果。选民们大多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尽管保守党一再加以否认。然而，通过我上面刚刚描述的那种“阶级政治的制度化”，许多选民现在

不太相信政治反对是矫正结果的一种手段了。

这样,对政治和政治家们的幻灭感广泛地扩散了,舆论调查结果总体上证明了这一点。我认为,这对工党和左翼造成的损害要多于对保守党和右翼造成的损害,因为对于前者来说,如果它们的政治不能有效地改变现存秩序的话,他们就两手空空了。当保守党甚至到了1992年还在选举阵地上领先时,它可能以更加实用的考虑为基础:部分是因为保守党作为代表商人的政党,它仍然——如果说是令人奇怪地——被相信是比工党管理经济的能力强;部分是因为很多支持对富人征高税的选民也担心高税可能会降到自己的头上。

然而,舆论调查还表明,对工党在历史上曾经代表的一些原则的支持——特别是在工人阶级中间,但很大程度上也在专业人员(如果不是企业团体的话)中间——仍然在扩展:工会代表雇员对抗雇主;广泛的公共福利提供;“更为公平的份额”,以及一些削弱最上层财富和权力的累进再分配措施。这方面的证据是非常显著的,说明激进右翼的社会哲学并没有赢得所有的“心灵和心智”(关于相关的舆论调查数据,参见《英国社会态度》中列举的那些连续的问题,ed. R. Jowell et al.,也参见如Heath and McMahon 1991, Taylor-Gooby 1991, Marshall et al. 1988, Westergaard et al.1989)。

这样,看来许多人都希望得到“更为公平的份额”。尽管许多人对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还存有疑虑,但是民众的观念同流行的社会理论和右翼的意识形态是不同的。到目前为止看来,情况至少是这样。

## 资本主义发展的模式<sup>①</sup>

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

主流的社会分层研究看起来已经对其核心概念失去了信心,这个概念就是“阶级”。这种信心的丧失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像在对统治阶级的研究中那样显著。在人们宣布阶级死亡之前,就已经发布了资本家阶级的讣告。主流的研究者也一直不太愿意承认处于统治地位的、有财产的阶级——基于对资本的所有和控制——的存在,而是用一种关于“精英”的研究来替代,直至20世纪70年代,都是分层研究的支柱(例如参见英国的一些研究, Cole 1955, Guttsman 1963, Bottomore 1964, Stanworth and Giddens 1974)。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种研究也差不多消失殆尽了,在许多国家内,也只剩下一两个孤单的研究者使这一问题维系下来。

社会分层研究的这一空白反映了阶级分析中的概念失败。理论家

<sup>①</sup>本文是专门为这本文集撰写的,取自关于区分和解释不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企业控制模式的一个更大的研究项目。本文的早期部分文稿于1993年在赖切斯特纪念约翰·雷克斯(John Rex)的会议上发表过。我非常感谢这次会议的组织者理查德·詹金斯(Richard Jenkins)和戴维·迈森(David Mason),以及对本文做出评论的与会的学者。我也从同吉尔伯特·伍恩(Gilbert Wong)关于诸多问题的讨论中受益颇多。



和研究者一样,尽管他们还在形式上尊敬马克思和韦伯,但是不能把财产所有权和阶级结构之间的关系合理地概念化。这使得他们不可能理解 19 世纪晚期以来发生的财产关系重构的真实含义。当马克思和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家估计到股份公司和金融资本制度改变了资本家阶级得以构成的基础时,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则得出了相反的、有些天真的结论,他们声称这些变化已经导致了资本家阶级的消亡。

例如,丹尼尔·贝尔 ( Daniel Bell ) 吸收了伯利和米恩斯 ( Berle and Means 1932 ) 的研究成果,他得出结论说,“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消灭了资本家阶级,代之以一种新的挣薪水的经理阶级。财产同阶级结构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了 ( 也参见 Parsons 1949, Kerr et al. 1960 )。这种“经理革命”被看做是“工业主义逻辑”的无情结果。然而,许多反对结构功能主义 ( 上述观点立论的基础 ) 的人也接受了这一立场,认为在阶级分析中不必再考虑财产所有权,而且对资本家阶级的深入分析已经没有必要了 ( Dahrendorf 1959 )。

现在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从伯利和米恩斯早期著作中得出的天真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而且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问题远比人们一般所理解的要复杂得多 ( Zeitlin 1989, Scott 1985 )。这种证据看来使得主流分层研究存在许多问题,它们或者忽视这种证据,或者最好只是说关于统治阶级或“精英”的应酬话。或者,如我在各处都讲的那样,他们彻底混淆了阶级概念和精英概念之间的重要区别 ( Scott 1996 )。关于财产所有对阶级结构的意义的重新考虑,已在很长时间里见不到了。而且这种考虑凸显了许多与所谓的“阶级的死亡”这一更广泛的问题相关的问题,而这在连篇累牍的辩论中也很少被考虑。

然而如果重新思考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必须在正确理解资本主义在过去 150 多年发展过程的复杂性的基础上来进行。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从个人资本占有形式不断转变为非个人的资本占有形式。个人的和家庭的所有者越来越被联合的或机构的所有者所补充和

代替。控制变得“非人化”了，在不具名的权力机构中而不是在个人手中运行。但是这种转变采取了多种不同的形式。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家、“冲突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同样倾向于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着同一发展模式。结构功能主义者倾向于从美国经验中抽象出这种同一模式，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倾向于从德国经验中抽象出同一模式。我们必须承认和接受的是，从个人占有到非个人占有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方式，反映了工业化的不同路径。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出发点，沿循不同的道路，因而以不同的方式发展，所以我们的理论必须考虑到这些不同和差异。

但是，这并不是为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作辩护。在资本主义企业模式多样性的背后，我们也能辨别出有限的几种形式，它们能被抽象化为适于比较研究的理想类型。我们这里可以区分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四种“既定”模式：英美模式、德国模式、日本模式和拉丁美洲模式。另外还有两种“正在形成的”模式，我对它们特别关注，这就是后共产主义模式和中国模式。然而，这些名称不应被理解为文化决定论的含义，而只为了对这些模式的方便描述，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它们确实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发生的。每种模式都是围绕资本动员的特定机制而组织起来，而且它们的再生产或转型都是产生于这些机制内部的潜力和局限造成的结果。

资本主义发展的英美模式，表现为从资本动员的企业家机制（像从较小规模的家庭企业中所看到的那样）转变为以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机构机制，诸如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这样的金融机构越来越取代了私人财产成为企业资本的主要来源。在德国模式中，则是以银行机制为中心进行资本动员，保证大的生产企业能够得到充分的长期借贷。在日本模式中，一组企业形成紧密联系的团体，在内部，资本从一个企业流向另一个企业，从利润少的流向利润高的企业，或流向长期性战略投资。这种集群机制开始时采取内部纵向垂直形式，公司群体都服从于家族控制，但在后来就发展成为横向形式了。而在我要分析的最

后一个模式即拉美模式中，资本动员机制是我所谓的联合网络形式。家庭、银行和投资公司的股权相互交织，形成一种复杂的控制形式，这使得家庭的影响能够在更为非人化的投资基金体制中得以持续。

这四种成熟的模式都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核心中形成的。在这些核心之外，一些其他的模式随着经济工业化的发展也出现了。但在本文中，我集中讨论我所所谓的后共产主义模式和中国模式。后共产主义模式中的实物交易机制包括争价、讨价和实物交换，这些来自于向资本主义方向转变的前共产主义制度。中国模式则包括一种具有友好互助根源的机制，这在东亚的“新”经济中可以看到。

本文的目的是为了集中展现这些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中对阶级分析最为相关的方面，并概括出它们对于资本家阶级进行理论研究的一些潜在意义。

## 资本主义发展的既有模式

关于英美模式，在英国和美国研究得最为充分，尽管它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存在（Scott 1985：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1986，Scott and Griff 1984）。英国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小规模、自我筹资的企业发起的，经营它们的个人和家庭只是为了短期贷款才求助于银行系统。结果，银行在工业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发挥多少积极的作用（Ingham 1984）。当扩张发生的时候，一般通过把企业合并成一个较大规模的家庭控制的经营。

美国的工业发展沿循着类似的模式，虽然美国经济规模本身意味着企业的扩张不得不出家庭资本的界限。纽约银行在提供另外的资本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们没有取代家庭持股者（Chandler 1990:57~58；也参见 Chandler 1963, Lash and Urry 1987:69）。以前的所有者变成了多数或少数股权控制，而很多投资银行家则进入了企业董事会。投资银行只是把自己的作用限制在提供短期贷款，只有少

数银行拥有公司的长期股权。结果,银行家的影响只是短期的,而到了大企业自己建立了融资机制时,银行的作用随之下降(Mizruchi 1982)。作为替代,新的资本来自于数量不断增加的投资公司、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它们成了企业股票的主要持有者,对于自己的投资只是处于短期效益考虑。

两次大战期间的工业困难,促使英国的银行家变得更深地卷入工业考虑,但这只是对他们金融困难的暂时反应,而且一有可能,银行就撤出了工业重建的事业。无论是在英国还是美国,企业家的资本都没有被长期银行资本所取代或补充。在这两个国家,都是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养老金等等——在向一种更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形式的转变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英国和美国机构控股发展的结果,并不是伯利和米恩斯(Berle and Means 1932)所预期的那种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大的金融机构对股票资本的控制意味着,“控制组合”能够持有大企业的50%以上的股票。结果正如我在其他文章里所说的“通过一群利益的组合进行控制”(Scott 1985)。控制企业所有权的非人格的金融利益形成结构松散和重叠交叉的组合,它们控制着特定企业的股票资本。这些组合尽管不会形成具有内聚力的控制团体,但是它们对管理的自主性具有重要的约束,而且是企业决策中的主要力量(Scott 1990, 1993)。机构控股和主导交织成企业之间关系的复杂网络,其中银行主管处于企业决策者“内圈”的核心地位(Useem 1984)。但是,这里并不存在像一些研究金融资本的人所预料的那种经营团体或金融帝国(Villarejo 1961, Perlo 1957, Rochester 1936, Menshikov 1969)。在英美体制中,这些机构利益组合的优势地位导致了一种特殊的短期投资模式,这与在其他体制中可看到的那种较为长期的投资模式是截然不同的。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德国、奥地利和许多中欧国家采取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模式,我将其统称为德国模式,当然这在德国最为典型。19世

纪德国资产阶级的弱小和农业经济状态,迫使普鲁士国家鼓励外国资本卷入本国的工业发展。这使得本国资本资源有时间来贮备,新组建的银行领导了这一过程(Kitchen 1978)。这种所谓的“通用银行”把长期的工业投资和短期的银行信贷结合起来,因而把剩余资金引导到工业中。通过浮选企业、提供信贷和具体控股,它们控制了企业的董事会,在企业事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Chandler 1990: 416~417, Landes 1969: 205, Gille 1970)。

银行业的合并和联合形成了一种相互交织控股的模式,使得大银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德国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Tilly 1986, Milward and Saul 1977:47, Henderson 1961: 62ff, Kocka 1980:90, Tilly 1974)。每家银行都能在大工业企业中拥有少数控股权,每个企业一般都同不只一家银行结盟(Scott 1987:215)。银行是经济中的主宰力量,站在上下垂直结构的工业体制的顶端。

类似的资本动员模式在奥地利和瑞士也发展起来,两次战争之间在中欧许多国家也很普及。一位观察家(Teichova 1992:18)甚至声称是奥地利而不是德国应被看做是通用银行业的典型,这当然也是希法亨的观点,他认为奥地利是银行主宰的最明显的例子(Hilferding 1910)。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奥地利,国家越来越进入银行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的影响奠定了奥地利独特的联合政治结构的基础。奥地利的国家银行同国家控股的工业企业结成紧密联盟,企业之间的整个关系网络具有一个等级制结构(Zeigler, Reissner and Bender 1985)。

在德国,银行单独保持着在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德国三家最大的银行在许多大型金融企业、重工业企业、采矿业企业和公用事业企业中具有利害关系和影响(Zeigler, Bender and Biehler 1985, Franks and Mayer 1992, Scott 1985:126~131)。瑞士的三家最大银行在金融企业和跨国企业等相关领域也发挥着类似的作用(Rusterholz 1985)。

我们要考虑的第三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日本。在这种模式中,

企业联系起来形成具有内聚力的企业簇群。尽管这种模式在日本最为明显,但在当代韩国也可以看到它的变体形式(Hamilton and Biggart 1988)。日本明治时代的现代化主义者试图通过创立强有力的企业团体,以使日本能够在世界上发挥作用(Allen 1972, Lockwood, W. 1968, Hirschmeier 1964, Morishima 1982:94)。这些私人企业团体——被称为财阀(zaibatsu)——在日本经济中成为关键性力量,每一企业团体在所有主要的工业领域都进行活动,它们通过家族控制和共同的贸易协约形成一个整体。而日本的各家银行,本身都是企业群体的内部成员,几乎专门为相关工业企业提供长期的金融支持。每一家财阀银行在企业群体内部筹集资本,并将这些资本引导到其他企业群体的资本中去。

这种通过纵向结构的簇群机制来迅速工业化的模式,在日本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美国占领之后,尽管美国官方机构试图破坏这种簇群机制,但是这种体制还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了起来。财阀家族被剥夺了持有的股票,但是以前的财阀企业还是彼此之间重新建立了联系,形成了更为横向的簇群模式。这些新的团体——采取紧密联系的企业群组形式,它们通过互惠持股、贸易联系、银行联系和连锁理事会等途径联系起来(Scott 1985:142~151,1986:第七章)。在每一企业群组内部,都存在一个分散的和非个人的企业“联盟”,这是企业“内部人”控制制度的基础。

我所谓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拉丁美洲模式在比利时最为明显,尽管在法国和意大利也有这样的特征。在一些方面看,它是我们上面所讨论的每种模式中的一些因素的混合,但它包含一种独特的资本动员结构,我称之为“企业网络”(corporate web)。在法国和比利时,工业的发展在整个19世纪都很缓慢(Fohlen 1970)。证券和股票交易非常弱小,难以支持资本的自动扩张,在德国所见的那种长期银行信贷在这里发挥不了什么重要作用(Milward and Saul 1977:118, Gille 1970:280~281, Palmade 1961)。在这两个国家,家庭控制的维系是

主要的目标,甚至比英国严重,家族只是因为小型投资支持才求助银行 ( Gerschenkron 1962:12 ~ 13 )。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扩张是靠寻求那种不危及家族控制连续性的伙伴来进行的。银行组成投资控股公司,或自己扮演投资者角色,在一系列公司中进行小型投资,这样也就分散了风险。反过来,实业家族也在投资公司中持有股份,以保证它们不会发挥太强大的或独立的作用。投资公司扩大自己的资本储量,但是它们本身不是自己的控制代理人。它们自己的资本是由相互联系的银行和家族的股票所有者所拥有,财力雄厚的家族在投资银行所投资的各种企业中也存在着利害关系。这种复杂的相互持股形成了企业网络。

在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投资控股公司是从相互联系的家族中动员资金的核心,而且它们之间的相互控股也形成了松散的企业群体 ( Allard et al. 1978 )。法国的企业间网络是围绕苏伊士和帕里巴斯 ( Suez and Paribas ) 形成有特征的网络结构 ( Swartz 1985, Scott 1985:131 ~ 142 )。在意大利,国家控股公司 IRI 和 ENI 发挥着类似的作用 ( Chiesi 1982,1985 )。在比利时,比利时社会通用公司的活动遍及各个领域 ( Cuyvers and Meeusen 1985, De Vroey 1973 )。

## 形成中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

上面我集中地描绘和论述了 4 种成熟的资本动员模式,它们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核心地区。在这里,我要简略地讨论一下世界经济核心之外的两种正在形成中的模式,它们在各自的体制转变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在俄国和东欧看到的后共产主义模式,以及在东亚和中国大陆看到的中国模式。

前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是以单一国家机构的国家计划为中心的 ( Rigby 1990 ),它使俄国工业沿着一种非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这种制度的解体为工业企业的控制者留下一个难题,即如何找到筹集和动

员资本的适宜方法。为做到这一点,他们吸收了共产主义和前共产主义时期的遗产,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后共产主义”体制。

共产主义制度崩溃后的政策是为了建立一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导致产生了一种新的资本动员机制,而不是效法任何一种既存的模式。计划和指令制度的瓦解,使得工业企业同以前管理调节它们的中央机构分离开来。“特权阶级”仍继续控制着他们曾经管理的许多企业,但是他们利用以前讨价还价和企业间实物交易的经验,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结构。在失去了曾无所不包的计划和指令框架的环境中,发展出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经济关系结构(Burawoy and Krotov 1992)。资本动员以一种“实物交换机制”为中心,其中对资本和投资机会的接近取决于特别的交易,而不是直接的商品交换。能否获得银行贷款、资料供给和产品销路,依赖于董事长和经理的讨价还价能力,而不是某项工程的商业可行性。这种实物交换机制被对“私有化”企业的一种新的所有和控制形式所强化。企业内现有的管理一般能够取得多数股权并控制少数股权,这种控制使得他们能够获得贷款、供应和销路,这是通过同其他企业和机构建立协作股权来实现的。

后共产主义的资本动员模式的发展前景是难以确定的。实物交换机制能否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确立一种稳定的体制,现在还难以判断。它可能被证明是对计划体制崩溃所引发的直接问题做出的一种脆弱的和暂时的反应。共产主义中国还仍然依循着一种共产主义政治制度来运行,但是也有迹象显示,在中国正出现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已经存在的那种“华人”商业模式非常接近。

这种“华人”模式可见于海外的华人经济中,诸如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等地。在这些地区,迅速的工业化是以那种长期存在的、通过政府强有力推动来支持的资本动员机制为基础的。在华人的经营家族中,财富在企业所有者的每个儿子之间分配,这种“兄弟”间财富分割模式为资本积累规定了明确的界限,因为大规模



的经营必须组织成为各自独立的企业相互交迭的群体,它们通过纯粹的个人血缘关系纽带联结在一起。当企业的一个创立者死亡或退休的时候,继承制度导致的分散效应阻止了企业的继续扩展(Wrong 1985)。从中国大陆向海外华人社区转移的经历,也强化了这种模式。在大陆上有相同家族起源的那些企业被认为是特别值得信赖的经营伙伴,并依赖于合作经营(Wong 1991, Redding 1990)。血缘关系和其他个人的联系结合成一种兄弟同源的“信用”机制,这意味着能够建立起坚固的经营事业。然而从长期来看,这种合作经营是有限的,因为兄弟机制的分散效应阻止经营的发展。

但是,这种资本动员机制是战后时期迅速工业化的基础,而且海外华人社会可能正处于从个人所有向非个人所有转变的早期阶段。例如在中国台湾,在银行业和主要工业领域都建立了强大的政府管理部门。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大型私人企业有了很大发展,政府管理部分成为现成经济的主导因素(Numazaki 1986, 1991, 1992, Hamilton et al. 1987)。传统的华人经营理念被发展起来,并成为强大的经济力量。在中国香港,富裕的华人家族能够运用 20 世纪 60 年代后在城市的资产发展中得到的利润来扩大自己的企业,这主要是通过证券交易和购买原来殖民地的公司来实现的(G. Wong 1991)。通过这种兄弟同源机制,这些家族能够充分利用自己财产的收入,并削弱外来资本的力量。至于它们是否能够避免最终的分裂,现在还难以确定,尽管在企业关系网络中有发生变化的迹象。在 20 世纪 80 年代,香港最大企业之间的连锁董事会做法既很广泛又包容性强,但是它们也变得缺乏内聚力和非集中化(G. Wong 1991),这种变化使得香港的企业越来越接近台湾的私人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东南沿海地区设立“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并得到了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日本的资本的支持,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为工业发展的重要核心。海外华人家族回归大陆从事经济活动,重新引进了在东亚其他地区被证明是成功的

兄弟同源机制。中央控制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设立经济特区并在1992年扩展到其他地区的做法,是把越来越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结合起来的战略。

## 阶级位置和社会阶级

我在上面概括了处于变化中的财产所有和资本主义企业模式,是为了让人们注意到对19世纪以来有产阶级的命运进行考察的复杂性。尽管在所有主要的资本主义经济中,都发生了从与企业家资本相联系的个人所有这一古典形式的转移,但这里并不包括任何清晰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而且向更为非个人化所有形式的转变并不是遵循单一的模式。有产阶级的形成仍然受到一直存在的资本动员模式差异的很大影响。我们可以对这种差异的一些潜在意义做出大致的概括。

在依循英美模式的国家,情况相对来说是最为清楚的,至少有许多已有的研究可供参考。英国和美国机构资本的兴起是与不同的资本家阶级状况和命令模式(command situation,这里所用的这一概念是指经济领域中的权威情况,进一步的讨论请参见Scott 1996)相联系的。企业家阶级职位的产生在大企业中仍然继续,但这些越来越包括进多数或少数控制机制并适应于机构资本。经理主管阶级和命令状况在其他大企业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尤其在金融机构情况更是如此。20世纪发生的企业股票的分散导致许多靠股息生活的阶级职位的产生,其生活机会依赖于在广泛的有价证券系列中进行的证券投资。在这些依靠股息生活的职位中,经理主管职位以及更小范围的企业家职位,经济利益越来越是整个系统范围内的事情,而不是局限于特定的企业,占据这些职位的人的生活机会取决于金融机构的运作情况。

这些阶级和命令职位的占有者在人口统计意义上形成一个单一、内聚的社会阶级。资本家社会阶级的形成不再像19世纪那样是一个

直接和明显的过程。机构资本的兴起造成了资本再生产机制和阶级再生产机制之间的部分分离。主要的社会阶级是通过职业征聘与流动、共同学习与大学教育、相互间通婚以及其他各种非正式的相互作用模式等联系环节而形成的。这在英国被人们描述为形成了一个“老男孩网”(old boy network, 关于英国的情况, 参见 Scott 1991 and 1993; 关于美国的情况, 参见 Domhoff 1983, Mintz 1989, Baltzell 1958, 1964; 关于加拿大的情况, 参见 Brym 1985, 1989)。

在具有拉美模式特征的国家, 企业网络允许家族资本和一定程度的家族控制和家族影响——在比英美模式情况更广泛的范围内存在。企业家阶级职位仍然是大企业的中心特征, 尽管在较大的投资控股公司和非家族企业中经理主管职位变得越来越重要 (Martinelli and Chiesi 1989)。这里同样也存在着资本再生产与阶级再生产机制的部分分离。正如布迪厄的著作 (Bourdieu 1973) 和布迪厄与帕瑟伦 (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0) 的著作强调的那样。这些作者在对法国主导社会阶级形成过程中与经济资本伴随的文化资产的作用进行了考察 (参见 Marceau 1977, 1989)。“资助人”(Patronat) 这一社会阶级, 具有雄厚的企业和家族背景, 看来更愿意认可自己的阶级特征, 甚至更愿意接受“资产阶级”的名称。

人们对德国和日本模式中有产阶级的形成研究得相对不多, 一个重要的研究项目正在进行。德国大企业家后继者的继续存在, 是在由银行和大的工业企业中占据经理主管职位的人所主导的框架中发生的 (Spohn and Bodemann 1989)。在日本, kigyoshudan 以及那些占据其经理职位的人进行着控制, 这大大减少了大规模企业家资本的机会。尽管在小规模企业里小资产者的职位很重要, 但是在日本经济中大规模的企业资本相对说来是较小的特征。在德国和日本, 能够广泛投资的靠股息生活的资本家并不为人较多了解。以前的财阀家族不得不将他们的直接持股转化为其他金融证券, 他们的命运还不为研究者所知晓。同样, 社会阶级的形成机制也不明晰, 尽管四所大学在经理资

产阶级的职业安排和阶级凝聚方面所起的作用很明显。至于通过社会流动和其他形式的人口流动而同处于其他阶级位置上的人之间的交迭情况,人们就根本不了解了(参见 Morioka 1989)。

至于正在形成的资本主义发展体制中的有产社会阶级,是人们研究最少的。海外华人社会目前正处于向相对的非个人所有形式的转变过程中,而且这种转变是否能够持续下去,还不能确定。结果,企业资本家职位占绝对的支配优势,社会阶级的再生产仍然很直接地同资本再生产机制联系在一起。中国大陆的情况特别不确定,因为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驱动伴随着对大量国外资本的非法侵扰,这造成了企业家和其他资本家阶级在一种“买办”结构中同外部利益联系在一起。买办阶级职位兴起也是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明显现象,尽管它们的发展路径还远不确定。前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中统治精英的消失,伴随着一种破碎的阶级和命令结构,现在有一些关于新“企业家”、“特权阶级”和以前的黑市“黑手党”团体的讨论,它们被视为是新生的俄罗斯经济中的主要资产阶级,尽管论据还十分有限(Krysh-tanovskaya 1993)。然而十分确定的情况是,社会阶级形成的过程非常脆弱,没有一个单独的主导社会阶级业已形成了。最好地讲,可能围绕各种不同的阶级位置存在着较小的社会阶级,但是很难说评论家们是否准确地辨析出了阶级分化的轮廓。如果没有更为详细地研究,这是很难做到的。

这些关于阶级位置和社会阶级形成轮廓的描述最好地讲也是启示性的,并不是一种非常明确的结论。我的目的是为了指出一些需要更深度研究的领域。那种关于“经理革命”的似乎明确的结论一定要放弃,研究者必须对有产阶级形成的模式进行直接地考察。关于资本所有制和企业组织结构的研究并不支持“阶级死亡”的观点,而是证明了基本的阶级划分还继续存在。一种更广泛系统的研究期待着那些关注现代社会中的权力与统治的社会学家们。

## 阶级结构比较研究<sup>①</sup>

约翰·迈尔斯(John Myles)

艾德南·图尔根(Adnan Turegun)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从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阶级分析与比较方法的理论和方法中发展起来的经验遗产。关于理论和方法的讨论是富有成果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引导经验研究的新问题。20 世纪 70 年代塑造这一议程的辩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催生出从深度历史案例分析到跨国比较调查的大量研究项目。在此我们所关注的，几乎包括了所有关于发达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阶级结构变量的研究。在文章的主体部分，我们主要论述从这样的努力中获得什么，我们的目标主要是描述性的。在结论部分，我们转而关注（当前）传统阶级分析方法之局限。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包括工资、雇佣协议和社会计划等的福特主

---

<sup>①</sup>本文节选自发表于 1994 年《社会学年度评论》(第 103~124 页)的《阶级结构比较研究》一文。在本章的原稿中，作者以资本所有权及其发展模式的大量比较研究为开端而展开讨论，其中涉及的资料和得出的关于所有权与控制权之矛盾的结论，与斯科特在前面的章节中所运用的材料和结论类似。由于本书篇幅所限，迈尔斯和图尔根文章中的相关部分在此省略。

义世界开始分崩离析,而愈益明显的是,这时阶级分析和传统的分层研究并不能解释甚或探究这一转变进程。上述两种传统“定位方法”(Parkin 1971)的失效,表明了当前对理论和方法进行重建的必要性。此外,这一比较研究还表明,20世纪初期及中叶所谓的普遍性研究成果,实际上是建立在并局限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轨迹上。

## 小资产阶级的回归

直至最近,普遍主义最可靠的基础,一直是在此种发展轨迹中小资产阶级的命运。对于如马克思和韦伯等人的古典社会学而言,小资产阶级的经历是可以预见的。在工业经济条件下,拥有并控制个人生产资料的独立生产者将会打一场败仗。小资产阶级经济基础的逐渐侵蚀,被认为是财产关系两极化发展的结果,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小资产阶级是一种过去的而不是未来的现象。米尔斯是一位尝试将马克思和韦伯联系起来的社会学家,他恰当地总结了古典社会学的观点(Mills 1951:14, 28),认为财产的集中化终结了“财产和工作的联系”,敲响了“阻碍进步发展车轮”的旧中间阶级的丧钟。

尤其在二战之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主要成就,是将越来越多的乡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变成了工人阶级和新中间阶级。这样,虽然各国情况不同,但在战后的大多时期里,劳动力中的小资产阶级部分衰落了。依韦伯主义者(Bechhofer and Elliott 1968, 1976, 1978, 1985)和马克思主义者(Burris 1980)看来,这一发展标志着小资产阶级被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主要阶级关系轴心中排除出去。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战后迅速发展时期的结束,各派社会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传统观点,并对长期以来关于小资产阶级的历史发展轨迹和社会地位等概念提出质疑,包括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中的边缘化、技术退步、经济无效率及其持续的衰落(Curran and

Burrows 1986, Scase and Goffee 1982)。“革新”观点的中心议题,是发达垄断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小商品生产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功能。这样就设定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的研究议题。

那些将当代经济划分为“传统”和“现代”部门的人,关注两者之间的联系和整合机制。在对仅存的拥有大规模小资产阶级人口的欧洲经济国家——意大利和法国的研究中,伯格试图说明小规模传统部门在大规模现代部门中的适应能力(Berger 1980, 1981),如小企业部门从事大企业并不经营的高需求商品的生产,通过降低失业缓冲困难时期对于现代部门的经济影响,以及通过转包方式赋予僵化的(现代)经济以灵活性。政治因素也发挥了作用。出于短期选举和长期性联盟的考虑,法国的戴高乐主义政党和意大利的天民党在历史上一直是小生产者阶级的保护者(也可参见 Weiss 1984 关于意大利的部分)。

显然,把小资产阶级视为较大社会力量容易使用的一种消极资源的观点,并不是与传统观点的根本决裂。但是现在,人们也更加强调小生产的自发动力。例如在法国,以 20 世纪 50 年代技工和店主的布热德运动(Poujadist Movement)为开端,小资产阶级成功地迫使政府做出财政让步。由于在消费者中享有的历史盛誉,手工面包师能够在市场上击败“工业面包”(Bertaux and Bertaux-Wiame 1981)。小资产阶级反对政府政策动员的另一个成功典范,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瑞典除外)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迅速发展。受小资产阶级经济基础遭受侵蚀的感情所驱策,这些党派试图对主流政党政策产生影响(Hoff 1982)。

无论是在社会生活中还是在学术界,20 世纪 80 年代被证明是小资产阶级(不幸)命运的转折点。坚决反对劳工而支持商业议程的新保守主义政府掌权,将小商业部门作为其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或更明确的说是其意识形态)的“实验”标本。在这一政治背景下,新一代的小资产阶级研究开始出现了。这股新研究潮流的中心议题,是阻止

自我经营性劳动的衰落,或用更具争议性的说法,是小资产阶级的复兴。这里暗含的意思,等于完全承认资本集中(如果不是积聚的话)的终结。

在过去 20 年间,“旧”中间阶级以及一般小资本的衰落,在许多资本主义经济大国中已发生了逆转。有两种发展趋向可以说明这一事实。首先是自我经营性劳动在不同国家如加拿大、美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芬兰和爱尔兰的兴起(Steinmetz and Wright 1989, OECD 1992)。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时,自我经营性劳动的真正巨大的增长仍然局限于英美民主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英国,所有这些发展都是以野心勃勃地致力于支持小企业增长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重构计划为开端。但是自从 80 年代中期以来,甚至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瑞典也见证了自我雇佣劳动的迅速增加,其自己经营的非农业劳动力从 1985 年的 4.4% 增加到 1990 年的 7%,其中男性自己经营的劳动者从 6.1% 增加到 10.2%(OECD 1992)。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公共部门雇佣劳动的迅速增长还一直是瑞典完全雇佣政策的基石(Esping-Anderson 1990)。在那之后,开始更加强调地方雇佣计划和小商业部门的发展,这一策略开启了瑞典小规模资本的发展空间(Johansson 1989)。

能够说明小资本命运转变的第二种趋向,是小企业雇佣劳动的增长以及中等规模企业的衰落。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时,经合组织曾指出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和日本规模企业的衰落(OECD 1985);而当仅考虑生产性企业时,还应该包括丹麦、卢森堡和英国。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有人还曾指出加拿大(Wannell 1991)和美国(Granovetter 1984, Davis and Haltiwanger 1989, Brynjolfsson et al. 1989)企业规模的急剧缩小。

这些发展表明,长期以来资本集中化趋向发生了逆转,小资产阶级和小资本得到了重生。毫不奇怪,对于这些发展的反映是非常谨慎的。例如在英国,许多被官方划归为自我经营劳动的人员并不满足通



常的自雇标准,如工场自治或生产方式所有权等。事实上,他们是合同工( Dale 1986)。在美国,官方所认为的自我经营人员中(尤其是服务业中),有很大一部分在收入、社会安全、技能和自主性方面过着低于无产阶级的生活( Linder and Houghton 1990)。由于官方分类方法不能在自主经营人员和雇员之间做出明确区分,企业从而可以将雇员登记为自我经营人员以逃避税收和社会支付。但是根据斯坦迈茨和怀特( Steinmetz and Wright 1989)的观察,作为小资产阶级真正发展最可能出现领域的自治商业企业中自我经营人员的增长,远比在有少量自我经营人员的非自治商业企业中发展迅速。

在考察这一逆转的发生起因及其全国变量方面,并未取得任何进步。传统上,自雇人员的增长是作为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等短期性危机的反映结果而出现的。全国性研究表明,这种情况会在建筑业等某些工业部门发生,但综合来看,失业增加对于自雇的反危机影响在一直下降( Sharpe, 1983, Steinmetz and Wright 1989)。雷恩尼对于这种积聚和集中过程的“相对退却”提出了一种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Rainnie 1985)。该观点认为,当20世纪70年代末期大企业发现自己处于危机之中时,它们开始尝试通过将某些业务部门分割成更小的工作单位,以及将其他业务“承包给”小公司等方式,以逃避高工资、工会斗争以及高额革新代价的风险。然而,这一观点也指出,这种缩小规模和发展的企业策略(如公司赋权、特许和转包),仅仅是小企业复兴的部分原因( Schutt and Whittington 1987)。

根据目前关于后福特主义的丰富文献(如 Piore and Sabel 1984),小资本的复兴与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方式的终结相联系。有人认为,新兴的以及不断获得成功的科学技术,将技术工人与通用的机器结合起来,为专业化市场生产小批量产品( Brusco 1982, Brusco and Sabel 1981)。领域经济而不是规模经济成为当今主要的生产方式(参见 Murray 1983, 1987)。向服务业尤其是消费者服务和商业服务的转换,是一个促进因素。但全国性研究再一次显示,这也只能是发

生自我经营转向的部分原因(Steinmetz and Wtight 1989)。布莱恩詹森等(Brynjolfsson 1989)指出,对于信息技术投资的增加,导致了垂直统一管理的减少,以及更多地依赖市场交易来获得投入和分配产出。总之,由新技术造成的交易费用的减少,带来了从“等级”向“市场”的转换。

如果这一发展的原因模糊不清,那么它对于工人的影响就更为显而易见了。那些服务于小企业的雇员往往获得更低的工资和福利,更不可能组织起来,并且往往拥有更高的周转率,这些问题我们将在结论部分进行探讨。

## 寻找新中间阶级

在现代社会学界,很少有能像“新中间阶级”那样引发激烈的争论。“新中间阶级”包括哪些人?如何划定其界限?其未来发展如何?在战后社会学界,通常运用传统的、相对简单的职业分类法,来对白领和蓝领工人划界。“工人阶级”由工厂工人、卡车司机以及其他从事“体力”工作的蓝领工薪者组成。

经理、学校教师甚至职员和秘书等,这些赚取薪金而不是工资、在办公室和商店而不是车间工作的“非体力”雇员,构成了新的扩大的中间阶级。对米尔斯来说,“白领”为他对战后美国中间阶级生活的重要研究提供了一个极为恰当的名称。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中间阶级的概念界限被弱化了。大多数传统的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者,都不再将职员、秘书、零售业者以及服务业工人(大部分为妇女)纳入“中间阶级”的行列(参见Gagliani 1981)。就其具有代表性的收入、工作条件及其在当代企业“统治关系”中的地位而言,他们更应该被视为新的后工业无产阶级的底层。在谱系的另一端,那些执行投资和分配等(用钱德勒的话来说是战略决策)传统企业家职能的企业经理主管们,现在大都被认为是那些行

使“真正经济所有权”人士中的一员,换言之,他们是统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到 20 世纪 70 年代,在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两个主要阶级分层的认识方面,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的阶级理论家都达成了一致:一方面是日益扩大的参与现代公司日常管理的中层管理人员,另一方面几乎已经成为了后工业主义同义语的职业和技术“知识工人”。关于如何看待后者的问题,引发了大量争论。依艾伦里奇夫妇(Ehrenreich 1979)看来,这些雇员是“职业经理人阶层”的一部分;在戈德索普(Goldthorpe 1982)那里,他们是服务业阶层的成员;而在普兰查斯(Poulantzas 1975)看来,他们是“新小资产阶级”的一员。在怀特最初的阶级规划中(Wright 1978),处于传统经理阶层之外的新“知识工人”被赋予一种“矛盾的阶级定位”——半自治工人,而在其后来的阶级规划版本中(Wright 1985),“专家阶级”身份被认为是阶级剥削的新的基础。

如果抛却理论偏好,我们应该认真地对待上述两组数量庞大的人群: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行政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相关职业人群等“新中间阶级”占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的 1/4 到 1/3。尽管许多案例研究指出了某些特殊行业中的“非技能化”过程,低收入的“廉价工作”在服务业中的蔓延等,但在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新中间阶级”同其他经济阶级相比,还是不成比例地继续增长。

在那些被列入是对新中间阶级增长规模之国别差异进行比较研究的“第一代”中,布里斯(Burris 1980)、利文斯通(Livingstone 1983)、卡波尼(Carboni 1984)和奥恩斯坦(Ornstein 1983)按照国际劳工组织定期发布的调整职业分配方法,提出“新中间阶级”的定义。这些研究论述了如下事实,即美国、英国等“占据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绝对优势”的国家(Burris 1980:167),其新中间阶级的发展最为显著。恰如旧中间阶级的衰落是与从封建农业经济向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过渡相联系一样,新中间阶级的兴起也可以被认为是“垄断资本

主义发达阶段特有的发展倾向的产物”（Burris 1980:164）。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经理阶层的庞大规模。卡波尼的估算（Carboni 1984:136）显示，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和英国分别有10.5%和9.4%的劳动力从事管理职业，而其他多数国家只有3%到5%。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的瑞典，也因为其具有相对规模的新中间阶级而为人瞩目——按照布里斯的估计，其新中间阶级数量的确是最大的，但这要完全归功于大量的职业和技术雇员。布里斯认为（Burris 1980:172），这是“社会民主党统治四十年”的结果，它创造了一个受卫生、教育和其他国家福利服务所约束的劳动力市场。

上述学者对自己所观测的模式提出了大量的可行性解释，但仍然缺乏任何数据以对此做出判断。布里斯通过引用海默的名著（Hymer 1972）指出，美国劳动力中高比例的经理人数，反映了在这个由美国人所操纵的大都市的跨国经济中心里，行政、计划和研究功能的集中（参见Johnson 1982）。依利文斯通看来（Livingstone 1983:62），同美国相比，加拿大拥有更少的经理人，这反映了加拿大作为“次要帝国主义组织”和纯外资输入国的地位。在布里斯和卡波尼看来，英国拥有相对大量的经理人阶层，是其帝国主义历史及其作为日益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的结果。

与此相反，鲍尔斯等人（Bowles et al. 1983）认为，美国高额的行政管理费用，主要是由它的劳动力控制模式造成的，这种模式注重对工人强化监督和调控。他们认为，战后美国经济中行政因素的加速增长，反映了对工人监管的日益强化，这是工厂主对于日益增长的反抗情绪的反应。

艾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on 1990）用一种显然是“后工业主义”的方法对上述观点加了一个注解。由于美国公共福利的发展并不完善，其企业的福利制度必定是补偿性的。这就要求更多的经理去管理那些构筑了美国私人“福利国家”的庞大而复杂的额外福利计划。同时，由于美国缺乏完善的劳动力交换体系和工作培训制度，因此

美国企业需要许多人事部门以招收并培训劳动人员。

想要利用职业的数据来对上述观点加以评判，看来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职业代码并不能告知人们从事的实际工作的内容。例如，要理解美国工人之所以被“过度管理”的原因，至少需要知晓的是，当所谓的经理人进行管理时，他们实际上在做些什么。他们是在参与高层政策决策 (Burris)，或调控工人 (Bowles et al.)，抑或在管理企业福利和培训计划呢 (Esping-Anderson)？

上述的许多难题，被“第二代”比较研究的发起者、威斯康辛大学的 E.O.怀特所解决。他不是依靠对各种职业头衔的臆测，而是通过运用一套复杂的直接行为标准来决定人们的工作内容。<sup>①</sup>除了通常自我汇报的职业头衔外，比较阶级结构调研 (CCSS) 的受访者还被要求详细地回答其参与组织决策的情况、他们对于其他雇员行使权威的形式，以及他们在组织化等级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 (参见 Wright, Costello, Hachen and Sprague 1982)。

这组跨国调研的首批研究项目之一，说明了这种直接测量人们工作内容的优点。在对瑞典和美国的比较研究中，阿那和怀特 (Ahrne and Wright 1983) 指出，美国的劳动力的确是被“过分管理”的，这不是因为美国拥有更多管理这一跨国帝国的高级行政人员，而是因为雇主雇佣了更多人来监督和调控其他工人的行为。在随后进行的一项包括了加拿大的研究中，布莱克和迈尔斯 (Black and Myles 1986) 指出，这种美国模式或曰“美国道路”，也是加拿大的那些传统上受美国资本和团体控制和组织的生产性和资源性经济部门的特点。而在金融、社会和其他服务业领域，加拿大工厂的阶级组织形式类似于瑞典。

这些研究也表明，在“中间阶级”的另一端 (用怀特的话说是“半

---

<sup>①</sup>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们得到了一份旨在明确分析国家间阶级结构差异的 3 个国家的数据文献 (包括美国、瑞典和芬兰)，此后是一份关于 5 个国家的文献 (加上了加拿大和挪威)，在 80 年代末得到关于 10 个国家的文献 (再加上英国、前西德、澳大利亚、丹麦和日本)。这些数据广为流传，并被详细描述。关于这一情况的介绍可参见 Wright 1995，由其引发的争论参见 Wright 1989。

自治雇员”），瑞典的人数是美国的两倍。这不仅仅因为甚至不是主要因为瑞典的大型公共部门及发达的福利国家。更恰当地说，瑞典所有经济部门的雇主雇佣了更多的“知识工人”<sup>①</sup>，这种雇员相对来说较少对其他雇员行使权威。就国际标准而言，美国确实拥有一个庞大的“中间阶级”队伍，但原因在于其独具特色的“工业关系”体系，而不是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或其不发达的福利国家制度。的确，与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职业数据材料相反，克莱门特和迈尔斯（Clement and Myles 1994）指出，如果将经理人的定义限定为只包括高级行政职位，那么各个国家几乎不存在太多的差异。霍特曼和斯特泽（Holtmann and Strasser 1990）也指出，即使运用怀特的更为广泛的经理人定义，国家间的差异空间也相当有限，经理人占受雇劳动力的 12.2% 到 14.8%。

尽管比较阶级结构调查在评估质量上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它在解释差异方面的局限很快就显现出来。由于这些调查采取的是截面设计方式，因此其解释仅限于这样的差异，它们只能通过工业联合体或国家就业水平的成分差异来说明。但这种方法很快就没有了用武之地，因为具体的国家模式逐渐凌驾于单纯的成分影响之上。因此同第一代的研究一样，第二代的研究开始转向可行的、但却没有直接论据证明的专门的历史解释。例如，澳大利亚拥有与美国同样多的管理型雇员，甚至拥有更多的经理人（决策者），这被认为是历史上对经济问题采取“官僚主义”解决方法的结果（Boreman et al. 1989）。尽管 20 世纪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存在着根本性差异，但（如国际

---

①那些熟知对怀特的阶级分类进行的争论的人，应清醒地看到怀特的“半自治”工人范畴所存在的争议性质。这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争论不下：其一，这一范畴作为独立的（矛盾的）阶级定位的理论地位；其二，用于确定这样工作的程序的测量性质。作为对加拿大版调研的额外补充结果，克莱门特和迈尔斯（Clement and Myles 1994：附录 2）指出，后一问题所作的关注是站不住脚的。在怀特最初进行的调研中，用于确定半自治雇员的程序对于确定“知识工人”——那类以高度自我定向和高度认知需求的工作为特色的工人——是有效而严格的。

劳工组织的数据所表明的那样) 两国在阶级结构方面却非常类似 (Holtmann and Strasser 1990:19)。

## 后工业主义、妇女和工人阶级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阶级争论的一个奇怪现象,是在理论上更多地关注阶级界限的划定(谁是中间阶级,谁不是中间阶级),而不是对于边界划定的结果做出解释。这样就出现了几个问题。其一,一旦收集起数据,没有理论可以指导阶级结构的经验研究;其二,一旦非工人(尤其是“新中间”)阶级的地位得以确认,人们就更少关注那些在很大程度上作为残余的工人阶级在构成上的国家差异和变动。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所有这些情况都开始发生改变。在“后福特主义”和“后工业主义”的题目下,人们开始大量关注那些相关的阶级结构的动态发展,特别是这种发展对于工人阶级作用的议题。在这种环境下,作为阶级议题的性别问题不能再被忽视了。

受雇于商品生产(采矿、制造、建筑)和流通(铁路、货车运输、海运)领域的男性蓝领工人,是从工业资本主义历史中脱胎出来的传统上固定的工人形象。他们一般是受雇于资本主义公司而不是国家,是劳工运动得以形成的基本要素。产业(男性)工人阶级的相对减少,以及当前的绝对减少,是劳动力之部门分配和资本雇佣劳动之社会构成发生变化的结果。首要的变化是雇佣劳动从生产性行业向服务业的转移;其次是妇女大量涌入有酬劳动队伍的结果。

艾斯平·安德森运用鲍莫尔提供的资料(Baumol 1967),指出了“后工业主义”经济中工人阶级潜在的三种命运。当制造业由于高生产率而削减工人时,服务业创造新工作岗位的能力却由于生产率的低增长而受到限制。这样,第一种可能性就是失业的增加、劳动力参与程度的降低以及受福利国家庇护的“外部人”阶级的增长。第二种可能性是主要通过提供卫生、教育和社会服务等福利性工作形式,由政府

支持就业。第三种可能性是,受到与部门间生产率工资差异相应的低工资影响,服务业雇佣劳动将在私有领域得以扩展。

占服务业领域绝大多数的妇女,将承担这些其他预设的大部分后果。首先,她们将受到低劳动参与率的冲击;在政府主导的工资补贴模式中,她们将会拥有高参与率,但主要从事的是社会服务性工作;而在那些将低工资作为服务业增长主要源泉的国家,她们将集中在低薪酬的私人服务部门。

福利国家和工会在决定可能出现哪种后果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在服务业集中的福利国家,如瑞典,可能采取高雇佣率的政府补贴模式;在如德国那样人口迁移集中的国家,可能会衍生出低就业率、“外部人阶级”的发展模式;而在如加拿大和美国那样存在着弱工会、福利欠发展的国家,可能会出现低工资、高就业率的模式。

通过重新建构全国人口普查的调查数据,艾斯平·安德森(Asp-  
ing-Anderson 1993)指出,他的理论预期与6国工人阶级的职业和工业构成情况几乎是一致的。德国,作为人口迁移集中的国家,其服务业的增长远比其他国家慢;无论在商品还是服务领域,其非熟练工人的数量相对而言较少;它的女性参与率很低,并拥有一支庞大的“外部人阶级”队伍。在瑞典和挪威,由于福利国家中存在着大量的非熟练女性劳动力和行业间的性别隔离,它们拥有较高的服务领域就业率。北美“富有弹性的”(如低工资)劳动力市场,也拥有很高的服务领域就业率,以及高度发达的低工资消费者服务部门。艾斯平·安德森总结认为,英国在德国和北美模式间犹疑不决:它在缓慢地迈向后工业化进程,但对于低技能、低工资的美国式消费者服务模式存有偏见。

但是,所有这些对于工人阶级的未来发展来说,意义仍不明晰。艾斯平·安德森书中所进行的具体国别研究表明,并没有证据显示除英国而外的其他国家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后工业”无产阶级。北美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非技术性服务领域就业,主要是为那些迅速从事更为传统的“工人阶级”职业——蓝领工作(男性)和职员工作(女性)

阶  
级

第三部分

研  
究



——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入门的工作机会。德国从非技术性服务工作中流动出来的比率很低，但这种工作机会相对来说也非常少。只有在英国，一个庞大而相对稳定的、非技术性的后工业无产阶级队伍正在形成。

## 阶级分析的未来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当马克思主义（Wright 1985）和韦伯主义（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的阶级分析家们正在建构适应阶级结构和阶级流动性比较研究的新的数据库时，真正的世界却一转而逝。尽管这些作者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和分类标准，但是针对阶级结构的新的发展趋向问题，所有人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制造业中的传统的无产阶级的工作正在减少，而且向服务业的转移不是以低档和速食业的工人为主流，而是以高档的经理人、自由职业者和技术性工种占主导。简而言之，所有这些研究都认为：“好”（即“中间阶级”）的工作正在兴起，而“坏”（无产阶级）的工作正在衰落（Block 1990, Boyd 1990, Esping-Anderson 1990, 1993, Goldthorpe 1987, Mayer and Carroll 1987, Myles 1988, Wright and Martin 1987）。事实上，按照所有传统社会学的看法，西方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趋向似乎是将我们引向一个后工业的极乐世界。就我们所知，在这个世界里，工人阶级如果不是消失，就是已经死亡了。如艾斯平·安德森（1993:225）总结的那样，“毫无疑问，传统阶级理论所阐述的那种两极化现象，在表面上已经丧失效用”。

但在狭小的社会学世界之外，事情看上去却完全不同。如列维（Levy 1988）指出的那样，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代际间和同代人之中向上的经济（不是职业的）流动性极大衰落了（加拿大的情况，参见 Myles, Picot and Wannell 1993）。作为代表战后繁荣和创造了戈德索普所说的著名的富裕工人（在北美，更为流行的说法是

“中间阶级”)之实际生活水平的迅速增长已经结束了。随着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等国收入两极化的日益发展 (Gottschalk and Joyce, 1991), 以及某些国家的福利措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缩减 (Fritzell 1992), 在 20 世纪 80 年代, 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衰落的中间阶级” (Kuttner 1983)。福利国家规模减小、工作转包以及临时工的广泛应用, 这些不仅对低工资的服务业人员而且对自由职业者和中层经理人也产生了影响。

通过对 20 世纪 80 年代卢森堡收入研究数据库的分析, 戈特沙尔克和乔伊斯 (Gottschalk and Joyce 1991) 指出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荷兰、瑞典以及英国、美国等国的薪资不平等和两极化增长的趋势。各国的发展显示, 低工资阶层中低于平均水平的收入有所增长或减少, 而在高工资阶层中高于平均水平的收入有所增加 (或低于平均水平的收入有所减少)。在根据同一数据库所进行的五国研究中, 弗里策尔 (Fritzell 1992) 指出, 日益增长的收入不平等 (家庭收入不平等发展的主要原因) 在瑞典、英国和美国由于税转体系 (福利措施的缩减) 而加剧, 但在加拿大和德国却在很大程度上被福利转移所抵消。英国的薪资变化最为显著, 其“中间阶级” (那些收入达到中间性收入的 50% 到 150% 的人) 从 62% 降至 43%。

对于那些习惯于“二战”末期至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稳定的收入不平等结构模式的经济学家来说, 上述现象令他们非常吃惊 (Danziger and Gottschalk 1993:3), 然而在确认这一变化的原因方面进步缓慢。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 如何粉碎那些流行的解释, 以及如何排除那些与数据不相一致的理论 (后工业化、人口迁移等) (参见 Danziger and Gottschalk 1993, Gottschalk and Joyce 1991)。瑞典是唯一被明确承认的“冒烟的枪”, 换言之, 1983 年后其集中化的协商工资制度瓦解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关于阶级的研究, 以及关于工资和其他工作特征的实际发展倾向的传统社会学研究, 所得出的结论是非常不同

的,这些提出了大量的理论和经验难题。与那些将收益和生活机会视为对个人和人力“资本”自然增加的经济理论不同,社会学家往往是把收益同地位联系起来(Parkin 1971:13)。不平等的阶级体系或结构是通过地位分配来界定的,这样,仅剩的议题就是确认个人获得这些地位的过程。依帕金看来(Parkin 1971:18),“阶级结构以及现代西方社会整个收益体系的核心,在于职业秩序”。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只在如何定义空地结构(the structure of empty places)中的“地位”方面,与上述这种“地位”解释存有差异。但是,正如列维(Levy 1988)明确指出的那样,职业流动并不是代际间或者人的一一生中经济变动的一个灵敏指示器。而“衰落的中间阶级”研究的最初教训之一,就是拙劣地将职业结构的变化(地位分配)作为薪资变化的指导(比较 Rosenthal 1985 和 McMahon and Tschetter 1986 的观点)。

以阶级为基础的地位模型不能确认经济变动和不平等结构的主要变化,这对于那些所谓的新韦伯主义阶级模型来说特别成问题。这种阶级模型把“生活机会”作为阶级定义的重要特征,并假定这样的“阶级”造成了不平等(例如 Goldthorpe 1987)。新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则坚持把由生产关系界定的阶级定义同那些包括生活水平(消费领域)的阶级定义区分开来。但是,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模型(Wright and Martin 1987)在总体上未能看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极化现象,并相反地同其他人一样,坚持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阶级结构的发展趋势是劳动力的非无产阶级化,这便造成了某些理论困惑。事实证明,布雷弗曼(Braverman 1974)的阶级两极化设想在消费层面是正确的,但在他所设想的生产关系层面是不正确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位共和党的前顾问菲利普斯(Phillips 1993)在这些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对美国“阶级结构”变化的历史意义做出了更具煽动性的阐释。

战后北美以及随后的欧洲,见证了受公共政策、企业政策和工会政策所保护的高工资工人阶级的出现,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为了

稳定工资和就业水平。对许多人而言,这一结果消除了传统上与工人阶级的生活经历相联系的“贫困周期”(Rowntree)。对工人来说,朗特里所说的贫困的生命周期可以用所谓的“福特主义生命周期”(Myles 1990)来代替。后者具体表现为,在商业周期和个人生活资源的沉浮中能够维持工作和收入的相对稳定。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于劳动弹性的研究,使得战后的雇佣关系逐渐清晰,而社会学家曾经认为可以通过解读职业等级和阶级图谱来界定的阶级和阶层定义,也随之而去了。在很大程度上说,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工资两极化以及劳动力市场风险的增加,并不是发生在阶级之间。这样,我们所熟悉的作为经验阶级分析之“核心”的定位方法——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韦伯主义的方法,在解释许多由阶级理论所引发的问题方面,已经丧失了某些分析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分析方法的死亡。相反,它需要新的分析工具,以捕捉20世纪末期资本主义的阶级特征。

## 阶级、下层阶级和劳动力市场<sup>①</sup>

莉迪亚·莫里斯(Lydia Morris)

近年来,英国经济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男性的就业水平急剧下降,劳动力的性别构成发生改变,人们的关注点从专职工作、男性劳动者、制造业和正式工作,转向兼职工作、女性劳动者、服务业和临时工作。我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是通过考察那些受到直接影响的群体的工作经历,来对这些变化的社会影响进行论述。使我感到疑惑的是,那种公然和直接地宣称结构不平等问题社会阶级概念,竟然看起来与这项工作没有什么关系。其部分原因在于,我主要关注广义界定的工人阶级的变化,<sup>②</sup>而且还因为这些变化本身破坏了传统的阶级分析方法(参见 Morris 1995)。

高水平的失业、非标准化雇佣模式以及已婚夫妇双双就业等,所有这些都对基于单方或主要方维持家庭生计的社会阶级分析方法中

---

<sup>①</sup>本章专为本书而作。该研究得到了 ESRC 的资金支持(资助号为 R000231381),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sup>②</sup>在此我主要对广义界定的工人阶级的分裂感兴趣,而这涵盖了 80% 的调查样本。这一分析采用了书记员—总经理式职业分类标准。

提出了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任何源于静止的职业结构模型的社会阶级研究方案,都将难以描述迅速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的性质和影响,因为它所代表的结构和相对的地位是不断变动的。我希望通过关注围绕下层阶级概念展开的具体争论,并依据某些相关的经验数据,来阐明部分问题。

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男性失业之所以急剧增加,是因为许多家庭中女性取而代之成为了养家糊口的顶梁柱。毕竟,在20世纪70和80年代的劳动力市场中,已婚女性有了实质性地增长。而事实上,就已有资料来看(参见Morris 1990, Irwin and Morris 1993),“角色转换”只是男性失业的部分原因。相反,我们正在见证一个“社会两极化”的过程。这一术语是由雷·帕尔(Ray Pahl 1984)提出的,它指的是就业集中于某些家庭而完全远离另一些家庭;拥有夫妇双方收入的家庭与没有收入的家庭之间的分裂。这一现象成为他如下观点的部分基础,即社会阶级不再是社会结构分析的有效工具。他认为,一个家庭中是否拥有就业人员,要远比家庭成员中任何一个人的特定职业地位更为重要(Pahl 1988)。对这种现象的更极端的反应,是采用“下层阶级”概念,来试图理解我们社会结构变化的实质,虽然关于这一概念的定义和解释仍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 相互冲突的下层阶级概念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英国出现了一股探讨“下层阶级”概念的热潮。这是由于害怕叛逆的青年一代引发社会动荡,以及受到某些关于福利国家认识的影响,即福利国家过于慷慨,创造了对高水平失业至少应承担部分责任的一种“依附性文化”。大量的争论都是政治性的,美国曾围绕这些思想展开了长期而广泛的争论。威尔森对迄今为止的争论进行了回顾总结,并提出了他自己的“下层阶级”定义(Wilson 1987):

这一群体包括那些缺乏训练和技能，经历过长期失业或不能成为劳动力的人，包括那些参与街头犯罪和其他形式越轨行为，并且其家庭长期遭受贫困或需依赖福利供给的人（第 8 页）。

因此，他做出了两种彼此关联的区分，即保守主义观点和自由主义观点的两极分化，以及相应的文化解释和结构解释的对立。

保守主义观点倡导一种文化解释，认为依赖福利是一种反文化或次文化现象的社会化（Murray 1984）。在这一方面，它与贫困论的文化解释是一致的（Lewis 1968）。而结构方法则将长期失业视为经济失败的结果，认为福利供应不仅未能产生依赖，而且还非常不充分。但是，也有人认为（Gans 1990），应该放弃使用已被玷污了的“下层阶级”一词。威尔森发展了这一观点，提出了“穷人聚居区”的概念，并呼吁“更加关注研究性的和理论的问题，而不要过分执着于概念或标签的争论”（第 5 页）。

但是，在英国还存在着另一种讨论维度，它与阶级分析面临的问题是直接相关的。对基于职业人群的分类模式而言，失业一直是个难题。有人试图运用下层阶级概念来解决诸如朗茨曼（Runciman 1990）的文章中提出的“当代英国社会存在多少阶级”的问题。

朗茨曼的目的无论如何都不是解释性的，这个问题我在后文中还会谈到。他是在更广泛的阶级分析背景中专门关注定义的问题。朗茨曼认为，在传统的 6 种阶级模式（一种上层阶级、3 种中间阶级和 2 种工人阶级）而外，还存在着第 7 种阶级模式，它可以用“下层阶级”的术语表示：

但这一术语必须这样理解，即它不是代表劳工市场中总体上处于劣势的一群或一类工人，而是依赖国家帮助、完全不能

参与劳动力市场的那些人。(第 388 页)

这一群体的成员被视为“典型的长期失业者”(第 388 页);尽管朗茨曼的潜在广泛性定义,提出了将那些完全处于劳动力市场之外的老年人、残疾人等人群如何归类的问题。看来这些人应该单独归类。

朗茨曼用以代表工人阶级划分的主要标准是“市场能力”,尽管对于熟练工人而言,这可能要与(工具的)“所有权”或(进入的)“控制权”结合起来(第 387 页)。在他看来,长期失业者是那些“不能参与市场”的人,由于在竞争中不能成功获得工作,他们被作为残余阶级看待。这样,朗茨曼定义的“下层阶级”与职业结构相关,但却是在建立在无能力或非参与的基础之上。其他一些人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例如史密斯的定义:

下层阶级是那些处于阶级分类模式之外的人,因为他们所从属的家庭单位同生产方式——合法的有酬就业——之间缺乏一种稳定的关系(Smith 1992:4)。

下层阶级定义的更广泛界定,强调把较为普遍的劳动力市场缺陷作为其存在的基础(Wilson 1991)。例如,吉登斯写到(Giddens 1973):

“下层阶级”由那些从事最低收入职业的人员、周期性失业或半就业人员所构成。这主要是作为一种“不合格”的市场能力的结果(第 465 页)。

在此,吉登斯对流行的、侧重于文化因素解释的美国文献进行了提炼,默里在新近关于英国的观察报告中也采用了这种观点(Murray 1990)。但是,默里强调家庭环境,尤其是单亲家庭对于一种依赖性次



文化形成的影响。与此不同的是,吉登斯的定义虽然在某些方面考虑到文化因素的作用,但却完全基于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这意味着他和朗茨曼同样关注“市场能力”,尽管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采用一种正式的阶级分类模式。

吉登斯的“下层阶级”定义被加尔烈所采用(Gallie 1988),他的理论兴趣也是集中于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并且与近年来围绕“弹性”失业进行的思考和争论密切相关。加尔烈关注的是在集体自我意识意义上阶级形成的潜力。他的结论是,受弹性工作模式影响的主要人群是女性,她们的差异性很大,不能构成某种特定的次文化的基础。而对于长期性失业的人来说,同社会的隔离和异质性,降低了通过政治行动或次文化标准来形成集体认同的可能性。换言之,下层阶级的结构性地位是存在的,但并存在一种文化支撑。对于其他阶级群体,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下层阶级概念的这些不同界定方法,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在延续多长的失业期内,可以说是同有酬工作之间存在“非稳定的关系”?这一条件同非稳定就业的关系如何?我们认为,只是通过对一种新的阶级定位的理论构建,而不去对劳动经历的非连续性和就业结构的变化进行经验研究,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事实上,上述争论所提出的一个普遍的但不太明确的问题是,阶级分析是如何对待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尤其是就业结构变化的。

### 哈特尔普尔的失业情况

为了进一步分析这些问题,我们采用哈特尔普尔对3组不同男性劳动者所作的随机抽样数据作为参考。其中,A组包括那些至少在最近12个月连续失业的人员;B组包括那些最近12个月连续在同一公司就业的人员;C组包括那些在最近12个月内的新就业人员,在受访期间,他们可能就业也可能失业。

设立最后一组人群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将那些经常面临非自愿性工作变动的男性劳动者包括进来。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组人群的话,那么经常性地进出就业——诸如形成“交错不定”的工作经历——就比开始当前的工作更为重要了(Harris 1987)。这种可能性的调查,是通过对全部组群的就业经历进行考察。这一调查涵盖了1970~1989年的时间,包括获取工作的途径和终结工作的原因。

在11年时间的工作经历中统计的工作段总数,是判断抽样组群间差异的原始指示器。仅仅通过数据就可以看出,在整个11年中,新就业人员(C组)比另两组人员都经历了更多的工作岗位。大约70%的新就业人员在11年中曾从事4个以上的工作,而B组(工作稳定)和C组(失业)人员中的比例分别只有不到1/4和1/10。C组中约有1/2的工人在这—时期从事过6项以上的工作,经常面临停止工作。

研究的第一步,是要考虑传统的社会阶级划分在多大程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些差异。例如,一种非常可能的情况是,三组抽样人群的不同经历仅仅是因为其“社会阶级”地位的差别造成的。由于本阶段所关注的是劳动力市场脆弱性的根源,所以长期性失业者的归类,主要是参照他们自述的“工作主线”。

在抽样人群的社会阶级构成中,出现了许多关注点。最明显的例子当然是为人们经常关注的长期性失业者中的大量非熟练工人:抽样中有15.3%的非熟练工人在11年中从未做过任何工作,而在Ⅲm和Ⅳ类的阶级中只有大约2%。在那些失业后再未获得新工作的人员中,非熟练工人达到了一半以上,而只有不到1/3的人重新得到了工作。但是长期性失业并未形成一个同质人群,因为他们中有32%是熟练的体力工人(和19%的半熟练工人)。尽管同其他组群中的长期失业者相比很少可能是在学徒期。根据工作主线,我们可以看到,长期性失业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完全地)反映了他们的社会阶级归类,以及他们对正式的技术资格条件的缺乏。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阶级对于理解长期性失业是极为重要的,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就认为失业本身应单独划

分出一个阶级。

B组(安定工作)和C组(不安定工作)间的差异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不能像上面那样把它们仅仅同可比较的社会阶级地位联系起来。这两个组群的人员主要是熟练的体力工人,但是不安定的组群更易丢掉工作,尽管是短期性失业。这种分散的模式看来是由于重复性冗员和临时性就业造成的。一旦失业,一个人就可能沦为公司中的冗员,这些公司依照“后者进先者出”的原则运作。这个人也可能成为临时就业的候补人,这样的临时性工作同稳定的工作相比,竞争激烈程度要低一些。

三组抽样组群的构成表明,社会阶级的差异既不能把握也不能解释稳定的工人与不稳定工人之间的差异,它甚至也不能说明体力与非体力工人的区分。虽然阶级分类的确揭示了长期性失业的一个重要方面——下层阶级概念可能会模糊这一方面——但它也容易把不同的就业经历和发展轨迹混合起来,而且它也很难适用于那些从未工作过的人群。

## 社会阶级分类的局限

这里总结一下上面的讨论。各类学者运用下层阶级的概念来指代长期性失业者,或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或依靠国家福利为生的人群。后一界定令人误解地把劳动力市场中的积极群体和不积极群体混合在一起。虽然关于男性工作经历的数据确实表明了,在那些长期性失业者和拥有断续工作经历的人群(二者显然不能归为一类)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但这种差异主要是社会阶级方面的:长期性失业者中的绝大多数(但不是全部)属于非熟练工人,而在不稳定工作群体中,多数为熟练工人。如果长期性失业是这一阶级人群的特征,那么将其归属于一个独立的阶级定位——下层阶级,看来是不合适的。把那些受影响的人同其工作时的状况分离开来,就掩盖了他

们易于失业的原因。

与这一认识相反的事实是,长期性失业人群在阶级条件上并不是同质的,依其“工作主线”进行的分类,也并不令人信服地适用于那些从未参加过工作的人群。对于那些面临不稳定工作的工人而言,社会阶级定位并不足以将他们与那些拥有更为稳定工作的人群区别开来。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这两类人群主要都隶属于Ⅲm阶级,另一部分原因是差异的继续存在(即使在其他阶级分类中也是如此)。不同群组的状况也是不同的,断续工作有随着年龄增长而递减的发展趋向。然而,尽管断续工作在年轻工人中更为突出,不同组群年龄段间的差异仍然显著。在那些30岁以上的工人中,B组和C组共有超过1/3的人曾经有过断续工作的经历。

关于不稳定工作与阶级归属之关系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是工作变化在何种程度上能被视为职业的发展,或曰“流动性”(这里依照在记录员-总经理的社会阶级群组间的流动模式来定义)。如果一个社会阶级代表着共同的生活机会,那么我们沿着一个具体的阶级指称来考察,就能发现某些类似的移动轨迹。总的来说,如果参考其起始工作即离开学校后得到的第一份工作,及其父辈的阶级地位,所抽取的样本在总体上是具有流动性的。

对于稳定组群和不稳定组群的流动前景,可以通过比较分析来评估。我们发现,对两组人群来说,从起点(第一份工作)开始的发展机会都算是好的,虽然不经常变动工作者的机会更好一些。<sup>①</sup>另一种相反的情况是,两组人群中有相当多的人具有状况恶化的经历。这样,断续工作的经历可能包括非常不同的工作轨迹(向上和向下的流动),其本身看来并不能形成一个特定的阶级。对“不稳定”和“稳定”工人的比较,使这一情形更加复杂化了,因为虽然根据当前工作的分类,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类似的,但这两组人群在就业经历和发展前景上却有

<sup>①</sup>这里需要谨慎地分析,因为那些向上流动的人群开始很可能从事的是非熟练工作,后来才变为熟练工作,而那些没有向上或向下流动的人群可能包括绝大多数的熟练工人。

着很大的差别。

不稳定人群的工作变动,并不一定是深思熟虑和有计划的,因为断续工作中的非自愿性工作变动占很大的比例。那些在 11 年工作经历中从事 4 份以上工作的人,有 29.2%的工人是非自愿离职的,而只有 8.2%的工人自愿离职。与之相比,那些从事过 3 份以下工作中的人,有 68%的工人是自愿离职。如果与相关的失业经历(不稳定人群中有 85%有过失业经历)联系起来考察,这一模式表明,无论是否经历过某种向上的流动,当前研究中所考察的断续就业人群,显然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但是,社会阶级的划分并不能轻而易举地涵盖这一地位。

## 阶级分析的含义

布劳恩(Brown 1982)曾经指出了阶级结构分析之截面方法的局限,他认为,为了对就业、不充分就业和长期性失业做出比较性考察,关于工作经历的数据是必要的。这样,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指出的那样,在任何特定时间点上,同样的职位可能代表着迥然不同的就业经历(参考 Stewart et al. 1980, Prandy 1990),失业同样也是如此。此外,我们的数据也说明了两个相关的问题:不仅社会阶级在一定时间内会随着经济变动而扩大和缩小,就业轨迹也随之发生变化。

哈特尔普尔的工作流动过去曾代表了可行的职业选择,但现在它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将那些失业时期也包括进来。这样,虽然我们能够通过考察一段时间的生活经历仅能充分掌握社会阶级分层的性质,但个人就业经历所处的结构是随着时间变化而改变的。这些变化所造成的脆弱性的状态与分布,向任何一种“快照”式的阶级结构提出了问题,因为这样的轨迹所处的结构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任何方案可能代表的相对地位决不会是固定不变的。

因此,那一被划分为“下层阶级”人群的出现,只是复杂而广泛的变化最明显的表现,这一概念本身并无多少助益。如果按照对国家

的依赖做出界定，那么这种分类就包括了太多的人群——退休者、失业者和单亲父母，而这些人群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如果将这一标签仅限于贴在失业者身上，就掩盖了他们（不成比例的）作为非熟练工人所具有的脆弱性的根源。

但是，阶级分析还存在深层和更具危害性的弊端，那些关于不稳定就业的数据很能说明这些问题。静态的社会阶级规划的设计，不是用来解释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的。这样，对于那些试图研究近期经济变化的性质和影响的人来说，这样的阶级划分毫无用处。研究劳动力市场的变化，需要一种研究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动态方法。这种方法一方面要关注就业的结构和重构，另一方面是研究一些工人能找到工作而另一些工人不能找到工作的过程，而这将把我们带回到关于下层阶级争论的某些方面上去。

## 社会结构的非正式方面

关于失业研究的“文化”方法（Murray 1990:17）关注个人的“态度”，如工作意愿的缺乏，而这经常被视为下层阶级的一个标志性特征。例如，默里（1990）把自己研究美国“下层阶级”（1984）的观点延伸到英国，他认为：

下层阶级形成的确定性证据，是多数年轻、健康和低收入  
的男性选择不参加工作（第 17 页）。

即使实际上拥有工作机会，数目不详但或许规模庞大的人  
群……仍试图获取社会福利（第 18 页）。

威尔森（Wilson 1987, 1991）在美国撰写的著作中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认为，经济下滑是造成长期性失业的主要原因，而这种情况由于失业者空间的和社会的集中而加剧了。

城内贫民区居民的主要困境就是没有工作，这由于贫困环境中日渐增加的社会孤立而加剧，例如，获取工作信息的网络系统迅速减少就反映了这种情况(Wilson 1991:9)。

非正式的联系网络，与其说是社会学家的研究范畴，不如说是人类学家的研究领域。它们在社会学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地方，一般是根据社会相互作用的某些具体的方面，而不是同社会结构的划分相联系。可以证明的是，社会网络使社会结构的维度更加清晰起来，而这种结构是不能通过对个人就业地位的“快照”式分析甚或更为宽泛的家庭角度就能得到的。但是，关于非正式联系模式同其他的社会划分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以及它们本身是否构成了结构性不平等的重要成分，这些仍有待于探讨。非正式联系和交流的社会网络是社会经济生活中尚待探索的方面，它们可能会成为理解社会结构动态变化的关键。为了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确定，本研究所调查的不同组群在何种程度上倾向于相互联系，或倾向于社会隔离。

### 社会隔离

长期以来，家庭内部失业的集中情况，被视为社会极化的一个症状。哈特尔普尔调查数据显示，抽样组群中家庭女性的就业率存在很大差异：其中A组（男性长期失业）中女性配偶的就业率为13.2%，而B组中为71.0%（男性安定工作）。在男性长期失业和男性拥有安定工作这两种极端的情况下，双薪家庭和无收入家庭的分裂要比全国的统计数据更为显著，这或许是因为全国统计数据没有把长期性失业与短期性失业分离开来的缘故（相关讨论参见 Irwin and Morris 1993）。

一段时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失业现象在小家庭中趋于集中（Payne 1987），但哈特尔普尔的调查数据显示，这种集中在大家庭中仍然存在。根据男性近亲中的就业水平和失业程度，男性长期失业者

(A组)看来表现出一种隔离的倾向,因为在受访期间内A组中有32.5%的男性的近亲处于失业中,稳定工作组群(B组)为15.8%,而不稳定工作组群(C组)为19.2%。当我们观察哈特尔普尔男性近亲居民的就业情况时,虽然不是这样的明显,但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当受访者被要求谈及其3个好友并说明他们的就业情况时,相似的情况重复出现了。

我们发现,失业在家庭和亲属中的集中,是与空间上的集中联系在一起。本研究中的3个抽样组群呈现出非常不同的居住模式。长期性失业者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地方政府提供居所,而绝大多数就业人口则拥有自己的住房。由于城镇住宅有规划安排,因此在特定区域内出现了失业人口高度集中的特殊空间模式。帕尔在早期对舍培岛进行研究(1984:309)所得出的一个结论是,邻近的家庭的技能和经历是非常相似的。但是哈特尔普尔的调查数据,却表明了一个独特的社会两极化空间维度。结果,任何非正式的社会交往模式一般都是不成比例地发生在处境相似的人群中,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在社会网络中发现失业人群的集中。

总之,长期性失业者倾向于集中生活在公共住宅区,这里的失业率一般较高,倾向于同那些同样是失业者的人群交往,其联系网络中多是失业的人,其密友也大都是失业者。尽管这些模式并没有完全排除就业的人口,但失业人群间确实存在着一种强烈的相互联系倾向。我们需要对这些集中的潜在意义做出解释,本文后面的部分将考虑非正式工作研究的重要性。

### 非正式求职

有关求职研究的数据表明,非正式网络通过信息和影响力的交流,对寻求就业发挥着核心的作用。从相关的工作经历数据来看,有超过一半的工作是通过非正式的途径得到的。在此,需要考察两种可能性:首先,非正式网络中的信息资源影响了求职倾向;其次,由于获取



工作的方式不同,其工作的稳定性也不同。

哈特尔普尔的调查数据显示了3种差不多同等重要的信息资源,即亲属、老友和熟人。如果考虑到格兰诺沃特关于弱联系之作用的假设(Granovetter 1973),那么所得出的结论会是非常有意思。他认为,在求职过程中,弱联系比强联系更为重要,因为所交往人员的范围远比相互联系的程度更为重要。这与哈特尔普尔的数据看来是相互矛盾的,因为上述数据显示,同与熟人的联系相比,与亲属及朋友的密切联系更为重要。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当工作的竞争程度高的时候——例如,在失业水平较高的地域,或许一种优先沟通的体系发挥作用。换言之,工作信息不是广泛、随意地传播的,而是更具有选择性。情况也可能是,哈特尔普尔作为一个相对联系紧密的地区,却呈现出影响更大的“强联系”。

然而,并不仅仅是求职者与信息提供者之间的关系令人感兴趣。求职者成功获得工作的情况,往往发生在那些信息提供者所任职的并存在职位空缺的单位。当我们问及是否信息提供者加以美言应征者就更易得到工作时,也呈现出类似的结果。这样,在求职过程中处于有利位置的,是这样的求职者:他们拥有一个广泛的朋友和亲属网络,这些朋友和亲属处于某一职位上,尤其当他们在单位中能够给求职者提供口头上的帮助时,后者就更容易得到工作。但是我们在上述数据中可以看出,长期性失业者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在求职数据中呈现出的另一明显情况,与不稳定的工作群体有关。虽然在哈特尔普尔劳工市场中人们普遍地依赖于招工信息,但这种信息对于不稳定工人的工作经历具有特殊的意义。对他们来说,招工信息是与临时工作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情况在其他组群中并不特别明显。这说明,断续工作模式不仅与年龄、技能等有关,更与受访者自己通过特殊的信息社会网所获得的工作类型有很大关系。换言之,围绕不稳定工作衍生的社会交往领域,确实强化和再生产出这一模式,正如由于社会联系网中失业者的集中化使他们的不利地位更趋恶

化的情况那样。

## 👉 结 论

就业结构在目前的诸多变化,对于建立在职业组群基础上的阶级划分提出了挑战。长期性失业就是这种变化的一种表现,但本文反对划定出一种新的阶级(如下层阶级)来定位这种状况。相反,本文把对变化的就业模式的关注,扩展到对稳定工人、不稳定工人和失业工人等不同的工作轨迹的考察。在这一过程中,阶级分析中的一些更为基本的问题被揭示出来,尤其是那些在不同时间段一直属于相同的“阶级”地位的工人的各种工作经历,以及作为这些不同发展轨迹之基础的职业结构本身的变化。

关于非正式联系网络的意义,已在上述有关求职和招工的段落中做出了说明。例如,那些在工厂中关系较少的长期性失业者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社会网络的作用、变化的就业结构以及两者间的相互关系表明,在变动不居的时代中,社会结构的动态方法较之狭隘地关注纯粹静态的阶级划分,更具有启示意义。这种方法只是考察动态劳动力市场的一个起点。

那种通过个人的职业等级甚或某些家庭的复合指标来研究社会不平等的传统方法,现在需要补充以对劳动力市场之动态变化的思考,以及对于社会结构所根植的非正式过程进行考察。这些过程既可能使不利地位恶化,也可能协调经济的变化。因此,这些过程对于当前关于英国社会中“下层阶级”之范围和性质的讨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试图辨识出这一阶级的边界,是同就业结构和经历的变化相冲突的,也同这些变化对阶级分析所提出的更为广泛的问题相矛盾。

## 发达工业社会的阶级和政治<sup>①</sup>

约翰·H.戈德索普(John H Goldthorpe)

关于社会阶级在现代国家政治中的意义，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100年前，它在“同马克思辩论”的过程中居于中心地位，当时许多伟大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奠基者参加了这个辩论。现在，阶级和政治的问题仍然引发着激烈而复杂的争论。然而，为了对这场争论的最近阶段做出全面的评价，有必要承认的是，二战后几十年来就该问题的讨论已达成了相对的共识。在这一时期，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立场的分析者在对阶级和政治关系的理解上，实际上是非常接近的。

这种一致性主要是在利普塞特和罗坎的著作的影响下形成的（参见 Lipset and Rokkan (eds), 1967），其要点如下：一方面，随着西方世界的工业化，社会分裂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源于“民族建设”和国家形成的分裂，如以宗教和地区为基础的分裂，在政治意义上已经趋于衰落，而基于阶级分裂的重要性则逐渐增强。在“成熟的”工业

---

<sup>①</sup>本文根据1994年2月在希腊政治学会所作的演讲改编而成，此前曾在《希腊政治学评论》(译文)上发表。我十分感激同杰弗里·埃文斯(Geoffrey Evans)和保罗·纽比塔(Paul Nieuwebeerta)进行的有益交流。

社会,政治组织和政治派别实际上主要是以阶级为基础的。另一方面也承认,虽然阶级冲突在自由民主政体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作用,但这种冲突并不必然——甚至也不具有代表性——导致以革命的形式推翻民主政体。确切地说,自由民主政体提供了一种制度环境,它限制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行动,但同时也允许其有效地表达。这样,利普塞特能够从一种美国自由主义的观点出发,指出西方国家选举政治中的公民参与,代表着“阶级斗争向着民主方向的转化”;而在20年后,科皮(Korpi, 1983)能够将他的论著命名为《民主的阶级斗争》,并站在瑞典社会民主党左翼的立场上来研究通过非革命道路向社会主义转化的可能性。

这种战后共识在目前趋于瓦解。虽然它还普遍盛行,但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坚定地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政体”是一种骗局,它迟早会被工人阶级革命所消灭。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另一截然不同的挑战却成为主流。他们宣称在20世纪末期,至少在较为发达的社会,阶级政治的重要性正在发生着根本的逆转。这种主张不仅认为阶级分裂与冲突已不再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即创造划时代变革的集体行动的根源,而且还进一步认为,即便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自由民主政体的选举政治层面上,阶级对于个人的态度和信仰的影响,也正在逐步减弱。

然而,尽管近年来这些观点经常被人们向前推进,但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就其具体内容而言,这些观点是各不相同的。虽然“阶级的衰落”日益成为各方面关注的主题,但对这种衰落的解释实际上却是众说纷纭。这里至少可以指出4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一些人认为,当前社会分裂的主线正在被重划。正如以前决定政治结盟模式的宗教和地区分裂后来让位于阶级分裂一样,阶级分裂现正在让位于新的分裂形式,它们是发达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的特征。例如有人认为,以部门划线的一些(具有显著政治意义的)重要分裂正在形成,这既包括生产领域也包括消费领域。实际的

或潜在的冲突,一方面表现在公共经济部门的就业人员与私有经济部门的就业人员之间,另一方面表现在如卫生、住房、教育和交通等方面,依靠公共提供的人群同依靠私人提供的人群之间(例如,Kitschelt 1994; 有关英国的情况参见 Dunleavy 1980, Dunleavy and Husbands 1985 and Saunders 1984, 1990a)。

第二,有人认为,在如今的较发达社会,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无论如何界定,对其政治观点塑造的重要性,要弱于对其总体信仰和价值体系形成的影响。以前人们可能认为,在阶级地位和意识形态立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现在,随着物质利益驱动的减弱,以及信仰和价值体系的自主化程度的提高,尤其是在青年一代人中,这种联系正在减弱。这样,政治中原有的“面包和黄油”的问题,正在被关注个人自由、妇女和少数民族权利、环境等“后物质主义”的“新议程”所取代。在这方面,最有影响的是英格尔哈特的著作( Inglehart 1977, 1984, 1990; Inglehart and Rabier, 1986。也可以比较 Eder 1993)。

第三,还有人认为,阶级对政治影响的下降,主要是因为政治行动本身变化的进程所造成的。发达社会的公民越来越在理性判断的基础上对具体的问题和政策做出政治选择,而不是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或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出发就可以做出预测的那种自动的反应。例如,他们认为,现在的选民是在更加真实的意义上选择他们所支持的政党,而不是几乎不假思索地去投票支持所谓“天然地”代表他们的阶级利益和政治信仰的政党。这样,从一次选举到另一次选举,政党的支持力量和社会构成的变化或“变动”都是很大的(特别参见 Rose and McAllister 1986; 也可以参见 Franklin 等人的文章,1992)。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一些观点着重强调阶级衰落这一现象本身。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阶级不再是生活机会、生活方式和集体认同的主要决定因素,因而它对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所有其他方面的影响也正在减弱。前进的工业主义或正在兴起的后工业主义,不仅创造出更

大的财富和更为平等的物质资源分配,也使经济和社会机会更为平等了。旧的等级制被打破了,社会选择越来越建立在个人业绩的基础上。原来在社区和工厂中的一致性已经瓦解,这促使人们去追寻个人的目标。这样,在政治上以阶级标准进行思考和行动的定式也日益被打破了。特别有意思的,是利普塞特较之先前(参见 Pahl,第六章和第八章)立场所发生的改变(本书第二章)。

当然,在这些不同观点中,具有一些相互补充的因素,但许多内容也是相互矛盾的。在各个方面,它们都相互抵牾。例如,现在就很难将那些认为新的结构分裂已经取代了阶级分裂的观点,同那些宣称任何“分裂政治”都已终结的观点调和起来。然而,本文的目的并不是对此做出进一步的解释(无论是批判的或其他形式的),而是对上面的每一种观点都试图论证的初始论点提出质疑,也就是,20世纪末在经济发达的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广泛而世俗的发展倾向,即认为政治的阶级基础被侵蚀了。本文提出这种质疑,并不是为了恢复上面所说的战后所形成的共识,因为这有可能被认为是夸大阶级因素在20世纪中期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本文也不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阶级和政治的关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本文将要论述的是,这些变化是如此的复杂,在不同国家中各有千秋,以至不能用非常概括性的或“发展的”术语所表述的任何一种简单命题来涵盖。

## 徒劳无益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许多主张阶级政治衰落的人,都是反反

阶  
级

第三部分

研  
究

的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发挥作用,并经常在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

现在,人们可能会对此都表示欣然赞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阶级政治决定论无疑遭到了颠覆,它们在实践中受颠覆的程度要甚于在社会研究中的情况。然而,这并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现在不是,也不曾是惟一的阶级理论。在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本文开始时提及的与马克思论战(当时的论战是有意义的)的几位伟大的学者,他们同样并没有抛弃阶级的概念及其对于政治分析的意义。只要想想韦伯、帕累托和熊彼特,就不难发现,现在许多(或许是多数)仍视阶级为发达社会政治中的关键因素的学者,他们本身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于阶级不平等是如何形成的,这些不平等是如何被社会主体经历的,以及这样的经历是如何影响政治的等等,有着不同的、更为复杂的理解。

显然,探讨阶级政治的衰落,仅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实践的失败是不够的。同时,仅仅局限于马克思的批判者提出的另一观点,也是无益的,甚至是不合逻辑的。这种观点认为,如果现在确实需要一种比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更为精确的阶级分析形式,那么这一现象本身就意味着阶级对政治的影响较之以前削弱了。例如,克拉克、利普塞特和雷姆培尔在回应霍特(本书第三章)时承认,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远远超出了诸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样的粗糙两分法(Clark, Lipset and Rempel 1993)。但他们也认为,如果抛弃了马克思的这些范畴,而支持那些差异性强、极化较弱的范畴,那么阶级结构本身就说明,阶级成员越来越“缺乏政治特性”了(可以参考第一章 Holton 的观点)。

然而,更令人信服的观点是与这一立场几乎相反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们了解可同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相适应的阶级状况时,才能充分理解当前在阶级和政治之间占主导地位的那种关系。可以进一步说,主要是因为上述评论者对阶级分析的评价,除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外,还存在很大的难题,所以他们不能看到阶级政治在多大程度上

仍然存在。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相当奇怪的悖论:那些坚持认为阶级政治衰落的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对阶级和政治的思考方式远没有摆脱自己竭力攻击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这或许是一个让人相当难以接受的观点,因此这里作些具体的分析可能是有益的。那些宣称阶级政治衰落(包括克拉克、利普塞特和雷姆培尔)的主要观点之一,是认为近几十年来在西方民主国家中,阶级和投票之间的关系已经逐步削弱了。通常采用阶级投票的“阿尔福特指数”(Alford 1962, 1963),来支持这一主张。运用社会调查数据就可以容易地计算出这个指数,即计算投票支持左翼政党的工人阶级的百分比,然后减去投票支持该党的非工人阶级的百分比。指数越大,则阶级与投票之间的联系越强。

长期以来,阿尔福特指数被认为具有严重的统计缺陷(参考 Hout, Brook and Manza 1995)。然而,目前看来更有意义的是,这一指数直接反映了并的确完全依赖于工人阶级与非工人阶级的简单的阶级两分法,以及与之相应的左翼与非左翼的政党两分法。如果拒绝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划分方法,承认存在两个以上的阶级和两种以上的政党,那么就不能使用阿尔福特指数。

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局限也存在于罗斯和麦克阿里斯特(Rose and McAllister 1986)所设计的另一种阶级投票指数,这是为证实其关于投票者现在“正开始选择”的观点;而对于阶级和政党两分法的依赖,也同样成为弗兰克林及其同事(Franklin 1992)所主张的看似更为成熟的方法,他们在对于西方民主国家选举变化的比较研究中,宣称几乎所有形式的政治分裂都在弱化。应该说,后者的分析所受到的技术上的非议,并不亚于那些依赖阿尔福特指数的分析。<sup>①</sup>但

<sup>①</sup>罗斯和麦克阿里斯特的指数同阿尔福特指数具有同样的基本缺陷,也就是它不是“边际不敏感”。这就是说,当这些指数被用于评估阶级投票倾向时,对于阶级-投票之间联系的衡量,受到了连续性的阶级-政党图表中不断变化的边际分布的影响。在弗兰克林及其同事的情况中,由于仅坚持使用两分的因变量,如左翼/非左翼的投票,本应使他们运用对数回归,而不是普通最小二乘方回归。



这里主要相关的地方仍在于粗糙的阶级和政党概念，它们本身极易使分析家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

例如，如果仅仅承认工人阶级与非工人阶级的两分法，那么各种“中间”群体的阶级属性等重要问题必然就会产生，如自雇的手工劳动者、工头和监工、技师或服务业从业人员等，他们是现代选举的主要构成力量。随着更多精细的阶级分析形式的出现，这些群体可能在理论上被区别对待。但实践证明，这种区分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同阶级与政党支持的问题相关。研究发现，在一些国家中，很多自雇手工劳动者以及其他“能够自己获取利润”的工人把选票投给了右翼——事实上，这一比率经常比白领雇员还要高（关于英国的情况，参见 Heath et al. 1991：第五章）。因此，如果自雇人员被划归为工人阶级中那些靠体力劳动获取工薪的阶层之列——像通常两分法方案所主张的那样，那么就会得出一种关于这个阶级的政治异质性的非常引人误解的印象，那么阶级—投票之联系的力量就可能被低估。

同样，如果注意力仅仅集中于对左翼政党（与非左翼相对）的支持，也很难对较为复杂的政党结构中的阶级投票模式做出评估。例如，在多元政党体系中，如果一个新兴的右翼政党由于获得非常同质的阶级的支持而崛起，也就是说，一个主要是受到高薪雇员和小资产阶级支持的“抗税”党，那么即使它造成了阶级投票集中化的局面，这种发展情况也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仅仅因为它发生在政治光谱中被视为剩余部分的非左翼范围内，这种情况就与潜在的假设——阶级投票只有作为一种左翼现象才是重要的——相互矛盾。

最后，在这种联系中有必要指出的是，在超出了那种对待阶级—政党之联系的所有简单的“两面价值”观点范围之外的，是非投票行为及其与阶级的关系问题。然而在一些案例中，或许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于选举政治的社会基础所进行的任何严肃分析，都必须充分考虑这一问题。

对于那种主要由阶级政治衰落的命题所构成的批判来说，这是其

更为否定的部分要承担的重负：这样的命题主要建立在简单化的、概念不充分的阶级与政党两分法的基础上，这样做的结果便是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工人阶级和左翼投票上。于是，这种做法看来便更倾向于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继续作含蓄的（如果不是明确的）抨击——这当然是徒劳无益的，而不是去关注分析本身的发展。如果现代民主社会中阶级与政党之间确实还有这种联系发挥作用的话，那么对其进行深入的考察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了。<sup>①</sup>

### 反对阶级结盟弱化——一些新发现

本文以后部分将致力于探讨更为积极的批判观点，对从新近的一些研究成果中得出的结论作一些描述。这些发现努力寻求并提出选举社会学中的概念和技术标准。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些成果事实上提供了充分的经验论据，以反驳那种认为阶级—投票之联系正在削弱的倾向代表着发达社会政治的固有特征的观点。相关研究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首先，他们放弃了阶级两分法，转而支持更具差异性的分类标准；其次，他们考虑所有政党的投票问题，在相关情况下，考虑非投票问题；再次，不是依赖于一些特殊的指数，他们试图通过正规的统计模式来对阶级投票的不同假设进行验证。当然，通过关注阶级和投票的关系来研究阶级和政治的关系，被许多人认为太狭隘了。但是，“阶级政治衰落”论的支持者本身，就是将其论点建立在假设的阶级—投票之关系已经削弱的基础上的，如果说这些观点获得了任何一种清晰的经验参照的话。

第一个说明以英国为例，它关于阶级和政党问题争论的历史或许

<sup>①</sup>这里要指出一些例外的情况。近期有一些作者通过严肃对待他们提出的概念和技术问题，来试图捍卫这一命题，或至少对它的批评者做出理性的回应。例如，纽比塔和德·格拉夫（1996）研究了从两分法转为更为复杂的阶级范畴，对阶级投票倾向评估产生的影响；但他们采取的比较研究方法迫使其仍然停留在简单的左翼与非左翼政党的划分之上。

是最长的。在英国政治中，一般认为“阶级结盟弱化”的进程始自1959年大选之后。当时的工党第三次丢掉了选举。有人认为，工人阶级不再像从前那样给予工党以稳固的支持了。这样，当工党在20世纪60~70年代的选举中击败保守党之时，一种不同的观点便出现了：即认为一种新的中间阶级“左倾化倾向”兴起了。然而，随着工党在1979年后连续4次选举失利，“工人阶级政治终结”的观点最终又一次占据了上风。需要指出的是，在关于这些在不同时期阶级结盟弱化的不同形式的各种尝试性解释中，先前所回顾的各种理论版本再次被援引（参见，例如Abrams, Rose and Hinden 1960, Sarlvik and Crewe 1983, Robertson 1984, Franklin 1985, Rose and McAllister 1986, Butler and Kavanagh 1992）。但是，近些年来，由于希思及其同事承担的重要研究计划得出的结论，使得关于英国阶级投票的所有争论的情况完全改变了。这一结论包括了从1964年到1992年总共9次英国大选数据的系统性再分析（尤其参见Heath, Jowell and Curtice 1985, Heath et al. 1991, Heath et al. 1994, Heath, Evans and Payne 1995）。这一研究得出以下两个重要的结果：

第一，当运用正确的技术进行数据统计时，显然在上述时期内，阶级和投票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展现出稳步削弱的迹象。在1964和1970年的大选中，阶级投票确实曾急剧下降过，但这种下降并没有维持多久。1970年后，可以看到阶级投票呈现出无倾向性波动的局面。<sup>①</sup>

第二，并不能把工党在新近选举中的失败，归结为工人阶级政治一致性的明确的削弱。的确，尤其从1979年以来，工人不太愿意把选票投给工党。然而，这种倾向并不局限于工人阶级，在所有选民中都是显而易见的。这表明，工党已成为“所有政党中”的最无吸引力的一个，而“第三”党，即自由党和其他党派的影响力逐渐增加。此外，工党

---

<sup>①</sup>韦克列姆和希思(1996)运用盖洛普数据分析1935年后的选举结果发现，英国的阶级投票实际上在1945年和1950年间达到最高峰；1935年到1945年间的阶级投票水平比1970年后还要低。遗憾的是，盖洛普数据的可靠程度看来是较难确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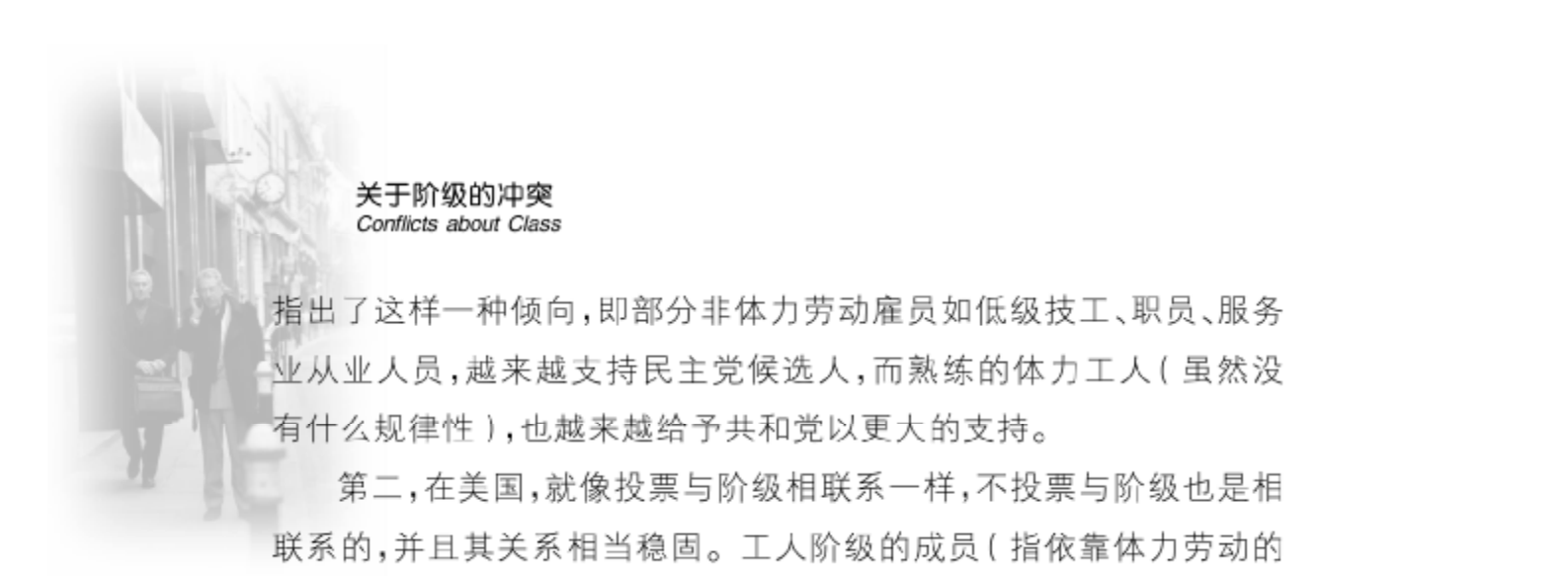
也面临着这样一种局面,如在其他发达社会中的情况一样,英国工人阶级(指依靠体力劳动的工薪阶层)的数量正在下降。这样,即使工人阶级不选择背弃工党,在选民中投票支持工党作为其“天然”党的体力工人也会愈来愈少。

此外从希思及其同事编辑的数据序列中,还可以获得其他令人感兴趣的结果。也就是说,至少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右翼的阶级投票差不多与左翼同样稳固(Goldthorpe 1996; 比较 Evans 1993)。例如,保守党在服务业从业阶级或自由职业者、行政管理者和经理等“工薪阶层”以及小资产阶级中的投票倾向,与工党在工人阶级中的投票倾向一样显著。的确,我们也能够看到,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至1992年的选举中,保守党除获得了上述将其作为“天然”党的阶级的支持外,同工党相比还赢得了选民中大量“非阶级”力量的青睐(Goldthorpe 1996)。不过同保守党相比,如果把工党作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阶级”政党,就值得商榷了。

值得指出的第二种研究结果,源自霍特及其同事对1956年到1992年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研究(Hout, Brooks and Manza 1995)。从历史上看我们有理由认为,在美国,阶级对投票的影响要低于欧洲国家(Nieuwbeerta and De Graaf 1996),而这更与地区、种族等其他因素相关。然而,关于投票的阶级结盟削弱的命题仍被应用于美国。霍特的研究计划正是致力于在这一案例中考察这种论题的有效性如何。

至今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表明,正如英国选举政治的情况一样,阶级-投票间的联系并未展现出一直削弱的倾向。在这一研究所覆盖的35年中,仅仅存在无倾向性波动的情况。但是,研究也指出了两个重要的补充性结论。

第一,虽然在投票中几乎没有阶级结盟弱化的迹象,但出现了阶级的再结盟过程:即在阶级投票的总体水平没有发生改变的同时,在阶级成员与政党支持的联系模式中依然呈现出某种变动。研究中尤其



## 关于阶级的冲突 *Conflicts about Class*

指出了这样一种倾向,即部分非体力劳动雇员如低级技工、职员、服务业从业人员,越来越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而熟练的体力工人(虽然没有什么规律性),也越来越给予共和党以更大的支持。

第二,在美国,就像投票与阶级相联系一样,不投票与阶级也是相联系的,并且其关系相当稳固。工人阶级的成员(指依靠体力劳动的雇员),较之其他阶级成员,更不乐意在选举中投票。此外,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不投票者中熟练和非熟练的体力工人的差异逐渐缩小。在新近的选举中,熟练工人同非熟练工人一样不乐意投票。这一研究结果提出了关于阶级投票争论中经常被忽视的一个观点:即这种投票意向的程度不仅依赖于阶级结构特征,也依赖于政党结构特征。这样,如果美国存在一个可供工人支持的工人阶级政党,阶级投票——与不投票相对——的水平就有可能更高一些。正如另外两位美国研究者范纳曼和坎农(Vanneman and Cannon 1987)所观察的那样,美国的不投票者在阶级构成上非常类似于英国的工党投票者,但是他们总结出,“美国没有左派政党……所以工人只能袖手旁观”。

对最近研究结果所作的第三种有益说明的,是由韦克列姆(Weakliem 1991)提供的。他对法国、意大利和荷兰等三个欧洲国家的选举政治进行了比较研究。韦克列姆分析了从1973年到1985年间这些国家的阶级和投票数据。他所关注的,是研究阶级政治衰落论,主要涉及前文提到的一个根本观点,即在现代政治中,阶级是一股衰落的力量,因为尤其在青年一代当中,正在兴起的“新议程”主要并不与阶级利益相关。正如韦克列姆所认为的那样,由于左翼政党专注于“后物质主义”而不是旧式的“阶级”议题,阶级—投票之间的联系变得松散了。这样,它们获得了富足的、作为后物质主义信仰和价值主要信奉者的白领投票者的支持,而这种支持是以一些牺牲传统的工人阶级支持者为代价的,因为他们可能被民粹主义的口号所吸引而转向支持右翼。

韦克列姆关于阶级投票的研究结果,与前述结论相同。如同英国

和美国一样,在法国、意大利和荷兰,没有迹象显示阶级投票正在下降。而政党支持的阶级分裂围绕着一一定倾向波动。同时,虽然在三国的选举政治中呈现出后物质主义“因素”的迹象,但即使在年轻一代投票者中,这一因素比反映阶级利益的物质主义“因素”要弱得多(比较“性别政治”的相关问题,Evans 1993)。换言之,“新议程”的重要性无疑被夸大了。

此外,韦克列姆的分析使其做出了一种解释,即后物质主义为什么未能像预期的那样降低阶级投票水平。这是因为后物质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化,同样是通过所有的阶级来实现的。因此,左翼政党关注后物质主义议题本身,并未使工人阶级(相对于非工人阶级)的支持显著降低。确切而言,由于左翼政党的支持,可能有助于后物质主义信仰和价值在工人阶级中的发展。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接下来要讨论的研究成果,所关注的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案例,即爱尔兰共和国。爱尔兰的选举政治的确是一个例外,因为在那里很难发现任何清晰的关于政党支持的社会基础(尤其参见 Whyte 1974)。国内的两个主要政党——共和党(Fianna Fail)和统一党(Fine Gael),是在1922~1923年内战期间产生的,其随后的支持力量主要建立在家族传统基础之上。一段时期以来,它对于政党支持具有象征性意义。然而,一些爱尔兰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最近研究,修正了这一观点。

首先,更为精确的阶级分析形式表明,其与阶级相联系的投票程度,即使低于欧洲的总体水平,但也远远高于以前的预测。此外更令人感兴趣的是,有迹象显示,在最近的爱尔兰选举中,阶级对政党支持的影响在逐步增加。尤其是共和党,越来越像一个中右翼政党,在日益扩大的工薪阶层中具有显著影响;而先前并无甚影响的工党,主要是因为获得了工人阶级的支持,在选举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参见如 Mair 1979, 1992, Laver, Marsh and Sinnot 1987, Breen and Whelan 1994)。换言之,正在发生的情形是,在大约70年后,象征性的政治正

在消失，而阶级利益还是对政党支持形成了更强有力的影响。

这样，爱尔兰就成为了阶级政治衰落论不能适用的另一案例。然而，其意义可能远不止于此。被视为象征性政治衰落的爱尔兰的情况，可能影响到我们对于新的、后共产主义的中东欧民主国家发展的认识。在那里，在新的民主体系建立后产生的选举政治，也在很大程度上含有一种反映着前民主时期和摆脱外国统治的斗争相分裂的象征性因素。爱尔兰的例子确实表明，这样一种象征性政治具有很强的持久性。但它也进一步表明，物质利益尤其是阶级利益的影响迟早都会被感知。在未来的几十年，至少那些没有出现民族分裂的中东欧国家——当然，假设它们的民主政体未发生改变，可能会提供一些与阶级结盟弱化相反的例证，即产生一种寻求阶级利益及其冲突向民主方向转化的选举政治。

## 👉 结 论

因此，可以强调三点。其一，如果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则应该用另一方法来理解阶级概念，并使其具有可操作性（一种对多个经验研究产生影响的方法，是指上述 Goldthorpe 1987，第二章；参考 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第二章，Evans 1992, 1993, 1994）。这样，就可以在改进了概念和技术的当前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这一理论本身所坚持的基础上，对阶级政治衰落论提出挑战。

必须强调的是，上述研究和分析结果并未表明，选举政治中持续性的阶级结盟弱化现象绝不会出现。相反，现在有证据表明，这种情况在战后的挪威(Ringdal and Hines 1996)和瑞典确实发生了。（对瑞典数据的分析，现在正由我本人和罗伯特·艾里克森承担。分析表明，至少在战后初期存在着阶级投票水平的下降）。更多的案例也能证明这一点。但是，上述说明确实显示，阶级政治的衰落不能被视为一种“构成”民主国家发展逻辑的普遍倾向。更为典型的结论是，从短期看，阶

级 - 投票之间的联系存在着极大的波动;而从长期来看,这种联系或者稳固,或者呈现出极端不确定的倾向。

其二,虽然阶级结盟弱化并不是现代社会政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特征,但阶级结盟却是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也就是说,即使阶级投票水平没有被全面削弱,阶级 - 政党关系的模式也容易受到外界变化的影响。这种阶级联盟弱化实际采取的形式,可能会显示出大量的跨国性变化,因为结盟弱化更可能源于政党结构和政党策略的变化,而不是直接的阶级结构变化。本文开头所回顾的那些观点,不仅低估了阶级作为民主政治要素的持续性力量,而且低估了政党为了维持并增加其选举支持,而对于阶级结构发展做出的有目的性反应的倾向和能力。

其三,上述研究指出了未来发展的方向。这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影响下进行的研究,它试图超越这一毫无结果的对抗。那些参与这一研究的人主要具有一种共同点,即认为不在某种政治观而在社会学概念的指导下来从事研究工作(比较 Goldthorpe 1990)。这一承诺的核心在于,无论研究计划的动机如何(政治的或其他动机),都必须努力按照最有利的方法论标准来进行研究——这些标准是能够精确确定的。至少在当前阶段,关于阶级和政治的辩论对这样的社会科学概念能否占主导地位的关注,可能与对社会政治现实的关注同样重要。



## 20世纪英国的阶级不平等 和教育改革<sup>①</sup>

安东尼·希思(Anthony Heath)

彼得·克里福德(Peter Clifford)

教育改革的目標有很多,包括下层阶级转向承担公民责任的社会化、经济效率的增加、精英阶层的扩大以及阶级间不平等的缩小。最后一点经常被经验研究所修正,从而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在英国,我们拥有一系列独一无二的全国调查数据,据此我们能够用图表来说明本世纪英国教育的阶级不平等的历史,能够在原则上将阶级不平等的任何变化与重要的教育改革联系起来。如1907年的免费学额制度、1944年的教育法案以及1965年(1965年10月)由教育科学部下发的、以综合性院校取代选择性教育体系的通知(Silver 1973)。本章将把最近的1992年的全国调查数据加进去,以更新我们

---

<sup>①</sup>1983年的牛津-SCPR研究是由Pergamon出版社、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批准号为E00232012)以及牛津耶稣学院共同资助的;1987年的牛津-SCPR研究是由Pergamon出版社、Sainsbury Trusts和ESRC(批准号为A00250005)共同资助的;而1992年的研究是由塞恩斯伯里基金会(Sainsbury Trusts)和ESRC(批准号为Y304253011)共同资助的。我们对戴维·李给予的大量有益建议表示感谢,其建议极大地提高了本文的表述水平;对皇家统计学会允许再次使用发表于《皇家统计学会杂志》的原始材料,也表示感谢。

此前在这一领域的研究(Heath and Clifford 1990),从而对全面重组产生的影响作一个可靠的评估。

教育研究者对于1944年的改革期望甚巨,因为这些改革为所有人建立起自由的中等教育制度。许多人认为,这使得限制工人阶级进入初级学校的经济问题消失了。因此,1949年进行的首次全国研究的主要作者戴维·格拉斯肯定地指出,1944年的法案将“极大促进英国的社会流动”(David Glass 1954: 22)。“由于作为儿童接受中等教育之决定因素的经济和社会背景的重要性被大大降低,社会流动将增加起来,或许急剧增加”(第24页)。格拉斯指出,“用不了40年,我们就能看到这种教育机会的新的、更具革命性的扩张,将如何改变社会的流动程度”(第21页)。但是,“显然,更多工人阶级的孩子现在能够进入初级学校,这样就克服了他们以后进入大学或职业教育以及获得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的第一个障碍”(第2页)。教育科学部1965年10月的通知,在全面重组方面具有类似的期望。重组的目标很多,但其中之一当然是入校的学生应该“代表着更为广泛的社会阶层”(苏格兰教育部引用Macpherson and Williams 1987)。我们希望,拥有不同背景的学生如果能够在同一学校环境中接受教育,而不是被分隔于中等的现代初级学校中,那么阶级差别将会缩小。当然,麦克弗森和威廉姆斯以及其他的社会学者也认为,全面重组的一个主要目标及其可能结果,将是“(教育)获得与社会阶级的联系应被削弱”(Macpherson and Williams 1987: 512)。

1944年和1965年的改革当然也有许多其他的教育成果,但在本文中我们要关注的,是这些改革是否成功地缩小了教育的社会阶级不平等。实质上,我们的问题是,那些在改革实施后从学校毕业的孩子,在教育经历及其获得上是否比改革稍前的群体更少被社会阶级所分隔。因此,我们将运用全国调查的系列成果,以验证一段时间来教育和社会阶级之关系的发展趋向。

当然,可能有许多完全不同于教育改革的其他理由,以解释一段

时期以来阶级差异的缩小。例如,克拉克和利普塞特(本书第二章)就提出了社会阶级是否行将结束的问题,并给出了肯定回答。他们及其他一些学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由于物质产品的丰富、地理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加、跨国婚姻以及以重工业为中心的传统工人阶级社会的衰落,阶级间的社会分裂日益模糊(比较 Crewe 1984)。关于阶级衰落的争论,在政治社会学研究中趋向白热化,其中围绕投票行为之阶级差异的争论尤为热烈(Heath et al.1985, Crewe 1986, Heath et al. 1987)。政治学家所声称的社会变革,不仅影响了投票行为的阶级差异,也在原则上影响了教育的阶级差异。然而,为实现本文所研究的目的,这里的关键在于,这些社会过程应该是渐进的和持续的(如 Crewe 认为是一种“缓慢的”趋向),而 1907 年、1944 年以及在较少程度上的 1965 年的教育改革,则应是导致了这一发展趋向中的明显突变。因此在教育领域,我们需要寻求主要改革时期发展趋向中出现的某些非连续性。对两种不同趋向进行比较,或许是有用的。如果在政治和教育领域都存在着模糊阶级分裂的社会过程,而教育改革引发了另一过程,那么我们应该预期的是,在教育领域中的阶级不平等要比在投票行为中更大规模地缩小。

## 数据资源

我们赖以进行研究的全国调查数据,包括 1949 年的随机调查(由来自 LSEZ 的小组组织)、1972 年的随机调查(由来自牛津纽菲尔德学院的小组组织)以及 1983 年、1987 年和 1992 年英国大选调查(由来自 SCPR 和牛津大学的小组组织)。这些是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层概率抽样。在 1949 年的研究中,发行的抽样包括居住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 18 岁以上的 10 000 人,抽样资料主要来源于保存在全国登记系统内各地方办公室的“活”卡片,其主要抽样单位为地方政府的行政区(详细的抽样资料参见 Gray and Corlett 1950);共获得了

7 751 份完整的访问记录,但由于增选了一些替代材料,最终得到的样本包括 9 296 份答复。

在 1972 年的研究中,发行的样本是 16 563 名年龄在 20 岁~64 岁的居住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男性选民。人员抽样来自选举登记和 417 个主要抽样单位(选区和教区)。初始样本既用于个人,也用于家庭和机关,其中未进行选举登记的个人也能被选入。最终得到的样本是 10 309 名成年男性的答复。

1983 年、1987 年和 1992 年的英国选举调查,是由同一小组设计、同一研究机构(SCPR)实施的。所有三个抽样的范围,都是英国的选举登记。1983 年和 1987 年发行的样本有 6 000 人,集中于 250 个投票选区,最终得到的答复样本分别是 3 955 和 3 826(详细参见 Field 1985)。1992 年的调查有所不同,为了对苏格兰的投票行为进行详细研究,增加了对苏格兰居民的抽样。在本文中,我们特别强调这一样本,以使调查中苏格兰居民的比例与作为整体的实际选举比例相符合。1992 年增加的样本规模是 2 855。由于它们在设计 and 程序上基本类似,我们能够将这三次选举调查集中起来,这样结合起来的样本规模是 10 636。

对半个世纪的数据序列进行比较,决非易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三组数据序列在规模、年龄、性别、居住地、抽样范围、运用模式及其答复率方面很不相同。此外,由于时间间隔以及研究机构的不同,调查程序不可避免地会有所不同。原则上,控制年龄、性别、居住地是很简单的,但要控制抽样、现场调查以及编码程序,则很不容易。这样,对三个数据序列结果进行直接比较,是很不明智的。为了用图表把阶级不平等的历史表呈现出来,我们采取了对同一年代出生的人群进行比较的策略,而不是对调查结果进行比较。

对同一代人分析的方法本身,并不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死亡和移民,意味着给定调查中的老一代人在相关一些方面与年轻人会有所不同。例如,我们并不能确定,1949 年抽取的 19 世纪 90 年代出生的

那一代人的样本，能够代表那些在世纪之交受到教育的英国人。因此，我们并不能得出结论认为，代际间的不同反映了一段时间以来学校教育的真正变革。但是，由于调查中年龄范围的重叠，我们能够对于具有共同点的同一代人是否表现出类似的发展倾向做出验证。

我们也应该指出，在离开学校后，人们继续进行成人教育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但这可能会对同一代人之间的比较产生影响，即那些年纪大一些的人，将有更多时间获得这种教育资格。

### 战前英国的阶级不平等

20世纪初，进入选择性中学是主要的教育问题。1907年的免费学额制度（在1902年法案指导下制定）规定，如果“在申请者通过了成绩和熟练程度的入学测试的条件下，那些申请进入的公共初级学校学生能够获得一定比例的免费学额”（教育委员会1907年），那么那些需要缴费的中学就可以从教育委员会得到更高比例的资金。这一制度规定，免费学额的比例应该是25%，但实际比例逐渐增加。这样，到1931年时，英国中学获得免费学额的孩子已达到45%（Halsey, Heath and Ridge 1980:25）。R. H. 托尼在20世纪20年代的文章中，将英国中级教育的新近发展总结如下：

“在1922年，免费学生和学校是很少的。尽管数量不多，但与1902年前几乎完全没有公共学额的情况相比，它们代表着一场教育革命”（Tawney 1922:20）。

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免费学额的增长却发生了逆转。1933年，教育委员会启动了经济措施，以精简职员、降低薪资、增加学费、减少维持资金的供给，并将免费学额变成“特殊”学额。特殊学额其实成了一次试验。正如弗洛德指出的那样，“其结果是扩大了学额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差距，使处于社会低层的父母放弃孩子获得中级教育的几率增加了”（Floud 1954: 109）。

1949年对同一代人进行的调查，使我们能够追寻由1907年制度所引发的教育改革的影响。我们的分析建立在格拉斯著作第五章中由珍·弗洛德提供的表格的基础之上（Glass 1954）。其表格的主要简化版本如表16.1所示。

弗洛德对现代中学（这里的用词并不准确，因为现代中学一词在战后才出现）、初级中学（包括技校）和寄宿学校进行了区分。由于寄宿学校的样本数非常少，而不利于有效分析，因此我们将其与初级（和技术）学校进行合并，并以“选择性学校教育”命名。这些学校提供了一条通向专业人员、技术和管理工作的道路，而进入这些学校则需要某种选择程序，无论是学术的或经济的。它们与那些招募多数学龄人口并主要是培养工人阶级的非选择性学校（这里主要是指战前的初级学校）是不同的。

弗洛德将成人样本划分为5代。年纪最大的（1889年及之前）一代在1907年免费学额制度生效之前，至世纪之交时就已经进入了中级教育。最年轻的（1920~1929）一代，在免费学额达到40%以上的20世纪30年代，才进入中级教育。

表 16.1 1949 年研究：选择性学校教育

父辈的社会地位分类	每一年龄段进入选择性中学的百分数/%				
	1889年及之前	1890~1899	1900~1909	1910~1919	1920~1929
男性					
1—3 高级非体力工作者	32	45	36	44	54
4 低级非体力工作者	10	17	13	23	26
5 熟练体力工作者	2	5	7	10	11
6,7 半熟练和不熟练体力工作者	3	2	1	4	9
全部	10	14	11	17	19
N	670	540	748	767	764
女性					
1—3 高级非体力工作者	38	37	34	50	50
4 低级非体力工作者	14	13	12	19	22
5 熟练体力工作者	5	4	7	11	14

阶  
级

第三部分

研  
究

续表

6,7 半熟练和不熟练体力工作者	2	0	1	3	5
全部	12	11	11	16	17
N	857	605	832	907	974

弗洛德按照豪尔与琼斯确立的标准（参见 Hall and Jones 1950, Macdonald 1974），依据父辈的社会地位，也对样本进行了划分。<sup>①</sup>她将 7 类划分标准归结为如下 4 类：

高级非体力工作者：指豪尔—琼斯分类的 1—3，包括专业人员、行政、管理以及其他高级非体力职业；

低级非体力工作者：指豪尔—琼斯分类的 4，包括“检查、监督以及其他低级非体力职业”；

熟练体力工作者：指豪尔—琼斯的分类 5，包括熟练体力工作者和非体力的日常普通职业；

半熟练和非熟练体力工作者：指豪尔—琼斯分类的 6 和 7。

弗洛德对其结果的解释是，在 20 世纪初，拥有更高社会地位的男性的“差别优势”有所下降。然而，我们从表 16.1 中得出的结论，取决于我们如何测定“差别优势”。一种直接的测定方法是社会地位的绝对差别。例如，在年纪最大的一代中，32%的来自高级非体力工作家庭背景的男孩进入了选择性中学，而来自熟练体力工作家庭的男孩比例只有 2%，二者间有 30%的差别。在一段时间内，这一差别有所增长，因此到弗洛德的最年轻一代时，二者间的差别达到 43%。

<sup>①</sup>父辈的“最后主要”职业是社会地位测定的基础，这在对同一代人的分析中可能产生某些问题。在进行调查时，最年轻一代人的父辈相对年轻，因此相较于老一代的父辈而言，其最后的主要职业倾向处于其职业的早期阶段。所以，数据可能低估了他们的最终职业成就。这样，相较于 1890~1899 一代父辈的 21%以及 1890 年之前一代父辈的 20%，被归于 1—3 类地位的 1920~1929 一代的父辈只有 15%。

这种绝对差别告诉我们,不同社会地位群体的教育经历有着相似性。因此,在年纪最大的一代中,不同社会地位人群的教育经历是相似的——来自任何背景的孩子都很少持续接受选择性教育。而到弗洛德的最年轻一代时,不同背景人群间的差距扩大了。来自低层背景的绝大多数孩子仍然进入非选择性学校,但是来自更高类别的绝大多数孩子(虽然只是一小部分人)首次进入初级中学和寄宿学校。社会地位分类的教育经历出现了不同发展情况。

虽然绝对差异在许多方面看是一种有效的测定方法,但社会学家最近在对社会不平等现象进行调查时,往往采用另一种测定方法。(参见例如 Shavit and Blossfeld 1993)这种测定是让步比(odds ratio),实际上它是测定阶级或地位类别在达到特定目标并避免其他目标的竞争中的相对成功率。<sup>①</sup>这样,在弗洛德的年纪最大一代中,有32%的来自高级非体力工作家庭背景的男孩获得了选择性中级教育,而来自同样背景的其余68%的男孩则未能得到选择性学校教育。因此,在这一社会分类中,让步比是32:8,也可以用1:2.1来表示。

对那些来自熟练体力工作者家庭背景的男孩而言,让步比更低:仅有2%的孩子得到了选择性学校教育,而98%的孩子未能获得这一机会。这样,他们的让步比是2:98或1:49。因此,对社会地位类别进行比较的有效方法,是比较他们获得选择性学校教育的让步比。在这一情况下,更高社会地位类别的让步比较之熟练体力工作类别的要高——他们的让步比高出20多倍( $1:2.1/1:49=23.1$ )。我们应该指出,让步比中的1表明,上述两组人群具有同样的相对几率,但让步比的量值没有上界。

---

<sup>①</sup>为测定阶级不平等,其他学者也提倡其他的方法。总的来说,不存在一种“正确的”测定方法,并且可能存在着相当多不同的阶级不平等概念。然而应该指出的是,让步比的最大优势在于它们独立于边际分布。而许多替代方法并不是能独立于边际分布的。因此,如果教育的方差发生变化,则这些替代的测定必然随之变化。我们知道,本世纪教育的方差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在考虑方差的变化后,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阶级和教育间的联系是否也改变了。



让步比有许多便利的数学特性,但对我们而言,关键在于它能够在为达到某种理想地位的竞争中,被用于测量两组人群相对成功的方法。它完全不同于绝对差别法,后者仅仅告诉我们两组人群的相似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两组人群可能是非常类似的,因为各组中很少有人进入初级中学;但在为得到少数几个名额而进行的竞争中,两组人群的相对成功仍然可能存在巨大差异。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组人群的经历可能会更加类似,但他们的相对成功会出现差异,反之亦然。

实际上,在弗洛德分析所涵盖的战前时期中,社会地位分类的选择性教育经历差异很大,而其相对竞争成功却较为类似。为了描述竞争成功随着时间推移的发展趋向,可以比较一下男性高级非体力工作者同熟练体力工作者的让步比。这一比率从年纪最大一代的 23 : 1,相继发展为后来的 9 : 1、5 : 1、4 : 1 和 5 : 1。这看起来的确同教育改革模式的发展颇为相符:本世纪初呈现出一种重要的竞争机会平等化倾向(虽然在 1907 年免费名额制度生效前就已开始出现),而由于受到 1933 年经济措施的影响,这一发展倾向在年轻一代中发生了逆转。

然而,我们不应该仅仅通过考察一组让步比,就得出任何确定的结论。根据表 16.1,我们能够计算出多个让步比,并且所有这些让步比都会受到样本变化的影响。尤其是那些来自体力工作背景、并能够进入选择性学校的孩子的样本很少,因此许多让步比存在着很大的置信区间。所以,我们将转而探讨线性对数模型。它是这样一种统计方法,能使我们同时考虑全组让步比和样本的差异。

我们首先验证一种零假设,即在为得到选择性中学教育的竞争中,社会地位分类的相对成功没有发生变化。这样,我们就构想了一个线性对数模型,它使学校教育依赖于父辈的社会地位和出生年龄段,但同时也将一段时期内的父辈社会地位和选择性教育之关系视为一个常数。(我们也曾研究过是否存在性别间的不同,但未能发现具有任何统计意义的差异。因此,我们把男孩与女孩的数据进行了合并。)

实际上,这一模型考虑了选择性学校教育的学额数量的变化,以及父辈社会地位分布的变化,但却假设来自不同社会地位的人获得选择性中学教育的相对机会不变。<sup>①</sup>

如果我们将这一“不变相对机会”模型与表 16.1 的数据配合起来看,其结果并不令人满意。换言之,完全不可能用样本变动来解释调查数据与模型间的差异。(卡方是 22.0,自由度是 12, $p=0.037$ )。因此,我们不得不放弃使用相对机会“不变”的零假设。

这样,数据分析得出了与上述非体力工作者同熟练体力工作者之让步比相同的结论:数据与下述假设相一致,即社会地位分类集中于获得选择性中学教育竞争的相对成功。当然,这种纯粹的统计分析并不能告诉我们因果关系。我们充其量只能认为,这一证据与关于 1907 年免费学额减少了低级社会地位人群在此前的竞争中所遭遇的不利条件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它与其他一些看法,如阶级界限的模糊不清等,也是一致的。遗憾的是,在这一时期,我们并不能得到一些关于阶级投票倾向或阶级不平等倾向的数据,这些数据可能会告诉我们是否平等化仅仅发生在教育领域。然而,平等化出现的时间确实表明,1907 年免费学额制度在因果关系的发展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 1944 年法案的影响

1944 年法案给所有人提供了接受免费中级教育的机会。虽然一些独立的领域没有变化,但这最终扫除了那些限制进入国有选择性学

---

<sup>①</sup>我们正式构建了一个对数模型,其中因变量是进入选择性或非选择性学校的对数几率。芬伯格这样表示这一模型:

$$\ln(m_{ij1}/m_{ij2}) = w + wA(i) + wB(j)$$

其中 A 代表父辈的社会地位, B 代表出生年龄段。社会地位分类的编号为 1—4, 其中第 1 类是指更高级职业。同一代人的编号为 1—5, 其中第 1 类是指 1890 年前出生的一代。如果加入条件  $wAB(ij)$ , 模型就会变得饱和, 但是我们的主要兴趣在于, 如果没有这一条件, 我们是否能够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校的经济障碍。同时,中级教育被重组为由初级中学、技校和现代中学构成的所谓“三方”体系。这三类学校在影响上势均力敌,1943年的《教育重组白皮书》认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所有孩子都应该接受最适合的教育”,对孩子们的选择“不是建立在竞争性测试而是建立在对个人条件的评估基础之上,这种评估主要通过学校记录进行,如有必要的话,也可以辅之以智力测试,主要考虑其父母的期望和个人希望从事的职业”。然而,在实践中,选择主要建立在竞争性的“11+”考试的基础上。

为了考察1944年法案的影响,我们必须对法案实施前后同一代人的教育经历进行比较。主要的资源是1972年的随机调查(Goldthorpe 1980, Halsey et al. 1980)。同1949年的研究一样,被调查的人接受了关于社会背景、教育和职业历史等个人相关信息的提问。<sup>①</sup>

约翰·戈德索普对1972年材料的分析表明,较之格拉斯及其同事调查的战前时期,战后时期阶级向上层流动的比率更高(Goldthorpe et al. 1978)。战后时期(到1972年)见证了阶级结构的迅速变化,专业人员和行政工作的数量不断扩展,而半熟练和非熟练体力工作则大大萎缩。因此,纯粹的向上流动,以及整个社会的流动水平(向上与向下流动结合起来),要高于战前时期(Heath 1981)。

在理论上,这种向上流动的增加不一定与教育改革相关,它可能只是就业结构变化的结果,然而人们可能期望1944年法案改变了获得这些工作的竞争条件,例如人们可能期望,在争取专业人员的竞争中,该法案能够减少那些来自专业人员背景的孩子较来自工人阶级背景孩子的优势。然而,戈德索普的结论认为,由这种方式定义的并通过让步比测定的相对流动机会,并未发生显著改变。

戈德索普的结论并不是建立在对1949年和1972年数据集的直

---

<sup>①</sup>关于这些数据的其他分析,请参见 Halsey, Heath and Ridge 1980, Blackburn and Marsh 1991, Jonsson and Mills 1993, and Kerckhoff and Trott 1993。

接比较基础之上,因为实际证明,重复格拉斯的社会地位分类程序是不可能的(Ridge 1974)。相反,它是源于1972年研究中对于连续年龄段的父辈和子嗣阶级关系的线性对数分析。戈德索普及其同事对他们自己称谓的“不变社会流动性模型”进行了检测。这一模型(与我们在前一部分所使用的模型相似)允许父辈和子嗣的阶级分布在一段时间内发生变化,但是假设父辈和子嗣之间的阶级联系是不变的。这一模型与数据非常相配(卡方=11.19,自由度=12, $p=0.51$ 。参见Goldthorpe等1978:456)。换言之,在1972年研究所涵盖的这一段时期,具有不同阶级背景的男性的相对流动机会并未发生变化。

人们可能认为,1972年研究中呈现的相对流动模式主要是由战前大规模的教育和就业恢复过程塑造的,格拉斯感到那些对充分评估1944年改革所必需的战前40年的经验,在1972年的研究中仍发生作用。然而,对二战前后年轻人教育经历的比较,并未给格拉斯的希望和期待以多少鼓励与支持,他设想1944年法案实施后,作为孩子获得中级教育之决定因素的社会和经济背景的重要性,将会消失。

表16.2展现了1972年研究中关于阶级背景、中级学校教育和出生年龄段之间的关系。同样的出生年龄段分组也曾被弗洛德用于对1949年的材料的分析。但正如我们上文所指出的,重复使用1949年研究中的社会地位测定的做法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作为替代的是,1972年的研究中使用了戈德索普设想的7类划分方案(有较小的改动)。这一方案基于两种标准:职业和就业地位。它区分了以下阶级:高、低级工薪阶级(包括专业人员、行政和管理行业),三种中间阶级(日常体力工作者、小资产阶级以及工头和技术人员),熟练、半熟练或非熟练的工人阶级。它还区分了中级学校教育的两种类型:非选择性的(包括中级现代的和综合性的学校)和选择性的(包括技术学校、初级中学和私立中学)。技校的定义(在二次大战期间是一个非常异质的范畴)远比弗洛德的定义宽泛,这也解释了表16.1和表16.2之间进入选择性中学人数在比例上的差异。然而,本文所关注的是变

量间的关系,而不是进入选择性学校的总数(这可以根据教育和科学部的官方资料作出更好的评估)。

表 16.2 1972 年研究:选择性学校教育

父辈的阶级	每一年龄段进入选择性中学的百分数/(男性)			
	1910~1919	1920~1929	1930~1939	1940~1949
I 高级服务业者	69	77	86	74
II 低级服务业者	57	70	77	62
III 日常非体力者	34	54	51	47
IV 小资产阶级	35	41	49	41
V 工头	22	34	38	33
VI 熟练工人	19	25	30	21
VII 半熟练或非熟练	15	23	27	23
全部	26	35	40	35
N	1 802	1 969	1 880	2 231

首先,考虑出生年龄段同进入选择性学校教育的关系。我们看到,在 1920~1929 和 1930~1939 年龄段中,各阶级进入选择性学校的比例都有所增加,年龄最大的一代从 26% 增加到 35%,其后达到最高峰 40%。然而在 1940~1949 年龄段中,比例降到 35%——即 20 年前的水平。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在于,战后出现了生育高峰,但选择性学校的学额比较而言并未增加,而 1930~1939 年龄段则得益于这一时期相对较小的出生规模。实际上,学额竞争日趋激烈,因此来自各阶级背景的孩子,在竞争中获得成功的比例下降了。

1930~1939 出生的一代,可以被认为是过渡的一代(许多人在战争期间开始中级教育)。在评价 1944 年教育法案的影响时,在 1950~1965 年三方体系的黄金时代接受中级教育的 1940~1949 一代人,其经历是最为相关的。在这一代中,阶级之间的绝对差别要比在战争期间接受教育的 1910~1919 一代人要小一些,相对而言的阶级机会(通过让步比测定)也不是更为平等。例如,高级服务业人员与熟练

工人阶级的让步比从年纪最大一代的 9.5, 发展为 10.0、14.3, 最终在最年轻一代中达到 10.7。<sup>①</sup>

与 1949 年的研究一样, 我们需要对表 16.2 中记录的数据进行更为正式的分析, 以研究所有的让步比, 并考虑样本的变化。如先前一样, 我们采用一种模型, 它允许父辈阶级和选择性学校学额的分布是可以变动的, 但假设一段时间内父辈阶级和进入选择性学校教育间的关系不变(我们也应该记得, 1972 年的研究仅仅包括男性。因此, 我们并不能如 1949 年的研究那样, 将男性和女性合并起来)。

当我们把模型应用于 1972 年数据时, 所得到的结果与 1949 年数据的结论截然不同。在对 1949 年数据的研究中, 我们不得不放弃这种“无变化”模型。但在 1972 年数据中, 这个模型却非常适合(卡方=12.32, 自由度=18,  $p=0.831$ )。因此, 我们不能抛却下面这一假设, 即, 进入选择性学校的相对阶级机会, 在 1972 年研究所涵盖的四个年龄段中保持不变。所以没有证据显示, 1944 年教育法案改变了来自不同社会阶级背景的孩子竞争中级学校学额的条件。无论如何, 1944 年法案并没有使关于“公共中级学校教育应该在平等条件下尽可能面向所有阶级的孩子”的理想成为现实(教育委员会 1909~1910 年度报告, 引自 Floud 1954)。

## 全面重组

1944 法案规定了对所有人进行免费中级教育, 此后便是全面的教育改革(为教育部 1965 年 10 月下发的通知所激励)。1974 年将离校年龄(ROSLA)提高到 16 岁, 以及中级教育证书(CSE)的逐渐推广

<sup>①</sup>与 1949 年数据相比较, 这些让步比差异很大。这些差异的部分原因在于, 阶级和社会地位的定义的不同。我们不知道霍尔和琼斯所指的高级非体力劳动者包括哪些人, 但它与戈德索普所指的高级服务业阶级是不一样的。同样, 两种熟练工人的分类也肯定存在着差异。例如, 霍尔和琼斯将某些日常非体力工人也包括其中, 或者也包括体力工头, 而戈德索普则将这两类人归于其他阶级。

等,1972 年的研究未能考察这三种发展情况。

ROSLA 代表着教育提供的重要扩展,对那些在取得中学毕业证书 ( GCE ) 或中级教育证书之前就离开学校的工人阶级的孩子而言,更是这样。许多战后评论家将工人阶级的孩子在参加公共考试之前就早早离开学校,视为阶级不平等在三方体系中的再现 ( Douglas 1968 )。ROSLA 是将所有人带入公共评价范围的重要步骤。人们期望 ROSLA 能使工人阶级追赶上来,并对阶级间教育经历的绝对差异产生较大影响,而希望全面的重组能够改变阶级间的竞争条件。

综合性重组也必然将我们的注意力从对 11 岁学童的选拔,转移到学校教育的后来阶段,尤其是 GCE 和 CSE 的公共考试。的确,GCE 的普通水平证书在某些方面是战前或战后初期初级中学学额的函数当量。这样,对战前一代而言,即使是没有取得学校证书的辍学者,选择性教育也能使其得到有薪金的工作。但在战后时期,情况不再如此,获得普通水平证书才是通往有薪金工作之路的关键步骤 ( 参见 Heath and Ridge 1983 )。

因此,我们将注意力从进入选择性学校教育,转向获得一个或多个 GCE 普通水平考试。本部分的中心议题是,ROSLA 或全面重组是否与 16 岁以上人口的阶级不平等变化有联系。

我们的数据来自 1983、1987 和 1992 年的英国选举调查,我们将这几次选举的数据合并以了解较大的频率分布。这些调查中,在战前接受教育的年纪最大的一代,其有效的公共考试是学校证书或中学毕业文凭。而对战后的一代而言,GEC 的普通水平 ( O ) 和 A 水平证书是有效的,CSE 在这一时期也成为有效证书。由于学校证书在严格意义上不能与普通水平证书相等同,因此我们将主要对战后接受教育的一代进行分析,并将一次或多次通过普通水平测试(或通过 CSE 的 1 级测试),作为考试成功的测量标准。

正如我们从表 16.3 中所看到的,考试通过的人数比例有显著的增长。从年纪最大一代的 27%,上升为最年轻一代的超过 60%。这种增

长是连续性的，并没有如先前 1940~1949 一代中选择性学校学额相对短缺那样的困难迹象发生。几乎可以肯定，这两种不同发展趋向是因为战后时期的现代中学开始让学生参加公共考试，而在战前学校证书是为选择性学校是所特有的（参见 Heath 1984）。这样，让现代中学的孩子参加 CSE 考试的政策，弥补了初级学校学额的短缺（这项政策是由学校和学生家长而不是中央权威机构临时发起的）。

但是，在我们研究的后期，普通水平证书的增长看来正在接近顶峰，而这种增长在其他阶级中正在继续。因此，阶级间的绝对差距倾向于下降。但与之相反，由让步比测定的阶级相对性并未展现出一致的发展趋向。以男性情况为例，高级服务业者同熟练体力工作者的让步比从 1930~1939 一代的 4.8，发展为 4.0, 11.9，最终在 1960~1969 一代中达到 5.7。从这一具体让步比的时间序列中，很难看出阶级的消逝。

表 16.3 1983~1992 年的研究:普通水平 (0-level) 考试

父辈的阶级	每一年龄段进入选择性中学的百分比/%			
	1930~1939	1940~1949	1950~1959	1960~1969
男性				
I 高级服务业者	59	63	87	83
II 低级服务业者	58	72	78	83
III 日常非体力者	35	67	65	84
IV 小资产阶级	25	40	55	61
V 工头	24	39	49	70
VI 熟练工人	23	30	44	55
VII 半熟练或非熟练	16	26	36	46
全部	27	40	53	64
N	719	856	858	765
女性				

阶  
级  
第三部分  
研  
究



续表

I 高级服务业者	62	66	82	79
II 低级服务业者	52	56	71	83
III 日常非体力者	50	54	64	76
IV 小资产阶级	27	46	53	77
V 工头	38	46	56	75
VI 熟练工人	19	28	41	62
VII 半熟练或非熟练	14	20	37	52
全部	28	38	52	69
N	697	886	919	742

我们必须再一次考虑全部让步比以及样本的变化。除非经过严格统计模型的确认，否则关注 1950~1959 一代中高达 11.9 的急剧增长并不是明智之举。

在将这些数据模型化的过程中，我们遵循着与 1949 年研究相同的程序。我们首先要确定男性与女性在阶级不平等模式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如果未能发现有所差异，则要将男性与女性数据合并，从而得到更大的分析样本。接下来，我们转而测试先前适用于 1949 年和 1972 年研究的“不变相对机会”模型。

我们发现，如 1972 年数据一样，“不变相对机会”模型也与这组数据非常相配。（卡方 = 18.8，自由度 = 18， $p=0.406$ ）因此，我们不得不放弃如下假设，即在我们研究的最后阶段，经过综合性重组和离校年龄的提高，表现在获得普通水平证明资格方面的阶级不平等下降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教育改革对于阶级的相对差异没有影响：如果未进行改革，阶级分裂实际上可能会扩大。这也并不意味着这些改革未能产生有利的结果：获得普通水平证书比例的不断提高，可能在一定意义上要归功于这些改革。但是，这些结果确实表明，阶级不平等现象是一直存在着的。

## 👉 结 论

因此，这些结果表明了一个显著的事实。如果将 1949 年和 1972 年的调查结果结合起来，我们就会发现，从 1900~1909 年龄段到 1960~1969 年龄段，阶级相对性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就这些不同群体的年轻人所面对的最为关键的教育转变而言，在 20 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相对的阶级机会实际上保持不变。虽然 1907 年的免费学额制度可能在本世纪初产生了一定影响，但随后进行的改革看起来未能对阶级相对性产生重要影响，社会阶级的不平等程度也未出现下降或衰亡的普遍发展倾向。

如果我们记得 20 世纪见证了人类教育经历的转变，那么上述这些结果就更加显著了。教育曾经是少数人的专利，而现在它已经在绝大多数人口中普及，并且几乎所有阶级都能获得如普通水平证书之类的考试证书。但是，阶级间的竞争条件并没有发生变化。我们有理由认为，可能教育政策对所有教育层面产生的影响，都大于对阶级不平等的影响。

虽然这里所述的结果看来十分显著，但应该强调的是，在其他许多国家也呈现出同样的发展模式，即总体教育水平提高了，但阶级不平等现象却一直存在 (Shavit and Blossfeld 1993)。因而阶级理论的中心议题，并不是阶级为什么在死亡，而是阶级为什么会如此顽强地继续存在。

## 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 社会阶级和利益形成<sup>①</sup>

杰弗里·埃文斯(Geoffrey Evans)

在发达的工业社会,当它们已越来越变得后工业的时候,关于阶级的辩论集中在它的死亡或相反这样的问题。但在目前的东欧,阶级的问题却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这里关注的不是工业主义的消亡是否带来阶级分化的消亡,而是当这些前共产主义国家在尝试向解决冲突的自由民主形式过渡的过程中,阶级是否可能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分裂形式,而它们以前则信奉无阶级的观念。另一方面,来自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的持不同观点的评论家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主要说明为什么后共产主义国家中的阶级分化最好地讲应该止息,特别是在同西方出现的情况相对比的时候更是如此。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社会学领域关于社会阶级作为不平等和利益形成的一个来源的重要性存在诸多争论,人们对市场化的反应程度和不同表现,也对这一地区的新的民主国家的政治特征具有潜在的重要影响,不管这些国家是否继续成为民主的国家。这些原

<sup>①</sup>这是专门为本书所撰写的论文。

因都是双重的。

第一,在转型过程中的“失败者”,包括广泛的社会群体——工人阶级、老年人、失业者,由于缺少自身利益的有力代言人,不可能获得自由民主游戏带来的利益。结果,他们很容易受反民主鼓动的民粹主义的影响。这种鼓动以市场化造成的穷困为依据,使自己传播的民族仇恨、国家扩张和集权的国家主义观点得到了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地区自由民主的民众基础看来很成问题。

第二,有人认为即便民主过程获得的支持相当广泛,但是在后共产主义政治竞争的整个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分裂的形式与结构,也对自由民主的稳定产生影响。种族排外和强烈的民族主义,对于跨集团政治动员来说难以适应。而那种支持市场倾向与国家干预倾向之间的争论却较为适合,后者成为许多西方民主国家左右翼分野和基于阶级的政治划分的关键轴心。结果,或由于民族分离或由于国际冲突,这样的进程容易使民主政体的稳定性受到质疑。这样,即便没有反民主运动的兴起,这种不能主要围绕经济运行而开展的民主政治竞争的代价,也使政治采取了不易谈判和更不稳定的形式。

简单地说,通过选举制度形成的阶级冲突的制度化,可能是民主统一进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缺少了它,弱势群体可能就去诉求于反民主的鼓动(参见 Zhirinovsky),或者政治可能受不易处理的分裂所困扰。这反过来又可能带来更加非民主的冲突解决方式的威胁(请参看前南斯拉夫的例子)。阶级利益的形成和表达可能同“健康的”民主进程相因而生,但是它在这里出现了么?或者说,在新东欧的初始时期,它的基本因素可以被人们看到么?

### 东欧的阶级分化出现了吗?

我们可以把关于东欧国家利益形成的讨论划分为两个一般性的主题。在每个范围内,都有多种政治的和社会学的层级,但它们可以综

合在一起来讨论,因为它们或者都使人们怀疑东欧地区是否形成了阶级分化,或者相反,它们为这种分化的出现提供了基础。

“大众社会命题”(Kornhauser 1960)意味着,共产主义条件下市民社会制度的瓦解,是在大众集体主义层次上——国家或社会——产生了一种利益表达方式,而不是在中间阶层的有组织的社会群体中。作为其必然结果,利益既不能很好地形成也不能很好地表达,而且人们预期它缺乏政治偏好的社会基础依据。这种观点的新近典型例子可见于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在美国社会学学会上的主席演讲(Lipset 1994),或见于研究东欧问题的专家关于市民社会作用的分析中(例如Lewis 1993; Schopflin 1993),甚至见于像戴维·奥斯特这样的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分析家的著述中(Ost 1993, 1995)。

例如,奥斯特列举了许多原因,说明在后共产主义的东欧社会中阶级利益形成的有限性。他认为,除了共产主义制度下对社会分化的压制和缺乏利益表达机制外,从1989年以来弥漫着反社会主义的意识,这与重视自由知识分子而不是工人阶级的目标的政治倾向相一致。试图消除阶级分化的国家政策,甚至在工会里社会主义信念的崩溃,都表明了这一点。西方的冷战思想及其对资本主义提供经济福利之优越性的强调,也抑制了基于阶级的方案对自由市场运作之纯粹性的替代。奥斯特甚至把一些移居西方的劳工的经历看做是他们降低了自己的其他任何期望,而只是自我满足于极不稳定的工作和市场地位的一个方面的表现。他认为,作为这些因素的结果,民族主义、宗教教旨主义和“大男子主义”等作为东欧工人阶级中对经济上的不满的非经济性反应而出现(Ost 1995:181)。在他看来,“由于共产主义结构……反共产主义的历史遗产和后共产主义政府的政策,阶级意识仍然很薄弱”(Ost 1995:182)。

同这些对后共产主义东欧地区阶级利益之重要性持悲观论调的看法相反,一些研究该地区利益形成的“现代化”和理性预期方法则认为,能够用以从资本主义利益酬报结构中获益的对资源的不同占

有,产生了支持——和反对——自由市场实践的明确的社会基础。现代化论者强调,在共产主义时代形成的利益冲突仍然对目前的利益形成模式发挥着作用(参见 Hamilton and Hirszowicz 1993:217~237 和 Frank Parkin 1971 关于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利益形成和不平等的模式的论文——两者都明显地与大众社会命题相反)。而理性预期方法则鼓励了那种强调现有资源的作用和未来前景的观点。例如,赫伯特·凯奇切特(Herbert Kitschelt)就认为,不管过去的情况如何,现在青年人、受教育良好的人、企业家群体都倾向于支持市场化和减少国家干预,而那些依赖国家的拥有较少资源的群体——靠养老金生活的人、工人阶级和农民——一般都反对它们(Kitschelt 1992:21~27)。这两个社会群体的差别在于他们对可转让资源的不同拥有,人们可以通过拥有这些资源来争取在新社会制度中的发展机会。

这样,关于利益形成的不同理论观点,显然得出了关于东欧阶级政治的非常不同的结论。还好的是,这些结论本身形成了可被经验事实检验的假设,这种检验是通过分析该地区社会阶级是否形成了阶级和政治利益的基础而进行的。对这些假设的检验能够表明阶级分化的显现程度及其对可能采取的分化结构形式的潜在意义。它们也向我们表明了不同历史环境下阶级分化的持续力量,以及阶级分析作为一种社会学行为仍然具有的意义。

## 数 据

为了考察上述这些问题,我要使用在东欧 9 个国家对社会结构和政治态度与行为进行调查所搜集的数据。这 9 个国家是: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和乌克兰,时间是 1993 年~1994 年。这些调查根据全国性概率样本,对回答者进行选择程序依据标准化规则,并在每个国家是具有代表性的样本结构

选择。回答率一般是很高的,在整个地区平均是 80%,未反应的情况主要是因为没接触。调查质量要经过后继调查来检测,也就是在几周后从始初调查者中随机选择 10% 进行再访。

每个调查包括 300 个相同或至少相当的问题。在它们用于主要研究之前,先在 50~100 个回答者中进行测试。通过几个月的翻译和回译,以及调查所使用的语言之间的互译,调查询问的各国间可比性就建立了起来。这一过程之所以能顺利进行,得益于纽菲尔德学院能够流利地讲斯洛伐克语和匈牙利语的一些人的参与,以及斯洛伐克和东欧研究学院一些学术翻译者的参与,还有东欧地区合作者的帮助。进一步的详细调查数据可在作者那里得到。

9 个国家处于非常不同的转变阶段,每个国家中影响利益之阶级基础形成的因素各不相同。埃文斯和怀特菲尔德 (Evans and Whitefield 1995) 对这里所涉及的多数国家提供了关于经济状况的总体看法,只是捷克和斯洛伐克除外——它们以及其他中欧国家的详细信息可以从维尼奇的著作中获得 (Winiiecki 1994)。为简要概略地描述起见,这些国家可被划分为 3 组: 中欧国家、巴尔干地区国家和前苏联地区国家。

中欧国家——捷克共和国、波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曾经处于转变的最前线。在捷克共和国,瓦西拉夫·克劳斯的经济改革可被令人信服地说是前共产主义国家中最为成功的,一个最有力的事实证明,就是他的支持市场的政府至今还在台上。波兰在 1990 年 1 月 1 日采用巴尔舍洛维奇的“休克疗法”计划,从而成为该地区国家中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带头者,尽管匈牙利甚至在 1989 年以前就实行一种半资本主义的经济。斯洛伐克可能是中欧国家中最不确定的国家,经过 1993 年的“天鹅绒分离”,使得斯洛伐克在经济上同富庶的捷克比起来显得情况较糟。另外,令人头痛的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然而这些国家中即便是最为富裕的,在 1988 年之后也是经常出现失业持续增加、实际工资下降、财政和外贸赤字不断扩大的情况。

这些不景气的统计数字也同其他情况相伴随：庞大的通货膨胀，减少的 GDP 和下滑的工业产出，尽管这些到了 1992 年走出谷底。因而在这些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代价同其带来的利益一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两个巴尔干地区的国家自然形成了第二个群组。罗马尼亚直到 1993 年才勉强走出共产主义年代。不论是经济的或政治的自由化，都没有明显的发展。生活水平很低，政治自由受到限制，同中欧地区的民主进程或同前德国经济腹地之间没有多少历史联系，只是特兰西瓦尼亚是例外，这里的少数民族构成大部分，成为内部冲突的持续根源 (Shafir 1994)。它在是凡尔赛条约之后判给罗马尼亚的惟一地方。保加利亚同样具有这种孤立的特征，尽管这里的民主体制相对来说很快稳定下来，前共产主义者也很快成为主导性的政党集团。同罗马尼亚的情况一样，这里社会关系和政治中也存在着民族问题，穆斯林少数民族倾向于加入反对前共产主义者的进步派系中，正如罗马尼亚的匈牙利少数民族那样 (Mcintosh et al. 1995, Heath, Evans and Marginean 1994)。

最后，前苏联地区有 3 个代表性的国家。俄罗斯是处于这个分解和崩溃的帝国的核心的巨人，尽管它由一位倾向西方和支持市场的领导人来统治，但其市场化还远未实现，民主进程也显然处于疑问之中 (Duch 1994, Whitefield and Evans 1994a)。乌克兰没有沿着自由市场道路走多远。甚至在立陶宛，虽然这里的前景看来好些，但到 1993 年为止，政府中还是包括许多前共产主义者 (Reisinger et al. 1994)。

虽然这些国家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但我在本章中并不是单独地考察每一国家。相反，我要通过对这一地区所作的合并分析，得出关于阶级利益形成的推论。在这一分析中，所有 9 个国家的样本被综合在一起，总共有 16 000 位被问者。无疑，下面的分析中所出现的变量的边际分布在国家之间是有略些差异的。然而在各个国家中，阶级地位



和其他变量之间的关联模式也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一致性；也正是这些关联模式——阶级地位与不平等的主客观方面之间的关联，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地位与政治态度之间的关联——对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最为重要。因而为了这个目的，结合的数据提供了该地区的简约特征化，它避免了由各国内呈现的复杂性造成的分散，同时并不歪曲国家内的关系结构。而且，被问者数目的庞大保证获得阶级差别的强估计，这样可以得出关于阶级划分的非常详细的解释。然而在论述这一分析得出的结果以前，我先要界定一下社会阶级是什么含义，以及它如何被测量。

### 对阶级位置的测量

正如约翰·戈德索普那样（参见他为本书撰写的文章），我不是把阶级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家与工人二元对立那样的含义来理解，或是作为社会经济差别的一种刻度尺。我所理解的阶级包括就业地位（比如雇主、自我经营者和雇员之间）的差别和广泛类别的雇员之间的差别。雇员之间的差别之所以提出，是因为“雇员实际上占据了一系列不同的劳动市场和工作职位，我们从中可以而且能够用阶级的术语得出有意义的差别”，如果我们关注雇员的“劳动合同”和“就业条件”中的差异（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 41）。雇员阶级基本的不同特征就是他们的就业条件、职位安全程度和“首要的，明确的职业机会”（1992: 42）。关于戈德索普的阶级概念，及其经由戈德索普的阶级图式具有的可操作性，埃文斯在其著作中作了详细论述（Evans 1992）。

社会阶级的度量是通过运用戈德索普和希思建立的运算法则来进行的（Goldthorpe and Heath 1992），同时运用了英国 OPCS 职业单元群组。在某些国家还使用了 ISCO 编码和地方信息来扩大加强，以便考虑进该地区农业职业的范围，以及由于前共产主义国家职业结构的

持续的复杂性所作的修正。从结果的模型中得出下面的类别：

阶级 1	专业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
阶级 2	低级管理人员和半专业人员
阶级 3	日常非体力工人和服务工人
阶级 4a	雇主
阶级 4b	自我经营者
阶级 5	工头和技术人员
阶级 6	熟练的体力工人
阶级 7a	半熟练和不熟练的体力工人
阶级 4c	农场主
阶级 7b	农业工人

按照惯例，在下面的分析中采取这样的分类：阶级 1 和阶级 2 被称为“薪水阶层”，阶级 6 和阶级 7a 被称为“工人阶级”，阶级 4c 和阶级 7b 被归入“农民”范畴。阶级位置的分配根据的是被问者的职业和就业地位。正如最近的研究认为的那样，在东欧，基于个人基础的位置分配可能是最有效的策略（参见 Marshall et al. 1995）。至于那些现在没有工作的人，我采用他们最靠近现在的时间所做的工作。

在东欧，职业特征可能既反映了前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也反映了正在萌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不可避免的是，把在西方发展起来的阶级图式应用到东欧，是十分困难的（尽管这样的阶级图式在东欧运用操作时也呈现了令人鼓舞的迹象。参见 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所以可能的情况是，同在英国情况相比（参见 Evans 1992），阶级概念在东欧国家相对难于使用和操作。然而，在我们对后共产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进行理解的现阶段，即便是从不完善的测量中得到的观察结果可能也是很有用处的。总之，当前测量方法中的任何缺陷造成的主要结果就是，同从改进的阶级指标中得出的结

果相比,对阶级之间的区分可能被估计不足。这样,在东欧国家阶级概念操作方法的精确化,将不会降低关于该地区阶级重要性之论断的意义,相反,他们将会强化把阶级地位作为利益基础的重要性。

## 分析

### 阶级划分的物质基础

在这一部分,我将对物质的不平等及其主体对应者进行评价,这可能为与阶级相关的利益表现提供基础。这样,一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是,如果考虑可转移资源和受制度规定的未来前景,东欧是否存在阶级的区分——这是上面描述的就业条件上的阶级差异的关键方面。另一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是,在最近的5年里,各阶级是否经历了各自不同的显著变化,以及在未来的几年中是否也预期这样变化(参见 Evans 1993)——这可能被认为对于基于阶级的政治倾向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首先我要考察的是,根据收入水平、经济安全程度和经济改善机会,阶级位置是否能够造成个人之间的差别。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虑不同阶级的成员所拥有的资源,还要详细地考察他们的就业前景。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在表 17.1 中列出了每个国家中的每个阶级在下述方面所占的比例:较高程度的教育,高家庭收入,处于职业阶梯上和处于失业中。正如所预期的那样,在阶级位置和教育获得之间存在着很密切的关联。失业、收入和职业阶梯上的位置也像预期的那样同阶级位置相关,尽管程度不尽相同。

教育和阶级之间的联系,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先前教育获得对当前阶级地位的影响,但也能说明的是,薪水阶级同其他阶级相比,在对可转移的教育技能的占有上具有较大的优势,他们能够利用这种优势从与自由化相联系的机会中获益。收入当然不仅仅在于作为一种物质资源的用途,而且因为它标志着是谁从转型中做得好——这显然不是工人阶级:薪水阶层、企业家和经理同农民和工人阶级比起来,在

表 17.1 东欧 9 个国家中根据社会阶级区分所显示的 不平等指标(全部数字为百分比/%)

	戈德索普的阶级划分									
	阶级 1	阶级 2	阶级 3a+3b	阶级 4a	阶级 4b	阶级 4c	阶级 5	阶级 6	阶级 7a	阶级 7b
较高教育程度	67	38	6	22	6	7	8	1	1	1
失业比例*	4	6	9	3	6	5	6	11	13	16
处于职业阶梯上的比例**	36	33	21	—	—	—	24	16	16	13
高收入比例(最高四分位值)	41	29	19	45	32	18	33	23	18	12
N=	(1 346)	(2 870)	(2 196)	(122)	(347)	(388)	(662)	(2 489)	(3 352)	(1 200)

\* 基于目前就业的或有工作的被问者做出的计算 N=10 087

\*\* 基于目前就业的被问者做出的计算 N=8 970

高收入人群中明显占很高的比例。特别是对于后者来说,同其他阶级相比,失业——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官方统计中不存在——则更可能成为转型的结果。最后,未来就业前景也呈现出大体同样的差别模式:薪水阶层同其他阶级比起来,在职业阶梯上占明显较高的比例,尽管有人认为同英国的数据比起来,即便是薪水阶层在职业阶梯上的比例也要低得多。

这些客观的阶级差别也反映在近些年来所经历的有关生活水平的经济转变后果上,以及对未来所持的信念中。表 17.2 表明,各阶级在过去的 5 年里所遭遇的经济变化是不同的,而且他们对未来 5 年的生活预期也各不相同。薪水阶层和企业家在共产主义结束后不仅仅更有可能提高生活水平,而且也能预期这将持续下去。相反,农民和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则有明显下降。他们对未来也有较大的希望,但同其他阶级比起来,仍然缺乏信心。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对提升前景的认识上。这样,就为表 17.2 中显示的关于职业阶梯的数据添加了主观性证据。较一般地说,工人阶级更有可能被证明是没有什么途径来改善他们家庭未来的生活水平。这样,关于预期方面的主观性证据证实了从资源上的阶级不平等中得出的预测。

总而言之,我们从本部分呈现的证据中可以看到,不同阶级的成员拥有不同的资源以从市场化中受益;经历着与转型相联系的不同的经济变化,而且同样具有不同的未来预期。尽管不应忘记的是,社会流动的影响至少能部分地解释阶级之间生活水平的差别在过去 5 年间的变化,但是阶级之间关于未来预期的差别却不能用这种方法来解释,关于对正在扩大的阶级不平等之认识的证据也不能这样来解释。的确,阶级位置与这些对当前经济变化的认识和对未来预期之间的关系,只有一定程度的解释力量,但是这些阶级却可能在已是不平等的起点上开始了转型过程。所以我们正在观察到的是与阶级位置相联系的经济状况的两极分化,不同阶级的被问者认为这将带来不同的前景,并预计在未来的 5 年里阶级分化还会扩大。

表 17.2 不同阶级的经历和预期 (所有数字为百分比/%)

	戈德索普的阶级划分									
	阶级 1	阶级 2	阶级 3a+3b	阶级 4a	阶级 4b	阶级 4c	阶级 5	阶级 6	阶级 7a	阶级 7b
在过去 5 年里家庭生活水平改善	21	18	16	35	29	19	13	12	9	6
预期在未来 5 年里家庭生活改善	31	31	29	44	40	27	27	26	24	16
没有机会提升的比例	37	42	50	—	—	—	40	49	61	59
没有途径提高当前生活水平的比例	24	28	30	18	18	39	30	32	38	56
N=	(1 346)	(2 870)	(2 196)	(122)	(347)	(388)	(662)	(2 489)	(3 352)	(1 200)

## 阶级意识的证明？

阶级之间不平等的情况是很明显的，但是它本身不能为推断阶级利益的形成提供充分的基础。因为后者的发生，需要人们认可自己的阶级地位并将其视为影响自己的收益和代价的重要原因。这需要人们既应该意识到自己在一个阶级中的成员身份，又要意识到阶级之间的不平等情况。所以考察这种意识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评价被问者是否接受阶级的标识和是否愿意把自己归属于一个阶级，以及这些自我归属的位置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同根据戈德索普阶级图式所决定的他们的客观阶级地位相符合。如果我们想要做出如下推断，即通过在一种阶级类型中的自我定位而做出的阶级认同表达，是以基于阶级关系的经历为前提条件的，那么后一个关于阶级意识的评判标准就是特别重要的。

表 17.3 中第一栏显示了被问者对关于阶级身份认同问题的回答的分布情况。该问题是：“这里列举的是（本国）目前所存在的社会群体。您觉得自己是属于其中的（表上列举的）哪个群体呢？”提供给被问者的社会群体分类是基于初步研究和当地被调查者的信息而选择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有 80% 多的人把自己归入这些社会阶级中的一种，并认为自己不需要进一步提升。而且，被问者中没有选择自己属于一个阶级的人，大多数在调查时实际上没有处于劳动市场之中。

这样的证据本身就表明，东欧国家的人是意识到自己在一个社会阶级中的位置。另外，表中其他的栏目也显示，认同于某个特定阶级的倾向确实是同被问者在戈德索普阶级图式中的位置相联系的。毫不奇怪的是，对于那些在戈德索普图式中所处的阶级位置同用于评价自己阶级身份的标识有交叠之处的被问者来说，这种情况尤为显著：阶级 6 和阶级 7（体力工人）、阶级 4（企业家）；以及阶级 1 和阶级 2（知识分子）。至于处于中间的阶级——日常非体力工人，工头和技工，他

表 17.3 所有被问者的阶级身份认同和依据戈德索普阶级图式所处的  
阶级位置(所有数字为百分比%)

	戈德索普的阶级划分										
	阶级 1	阶级 2	阶级 3a+3b	阶级 4a	阶级 4b	阶级 4c	阶级 5	阶级 6	阶级 7a	阶级 7b	
体力工人	40	6	13	34	27	27	18	46	77	73	31
企业家	5	6	5	5	47	42	2	2	3	2	1
经理	5	15	11	6	4	2	4	9	1	1	1
知识分子	23	61	54	27	13	5	4	18	3	4	2
农民	11	2	2	5	4	9	67	5	5	8	53
以上都不是	17	10	15	24	6	15	6	19	11	12	12
N=	(16 306)	(1 346)	(2 870)	(2 196)	(122)	(347)	(388)	(662)	(2 489)	(3 352)	(1 200)



们在自我定位选择中呈现出更强的异质性。至于农业工人,他们也倾向于使用体力工人的标签,或者农民的称呼。总而言之,这些资料表明,在整个东欧国家,主观的阶级身份认同表达是与被问者“客观的”的阶级地位的经历存在着切实的联系。

尽管东欧国家的人认可自己在一定的社会阶级结构的位置,但这本身并不意味着他们形成了对于阶级利益的认同。如果要把后者具体化的话,那么他们对自己所处阶级地位的优势和劣势的认识就是必需的。所以下一步,就是考察被问者是否意识到这些结果以及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他们是否意识到社会转型对各阶级的影响。如果预设他们自己已认同定位于某一阶级的话,那么,他们是否意识到该阶级的相对利益和代价呢?这些是否为不同的阶级利益的表达提供了一个基础呢?

表 17.4 所显示的数据,提供了各阶级对在过去的 5 年所经历和遭遇的情况的认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东欧地区的绝大多数人对于某些阶级所经历的情况的认识是一致的。企业家和经理几乎被一致认为是从变化中获得了许多利益;许多人认为知识分子阶级也从转型中获益颇多。相反,大多数人认为体力工人和农民承担着许多代价。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对各阶级遭遇的认识,是依他们所处的阶级位置不同而有差别的。例如,薪水阶级中的许多人并不认为知识分子群体从过去 5 年的变化中受益,而体力工人和农民却持不同的看法。但是,这种分歧并不适用于对农民和体力工人的命运的认识,几乎所有阶级的被问者都认为农民和体力工人失去很多。

如果我们考察人们对未来 5 年的预期,就会发现相同的模式。虽然人们对农民和工人的命运的未来预期要比对其近期遭遇的认识要积极得多,但是许多群体认为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将继续分化下去。这种分化将可能是出现阶级差别的很好证明。这种阶级差别是对当前东欧国家正在进行的经济剧变的反应。

表 17.4 关于经济转变对各社会阶级造成的不同结果的认识  
(所有数字为百分比%)

被询问的群体	在过去的 5 年里生 活水平下降	在未来的 5 年里生 活水平可能提高
体力工人	77	29
企业家	6	64
经理和管理者	6	61
知识分子	37	45
农民	67	33
N=16 386		

## 👉 阶级利益出现了么？

我们现在评判一下各阶级是否形成了表达内容不同的利益。关于什么是利益表达，我认为它意味着在政治和经济倾向上出现的阶级差别，特别体现在以下两种相反的倾向上：一种是关于支持自由市场不受干预地运行的倾向，以及拥护其附带的与阶级相关联的不平等；一种是支持强有力的国家干预，以限制市场的运作，有利于较大程度的社会条件平等，减少社会结构上的生活机会的不平等。这样，如果确实发生了经济条件的阶级分化的话，那么这就应该造成支持和反对继续自由化之不同的阶级基础的形成，两者都涉及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总体目标，以及关于经济政策的更为具体的方面。其含义在于，对东欧国家的利益之阶级基础的分析所要解决的关键政治问题，就是由转型造成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经济上的怨恨，是否导致他们对自由市场的拒斥，以及对解决冲突的自由民主模式的拒斥。

对这些问题的调查，首先向被问者询问的是他们支持建立民主市

表 17.5 各阶级对自由市场和民主的支持(所有数字为百分比%)

		戈德索普的阶级划分									
		阶级 1	阶级 2	阶级 3a+3b	阶级 4a	阶级 4b	阶级 4c	阶级 5	阶级 6	阶级 7a	阶级 7b
支持自由市场目标的比例		79	74	64	79	74	55	66	61	55	42
支持民主目标的比例		73	68	56	69	57	52	59	57	50	42
N=		(1 346)	(2 870)	(2 196)	(122)	(347)	(388)	(662)	(2 489)	(3 352)	(1 200)

场社会的目标的情况：“您是如何认识（本国）采取政党竞争民主制度这一目标的？”和“您是如何认识建立一种以私有制和企业家的经济自由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表 17.5 显示了支持和反对这些目标的阶级的分布情况。

我们从表 17.5 中可以看到，在表达自己支持自由市场和民主的情况时，各阶级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工人阶级的被问者在这一问题倾向于分化，而在薪水阶级和特别是企业家阶级中，可以预料的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倾向于支持。然而，如果我们超越对支持民主和自由市场的“目标”的基本原则的询问，而是考察被问者对从市场经济运作中产生的一些问题的看法，这会是有用途的。随着调查时间的延续，这些看法和态度同那些对“民主”和“市场”带有感情色彩但又重于言词的偏好倾向相比，它们要有用得多。我们也从西方的调查中知晓，这些要依赖于某些特定的问题所产生的环境，所以有可能在支持抽象的自由化与对具体的政策建议的态度之间存在着不一致的情况（参见 Mann 1970）。还好的是，在调查中有一些集中于经济政策的更具体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把自由市场政策同国家干预政策并置在一起。表 17.6 显示了各阶级中支持干预和支持市场的反应的比例。

尽管我们从表 17.5 中观察到绝大多数人支持自由市场，但显然当涉及更为具体的政策偏好时，东欧人总体上看是某些程度上的干预主义者。然而毫不奇怪的是，正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为国家干预政策提供了最强的选举基础。在过去的两年里，奉行干预政策的各社会民主党政府被推上东欧的政治舞台（参见 Whitefield and Evans 1994b）。

然而，如果不把阶级的影响同经济政治利益的其他社会基础的影响加以比较的话，就可能难以有把握地评价阶级的政治重要性。毕竟，一些其他因素对经济政策态度的社会影响可能要比同阶级相关的影响还要重要。如果这是实际情况的话，任何关于阶级政治重要性的观点都要重新加以考虑。

能够纳入关于利益之社会基础的比较分析之中的因素是不难看

表 17.6 社会各阶级对经济政策的态度的态度(所有数字为百分比/%)

	戈德索普的阶级划分									
	阶级 1	阶级 2	阶级 3a+3b	阶级 4a	阶级 4b	阶级 4c	阶级 5	阶级 6	阶级 7a	阶级 7b
政府应该致力于保证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和好的生活水平或者	52	59	70	57	55	66	65	70	72	73
政府只是应该让每个人自由行事	32	24	15	29	33	13	22	16	15	11
一些人认为政府不应关注人们收入平等问题或者	49	42	33	55	42	27	42	34	31	26
政府应努力使收入差别最小	30	34	44	27	36	46	39	43	48	45
政府应把所有的重要产业变为国有	45	46	50	49	46	56	54	55	54	55
或者政府应把所有的重要产业变为私有	28	26	21	30	30	20	22	20	18	12
政府只应让私人企业自主决定工资、价格和利润	49	43	39	54	49	25	39	36	31	24
或者	35	40	42	34	35	45	46	45	49	49
政府应该控制工资、价格和利润										
N=	(1 346)	(2 870)	(2 196)	(122)	(347)	(388)	(662)	(2 489)	(3 352)	(1 200)

到的。正如凯奇尔特在上面所指出的,年龄对于个人在市场化上的反应很可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同样,男性对于公共领域不断增强的控制,经常被用于证明性别是利益的重要基础(Watson, 1993);在私人与国家领域中就业,被认为能进一步影响人们对国家干预政策的态度。依靠诸如失业补贴和养老金形式的国家施与等,也影响人们对经济政策的态度(Dunleavy and Husbands 1985)。收入差距也可能是影响人们支持市场化程度的重要因素。所以,把阶级地位对人们关于市场与国家干预政策的态度所产生的相对影响,同收入、年龄、性别、就业领域和国家依赖等因素所造成的影响相比较,是很有用处的(关于进一步的比较,请参见 Evans, 1996)。

为达到这一目标,我在下面列出了一个回归分析的结果,它把一组“经济意识形态”作为因变量(如可预测的事情),把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态度并置在一起,通过把表 17.6 中的四项分值结合起来进行建构(所有项目都作了编码,所以高分值表示的是支持自由市场的态度,低分值表示的是支持国家干预的态度)。为评价对经济意识形态造成的不同影响效果的相对程度,读者只需要观察表中显示的系数大小。<sup>①</sup>

表 17.7 表明,即便是测量得非常粗糙(参见技术性注释),社会阶级对经济意识形态的影响也要比其他任何社会特征造成的影响要

---

<sup>①</sup>表 17.7 模型中的自变量是按照如下方式测量的:年龄按年份;性别(编码男性=0;女性=1);被问者是否依赖国家救济金(否=0;是=1);失业(否=0;是=1);在或者正转入私人领域(否=0;是=1);自我报告的收入。阶级的影响是通过一个简单的三范畴测量标准表示的:(1)“薪水阶级和自我经营者”(包括阶级 1、阶级 2、阶级 4a 和阶级 5b);(2)“中间的”阶级(阶级 3 和阶级 5);(3)“工人阶级”(半熟练和不熟练的体力工人)。测量值计分为 3,2,1。更复杂的分析使用虚拟变量代表阶级和就业领域(如包括合作社)的影响以确定结果。模型中也包括进代表国家的一系列虚拟变量(这些系数没有报告)。测量经济意识形态的因变量是一个 4 项的李克特标准(Likert scale),根据提问用词的方向等分平衡,以降低默认的反应偏好。内在连续性只是中等的(克隆巴赫的阿尔法值等于 0.51),如果考虑到数值中项目的小值和平衡后的用词方向,这是可以预期的。使用 10 项的测量标准的分析产生同样结果(关于这些测量问题的进一步详细论述,请参见 Evans and Heath 1995, Evans, Heath and Lalljee 1995)。

表 17.7 经济意识形态对社会阶级和其他可预测因素上的回归  
(所有数字为百分比)

	标准化的贝塔系数
阶 级	0.19
年 龄	-0.14
女 性	-0.08
私人领域	0.06
失业者	-0.04
靠养老金生活者	-0.03*
收 入	0.02*
$R^2$	0.124

所有系数显著值  $p < 0.01$ , 除非其他显示

\*  $p < 0.05$

$N = 14\ 378$

大。自主经营者和薪水阶层更倾向于支持自由市场,而农民和工人阶级则更加倾向于支持国家干预,一些处于中间的阶级——阶级 3(日常非体力工人)和阶级 4(工头和技术人员)则介于上述二者之间。年龄对经济意识形态的影响是第二位强的,年纪较大的被问者多倾向于国家干预主义者。此外,同在前苏联进行的调查一致(Hesli and Miller 1993, Tedin and Yap 1993),女性同男性相比,较少倾向于自由化。而在国家领域就业则与支持市场的态度相联系。最后,失业和接受国家救济的影响也是可预测的,尽管较小,但两者都使人们偏好支持干预政策。有意思的是,收入的影响是最弱的。这些结果进一步为我们对阶级的强调增加了力量——这里关注的是获得收入的条件,而不是收入水平本身。

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共产主义条件下市民社会的缺失并未导致后共产主义的东欧缺乏利益的结构性分化。可以预见的是,正是工人阶级、农民、老年人、失业者、靠救济生活的人、国有部门的工人和妇女——这些人在转向自由市场的过程中无疑是丧失最多的——反对市场的运作。然而在这些社会划分中,只有年龄同社会阶级的实际

影响大体相当。而且,如果考虑到阶级位置对诸如失业倾向等造成的影响的话,那么表 17.7 提供的分析可能还低估了这些影响的程度。

## 👉 结 论

我们已经看到,在当前的东欧社会,阶级地位是资源和条件的广泛不平等的一个显著标识。这些不平等依次地被反映在不同社会阶级的成员在转型过程中遭遇的命运中。社会阶级概念本身对于东欧人来说也是明显有意义的,他们在一个分类图式中的自我定位,也表明同约翰·戈德索普发展起来的理论上的社会阶级图式有很大的交叠。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在转向市场经济的目标和方法上的阶级分化已经出现,而且可能会塑造该地区政治竞争的性质。即便把其他社会差别也考虑进来,阶级地位看起来对于政治和经济利益也是很重要的。的确,如果考虑经济状况的两极分化和东欧地区人们相应的明显遭遇,我们可以认为,甚至我们能够预计,在东欧地区,政治的阶级基础比在西方国家还要强。

当然这并不否认,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各阶级内部的经历是复杂多样的。例如,在重工业部门的工人要比在服务部门的工人的状况要差——虽然重工业在东欧经济中是衰退领域这个事实是影响工人就业的主要原因,但是经济重组过程却使处于最脆弱阶级中的人受创尤甚(《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研究》,专刊 1995 年)。而且,如果我们把该地区阶级分化的相对严重性和模式同西方国家类似的经验证据(参见 Evans 1993d 中关于 8 个西方国家在身份认同和政治态度上的阶级差别研究)相比较就会发现,尽管对阶级身份认同和对再分配与不平等之态度的测量方式有所不同,但阶级分化的模式却很相同。这些身份和态度在东欧地区同西方比起来,它们同阶级的相关性并不逊色。

尽管我们非常重视这样的阶级分化对阶级政治发展的潜在意义,



但是必须认识到的是,利益表达中的阶级分化不一定就转化成任何其他形式的工业或者政治行动。而且,虽然它们能够影响政治选举的结果,但是东欧各政党的纲领中反映和纳入的关于阶级利益分化的程度,是以多种多样的制度因素为条件的。这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我们对阶级利益形成的考察范围,因而并没有进入本章的内容。毕竟,阶级分析不能被期望用来解释精英竞争的复杂性。但是,它能够指出从东欧经济关系结构中产生的利益分化所提供的限制和机会,及其通过各种形式的政治行为和公众舆论进行的表达。后者是特别重要的,它能够把信息传递给政党和总统候选人,如果他们想当选的话,就要依据它们进行活动。在这个方面,怀特菲尔德和埃文斯(Whitefield and Evans 1994b)为东欧地区正在形成的政治行动者的纲领与选民政治偏好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清晰的证明。所以我们并不奇怪,在过去的两年里社会党在选举中接二连三地胜利。在转变之后的初期,东欧选民可能只满足于消灭他们不喜欢的制度,但是这种“消极的政治遗产”很快就让位于某种形式的基于利益的政治。这样的政治实际上并不需要是关于阶级的——在某些国家,例如爱沙尼亚,在其民族结构中,民族分化贯穿甚至是主导不平等和经济政策的阶级分化(参见 Evans and Whitefield 1993)——但是在缺乏其他有力的政治分化资源的地方,我们可以预期与阶级相关的问题将占据中心地位。

这个过程可以这样表述:市场化的代价是很沉重的,弱势社会群体的人正意识到,是社会民主,而不是自由市场民主,是他们偏好的战略。从这个方面讲,左翼浪潮,在很多情况下是前共产主义者,席卷了最近的东欧选举。这也许是该地区民主健康的最好显示,尽管利普塞特和其他理论家认为这取决于这些社会民主主义政府的有效性(Lipset 1994)。

像瑞典那样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府能否在如此困难的经济条件下有效地运作,这仍然需要继续观察。我们能从上面的证据中能有把握地得出的结论是,阶级地位是——正如它在其他地方一样——一个人在

转型社会的代价与利益矩阵中的位置的关键标识,这样它必然对利益模式产生普遍深入的影响,而这些利益模式正改造着后共产主义民主社会的政治冲突。



---

## 主 编 结 论

---



## 弱阶级理论或强社会学？<sup>①</sup>

戴维·J.李 (David J. Lee)

在这篇编者结论中，我要为“强”阶级概念作辩护。同前面的作者一样，我接受下面的事实，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过去的世纪里作为“强”阶级概念理论的主要代表，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继续追随它的人中有许多也广泛地承认这一点，尽管其中大多数不像我这样认为它的破坏是致命的。但是，关于“阶级死亡”的批判也是有缺陷的。它包含着一种取消性的谬断。根据这样的论断，因为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必须做到两点：（1）在社会学中抛弃掉所有的“强”阶级解释的尝试；（2）接受那种个人主义的“弱”阶级理论以及与韦伯理论相联系的方法。据我看来，这种状况没有在实际中形成。而且，正如我将论述的那样，那种认为“弱”和“强”阶级分析是彼此排斥的观点无论如何也是错误的。

“强”阶级解释包括这样的观点，即阶级——同其他许多社会现

---

<sup>①</sup>我要感谢那些在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系的各方面同事提出的建设性批评和讨论意见，特别是要感谢特德·本顿 (Ted Benton)、戴维·洛克伍德 (David Lockwood) 和约翰·斯科特 (John Scott)。

象一样——必须在一定意义上被理解为是社会关系的一种性质，它不能只是被约减为个人的状况和行为。的确，阶级经常塑造和约束——在这个意义上也是解释——特定社会主体的个性，使其成为他们所是的人或群体。我把这样的解释方法视为是使社会学本身具有独特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我在这里没有更多的篇幅为其进行合理的辩护，但我认为“强”阶级理论的辩护是总体上保持和加强社会学专门学科的一个关键内容。

所以，下面的论述就是要尝试说明一种强阶级解释如何能在社会学中得以恢复，它将解决本书中前面的作者所提出的一些关键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承认马克思的一些洞见是值得保留的。支持性的论据可分为四个部分：方法论的、理论的、实际的（在较一般的意义上说）和政治的。

## 阶级解释的方法论

在《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有一段著名的话：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Marx 1934：10）。

这段话包含着社会学中的一种所谓的结构—行为问题。最简单地讲，就是如何理解以下这两者的关系：一方面是由客观的环境和条件所决定的社会行为；另一方面是由主观愿望、“意图”和理智所决定的社会行为。上面援引的这段话的准确含义，作为理解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的一个向导，经常引起人们很多的争论。然而，我们可以把

这段话在其表面意义上仅理解为一种简单但却是重要的方法论洞见：即为了理解社会行为，就必须运用不同层次上的分析来进行研究。不同层次上的分析，诸如“结构的”和“行为的”等等，都是从复杂的现实中得出的必要抽象。然而，它们之间不具有可比性，不能将一个简约为另一个。其意义在于——马克思本人也是经常没有注意到——任何一种尝试把结构和行为包容进一种同样的解释框架中的雄心勃勃的理论努力（或者像吉登斯那样用其“阶级结构化”概念将它们合并的努力），都将成为简约主义的，都将导致像霍姆伍德和斯图尔特所说的那样的失败（Holmwood and Stewart 1983, 1995；参见 Giddens 1973）。

正是现存各种版本的阶级分析中的这种简化法，是“阶级死亡”辩论术的核心。例如帕尔就发现，正是“结构—意识—行为”之简化法的“魔咒”，成为城市社会学和阶级分析中的病症。看来韦伯主义的后现代批评家们所作的阶级分析也是在这样或那样的伪装下在说，正是阶级这一概念本身依赖于集体主义方法论的简化。

可是，韦伯主义的“弱”阶级分析方法本身也是一种简化主义，尽管它走到与马克思主义截然相反的方向去。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阶级分析冒着把所有的阶级现实问题简化为决定性的结构问题时，韦伯主义的阶级分析却倾向于把所有的阶级分析问题简化为个人的阶级位置、状态、行为和意图的问题。实际上在韦伯的著作中，存在着已被许多人认为是紧张的关系。一方面，他致力于研究许多看起来是无可置疑的社会学的实质性问题，当然也包括阶级；另一方面，他倡导一种方法论，它使成功的社会学解释的轨迹“在意义层次上是充分的”。但不幸的是，在他的社会学的继承人看来，韦伯是倾向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把自己同社会科学中的简化传统结盟，反对我在这里所界定的“强”社会学。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通过奥地利新古典经济学，传至哈耶克、波普尔、弗里德曼和其他的人，它倾向于不仅仅拒斥马克思主义，而且也否定任何形式的方法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这种方法论



的个人主义如果坚持到极端，就会运用哲学的绝对命令否定马克思理论的原则，即社会现象（包括阶级）必须要在各个单独的层次上来研究。但是正如我们在导论中所看到的那样，韦伯主义的阶级分析也被迫默认地包括进“结构的”隐喻。

为了否定一种形式的简化主义，我们强调不能因此就被迫投入另一种简化主义的怀抱。通过在马克思主义的废墟上恢复“强”阶级分析，我并不认为它要比“弱”阶级分析要“好”，或可以取代后者。我们不能同时研究所有的事情，况且每种方法都适用于不同的问题。“强”问题不能用“弱”理论来解释，“弱”问题也不能用“强”理论来解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在共产主义崩溃之后，阶级分析的理论家们就有可能逐一“脱去”不同形式的阶级分析外衣——先是“强”的，然后是“弱”的——那我们就会看到，皇帝最后如果不是一丝不挂的话，也是穿的很少了。这里需要做的说明是这种比喻仍然存在而且很合适。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一个迄今为止最为准确的阶级解释，以及一种决定什么时候和为什么强阶级分析适用的方法。

## 结构、意识和行为

马克思关于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的暗示，提出了一种关于强阶级分析更深层的方法论见解。现存分析方法中的解释失败和简化主义的后果之一，就是他们未能发展起系统地认识帕尔所说的中性术语“曼特罗”（mantra），也就是意识。关于社会科学中思维过程的地位，关于社会学家忽视或重复论述——尽管以一种非常天真无知的方式——心理学中类似的问题的倾向，可以写一篇长的论文。他们在纯粹思维——即完全可以归于心理学家做的事情——与纯粹社会的事情之间，发展起一种令人遗憾的二元论。不幸的是，学习和研究“社会”事情的学生还得必须承认像认识和“意识”这样的“心理”现象——饰以各种各样的概念，如与“目的”、“认同”、“自我形

象”、“意识形态”以及当然包括的“阶级意识”相联系的“典型含义”、“理性”等——是介于“作为结构的社会”和“作为行为的社会”之间的,反之亦然。但是,除了一个例子之外,可以说现在几乎没有有什么可用的关于集体意识或社会思想的严肃的理论。

这个例外当然是涂尔干及受其影响的追随者的著作——其中苏联心理学家维戈斯基的著作是最为重要的,只是因为对他的著作的重新发现鼓励了心理学的社会学转向(Kozulin 1990)。但是在这一传统中,意识/认识既是结构也是行为的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二者之间的黑箱子。因为涂尔干很少直接地谈及阶级,所以阶级分析就成了社会学领域中实际未受其思想影响的地方。这是令人遗憾的,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涂尔干(主要经维戈斯基重新阐释)为一种集体性心理生活的“强”理论开创奠定了一种非常细微的基础。在这种方法中,社会关系既是精神建构的,也是“物质创造的”(Fletcher 1971, 2:271)。

首先,如果仔细阅读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规则》就能发现,他认为在建构社会学解释框架的过程中,理解社会关系(“社会”)是如何制约和限制个人的自我主义是很重要的,不管它是以理性计算或以非理性“激情”表达出来。因为它们在潜在程度上都是无限的,所以这样的约束是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义务得以持续的前提条件。第二,在他的全部作品中,涂尔干开创了一种集体认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个体行为(“分类”)的精神界限建立起来,并通过它,使社会关系和个人行为同时被赋予了一种“结构”。这种集体思想的基本因素并不是机械的条件作用,而是一方面关于事情和行为的积极分类,另一方面关于人的分类。这种分类,至少从短期和中期来说,是一种“既定的”集体“表达”,就是集体意识状态,包括语言和信仰等,它们表达了“群体用以思考自己同影响他们的客观事物的关系的方式。”(Durkheim 1964)应该强调的是,这些原则中的每一个都不是理论,只是涂尔干所阐释的方法论原则基础对于强社会学解释是重要

的——也是经验地确立解释的正确性时所要表明的。还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每一个都没有违背解释应该意义充分的原则,但它们确实要求一种关于不同层次意义的分析。

那么在这里,如何运用这些同样的原则来捍卫强阶级分析呢?最要紧的出发点就是建立起阶级的“集体表达”。然而,涂尔干自己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正如他的理论的阐释者看到的,他感到自己能够具体描述出这种集体表达,前现代社会正是通过这种表达来约束自己成员的行为:法律、道德和最伪劣的宗教,它用其强有力的宇宙秩序分类、运用它的仪式和象征符号以及对自我主义滋长的有力控制,正如我们今天所经历的那样。然而,现代工业的劳动分工削弱了集体情感的同质性和一致性,代之以一种“组织性的”团结,其中强调个性和关于个人与自我利益“牺牲”的政治信条。这样的秩序是如何能够更有效地同时建立起任务分工又保证为个人热情划定界限呢?

通过对图腾崇拜的细致研究,他试图发现解决他所称谓的“现代人类的宗教本质”的问题。实际上,他本应去探寻的是现代金钱的宗教本质。难道不是金钱成为了真正令人敬畏的集体表达吗?它在很大范围内决定个人化取向之法理社会中个人行为的组织形式和界限,而且使其真正对集体负责任。然而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详细论述的那样,在金钱作为集体表达的作用中,也隐含着对现代工业社会中阶级的持续存在进行非简化主义的理论解释的线索。

## 金钱、资本和“强”阶级理论

关于金钱的重要观点是认为它是一种形式的权力。但是,权力可以按照强的意义和弱的意义来理解,也就是在不同的分析层次上来理解。韦伯在对权力的著名定义中,典型地把权力作为一种“含义”和“意图”,也就是“理解到自己抵制他人反对的能力”。权力也可以按照涂尔干的强的意义来理解,也就是社会关系总体上对个体行为

者——个人或诸如组织和群体这样的集体——的约束和影响 ( Geiger 1947: 242~345 )。的确,韦伯意义上的权力如果不归结于“强”的意义也就是社会权力,它就没有确定性。依我看来,这恰恰就是金钱和阶级权力是如何联结的说明,也是为什么阶级仍然是这样一种稳固的和重要的“权力分配现象”(韦伯的用语)的原因。一位人类学家注意到,金钱经常既是“头”也是“尾”,就是说,它一方面是一种法律和权威的集体表达,另一方面却被既定宗派的社会主体所掌握 ( Hart 1986 )。或者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通过金钱,特别是积累起来作为资本的金钱,社会对于人类行为(以劳动的形式出现)的一般权力转化为被特殊的人所使用的权力。

然而我们要合理地理解这个过程,就必须摒弃马克思和韦伯的相关观点。正如他们的方法论存在缺陷一样,他们对货币和资本的定义也存在着缺陷。特别是,他们一直是以各种形式在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思想范围内进行思考 ( Lee 1994: 401~403 )。例如马克思就认为,资本的积累只有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才有可能。这样关于“生产”的具体强调,继承了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但立即开始就给他的阶级理论带来了问题,因为它把阶级关系同在私人所有的制造工业中“生产”的传统工人阶级的存在联系在一起。这样,它就无法解释 20 世纪的联合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国家和“工业”之间的相互渗透稳定地发展,“非生产的”中间阶级管理者和经理成为重要的职业群体。马克思也未能充分抓住在“生产”领域之外资本积累的重要性。通过金融和投机,公司可以控制和使用国家收入。正如银行家们认为的那样,现在是社会学抛掉马克思具体强调生产的观点的时候了——资本是任何一种积累起来的和可管理的货币。

的确,韦伯作为马克思后一代的理论家,能够以一种更灵活的阶级分析对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做出反应。但是,他的著述经常潜在地指向“市场”和“经济行为”,就好像它们根本不存在问题,市场可以依据经济学的习惯用语来理解,也就是根据“经济学的”一般规律来

理解,假定社会学可以把它当做是“既定的”东西。因为这种既定性又像被运用到其他经济过程那样被运用到资本积累,所以韦伯和马克思留给后代社会学家的遗产是,如果不被曲解的话,阶级不平等同“经济”生活机会密切联系在一起。只是到了近期,随着经济学自我反省的增加,一种经济的和市场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开始逐渐变得可行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揭示了“经济的”解释包含着它自身的失败(Holmwood and Stewart 1995)。

但是,即便去除了“经济主义”的解释失败,这些著作者还是显示出不能充分地对待货币的倾向(Lee 1994; 参见 Dodd 1994)。因为,对于马克思和韦伯以及后来大多数社会学家来说,货币“只是”其他事物的符号而已:“真实的”的经济关系或一般经济行为的理性。这样,社会学就很少地表明,关于现代生活中货币的作用和作为其特征的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这些不是某种形式的“经济学”。货币实际上有更多的意义,而不仅仅是经济关系的符号:它是法理社会(“经济的”社会)的集体表达。我们没有货币,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市场经济。我们有了经济和市场,是因为我们有了货币。

像一些后现代主义神话所声称的那样,如果20世纪晚期的生活是以社会关系和文化的分散化和“全球化”为特征的话,那么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甚至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指出,作为资本积累过程的结果,“所有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传统的社会道德关系都被金钱关系所取代了。所以奇怪的是,在他们的著作中很少看到对“作为货币的权力”或资本积累的承认。他们声称,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以致阶级的概念已成为赘余。这个问题或是被完全忽视,或是把资本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命题当做似乎是确定不移的事实(这种特殊的宏大叙事似乎能够避免能够应用到其他问题上的质疑)。相反,正如斯科特和其他作者通过具体的经验分析所表明的那样,以对积累的货币进行“非个人化”所有者控制的形式表现的“强”阶级关系,在理解现代“全球化”社会中仍具有非

常重要的价值(参见第十二章)。

## 金钱性分类和构建正确的阶级概念

尽管在这里我不能充分地做到这一点,但是我现在必须表明,所有这些“强”方法的和理论的观点可被用于解决本书中主要关注的争论,即关于阶级地位的就业调查或以职业为基础的研究,正如怀特、戈德索普和其他作者所展示的那样。批评家们则认为这些工作最好地讲也只是一种“弱”阶级分析形式,而且与此相联系的“阶级”术语的使用则变得越来越多余,人们也能够同样使用关于收入水平或社会经济分组等话语来代替。从直觉上,我感到这些认为这项独特的工作远不是阶级分析的观点是很怪异的。正如新韦伯主义者及其伙伴新马克思主义者所辩明的那样,把职业归组到阶级中去是有下述道理的,即就业和有酬工作仍然是权威、作用、条件和报酬之差异的主要源泉,而这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有可能在很长的时间段和在许多不同类别的社会中证明这一点的事实,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然而,证明其在概念上是阶级分析的这些基础一直在削弱。首先是存在着具有其各自原理的非常不同的分类,特别是怀特和戈德索普的分类;存在着模糊极少数非常富裕和有权力的行为者的可能,尽管实际上他们做出的与自己的“就业”相关的决策现在会影响到全球的“共同体”;存在着把关于分配和资本控制的研究同职业调查提供的“职位的”统计相关性联系起来的概念问题;存在着关于那些没有工作的人——相当多的是全日家庭主妇、无家可归者或失业者——在这种意义上看来是没有阶级位置的问题(是真的吗?)。存在着在详细阐述经验的阶级结构的过程中需要考虑性别和民族差异时产生的许多问题。

所以我得出的结论与克罗普顿的结论是一致的(Crompton 1993和前面的章节),即作为把社会划分为各个阶级的基础之一,职业是

这一过程的重要部分,但绝对不是全部。职业是我这里所说的关于人和事物的更广泛的金钱性分类的因素之一。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它意味着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中归属于一个广大的群体,其收入是较为稳定的,能够保证必需品的提供,但他们的收支大体上是平衡的。当然还存在其他群体。在最底层是失业群体,其中许多人是年轻的成年人或年老的人,他们经常身无分文,以至于根本不拥有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的途径。而且,由于公民体制的瓦解,他们丧失了社会地位,边缘化于主流社会之外。在靠近他们的上层,是一些收入不稳定或经营失败或其他经历的人,他们累积起来的是债务而不是资本。顺次来看,在有偿付能力的广大从业群体的上层是真正的小资产阶级的成员,他们努力地积累货币,以求把小资本变成大资本。正如迈尔斯和图尔根在前面所指出的,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大资本并不完全排逐小资本,而是它们的队伍中加入了新资本家或私人 and 公共领域的服务阶级。当他们把高收入和有利的职业条件变为(大多是)食利资本的源泉时,他们就最显得突出起来。上面两种小资产阶级由于以下原因而与众不同,即他们还拥有加入上层金钱群体的机会,变为大规模个人或公共资本的所有者和控制者。这样,我们就完全有可能从“强”金钱性阶级分析中发展出关于地位(“弱”)的经验研究的相关内容,建立于现有的职业框架上,具有将它们严格等同起来的潜力。特别是当人们能够获得从许多国家收集起来的组群研究数据时,情况更是这样。

这些显然是非常简明的论述的基本目的,并不是为了复述传统框架的局限,而是为了强调:为了正确把握它们对阶级分析所作的贡献,取决于准确说明它们的方法论的和概念的结构是怎样归属于一个更广泛的架构。在这种更广泛的架构中,弱的和强的方法将包括共同的阶级观点,即把阶级看成是基于与现存的资本积累手段相联系的金钱性分类。

## 强社会学和倾向性政治

最后我要谈谈近期一些对强阶级理论进行批判的非分析性观点。在各种批判性讨论中经常出现的一种观点是,阶级分析(就其可被容忍的范围内讲)只能在“弱”的意义上来讨论阶级。我认为这种观点在政治上是有偏向的,不论持这种观点的作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冷战对社会科学痛楚的文化影响还继续延续着,这表现在那些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之方法失败与预测失败的新叙述,表现在对阶级分析中之左翼偏见的指责,表现在对于自由资本主义法理社会的潜在的胜利信念,等等。马歇尔和戈德索普非常正确地提出了如下抱怨,即对他们的阶级分析的各种批判,看来根本不把“阶级”置于分析意义上来使用,全然抛却了它的任何变革性政治联系。同时这些批判也不情愿承认阶级分析要求所有的先入之见,即便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都要经得起检验。甚至在这些批判观点中存在着如下的暗讽,即那些徒劳地坚持阶级研究而不顾左翼政治纲领全然崩溃之事实的社会学家,显得有些愚钝和在学术上失去声誉。这些批判中还存在着这样肤浅的暗示,即如果一种理论观点源于政治乌托邦主义或关于礼俗社会的怀旧,那么它的现实分析力量就要被质疑。然而,新自由主义本身,特别是作为自由市场理论的变体,也是源于对理想的法理社会的天真的乌托邦信念,认为这样的社会消除了对市场过程的所有束缚。新自由主义理论还依赖于一种过时的反怀旧的现代主义,它把好处简单地等同于功利主义,把个人自由简单地等同于社会秩序失范,或更糟糕地等同于许可证。实际情况是,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理论一样,都是一种失败的政治哲学,但他们却仍然阻碍着学术理论的研究。



## 结 论

我在本章中努力为“强”阶级分析辩护，认为它形成了任何一项阶级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样的研究对社会科学中不同层次的方法和理论工作的力量和局限都同样关注。为努力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承认和抛弃传统的阶级理论中的简化主义和实质性错误，这样的阶级理论导致了它现在的失败。阶级分析的更广泛的用途在于建立一种“经济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这样的理论体系中，要重视金钱在工业世界里整合有组织的或法理社会的生活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正如戈德索普指出的那样，正是阶级的顽强持续存在而不是它的死亡，将在许多年内形成这样建设性工作的核心。

## 资本主义、阶级和公民身份<sup>①</sup>

布赖恩·S. 特纳(Bryan S. Turner)

人们可以经常看到,学者们几乎很少解决问题;他们会对一个问题感到厌倦而转移到不同的问题上去。问题往往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它们不是被放弃就是被重复。目前,学术界存在着对关于社会阶级的存在和本质之长久争论的厌倦情绪。而且,因为社会学经常被深深地卷入它力图描绘和理解的社会过程中,所以它就经常受到知识氛围中的文化风尚与变化的深刻影响并被其改变。正如我们在本书导论中所论述的,关于以下这种明显区分的断言正是对资本主义进行阶级批判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消极的社会后果,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和有组织的共产主义的积极优点。社会学和1968年“五月事件”之间的关系为人熟知(Lyotard 1988, Plant 1992)。撒切尔时代、里根执政时期和共产主义的衰落,都对关于社会阶级和福利国家的学术分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对社

<sup>①</sup>本章是根据霍尔顿和特纳的文章《阶级分析中的辩论与伪辩论:戈德索普和马歇尔之辩护中的一些不合理的方面》(R. Holton and B. S. Turner 1994)进行修改的,参见《社会学》杂志,28,3 1994:799~804。

会主义理论之明确价值的沉默又经常同对诸如马克思主义等宏大叙事的后现代批判相伴而行 (Lyotard 1984、1988)。如果看看马克思在 19 世纪关于宗教死亡的断言,那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共产主义的消失,现在许多作家把伊斯兰教视为对西方资本主义传统的惟一有力的挑战。所以毫不奇怪,人们经常讨论伊斯兰教在后现代文化中的现实作用 (Ahmed 1992, Gellner 1992, Turner 1994)。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简单区分,已经被各种形式的原教旨主义在国际范围内的迅速滋长弄得复杂化了,其中伊斯兰复兴运动就是显著的例子。所以,关于阶级分析的兴衰正是社会学和社会理论深受知识市场中文化风尚之影响的最好例证。

在这结论部分,我想要论证的是:社会学家们主流情绪的这些波动,不会也不应该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短缺和团结 (scarcity and solidarity) 的制度性意义上转移开去,它们是社会共同体成员与社会冲突这样持久的社会现实的反映观点和范式。资源短缺和需要社会团结之间的辩证法是经典社会学分析的永恒主题 (Lockwood 1992)。阶级分析的术语受风尚的影响,但资源短缺及其分配的不平等是所有社会组织 and 行为的永恒特点。然而,本书和其他著作中试图捍卫阶级用语的作者,却未能表明阶级仍然是理解现代形式的短缺和不平等的可行工具。

## 阶级分析中的伪辩论

在强社会阶级理论中,仍存在着难以处理的理论和经验问题,其中大多数都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即在复杂的实际事件和环境中,阶级如何表现出自己的突出特征?那些物质利益同其他阶级相对立的各自独立的阶级,是如何在文化、教育、宗教以及其他事项的纷繁交错中表明自己的存在的?这些难题并不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强阶级理论。例如,关于分层的功能主义理论与阶级理论之间的多数争论,都围绕着不平

等的分级序列与社会结构的急剧断裂这样的问题而开展的。再如,现在已经很难把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含义融入到强阶级理论中,正如皮埃尔·布迪厄在其著作《趣味与差异》中所做的那样(Bourdieu 1984)。布迪厄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强版本。例如,它对教育制度的分析就是非常简化主义的(Bourdieu 1977)。他把这种阶级简化主义的方法同对习俗之文化成分的独立性的人类学理解结合起来,结果,他对文化实践的人类学理解与其阶级地位的结构主义方法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另外,关于性别、年龄和民族这样的维度,对于社会阶级的强经济理论来说也成问题。所以,人们很难证明在这些其他的不平等与“阶级”之间存在着经验联系,正如韦斯特加德所做的那样。从理论上把这些纳入阶级分析的失败仍然是一个问题,如克罗普顿关于性别论述的一章所描述的那样(本书第九章),经验联系实际上可用于表明优先考虑阶级分析的局限性(参见Crompton 1993, Crompton and Mann 1986)。关于忽视年龄和代际作为分类原则的类似的批判,也可作为反对传统阶级理论的论据(Turner 1989)。

正如我们此前答复戈德索普和马歇尔时(前文第七章)所表明,霍尔顿和我都不认为阶级作为一种经验现象或一种分析形式已处于灭绝的边缘。但是,阶级分析的术语必须要根据强阶级理论的明显瓦解进行系统的检查。抛弃掉强阶级术语,显然就是要限制传统阶级理论的范围和重要性。戈德索普和马歇尔显然也赞同这样的观点。在他们对阶级分析的范围和程度所做的严格界定中,谈到其中“不存在历史理论”,“不存在阶级剥削”,“不存在以阶级为基础的集体行为理论”,以及不存在“政治行为的简化理论”(参见本书第七章)。我们建议,在列举的这些限制中应加上这样的观点,即也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确立起一种系统的、以阶级意识为主导的合理解释(Abercrombie, Hill and Turener 1980,1990)。

我们之所以把戈德索普和马歇尔这样的新韦伯主义理论看做是

最低原则主义的 ( minimalist ) 或 “弱” 的, 是因为他们关于阶级研究的分析价值和功用的主张是限定的和描述性的, 不像最高原则主义 ( maximalist ) 之分析的和经验的主张那样, 是经典马克思主义遗产的典型代表。如果考虑到目前马克思主义在后共产主义的国际体制中所面临的困难, 这种后马克思主义的最低原则主义看起来是较为合理的。的确, 我们之间显然也存在着实际的一致地方, 特别是我们都确认强阶级用语中的缺陷和局限, 都认为阶级分析本身需要广泛的重新界定。我们坚持认为自己没有一套独特的阶级术语, 并像克罗普顿指出的那样 ( Crompton 1993: 117 ), 我们为这幅图画注入了许多 “伪辩论” 的成分。

然而, 这里关键的问题仍然是, 一旦否定了强阶级术语而支持最低原则主义, 像这样的阶级分析还能够剩下什么呢? 正如我们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 我们自己进入这场辩论 ( Holton and Turner 1989 ), 并不是一种冷漠的、非历史的、无阶级的工业社会理论观点, 而是一种韦伯主义法理社会的阶级理论。这种韦伯主义方法是以对个人一生中在市场中的生活机会的分析为基础的, 把它作为研究经济、政治和文化不平等模式的方法 ( Turner 1981 )。韦伯的方法是与 ( 功能主义的 ) 工业社会理论不同的, 在于后者忽视结构性产生的经济不平等的持续存在, 以及多种群体内的个人在几代之间阶级地位的固定不变。它们也公开受到激进的批评, 认为它们提供的只是一种为通过继承得到的机会不平等进行辩护的肤浅的、伪装的理论。例如, 在教育上的有动机的追求和个人投入却不能根据个人的能力和成绩得到相应回报, 这是因为家庭继承经常从一出生就赋予个人以不公平的优势。近期一些试图运用功能主义理论解决这些问题的尝试, 被证明是既不令人满意也不成功的 ( Alexander 1985 )。

当然, 认为这种方法是缺乏任何历史维度的观点也具有误导性。我们的方法不是非历史的, 但我们反对那种浪漫主义观点, 它认为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共同体作为社会变革主体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

那种关于工人阶级群体的能力和作用的浪漫主义,认为他们是真正价值的载体和革命变革的主体。这种看法是英语国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工人阶级文化氛围中的激进学生的显著标志。阶级的这种共同体品质,一般为那种以包括有限的职业分类为特征的、孤立的社会所描述。其他一些研究试图在宗教结合信条中发现阶级传统的这种共同基础,特别是根据卫理公会派教义对英国文化的影响(Hoggart 1957, Halevy 1962, Thompson 1968)。我们对浪漫主义向往亲密的共同体生活和文化真实性的怀旧情绪的批判,早在我们捍卫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社会自由主义遗产时就形成了(Holton and Turner 1986:234)。帕森斯的社会学可被看做是旗帜鲜明地捍卫现代性、反对保守的和激进的怀旧情绪的例子。

为了超出伪辩论的范围,我们有可能确定两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是关于法理社会模式的弱阶级分析仍保持的范围,第二个是对阶级理论的过度科学至上主义解释的内在固有的问题。在其仍要保持的范围方面,有限的或弱的阶级理论的重要性,取决于它解释不平等模式、社会-政治态度和社会行为的能力。对阶级理论能否承担这种任务之可行性的评价,又取决于两个相互联系的因素。一个是各种阶级理论(戈德索普、马歇尔、怀特和其他的理论家所提供的)在经验上的说服力,另一个是阶级理论同试图解释相同社会现象的其他较广泛的理论相联系的特征。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更详细的讨论,将把我们带入与阶级理论相联系的政治、生活方式、公民身份和文化的重要性的研究中(Turner 1988)。

这里产生的理论难题源于从职业集合体中或其他基于职业的特征中构建阶级范畴。一种描述是他们非常奇怪地说起“农业阶级”这样的概念。人们在原则上可以认为这样列举的阶级能够延伸地包括“大学阶级”、“体育阶级”或“娱乐阶级”,正如对职业总汇进行描述那样。这样可以说,围绕戈德索普的著作进行的辩论并不是关于阶级的辩论,而是关于就业结构、制度性就业机会和职业地位与态度的辩

论 (Crompton)。这样的分类具有的明显好处就是可测性,但是它们没有考虑到性别、民族和文化,这些也是不平等的特征。社会阶级仍然同职业地位相联系,但是更广泛、更有趣的问题,诸如权力、文化和社会行为等,却被预先排除了。结果便把阶级降为统计资料的总汇,同意识、政治和社会行为的联系十分不确定和脆弱。在这种关于职业群体的见解中,不存在关于不可避免的基于利益的阶级冲突。这种弱阶级理论只是强调,当代社会中还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是围绕各职业群体之间购买力的不同而组织起来的。我们对这种传统的弱阶级理论提出的挑战是:如果考虑到这种最低原则主义的结论,为什么要说阶级在社会学领域和词汇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呢?为什么不直接用职业、经济组织、劳动市场和社会态度等来取代它呢?人们不清楚的是,阶级概念为研究职业流动,或职业地位与社会态度的关系,或如莫里斯所认为的劳动市场在提供就业上的彻底失败等,增添了多少解释分量呢?

第二个方面是对传统阶级分析的科学法描述提出质疑。当然,我们并不否定原则上在经验研究中进行测量和定量,但是我们很有必要否定这样的看法,即认为对阶级进行测量可以不诉诸于文化评价和与价值相关的问题。如果把这种否定观点置于更明确的韦伯主义术语中考察,人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阶级分析的成果值得去了解呢?”和“为什么有许多历史主体,包括社会学家,认为它们值得了解呢?”这里的基本点是,“如果不诉诸于评价性的文化标准,人们很难把复杂多样的阶级地位汇入到范畴中去。”(Holton and Turner 1989: 388)阶级划分已被深深地包含在关于不平等、剥削、公平和公民身份的与价值相关的关注中。例如,近来许多想建立以技能为基础的职业分类的尝试,它们本身就深深卷入更广泛的社会辩论中,特别是关于男性和女性对生产率之相对贡献的辩论中。

我们这里说阶级或职业分类与价值相关,并不是认为它们难以遵循科学的调查,而是认为它们并不是与价值隔绝。例如,如果不是与专

家及其他人的主张被规范性地合法化相关,关于服务阶级的观念是如何成为主流的呢?换句话说,对“服务阶级”这样标识的选择本身,就不是从关于职业群体的调查数据中自然地、直接地或明确地产生的观念。调查方法不能为解决这样的争论提供任何特殊的工具。这些问题对于韦伯的科学准则(Wissenschaftslehre)是很重要的,理想类型的作用就是解决一些与价值相关的问题(Turner 1981)。

## 团结和短缺

在分析的和历史的术语中,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经常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在马克思和韦伯的著作中非常明显。马克思试图根据一种否定资产阶级效用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来理解市民社会和生产方式的关系。依玛丽安·韦伯看来,韦伯最重要的著作就是《经济和社会》。我们可以把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潜在的问题表述为关于短缺和团结之关系的争论。经济学在18世纪成为一种现代科学,是同消费社会的发展并行的。庞大消费、地位优势、占有性个人主义、自我陶醉、自我标榜和休闲阶级等等——这些概念都被试图用来表达各种差别之间的竞争。各种差别是随着工业化、随着短缺作为富庶的结果之悖论的发展而出现的。需求的无尽弹性意味着,短缺是经济剩余和不断上升的社会预期的一个条件。在欲望无穷的世界,作为现代化的结果,富庶创造了一个短缺的世界(Xenos 1989)。经济学结果成了关于短缺的科学,它试图在有限的资源环境中理解选择的难题。古典的边际效用理论试图解释短缺的经济学,或至少要解释在普遍短缺的条件下手段如何与目的相联系。相反,社会学却试图根据共同的价值和理念、共同的情感纽带和集体仪式的综合结果来理解社会团结的基础。换句话说,社会学试图为这样的问题提供一般性的答案: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把上述这两种辩论结合起来,社会学所追问的就是,社会在基于短缺的冲突的环境中如何得以持续?在一定程度上讲,这是戴维·洛克伍德



的著作《团结和分裂》中的核心问题 ( David Lockwood 1992 ), 这部著作考察了涂尔干和马克思的社会学中混乱的实质。在最后结论性的考察中, 我通过考察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公民身份的前景, 试图对这个问题作角度些许不同的强调。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 在理论上是对边际效用理论中潜在假设的局限作出的反应, 这在韦伯的著作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 Breiner 1995 )。韦伯的行为 ( 传统的、感性的和理性的 ) 范畴, 就是为了克服效用理论在手段 - 目的之理性主义观点上的局限。在韦伯的分析中, 有着一套人们熟悉的关于理性的、无理性的和非理性的行为的区分, 这种区分仍然渗透于社会学中。特别是韦伯的行为社会学指向了目的理性行为之含义的局限。很有意思的是, 考虑到尼采对他的著作的影响, 韦伯的社会学接受了理性含义的多样性, 包括新教教义中的理性追求受希望得到救赎这种不理性的愿望驱动的观点。所以人们怀疑韦伯是否为 “什么才是经济理性” 这一问题提供了令人满意的答案 ( Sica 1988 )。

古典社会学试图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对行为的非理性特征进行理解, 这是理性选择模型对爱、宗教和慈善这类现象的局限性; 另一个是对团结的非经济基础进行理解。“社会学” 这一术语本身来源于 “logos” ( 的研究 ) 和 “socius” ( 朋友或伙伴 )。现在, 伙伴关系是从分享面包中产生出来的一种团结, 而社会学可以理解为对团结之情感基础的分析。更详细地说, 社会学是研究一系列把短缺条件和对集体行为与团结之需求连结起来的矛盾关系。对市场和共同体之相互关系的研究就是典型的例子。很难相信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会偏离这些知识起源太远, 它实际上是对短缺条件下互利互惠的实质的道德探究。

社会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也是塔尔科特·帕森斯的制度理论背后的主要分析的问题 ( Holton and Turner 1986 )。在《社会行为的结构》中 ( Parsons 1937 ), 帕森斯批评了经济理论根本不能解决社会秩

序的问题，它的知识根源在于托马斯·霍布斯的著作中关于国家的矛盾理论，通过经济行为的理性理论表现出来。因为欺骗和暴力是对短缺的杰出的理性反应，所以经济理论如果不诉诸于像情感这样的其他范畴时，就不能解释社会秩序问题。帕森斯试图通过研究行为的非理性成分来解决这样的难题，也就是研究引导人们的行为趋向集体目标的共同的价值和标准。尽管帕森斯的许多批评家认为他抛弃了合理的行为理论而吸收了一种社会制度的功能主义理论，但是对经济学和社会学之关系的关注却重新出现在亚制度的范式中，其中的核心问题存在于分配短缺资源问题（经济和政治）与获得团结的内在模式（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之间，通过这样的过程使规范内在化和共同价值社会化。依帕森斯看来，所有的社会生活都必须解决（合理地）分配有限的经济资源的政治问题和通过责任动员达致结合的社会学问题。我们怎样能够在不平衡的短缺环境中实现规范性的团结呢？如果霍布斯的问题是关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莱布尼茨自然神学的问题就是关注在制度性不平等的环境中如何维持对社会的忠诚。

经典社会学的一个传统答案是，短缺（阶级）的负面效应被一种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的形成所掩盖了。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这种意识形态产生了这样一种团结，它能够适应于经济剥削的潜在需要。在这些理论中，比如宗教就是社会聚合的一种有效形式。随着宗教的逐渐衰落，人们在公民身份中发现了一种更适宜的理论。马歇尔关于阶级和公民身份的方法的作用在于，它代表了对现代工业社会条件下短缺和团结之关系的合理反应（Marshall 1981）。按照马歇尔的观点，公民身份是一系列的制度，它保护个人和家庭不遭受市场的全面影响。例如，社会保障实质上就是保护个人免遭经济短缺之严酷伤害的一系列措施。阶级是市场领域中经济不平等的结果，而公民身份则代表了对机会和条件不平等的一种社会反应，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表现。

马歇尔的理论是当代诸多批评和发展的主题（Turner and


Hamilton 1994)。他未能建立起关于公民身份的一种不同的观念,而且他关于权利(法律、政治和社会的)的概念过于狭窄。例如,他没有关于经济权利的完整概念,而这样的概念能够把经济上的公民身份同工业民主联系起来。马歇尔也未能把文化上公民身份的概念融入其关于扩大的民主的阐释中,而后者是同教育参与相联系的。虽然这些难题都没有解决,但无论如何,马歇尔的方法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它承认公民身份是现代世俗社会中一种重要的团结资源。如果说市场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分裂特征的话,那么公民身份就是团结的一种主要成分,它可能视为公民宗教的一种形式。公民身份是民族国家范围内忠诚的主要源泉。然而当代社会变化的两个方面,侵蚀作为福利资本主义之团结原则的公民身份,它们是全球化和后现代化。

这样,不论强或弱的阶级理论兴衰状况如何,短缺资源之社会分配中的不平等或制度性不平衡(Turner 1986),仍然是人类社会的主要特征(这与在资源不充足的环境中人们的欲望相关)。结果,社会学也仍然将是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社会自反性的主要特征。社会理论的作用就是要理解短缺和团结之间的无限复杂和无穷变化的关系,特别是要理解短缺是如何在富庶中产生,团结如何在冲突中形成。然而这里的立场仍然是,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不但远不能有助于这样的理解和研究,而且变成了它们的障碍。

## 译者后记

这本译著经过近两年的时间,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两年之前我在从事西方政治思潮和政党研究、左翼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时候,觉得很有必要对西方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及其引起的阶级分析理论的变化进行全面深刻地了解。我在收集阅读资料的过程中,前辈徐崇温老师推荐了这本《关于阶级的冲突》,并鼓励支持我翻译出来,作为他主编的“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的一本。2005年,我主持的课题“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西方工人阶级的变化与社会主义运动”被批准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恰好这本书的初译稿已经完成,这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该书的出版,也是我主持的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在翻译和校对过程中,由于其他工作繁忙,所以该书最终拿出定稿,已经超过了我与重庆出版社最初约定的时间。感谢重庆出版社负责同志的谅解和宽限,同意我适当延长时间,以较好完成书稿的翻译工作。

本书是一本论文集,收入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一些社会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关于阶级问题的讨论和辩论的文章。作者包括约翰·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戈登·马歇尔(Gordon Marshall)、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约翰·韦斯特加德(John Westergaard)、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等西方著名社会学家的文章,能为相关研究者提供有益的资料和启发。作者分别处于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涉及国家和地区较多,讨论的问题广泛而深刻:阶级已经“死亡”了么?阶级分析对于社会研究和政治研究还有价值吗?阶级分析和社会学的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阶级政治还是不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活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否还存在阶级分化?马克思的阶级理



关于阶级的冲突  
*Conflicts about Class*

论还有意义么？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韦伯的阶级理论关系如何？工人阶级是不是能够继续存在？如果是，他们的生活状况、社会意识和行为如何？阶级、种族、民族、性别等社会划分之间是什么关系？等等，至于详细内容，我这里不再赘述，我相信读者会从这本书中获得有益的材料和启发，对于不同立场和倾向的观点，也会做出自己的判断。

最后，我要对在翻译过程中指导、帮助和支持我的师长、同事、朋友和亲人致谢。由于水平有限，译文中一定有不足和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赐教。

姜 辉

2005年6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 参考文献

ABERCROMBIE N., HILL S. and TURNER B.. 1980. *The Dominant Ideology Thesis* (《主导意识形态论题》). London: Allen & Unwin

ABERCROMBIE N., HILL S. and TURNER B.. (eds). 1990. *Dominant Ideologies* (《主导意识形态》). London: Unwin Hyman

ABRAMS M., ROSE R. and HINDEN R.. 1960. *Must Labour Lose?* (《劳工必然失败么?》). Harmondsworth: Penguin

ABRAMSON P. and INGLEHART R.. 1992. Generational Replacement and Value Change in Eight Western European Societies (《西欧八国中的代际替代和价值变化》).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2(2): 183~288

ACKER J.. 1973. Women and Stratification: A Case of Intellectual Sexism (《女性和社会分层: 知识界男性至上主义案例》). In: J. Huber (ed.) *Changing Women in a Changing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HMED A.S.. 1992. *Postmodernism and Islam: Predicament and Promise* (《后现代主义和伊斯兰教: 困境和希望》).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AHRNE G. and WRIGHT, E.O. 1983. Clas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weden: A Comparison (《美国和瑞典的阶级: 一个比较》). *Acta Sociologica* 26: 211~2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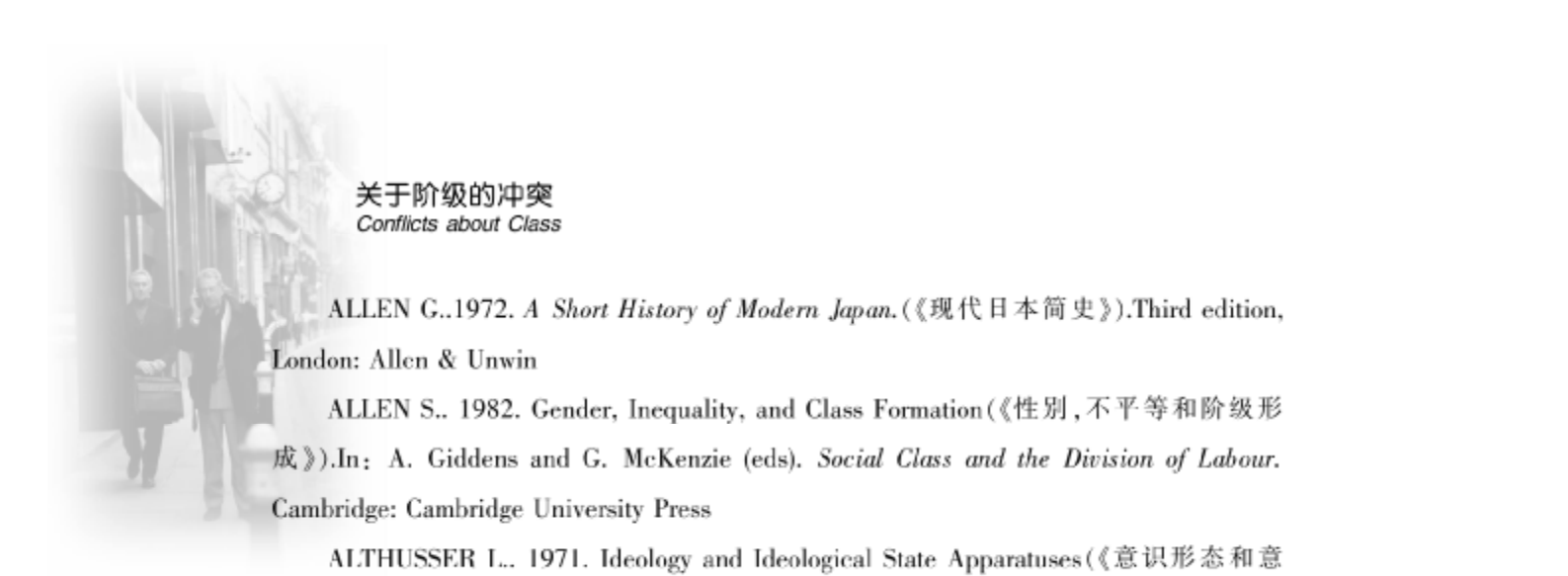
AHRNE G. and CLEMENT W.. 1992. A New Regime? Class Representation within the Swedish State (《一种新政治体制? 瑞典国家中的阶级表达》).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mocracy* 13: 455~479

ALEXANDER J. (ed.). 1985. *Neofunctionalism* (《新功能主义》). Beverly Hills: Sage

ALFORD R.. 1962. A Suggested Index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cial Class and Voting (《试编社会阶级和选举的群丛指数》).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6: 417~425

ALFORD R.. 1963. *Party and Society: Anglo-American Democracies* (《政党和社会: 春格鲁—撒克逊民主》). Chicago: Rand McNally

ALLARD P., BEAUD M., BELLON B., LEVY A. M. and LIENHART S.. 1978. *Dictionnaire des groupes industriels et financiers en France*. (《法国工业和金融业组织指南》).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关于阶级的冲突  
*Conflicts about Class*

ALLEN G..1972. *A Short History of Modern Japan.*(《现代日本简史》).Third edition, London: Allen & Unwin

ALLEN S.. 1982. Gender, Inequality, and Class Formation(《性别,不平等和阶级形成》).In: A. Giddens and G. McKenzie (eds). *Social Clas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LTHUSSER L.. 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工具》).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New Left Books

ANDERSON B..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幻想的共同体》).London: Verso

ANDERSON P.. 1979.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专制主义国家谱系》). London: Verso

ANTHIAS F.. 1991. Race and Class Revisited: Conceptualising Race and Racism(《种族和阶级再思考:种族和种族主义的概念化》).*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8(1):19~42

BACCHI C.. 1990. *Some Difference*(《一些差异》).Sydney: Allen & Unwin

BAGGULEY P.. and MANN K.. 1992. Idle Thieving Bastards: Scholarly Representations of the "Underclass"(《懒惰偷窃的家伙:“下层阶级”的知识表达》).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Vol. 6

BAKER K, DALTON R. and HILDEBRANDT K.. 1981. *Germany Trans formed*(《转变的德国》).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ALDERSHEIM H. et al. (eds). 1989. *New Leaders ,Parties and Groups*(《新领导人,政党和团体》).Bordeaux, France: Cervel-lep

BALTZELL E. D.. 1958. *Philadelphia Gentlemen: The making of a National Upper Class*(《费城绅士们:塑造国家的上层阶级》).New York: Free Press

BALTZELL,E. D.. 1964. *The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 (《新教组织》). New York: Random House

BARBER B.. and DUNCAN, O. D.. 1959. Discussion of Papers by Professor Nisbet and Professor Berherle(《关于奈斯比特和伯赫勒教授文章的讨论》).*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 Springa;25~28

BAKER D. and ALLEN, S. (eds).1976. *Sexual Divisions and Society*(《性别分工和社会》).London: Tavistock

BAUDRILLARD J.. 1988. *Selected writings*(《论文选辑》).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AUMAN Z.. 1982. *Memories of Class. The Pre-history and After-life of Class*(《阶

级的记忆;阶级的前史和生活之后》).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BAUMOL W.. 1967.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不平衡增长的宏观经济学》).*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7:415~426

BECHHOFFER F. and ELLIOTT B.. 1968. An Approach to a Study of Small Shopkeepers and the Class Structure(《关于小店主的研究方法和阶级结构》).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 180~202

BECHHOFFER F. and ELLIOTT B.. 1976. Persistence and Change: The Petite Bourgeoisie in the Industrial Society(《持续和变化:工业社会中的小资产阶级》).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7: 74~99

BECHHOFFER F. and ELLIOTT B.. 1978. The Voice of Small Busi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小商业的声音和生存政治》).*Sociological Review*, 26: 57~88

BECHHOFFER F. and ELLIOTT B.. (eds). 1981. *The Petite Bourgeoisi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e Uneasy Stratum*(《小资产阶级:不稳定阶层的比较研究》). London: Macmillan.

BECHHOFFER F. and ELLIOTT B.. 1985. The Petite Bourgeoisie in Late Capitalism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小资产阶级》).*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1: 181~207

BECK U.. 1987. Beyond Status and Class: Will there be an Individualized Class Society?(《超越地位和阶级:将会存在一个个人化的阶级社会么?》). In V Meja, D Mispel and N Stehr (eds). *Modern German Soci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340~355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冒险的社会:走向一种新的现代性》).London: Sage

BECK U.. 1994. The Debate on Individualisation Theory in Today's Sociology in Germany(《关于当代德国社会学中个人主义化理论的辩论》).*Soziologie* (Journal of the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Soziologie), 3:119~2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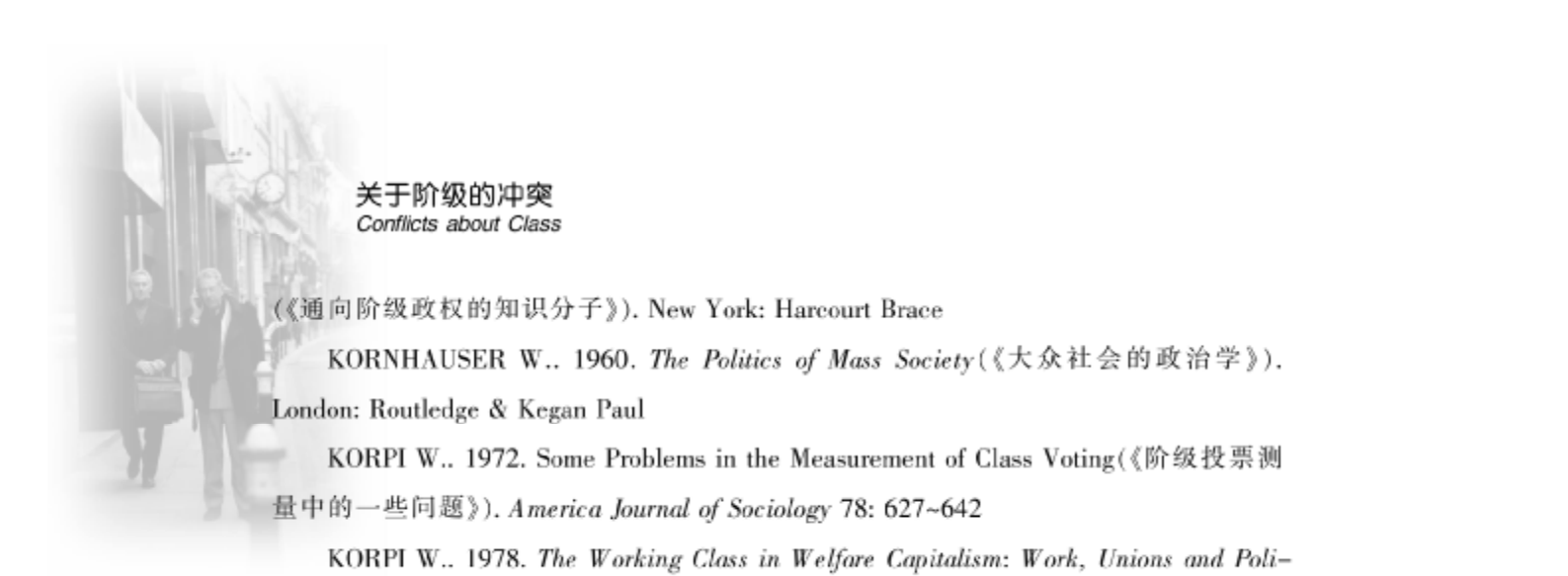
BECKER U.. 1989. Class Theory: Still the Axis of Critical Social Scientific Analysis?(《阶级理论:仍然是批判的社会科学分析的轴心么?》).In: E.O. Wright (ed.). *The Debate on Classes*. London: Verso

BELL D.. 1961. *The end of Ideology*(《意识形态的终结》).New York: Collier Books

BELL D.. 1973.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后工业社会的来临》).New York: Basic Books

BELL D.. 1979.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London: Heinemann





关于阶级的冲突  
*Conflicts about Class*

BELL D.. 1979. The New Class: a Muddled Concept(《新阶级:混乱的概念》).In:B. Bruce-Biggs (ed.). *The New Class*.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ress

BENOIT- SMULLYAN E.. 1944. Status, Status Types and Status Inter-relationships(《地位,地位类型和地位的相互关系》).*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9: 151-161

BERGER P.. 1987. *The Capitalist Revolution*(《资本主义革命》).Hunts: Wildwood House

BERGER S.. 1980. The Traditional Sector in France and Italy(《法国和意大利的传统部门》).In:S. Berger, M. J. Pearce (eds). *Dualism and Discontinu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8-131

BERGER S.. 1981. The Uses of the Traditional Sector in Italy: Why Declining Classes Survive(《意大利传统部门的使用:为什么正衰退的阶级还能生存》).See Bechhofer and Elliott 1981, 71-89

BERGER S. (ed.). 1981. *Organising Interests in Western Europe*(《西欧社会对利益的组织》).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RLE A. and MEANS G.. 1932.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现代公司和私人产权》). London: Macmillan

BERMAN M.. 1982.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所有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现代性的经历》).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BERNSTEIN E.. 1899.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Stuttgart: Dietz

BERTAUX D. and BERTAUX- WIAME I.. 1981. Artisanal Bakery in France: How it Lives and Why it Survives (《法国手工面包店:它怎样经营和为什么生存》).See Bechhofer and Elliott 1981, 155-181

BIANCHI S.. 1981. *Household Composition and Racial Inequality*(《家庭构成和种族不平等》).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BIRCH D.. 1979. *The Job Generation Process*(《工作发生过程》). Cambridge, MA: MIT Program on Neighborhood and Regional Change

BLACK D. and MYLES J.. 1986. Dependent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Canadian Class Structure :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and Sweden(《依附性工业化和加拿大阶级结构:对加拿大、美国和瑞典的比较分析》).*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23: 157-181

BLACKBURN R.M..and MANAN,M.1979.*The Working Class in the Labour Market*(《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人阶级》).London:Macmillan.

BLACKBURN R. M. and MARSH C.. 1991. Education and Social Class: Revisiting the 1944 Education Act with Fixed Marginals(《教育和社会阶级:从固定边际值对1944年教育法案的再考察》).*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2,507~536

BLAU P. M. and DUNCAN O. D..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美国职业结构》).New York: Wiley

BLOCK F.. 1987. *Revising State Theory*(《国家理论再考察》).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BLOCK F.. 1990. *Postindustrial Possibilities*(《后工业的可能性》).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LOCK F.. 1992. Capitalism Without Class Power(《没有阶级权力的资本主义》).*Politics and Society*. 20:277~302

BOARD OF EDUCATION, 1907. *Regulations for Secondary Schools*(《中学规章》). London: Board of Education

BOLTANSKI L.. 1987. *The Making of a Class: Cadres in French Society*(《一个阶级的形成:法国社会中的干部》).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NNEY N.. 1988. Gender, Household and Social Class(《性别,家庭和社会阶级》).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March

BONNEY N.. 1988 b. Dual Earning Couples.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双重收入家庭、工作、就业和社会》).March

BOREHAM P., CLEGG S., EMMISON R., MARKS J. and STEWART R.. 1989. Semi-peripheries or Particular Pathways: The Case of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Canada as Class Formations(《半外围或特殊路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的阶级形成》).*International Sociology* 4: 67~90

BOTTOMORE T. B.. 1964. *Elites and Society*(《精英和社会》).London: C. A. Wat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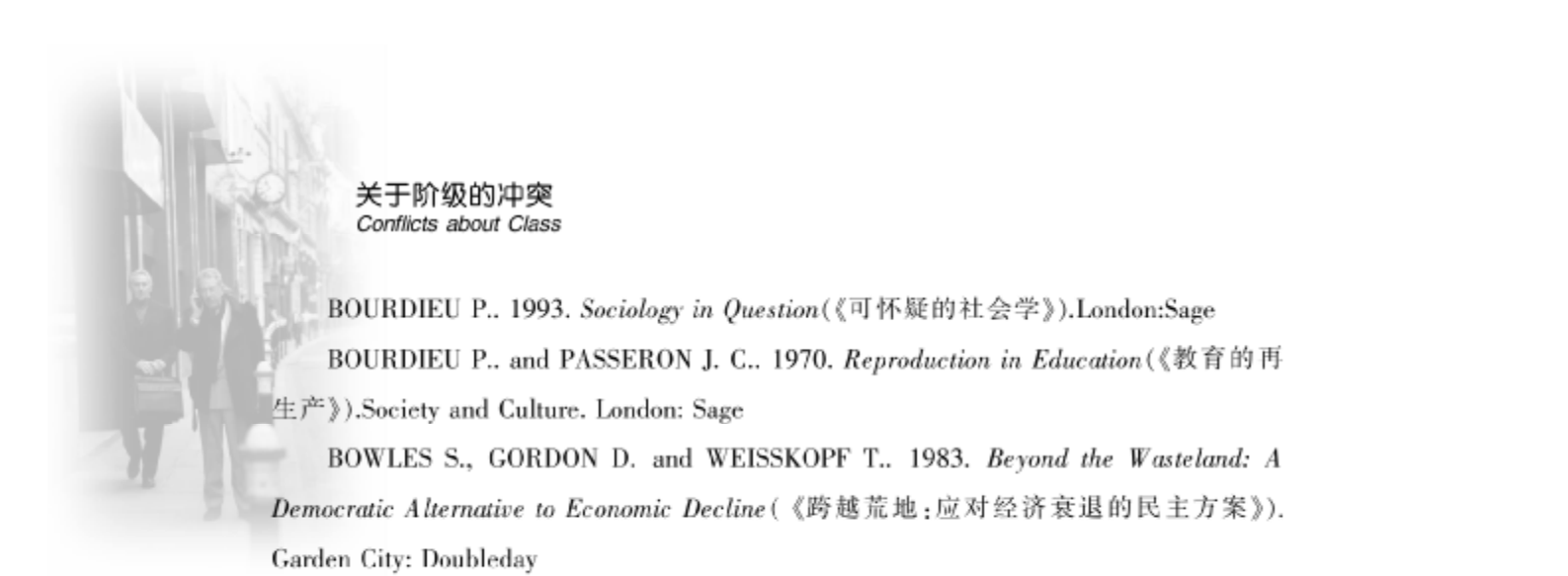
BOTTOMORE T. and BRYMR. (eds). 1989. *The Capitalist Class: An International Study*(《资本家阶级:国际研究》).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 1973. Les strategies de reconversion: les classes sociales et le système d'enseignement'.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2:5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实践理论概要》).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差异:味觉判断的社会批判》).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BOURDIEU P..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实践逻辑》). Cambridge :Polity



关于阶级的冲突  
*Conflicts about Class*

- BOURDIEU P.. 1993. *Sociology in Question*(《可怀疑的社会学》).London:Sage
- BOURDIEU P.. and PASSERON J. C.. 1970.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教育的再生产》).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Sage
- BOWLES S., GORDON D. and WEISSKOPF T.. 1983. *Beyond the Wasteland: A Democratic Alternative to Economic Decline*(《跨越荒地:应对经济衰退的民主方案》). Garden City: Doubleday
- BOYD M.. 1990. Sex Differences in Occupational Skill: Canada, 1961—1986(《职业技能中的性别差异:加拿大,1961—1986年》).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27:285~315
- BRAVERMAN H.. 1974. *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劳动和垄断资本:20世纪工作的退化》).New York: Monthly Review
- BREEN R. and WHELAN C.. 1994. Social Class,Social Origins and Political Partisanship in the Republic of Ireland(《爱尔兰共和国的社会阶级、社会起源和政党》).*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26:117~134
- BREIGER R..1981.The Social Class Structure of Occupational Mobility (《职业流动的社会阶级结构》).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578~591
- BREINER P.. 1995. Rationality, Self-Interest and Politics.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 Logic of Modernity in Max Weber(《理性,自我利益和政治。马克斯·韦伯经济学的政治逻辑和现代性的经济逻辑》). *Political Theory*, 23: 1, 25~47
- BRENNER J. and RAMAS M.. 1984. 'Rethinking Women's Oppression(《妇女压迫再考察》). *New Left Review* 144:33~71
- BRIGGS A.. 1976. The Language of Class(《阶级的语言》).In:A. Briggs and J. Saville (eds). *Essays in Labour History*, vol. 1, London: Macmillan
- BROOM L. and JONES F.. 1976. *Opportunity and Attainment in Australia*(《澳大利亚国家中的机会和实现》).Canberra: ANU Press
- BROWN R.. 1982. Work Histories, Career Strategies and the Class Structure(《工作经历、职业战略和阶级结构》).In:A. Giddens (ed). *Social Clas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9~136
- BRUSCO S.. 1982. The Emilian Model: Productive Decentralis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伊米莉亚模式:生产的分散化和社会整合》).*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6: 167~184
- BRUSCO S. and SABEL C.. 1981. Artisan Produ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工艺

生产和经济增长》).In:F. Wilkinson (ed.). *The Dynamics of Labour Market Segmentation*. London: Academic. 99~113

BRYM R. J. (ed.). 1985. *The structure of the Canadian Capitalist Class*(《加拿大资本家阶级的结构》). Toronto: Garamond

BRYM R. J.. 1989. *Canada*(《加拿大》).See Bottomore and Brym 1989. 177~206

BRYNJOLFSSON E., MALONE T., GURBABANXI V. and KAMBIL A.. 1989. Do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ead to Smaller Firm?(《信息技术带来了小企业么?》).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meo

BURAWOY M. and KROTOV P.. 1992. The Soviet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to Capitalism(《苏联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BURNHILL P., GARNER C. and MCPHERSON A.. 1990. Parental Education, Social Class and Entry to Higher Education 1976—1985(《家长教育,社会阶级和高等教育的进入》).*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A, 153, 233~248

BURRIS V.. 1980. Class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形成和转变:比较分析》).*Social Praxis* 7: 147~179

BUTLER D. E. and KAVANAGH D.. 1992. *The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of 1992*.(《英国 1992 年大选》). London: Macmillan

CALVERT P.. 1982. *The Concept Class?*(《阶级的概念》).London: Hutchinson

CAMPBELL A. et al.. 1960. *The American Voter*(《美国选民》).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ANNADINE D.. 1992. Review Article(《评论文章》).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No.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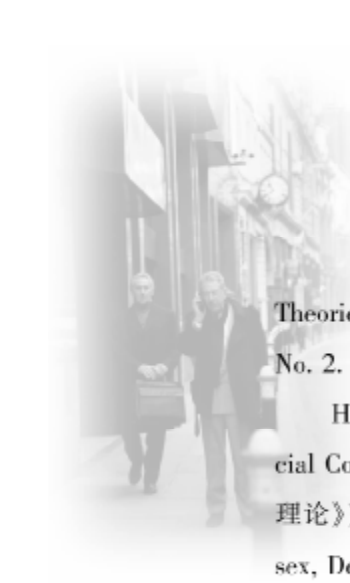
CARBONI C.. 1984. Observaciones comparativas sobre la estructura de clase de los paises capitalistas avanzados'. *Revista Espagnol Invest. Sociologa*. 26: 129~149

CHANDLER A. D.. 1963. *Strategy and Structure*(《战略和结构》).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NDLER A. D.. 1990. *Scale and Scope?*(《尺度和范围》).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NDLER A. D.. and DAEMS, H. (eds).1980. *Managerial Hierarchies*(《经理等级》).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ERLIN A. J.. 1981. *Marriage, Divorce, Remarriage*(《婚姻,离婚,再婚》).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关于阶级的冲突  
*Conflicts about Class*

- CHIESI A.. 1982. L'Elite Finanziaria Italiana'. *Rassegna Italiana di Sociologia* 23
- CHIESI A.M.. 1985. Property, Capital and Network Structure in Italy(《意大利的所有权、资本和网络结构》).See Stockman et al. 1985.199~214
- CHODOROW N.. 1989. *Feminism and Psychoanalytic Theory*(《女性主义和心理分析理论》).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CIPOLLA C. (ed.). 1973.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丰塔纳欧洲经济史》). Vols 3 and 4, London: Fontana
- CLARK T.. 1975. Community Power(《共同体权力》). In: A. Inkeles, J. Coleman and N. J. Smelser (ed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 217~296
- CLARK T.. 1985, 1986, 1987,1988. *Research in Urban Policy*(《城市政策研究》). Vols 1, 2A, 2B, 3,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CLARK T. and FERGUSON L.. 1983. *City Money* (《城市货币》).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LARK T. and INGLEHART R.. 1991. The New Political Culture: An Introduction(《新政治文化:导言》).Prepared for Clark, T. and Hoffmann-martinot, V. (eds). *The New Political Culture*(Draft Volume)
- CLARK T., LIPSET S. and REMPEL M.. 1993. The Declining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Social Class(《社会阶级之政治重要性的衰落》).*International Sociology* 8:3, 293~316
- CLARKE S.. 1992. Privatis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俄罗斯的私有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New Left Review*, 196
- CLARKE S. (ed). 1989. *Urban Innovation and Autonomy*(《城市创新和自治》). Newbury Park: Sage
- CLAWSON D., NEUSTADT A. and SCOTT D.. 1992. *Money Talks: Corporate PACs and Political Influence*(《金钱对话:企业 PACs 和政治影响》). New York: Basic Books
- CLEMENT W.. 1975. *The Canadian Corporate Elite: An Analysis of Economic Power* (《加拿大企业精英:经济权力分析》).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 CLEMENT W.. 1977. *Continental Corporate power: Economic Elite Linkages betwee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大陆企业权力:加拿大和美国的经济精英联系》).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 CLEMENT( W. and MYLES J.. 1994. *Relations of Ruling: Class and Gender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统治关系:后工业社会的阶级和性别》).Montreal: McGill -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COATES D.. 1989. *Britain*. (《英国》).See Bottomore and Brym 1989. 19~45

- COHEN J.. 1982. *Class and Civil Society*(《阶级和市民社会》).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COHEN J.. 1985. Strategy or Identity(《战略或共识》).*Social Research* 52:872~895
- Cole G.. 1955. Elites in the British Class Structure(《英国阶级结构中的精英》).In: G. D. H. Cole, *Studies in Class Structur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55
- COLEMAN P. and RAINWATER I. (With K. A. McLelland)(1979). *Social Standing in America*(《美国的社会地位》).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COLLINS R.. 1971. Functional and Conflict Theories of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教育分层的功能和冲突理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6: 1002~1019
- COLLINS R.. 1975. *Conflict Sociology: toward an Explanatory Science*(《冲突社会学:走向一种解释社会学》).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1995. Special issue, Blue Collar Worker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蓝领工人》).28, (1): 3~118
- CONNELL R.. 1987. *Gender and Power*(《性别和权力》).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NVERSE P. E.. 1964.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in Mass Publics'(《大众信仰体系的实质》). In:D. Apter(ed.), *Ideology and Disconten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206~261
- COTTRELL P. L., LINDGREN H. and TEICHOVA A. (eds). 1992. *European Industry and Banking Between the Wars*(《两次大战之间欧洲的工业和银行业》).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 COXON A. and DAVIES P.. 1986. *Image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Occupational Structures and Class*(《社会分层的面貌:职业结构和阶级》).London: Sage
- CREWE I. and DENVER D. (eds). 1985. *Electoral Change in Western Democracies: Patterns and Sources of Electoral Volatility*(《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变化:选举不稳定性的模式和根源》).London: Croom Helm
- CREWE I.,1984. The Electorate: Partisan Dealignment Ten Years On (《选民:十年来政党的非联盟化》).In:H. Berrington (ed.). *Change in British Politics*. London: Frank Cass
- CREWE I.,1986. On the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Class Voting: Some Comments on How Britain Votes(《阶级投票的死亡和复苏:关于英国如何投票的一些评论》). *Political Studies* 34: 620~638
- CROMPTON R..1989. Class Theory and Gender(《阶级理论和性别》).*British Journal*



关于阶级的冲突  
*Conflicts about Class*

*of Sociology*, 1: No. 4, 565~587

CROMPTON R..1993. *Class and Stratification* (《阶级和社会分层》).Cambridge: Polity Press

CROMPTON R..1995. Women's Employment and the "Middle Class"(《女性就业和“中间阶级”》). In: M. Savage and T. Butler (eds). *Social Change and the Middle Classes*. London: UCL Press

CROMPTON R. and GUBBAY J.. 1978. *Economy and Class Structure*(《经济和阶级结构》).London: Mcmillan

CROMPTON R. and Jones G.. 1984. *White Collar Proletariat*(《白领无产阶级》). London: Mamillan

CROMPTON R. and MANN M. (eds). 1986. *Gender and Stratification*(《性别和社会分层》).Cambridge: Polity Press

CROOK S., PAULSKI J. and WATERS M.. 1992. *Postmodernization*(《后现代化》). London: Sage

CROSLAND A.. 1956.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社会主义的未来》). London: Jonathan Cape

CRYSTAL G.. 1991. *In Search of Excess: Executive Compensation in the 1980s*(《寻找超额:1980年代的行政补偿》).New York: Norton

CURRAN J. and BURROWS R.. 1986. The Sociology of Petit Capitalism: A Trend Report(《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趋势报告》).*Sociology* 20:265~279

CUYVERS L. and MEEUSEN W.. 1985. Financial Groups in the Belgian Network of Interlocking Directorships(《比利时连锁经营管理网中的金融集团》). See Stokman et al. 1985. 148~165

CYBA E.. 1994. Gender Inequalities Between Individualization and Social Class(《个体化和社会阶级之间的性别不平等》).*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7, 2/3, 169~179

DAEMS H. and VAN DER WEE H. (eds). 1974. *The Rise of Managerial Capitalism*(《管理资本主义的兴起》).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

DAHL R. A.. 1961. *Who Governs?* (《谁来统治?》).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AHRENDORF R.. 1959.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DAHRENDORF R.. 1969. The Service Class(《服务阶级》).In:T. Burns (ed.). *In-*

*dustrial Man*, Harmondsworth: Penguin

DAHRENDORF R.. 1988. *The Modern social conflict* (《现代社会冲突》).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DALE A.. 1986. Social Class and the Self Employed(《社会阶级和自我经营者》). *Sociology* 20: 430~434

DALTON R. J.. 1988. *Citizen Politics in Western Democracies*(《西方民主社会中的公民政治》).Chatham N. J.: Chatham Publishers

DALTON R. J., KUECHLER M. and BECK P. A.. (eds). 1990. *Electoral Change in Advance Industrial Democracies?* (《发达工业民主国家中的选举变化》).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ALTON R., KUECHLER M. and BURKLIN W.. 1990. The Challenge of New Movements(《新社会运动的挑战》).In:R. J. Dalton et al. (eds). *Challenging the Political Order: New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Cambridge: Polity. 3~22

DANZIGER S., GOTTSCHALK P.. 1993. *Uneven Tides: Rising Inequality in America* (《不平衡趋势:美国不平等的发展》).New York: Sage

DAVIDOFF. R. 1986. The Role of Gender in 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第一个工业国家中性别的作用》).See Crompton and Mann(eds) 1986

DAVIDOFF L. and HALL C.. 1987. *Family Fortunes* (《家庭财富》). London: Hutchinson

DAVIS K. and MOORE W.. 1945. Some Principles of Stratification(《社会分层的一些原则》).*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0: 242~249

DAVIS M.. 1991. *City of Quartz*(《石英之城》). London:Verso

DAVIS S. and HALTWINGER J.. 1989. The Distribution of Employees by Establishment Size: Patterns of Change and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既定规模决定的雇员分布:美国的变化和运动模式》). University of Chicago, Mimeo


DE VROEY M..1973. *Propriete et pouvoir dans les grandes entreprises*. Brussels: CRISP

DELPHY C. and LEONARD A.. 1986. Class Analysis, Gender Analysis, and The Family(《阶级分析,性别分析和家庭》).See Crompton and Manns (eds)1986

DENNIS N., Henriques F. M. and SLAUGHTER C.. 1962. *Goal is Our Life*(《目标是我们的生活》).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DEPARTMENT OF SOCIAL SECURITY. 1993. *Households Below Average Income*





关于阶级的冲突  
*Conflicts about Class*

- (《低于平均收入的家庭》).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 DEX S.. 1985. *The Sexual Division of Work* (《工作的性别分工》).Brighton: Harvester
- DJILAS M.. 1966. *The New Class* (《新阶级》).London: Allen& Unwin
- DODD N.. 1994. *The Sociology of Money: Economics, reason and cotemporary society* (《货币社会学:经济,理性和当代社会》).Cambridge: Polity Press
- DOMHOFF G. W.. 1970. *The Higher Circles: The Governing Class in America*(《较高层级:美国的统治阶级》).New York: Vintage
- DOMHOFF G.W.. 1983. *Who Rules America Now?*(《现在谁统治美国?》). New York: Simon&Schuster
- DOMHOFF G. W.. 1990. *The Power Elite and the State*(《权力精英和国家》).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DORE R. P.. 1976. *The Diploma Disease*(《文凭病》). London: Allen & Unwin
- DOUGLAS 1968. *The Home and the School*(《家庭和学校》).London: Penguin Press
- DUCH R.. 1994. Tolerating Economic Reform: Popular Support for Transition to a Free Market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对经济改革的容忍:前苏联民众对向自由市场转变的支持》).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 590~608
- DUNLEAVY P. 1979. The Urban Base of Political Alignment(《政治结盟的城市基础》).*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9
- DUNLEAVY P. and HUSBANDS C.. 1985. *British Democracy at the Crossroads*. (《处于十字路口的英国民主》).London: Allen & Unwin
- DUNLEVY P..1980.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Sectoral Cleavages and the Growth of State Employment(《部分分裂的政治含义和国家就业的增长》). *Political Studies*., 28: 364~383 and 527~549
- DURKHEIM E.. 1964.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1895)(《社会学方法的规则(1895年)》).New York: The Free Press: Collier-Macmillan
- EDER K.. 1993. *The New Politics of Class*(《新的阶级政治》).London: Sage
- EDGEELL S. and DUKE V.. 1991. *A Measure of Thatcherism* (《撒切尔主义的措施》).London: Harper Collins
- EDWARDS R..1988. Segmented Labor Markets.In:F. Hearn(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工业组织的转变》).Belmont, CA: Wadsworth. 85~98
- EHRENREICH B. and EHRENREICH J.. 1979. The professional-Managerial Class(《职业经理阶级》).In:P. Walker (ed.).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Boston: South End.

ELSTER J.. 1985. *Making Sense of Marx*(《理解马克思》).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MMISON M. and WESTERN M.. 1990. Social Class and Social Identity: A comment on Marshall et al (《社会阶级和社会身份: 关于马歇尔等人的评论》).*Sociology* 24 (2): 241~253

ENGBERSEN G.. 1989. cultures of Long-term Unemployment in the West(《西方社会中长期失业的文化》). *Netherland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5:75~96

ENGELS F.. 1968.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英国工人阶级状况》).Oxford: Blackwell

ERIKSON R.. 1984. Social Class of Men, Women and Families(《男性、女性和家庭的社会阶级》).*Sociology* 18, 4:465~488

ERIKSON R. and GOLDTHORPE J.. 1988. Women at class Crossroads: a Critical Note(《处于阶级抉择中的女性: 一种批判意见》).*Sociology* 22:545~548

ERIKSON R. and GOLDTHORPE J.. 1992. *The Constant Flux: 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恒常流量: 工业社会中阶级流动研究》).Oxford: Clarendon

ESPING-ANDERSON G.. 1985. *politics Against Markets* (《反对市场的政治》).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SPING-ANDERSON G (ed.).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SPING-ANDERSON G. (ed). 1993. *Changing Classes*(《变化中的阶级》). London: Sage

ESPING-ANDERSON G. and KORPI, W..1984. Social Policy as class Politics in Post-War Capitalism: Scandinavia, Austria and Germany(《战后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阶级政治的社会政策: 斯堪的那维亚、奥地利和德国》).In:J. H. Goldthorpe (ed.). *Order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Evans G.. 1992. Testing the Validity of the Goldthorpe class Schema(《对戈德索普阶级计划正确性的检验》).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8. 211~232

EVANS G.. 1993. The Decline of Class Divisions in Britain? Class and Ideological Preferences in Britain in the 1960s and 1980s (《英国阶级分化的衰退? 1960年代和1980年代英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偏好》).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4:449~471

EVANS G.. 1993. Is Gender on the New Agenda?(《性别提上新日程了么?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4, 135~158

EVANS G.. 1993. Class, Prospects and the Life-Cycle: Explain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lass Position and Political Preferences(《阶级、前景和生活圈:阶级位置和政治倾向之联系的解释》).*Acta sociologica*, 36:263~276

EVANS G.. 1993. Class conflict and Inequality(《阶级冲突和不平等》).In: R. Jowell, L. Brook and L. Dowds (eds). *International social Attitudes: the 10<sup>th</sup> 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Report*. Aldershot: Dartmouth.

EVANS G.. 1994. An Assessment of the Validity of the Goldthorpe class Schema for Men and Women (《戈德索普关于男性和女性阶级图式之正确性的评价》).In: M. Blackburn (ed.).*Social Inequality in a Changing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Social Research Group

EVANS G.. 1996. Mass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Democracy in Eastern Europe (《东欧的大众政治态度和市场民主的发展》).In L. Whitehead (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iberalis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VANS G. (ed). 1996. *The End of Class Politics?*(《阶级政治的终结? 》). Boulder: Westview Press

EVANS G. and HEATH A..1995. The Measurement of Left-Right and Libertarian-Authoritarian Values:Comparing Balanced and Unbalanced Scales(《左-右和自由-集权价值的测度:平衡和非平衡标准比较》).*Quality and Quantity*, 29: 191~206

EVANS G., HEATH A. and LALLJEE M.. 1996. Measuring Left-Right and Libertarian-Authoritarian Values in the British Electorate(《英国选民中左-右和自由-集权价值的测度》).*Forthcoming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7

EVANS G.. and WHITEFIELD,S.1993. Identifying the Bases of Party Competition in Eastern Europe (《东欧政党竞争的基础考察》).*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3, 521~548

EVANS G. and WHITEFIELD S.. 1995.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Democratic Commitment: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Transition Societies(《民主实践中的政治学和经济学:支持转型社会中的民主》).*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5(4); 485~514

FEATHERMAN D. and HAUSER R.. 1978. *Opportunity and change* (《机会和变化》). New York: Academic

FEATHERMAN D. and SELBEE L.. 1988. Class Formation and Class Mobility: A New Approach with Counts from life History Data(《阶级形成和阶级流动:从生活经历数据中得出的新计算方法》).In: M. Riley and B. Huber (eds). *Social Structure and Human Lives*. Newbury Park: Sage

FEATHERMAN D., SELBEE L. K. and MAYER K. U.. 1989. Social Class and the Structuring of the Life Course in Norway and West Germany(《挪威和西德的社会阶级和生活历程构造》). In: D. Kertzer, J. Meyer and K. W. Schale (eds). *social Structure and Aging*. Hillsdale, New Jersey: Erlbaum

FEATHERMAN D. and SPENNER K.. 1990. Class and the Socialisation of Children: Constancy, Change or Irrelevance?(《阶级和孩子们的社会化:固定、变化或不相关?》). In: E. M. Hetherington, R. M. Lerner and M. Perlmutter (eds) *Child Development in Life-Span Perspective*. Hillsdale, New Jersey: Erlbaum

FEATHERSTONE M.. 1987. Life Style and Consumer Culture(《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4(1):55~70

FEATHERSTONE M.. 1988. In Pursuit of the Postmodern(《追求后现代》).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5:195~215

FEHER F. and HELLER A.. 1984. From Red to Green(《从红到绿》). *Telos*, 59

FIELD F.. 1989. *Losing Out: The Emergence of Britain's Underclass*(《一败涂地:英国下层阶级的形成》). Oxford: Blackwell

FIELD J.. 1985. *The 1983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Survey: Methodological Report*. London: social and community Planning Research

FIENBERG S. E.. 1980. *The Analysis of Cross-Classified Categorical Data*(《跨分类范畴数据的分析》). 2<sup>nd</sup> ed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FLANAGAN S. C.. 1980. Value Cleavages, Economic Cleavages, and the Japanese Voter(《价值分裂,经济分裂和日本选民》).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4

FLETCHER R.. 1971. *The Making of Sociology*(《社会学的形成》). 2 vols. London: Nelson

FLOUD J.. 1954. The Educational Experience of the Adult Population of England and Wales as at July 1949(《如英格兰和威尔士 1949 年 7 月的成人教育经历》). In: D. V. Glass (ed.). *Social Mobility in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98~140

FLOULD R., WACHTER K. and Gregory A.. 1990. *Height, Health and History. Nutritional Status in the United Kingdom (1750—1980)*(《身高、健康和历史:英国(1750—1980 年)的营养地位》).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HLEN C.. 1970. France, 1700—1914(《法国,1700—1914 年》). in Cipolla 1973

FOREST R., MURIE A. and WILLIAMS P.. 1990. *Home Ownership, Differentiation and Fragmentation*(《家庭所有制,差异和分裂》). London: Unwin Hyman

FORSE M.. 1986. La diversificatio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vue à travers le mariage

et l'ideologie. *Tocqueville Review* 7:223~233

FOSTER J. 1974. *Class Struggl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阶级斗争和工业革命》).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FRANKLIN M. 1985. *The Decline of Class Voting in Britain*(《英国阶级投票的衰落》).Oxford: Clarendon Press

FRANKLIN M. et al. 1992. *Electoral change: Responses to Evolving Social and Attitudinal Structures In Western countries*(《选举变化:西方国家对变化的社会结构和态度结构的回应》).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RANKS J. and MAYER C.. 1992. *Corporate control: A Synthe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企业控制:国际证据的综合》).Unpublished paper, London Business School and University of Watrick

FRITZELL J. 1992. Income Inequality Trends in the 1980s: A Five Country Comparison(《1980年代的收入不平等趋势:五国比较》).Working Paper 73, Luxembourg Income Study

FUKAYAMA F.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Harmondsworth: Penguin

GAGLIANI G.. 1981. How Many working Classes?(《有多少工人阶级?》).*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259~285

GALLIE D.. 1988. Employment, Unemployment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就业、失业和社会分层》).In: D.. Gallie (ed.). *Employment in Britain*. Oxford: Basil Blackwell.465~492

GALLIE D.. 1990. John Goldthorpe's Critique of Liberal Theories of Industrialism(《约翰·戈德索普对工业主义的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In: J. Clark, C. Modgil and S. Modgil (eds). *John H. Goldthorpe: Consensus and Controversy*. London: Falmer Press

GAMBLE A.. 1979. The Free Economy and the Strong State(《自由经济和强势国家》). R. Miliband and J. Saville (eds). *Socialist Register*. London: Merlin Press

GANS H. J.. 1990. Deconstructing the Underclass(《解构下层阶级》).*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56, 271~277

GANZEBOOM H., LUIJKX R. and TREIMAN D.. 1989.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代间阶级流动的比较考察》).*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8:3~55

GEIGER T.. 1947. *Vorstudien zu einer soziologie des Rechts*. Aarhus and Copenhagen: Hermann.

GELLNER E.. 1992. *Postmodernism, Reason and Religion*(《后现代主义、理智和宗

教》).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GERSCHENKRON A. 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经济落后的历史角度分析》).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IDDENS A.. 1973.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 London: Hutchinson

GIDDENS A.. 1976. *The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London: Hutchinson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社会的构成》). Oxford: Polity Press

GIDDENS A..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现代性的后果》). Cambridge: Polity Press

GIDDENS A.. 1993.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现代性和自我认同》). Cambridge: Polity Press

GILLE B.. 1970. Banking and Industrialisation in Europe, 1730—1914 (《欧洲的银行业和工业化, 1730—1914年》). in Cipolla 1973

GLASS D. V. (ed.). 1954. *Social Mobility in Britain* (《英国的社会流动》).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GLAZER N.. 1988. *The Limits of Social Policy* (《社会政策的局限》). Cambridge: Massachussets

GOLDBLATT P.. 1990. Mortality and Alternative Classifications (《死亡率和可替代的分类》). In: *Longitudinal Study: Mortality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London: HMSO: 163~192

GOLDEN M. and PONTUSSON J.(esd). 1992. *Bargaining for Change: Union Politics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争取变革: 北美和欧洲的工会政治》).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GOLDTHORPE J.. 1971. Theories of Industrial society: Reflections on the Recrudescence of Historicism and the Future of Futurology (《工业社会理论: 关于历史主义之复苏和未来学之未来的思考》). *Archives Europeennes de sociologie* 12:263~288

GOLDTHORPE J.. 1979. Intellectuals and the Working Class in Modern Britain (《现代英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 Fuller Bequest lecture, University of Essex. Reprinted in D. Rose (ed.). 1988,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Economic Change*. London: Hutchinson

GOLDTHORPE J.. 1982. On the Service Class, its Formation and Future (《论服务阶级, 它的形成和未来》). In: A. Giddens and G. Mackenzie (eds). *Social Class and the Di-*

关于阶级的冲突  
*Conflicts about Class*

*vision of Lab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2~185

GOLDTHORPE J..1983. Woman and Class Analysis: In Defence of the Conventional View(《女性和阶级分析:对传统观点的捍卫》).*Sociology* 17, 4:465~488

GOLDTHORPE J..1984. Women and Class Analysis: A Reply to the Replies(《女性和阶级分析:对回复的回复》). *Sociology* 18, 4:491~499

GOLDTHORPE J. 1984. The End of Convergence: Corporatist and Dualist Tendencies in Modern Western Societies(《趋同的终结:现代西方社会的合作主义和二元主义趋向》).In: J. Goldthorpe (ed.), *Order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GOLDTHORPE J.. 1985.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Formation(《社会流动和阶级形成》).CASMIN Paper No. 1

GOLDTHORPE J..1985. Sociale Mobilitat und Klassenbildung.Zur Erneuerung einer Tradition soziologischer Forschung. In: H. Strasser and J. H. Goldthorpe (eds ). *Die Analyse sozialer Ungleichheit*.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GOLDTHORPE J. 1986. 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 in England and Wales 1972—1983 (《英国和威尔士的代间阶级流动趋势,1972—1983年》).*Sociology* 20:1~24

GOLDTHORPE J. 1987.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现代英国的社会流动和阶级结构》).with Llewellyn, C. and Payne, 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econd edn, (First Edition, 1980)

GOLDTHORPE J. 1990. A Response (《一个答复》).In:Clark J., Modgil C. and Modgil S. (eds). *John H. Goldthorpe: Consensus and Controversy*, London: Falmer

GOLDTHORPE J. 1992. Employment, Class and Mobility: A Critique of Liberal and Marxist Theories of Long Term Change(《就业,阶级和流动:对关于长期变化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In:H. Haferkamp and N. Smelser (eds). *Modernity and Social Chan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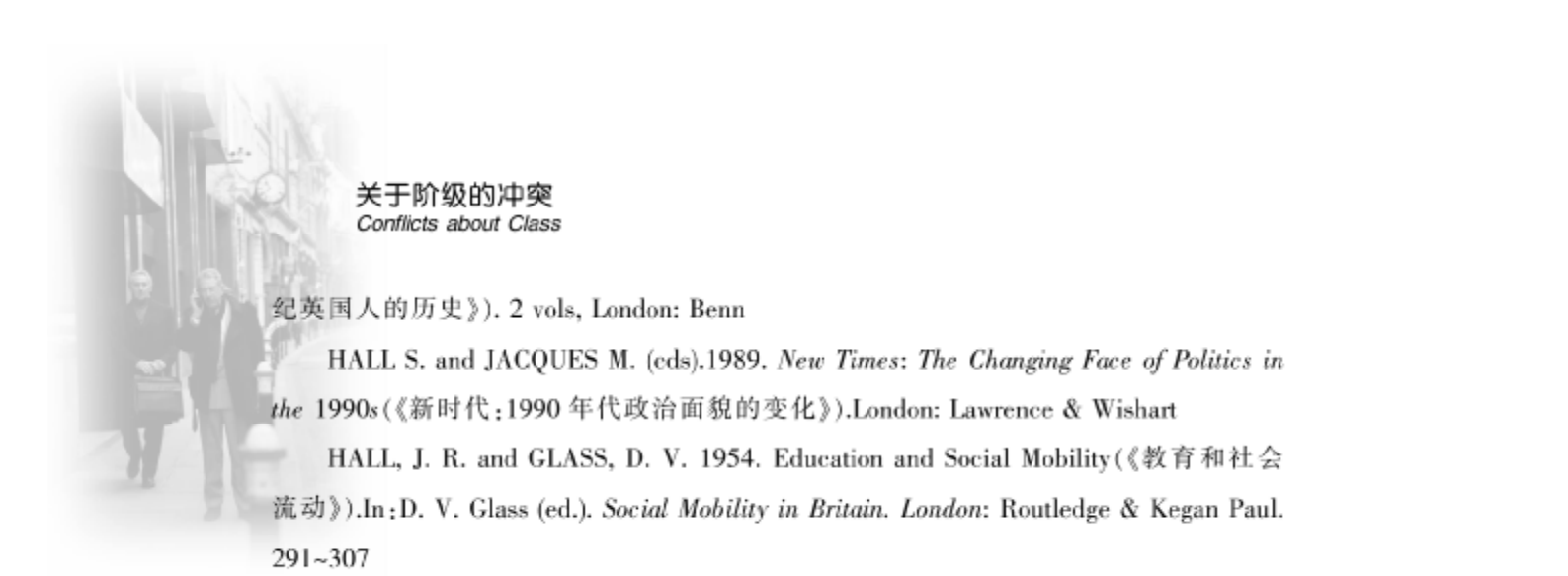
GOLDTHORPE J. 1996. Modelling the Pattern of Class Voting in British Elections, 1964 to 1992 (《英国选举中阶级投票模式的模型建构,1964—1992年》). In Evans G. (ed.). *The End of Class Politic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GOLDTHORPE J. and HEATH A.. 1992. Revised Class Schema 1992(《修正的阶级图式,1992》). *Jusst Working Paper No. 13*, Nuffield College and SCPR

GOLDTHORPE J. and HOPE K.. 1974. The Social Grading of Occupations: A New Approach and Scale(《职业的社会分级:新方法和新标准》).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GOLDTHORPE J., LOCKWOOD D., BECHOFFER F. and PLATT J.. 1969. *The Affluent Worker in the Class Structure*(《阶级结构中的富裕工人》).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LDTHORPE J., PAYNE C. and LLEWELLYN C.. 1978. Trends in Class Mobility(《阶级流动趋势》).*Sociology* 12, 441~468
- GORDON D., EDWARDS R. and REICH M.. 1982. *Segmented Work, Divided Workers*(《分散的工作,分化的工人》).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RDON M.. 1949.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美国社会学杂志》)
- GORZ A.. 1982.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告别工人阶级》). London: Pluto
- GOTTSCHALK P..1993. Changes in Equality of Family Income in Seve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七个工业化国家中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变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3:136~142
- GOTTSCHALK P. and JOYCE M.. 1991. Changes in Earnings Inequality(《收入不平等的变化》).Working Paper 66, Luxembourg Income Study
- GOULDNER A.. 1979.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 New York: Seabury Press
- GRAETZ B.. 1992.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Australia(《澳大利亚的不平等和政治激进主义》).*Research in Inequality and Social Conflict* 2: 157~177
- GRANOVETTER M..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弱纽带的力量》).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360~1380
- GRANOVETTER M.. 1984. Small is Beautiful: Labour Markets and Establishment Size(《小的是美好的;劳动力市场和既有规模》).*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323~334
- GRAY P. G. and CORLETT T.. 1950. Sampling for the Social Survey (with discussion)(《社会调查(讨论)抽样》).*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A*, 113, 150~206
- GRUSKY D.B. 1986. American Social Mobility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19和20世纪的美国社会流动》).Ph. D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 GUTTSMAN, W. G.. 1963. *The British Political Elite*(《英国政治精英》).London: MacGibbon & Kee
- HABERMAS J.. 1967. *Legitimation Crisis*(《合法性危机》). London: Heinemann
- HALFVY E.. 1962.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世





关于阶级的冲突  
*Conflicts about Class*

纪英国人的历史》). 2 vols, London: Benn

HALL S. and JACQUES M. (eds).1989. *New Times: The Changing Face of Politics in the 1990s*(《新时代:1990年代政治面貌的变化》).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HALL, J. R. and GLASS, D. V. 1954. 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教育和社会流动》).In: D. V. Glass (ed.). *Social Mobility in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291~307

HALL J. and JONES D.. 1950. The social Grading of Occupations(《职业的社会分级》).*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 31~35

HALLER M.. 1990. European Class Structure: Does it Exist?(《欧洲阶级结构:它存在么?》).In: Haller (ed.), *Class Structure in Europe: New Findings from East-West Comparisons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Mobility*. London: M. E. Sharpe

HALSEY A.. 1977. Towards Meritocracy? The Case of Britain(《走向知识界精英?以英国为例》).In: A. Halsey and J. Karabel (eds) . *Power and Ideology in Educ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LSEY A.. 1987. Social Trends since World War II(《二战以来的社会趋势》).*Social Trends*, No. 17 (Government Statistical Service)

HALSEY A. H., HEATH A. F. and RIDGE J. M.. 1980. *Origins and Destinations: Family, Class, and Education in Modern Britain*(《起源和目的:现代英国的家庭,阶级和教育》). Oxford: Clarendon

HAMILTON G. C. (ed.). 1991. *Business Network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nd South East Asia*(《东亚和东南亚的商业网络 and 经济发展》).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AMILTON G. C., ORRU M. and BIGGART N.. 1987. Enterprise Groups in East Asia. *Shoken Keizai* 161

HAMILTON G. C. and BIGGART N.. 1988. Market, Culture and Author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sation in the Far East(《市场、文化和权威:远东管理和组织的比较分析》).*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upplement

HAMILTON M. and HIRSZPWICZ M.. 1993. *Class and Inequalit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阶级和不平等:比较考察》).Hemel Hempstead: Harvest Wheatsheaf

HARRIS C. C.. 1987. *Redundancy and Recession in South Wales*(《南威尔士的冗余和萧条》).Oxford: Basil Blackwell

HARRISON B. and BLUESTONE B.. 1988. *The Great U-Turn: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and the Polarizing of America*(《大U形转弯:美国企业的重组和阶级分化》).New

York: Basic

HART K.. 1986. Heads or Tails? Two Sides of a Coin(《正还是反? 硬币的两面》). The 1986 Malinowski Memorial Lecture, *Man*, 21:637~656

HARTMANN H.. 1982. Capitalism, Patriarchy and Job Segregation by Sex(《资本主义, 家长制和性别的工作隔离》). In: A. Giddens and Held D. (eds). *Classes, Power and Conflict*. London/Basingstoke: Macmillan

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后现代性的条件》). Oxford: Blackwell

HAUSER R.. 1972.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and Educational Performance*(《社会经济落后和教育实践》). Washington, D.C.: Rose Monograph Se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HAUSER R.. 1978. A Structural Model of the Mobility Table(《流动表的结构模型》). *Social Forces* 56:919~953

HAUSER R., DICKINGSON P. J., TRAVIS H. P. and KOFFEL J. M.. 1975. Temporal Change in Occupational Mobility: Evidence for Men in the United States(《职业流动的时间变化: 美国男性的材料》).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0:279~297

HAUSER R. M. and GRUSKY D. B.. 1984. Comparative Social Mobility Revisited(《比较社会流动再思考》).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19~38

HAUSER R. M. and GRUSKY D. B.. 1987. Cross-National Variation in Occupational Distributions, Relative Mobility Chances and Intergenerational Shifts in Occupational Distributions(《职业分布的国家间差别, 相对流动机会和职业分布的代间变化》). Draft Paper

HEARN F.. 1978. *Domination, Legitimation and Resistance*(《统治, 合法性和抵制》).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HEATH A. and BRITTEN N.. 1984. Women's Jobs Do Make a Difference: A Reply to Goldthorpe(《女性工作确实重要: 回应戈德索普》). *Sociology* 18, 4:475~490

HEATH A., MILLS C. and ROBERTS J.. 1991. *Towards Meritocracy? Recent Evidence on an Old Problem*.(《走向知识界精英? 关于一个老问题的新证据》). Joint Unit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Trends, SCPR-Nuffield College, Oxford Working Paper 3

HEATH A.. 1981. *Social Mobility*(《社会流动》). London: Fontana

HEATH A.. 1984. In Defence of Comprehensive Schools(《为综合中学辩护》).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10, 115~123

HEATH A., JOWELL R. and CURTICE J. (eds). 1994. *Labour's Last Chance? The*



关于阶级的冲突  
*Conflicts about Class*

1992 *Election and Beyond*(《劳工的最后机会? 1992 年选举及其他》). Aldershot: Dartmouth

HEATH A. and RIDGE J.. 1983. Schools, Examinations and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学校, 考试和职业成就》). In: J. Purvis and M. Hales (eds ). *Achievement and Inequality in Educa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HEATH A., JOWELL R. and CURTICE J.. 1985. *How Britain Votes*(《英国如何选举》). Oxford: Pergamon

HEATH A., JOWELL R. and CURTICE J.. 1987. Trendless Fluctuation A Reply to Crewe(《无趋向波动》). *Political Studies* 35, 256~277

HEATH A. et al.. 1991.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Change: The British Voter, 1964—1987*(《理解政治变化: 英国选举, 1964—1987 年》). Oxford: Pergamon

HEATH A. and CLIFFORD P.. 1990. Class Inequalities in Educ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20 世纪教育中的阶级不平等》).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A, 153, 1~16

HEATH A. and MCMAHON D.. 1991. Consensus and Dissensus (《共识和分歧》). In: R. Jowell et al. (eds). *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the 8<sup>th</sup> Report*. London: Social and Community Planning Research.

HEATH A., EVANS G. and MARGINEAN I.. 1994. Clasa sociala si politica in Europa de Est. *Revista de Cercetari Sociale* 2:59~67

HEATH A., EVANS G. and PAYNE C.. 1995. Modelling th Class/Party Relationship in Britain, 1964—1992(《关于英国阶级/政党关系的模型建构, 1964—1992 年》).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forthcoming

HEITLINGER A.. 1979. *Women and State Socialism* (《女性和国家社会主义》).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HENDERSON W.. 1961.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urope*(《欧洲的工业革命》). Chicago: Quadrangle

HERMAN E. S.. 1981. *Corporate Control, Corporate Power: A Twentieth Century Fund Study*(《企业控制, 企业权力; 20 世纪基金研究》).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SLI V. and MILLER A.. 1993. The Gender Base of Institutional Support in Lithuania, Ukraine and Russia(《立陶宛、乌克兰和俄国制度支持的性别基础》). *Europe-Asia Studies* 45, 505~532

HIBBS D.. 1982. Economic Outcomes and Political Support for British Governments

among the Occupational Classes (《职业阶级中对英国政府的经济影响和政治支持》).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6:259~279

HIBBS D.. 1990. *Wage Compression under Solidarity Bargaining in Sweden*(《瑞典集体谈判下的工资压缩》). Stockholm: Trade Uni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HIBBS D.. 1991. Market Forces, Trade Union Ideology and Trends in Swedish Wage Dispersion(《市场力量,工会意识形态和瑞典工资分散的趋势》).*Acta Sociologica*. 34: 89~102

HILFERDING R.. 1910. *Finance Capital*(《金融资本》).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1

HINDESS B.. 1987. *Politics and Class Analysis*(《政治和阶级分析》). Oxford: Basil Blackwell

HIRSCHMEIER J.. 1964. *The Origins of Entrepreneurship in Meiji Japan*(《明治时代日本企业家的兴起》).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IRST P. Q.. 1977. Economic Classes and Politics (《经济阶级和政治》)In: A. Hunt (ed.). *Class and Structur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HOBBSAWM E. J.. 1959. *Primitive Rebels*(《原始反抗》).Londo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HOBBSAWM E. J.. 1964. *Labouring Men* (《劳工》).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HOBBSAWM E. .1981. The Forward March of Labour Halted? (《劳工前进的脚步停止了么? 》).and Observations on the Debate. In: M. Jacques and F. Mulhern (eds), *The Forward March of Labour Halted?*. London: New Left boo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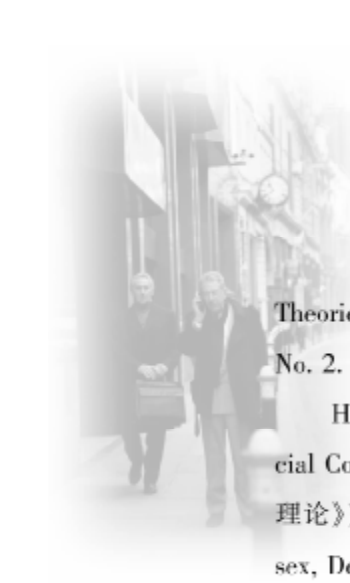
HOCHSCHILD A.. 1989. *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Parent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第二次转变:工作双亲和家庭内的革命》).New York: Viking

HODSON R.. 1983. *Workers' Earnings and Corporate Economic Structure*(《工人的收入和企业的经济结构》). New York: Academic

HOFF J.. 1982.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Petty Bourgeoisie? The Scandinavian Experien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Marxist Research on Class, State, and Ideology(《小资产阶级的复苏? 斯堪的纳维亚经验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国家和意识形态研究的意义》).Prepared for Int. Conf. State, Consenza, Italy

HOGGART R.. 1957. *The Uses of Literacy*(《有文化的好处》). London: Chatto & Windus

HOLMWOOD J.and STEWART A.. 1983. The Role of Contradictions in Modern



关于阶级的冲突  
*Conflicts about Class*

Theorie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现代社会分层理论矛盾的作用》). *Sociology* Vol. 17, No. 2.

HOLMWOOD J. and STEWART A.. 1995. Social Integration, System Integration, Social Contradiction and Sociological Theory(《社会学整合,体制整合,社会矛盾和社会学理论》). Paper Presented to Retirement Conference for David Lockwood, University of Essex,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pril 1995

HOLTMANN D. and STRASSER H.. 1990. Comparing Class Structures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n Western Societies (《西方社会中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比较》). In: M. Haller (ed.). *Class Structure in Europe: New Findings from East-West Comparisons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Mobility*. Armonk: Sharpe. 3~23

HOLTON R.. 1976. *British Syndicalism 1910—1914*. (《英国工团主义》). London: Pluto Press

HOLTON R.. 1992. *Economy and Society*(《经济和社会》). London: Routledge

HOLTON R. and TURNER B.. 1986. *Talcott Parsons on Economy and Society*(《塔尔科特·帕森斯论经济和社会》).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HOLTON R. and TURNER B. .1989. *Max Weber on Economy and Society*(《马克思·韦伯论经济和社会》).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HOLTON R. and TRUNER B. S.. 1994. Debate and Pseudo-Debate in Class Analysis: Some Unpromising Aspects of Goldthorpe and Marshall's Defence(《阶级分析中的辩论和伪辩论:戈德索普和马歇尔辩护中的一些没有希望的方面》). *Sociology* Vol. 28(3): 799~804

HOPE K.. 1981. Trends in the Openness of British Society in the Present Century (《本世纪英国社会的开放趋势》).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1:127~169

HOUT M.. 1982.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Husbands' and Wives' Occupations in Two-Earner Families' (《双收入家庭中丈夫和妻子职业的联系》).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8:397~409

HOUT M.. 1988. More Universalism, Less Structural Mobility(《更多普遍性,较少结构性流动》).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1358~1400

HOUT M.. 1989. *Following in Father's Footsteps: Social Mobility in Ireland*(《沿着父辈的足迹:爱尔兰的社会流动》).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OUT M. and HAUSER R.. 1992. Hierarchy and Symmetry in Social Mobility(《社会流动中的等级和对称》).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8:239~266

- HOUT M., WRIGHT E. and SANCHEZ-JANKOWSKI M. 1992. 1991—1992 Class Structure and Consciousness Survey(《1991—1992年阶级结构和意识调查》). [Machine Readable Data File and Documentation]. Berkeley: UC Berkeley Survey Research Center
- HOUT M., BROOKS C. and MANZA J. 1995. Class Voting in Capitalist Democracies since World War II: Dealignment, Realignment or Trendless Fluctuation(《二战以来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的阶级投票:非结盟,再结盟或无趋势波动》).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forthcoming
- HOUT M., BROOKS C. and MANZA J. 1995. The Democratic Class Struggl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8—1992(《1948—1992年美国的民主阶级斗争》).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forthcoming
- HUMPHRIES J. 1988. Protective Legislation, the Capitalist State and Working Class Men: the case of the 1984 Mines Regulation Act(《保护立法、资本主义国家和工人阶级:以1984年矿山规章法案为例》). In: R. Pahl (ed.). *On Work*. London: Basil Blackwell
- HYMER S. 1972.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the Law of Uneven Development(《跨国公司和不平衡发展法》). In: J. Bhagwati (ed.). *Economics and the World Order from the 1970s to the 1990s*, London: Collier-Macmillan.113~140
- INGHAM G. 1984. *Capitalism Divided*(《分裂的资本主义》). London: Macmillan
- INGLEHART R. 1977.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沉默的革命:西方公众变化的价值和政治方式》).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INGLEHART R. 1984.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Political Cleavages in Western Society(《西方社会变化的政治分裂结构》).In: Dalton, R. J., Flanagan, S. C. and Beck, P. A. (eds). *Elector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INGLEHART R. 1990. *Cultru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变》).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INGLEHART R. and FLANAGAN S. 1989. Value Change in Industrial Societies(《工业社会的价值变化》).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1 (4): 1289~1319
- INGLEHART R. and RABIER, J. R. 1986. Political Realignmen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from Class-Based Politics to Quality-of-Life Politics(《发达工业社会的政治调整:从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到生活质量政治学》).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1: 456~479
- IRWIN S. and MORRIS L. 1993. Social Security or Economic Insecurity? The Con-

centration of Unemployment (and Research) within Households(《社会安全或经济不安全? 家庭内部失业的集中化(及其研究)》). *Journal of Social Polity* 22, 349~372

ISHIDA H.. 1993. *Social Mobility in Japan*(《日本的社会流动》).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JENCKS C. and PETERSEN P. (eds). 1991. *The Urban Underclass*(《城市中的下层阶级》).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e

JENKINS S. P.. 1991. Living Standards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1970s and 1980s(《20世纪70和80年代的生活水平和收入不平等》). *Fiscal Studies* Vol. 12

JOHANISSON B.. 1989. Entrepreneurship in a Corporatist State: The Case of Sweden(《合作主义国家中的企业家:以瑞典为例》). In: R. Goffee, R. Scase (eds). *Entrepreneurship in Europe*. London: Croom Helm 131~143

JOHNSON C.. 1982.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MITI和日本奇迹:1925—1975年间的工业政策发展》).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JOHNSON P. and STARK, G.. 1989. *Tax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1979—1989*. (《1979—1789年间的税收和社会安全》). London: Institute of Fiscal Studies

JONES F.. 1991. *Common Social Fluidity: A Comment on Some Recent Criticism*(《普通社会:流动性:对一些新近批判的评论》). Research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JONSSON J.. 1991. *Towards the Merit-Selective Society?*(《走向绩效选择的社会?》). Swedish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JONSSON J.. 1991. *Class Formation: The Holding Power and Socio-Demographic Composition of Social Classes in Sweden*(《阶级形成:瑞典社会阶级的权力所有和社会人口构成》). Swedish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JONSSON J. and MILLS C.. 1993. Social Class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Swedish-English Comparison, Parts I and II(《从历史上考察社会阶级和教育成就:瑞典和英国的比较,第1和第2部分》).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4 (2): 213~247

JOYCE P.. 1995. *Class*(《阶级》)Oxford: Oxford Universtiy Press

KALLENBERG A. L. and BERG I.. 1987. *Work and Industry: Structures, Markets, and Processes*(《工作和工业:结构、市场和过程》). New York: Plenum Press

KARABEL J. and HALSEY A.. 1977. *Power and Ideology in Education*(《教育的权力和意识形态》). Oxford: Oxford Universtiy Press

KATZENSTEIN P.. 1984. *Corporatism and Change: Austria, Switzerland,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y*(《合作主义和变化:奥地利、瑞士和工业政治》).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ATZENSTEIN P.. 1985. *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 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世界市场中的小国:欧洲的工业政策》)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ATZENSTEIN P.. 1987. *Policy and Politics in West Germany: The Growth of a Semisovereign State*(《西德的政策和政治:半主权国家的发展》).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KATZENSTEIN P.. 1989. Industry in a Changing West Germany(《变化中西德的工业》). In: P. J. Katzenstein (ed.). *Industry and Politics in West Germany: Toward the Third Republic*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3~29

KEANE J.. 1988.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民主和市民社会》). London: Verso

KERCKHOFF A. and TROTT J.. 1993.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a Changing Educational System: The Case of England and Wales(《变化教育体系中的教育成就:以英格兰和威尔士为例》). See Shavit, Y. and Blossfeld H. P. (eds), 1993

KERN H. and SCHUMANN M.. 1984. Work and Social Character(《工作和社会特征》).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mocracy* 5: 51~71

KERN H. and SCHUMANN M.. 1987. Limits of the Division of Labour. New Production Concepts in West German Industry(《劳动分工的局限:西德工业的新生产观念》).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mocracy* 8: 151~171

KERR C.. 1983. *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Society*(《工业社会的未来》).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ERR C., DUNLOP J., HARBISON F. and MYERS C. .1969. *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工业主义和工业人》).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ITCHEN M.. 197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ermany, 1815—1914*(《1815—1914年德国的政治经济》). London: Croom Hel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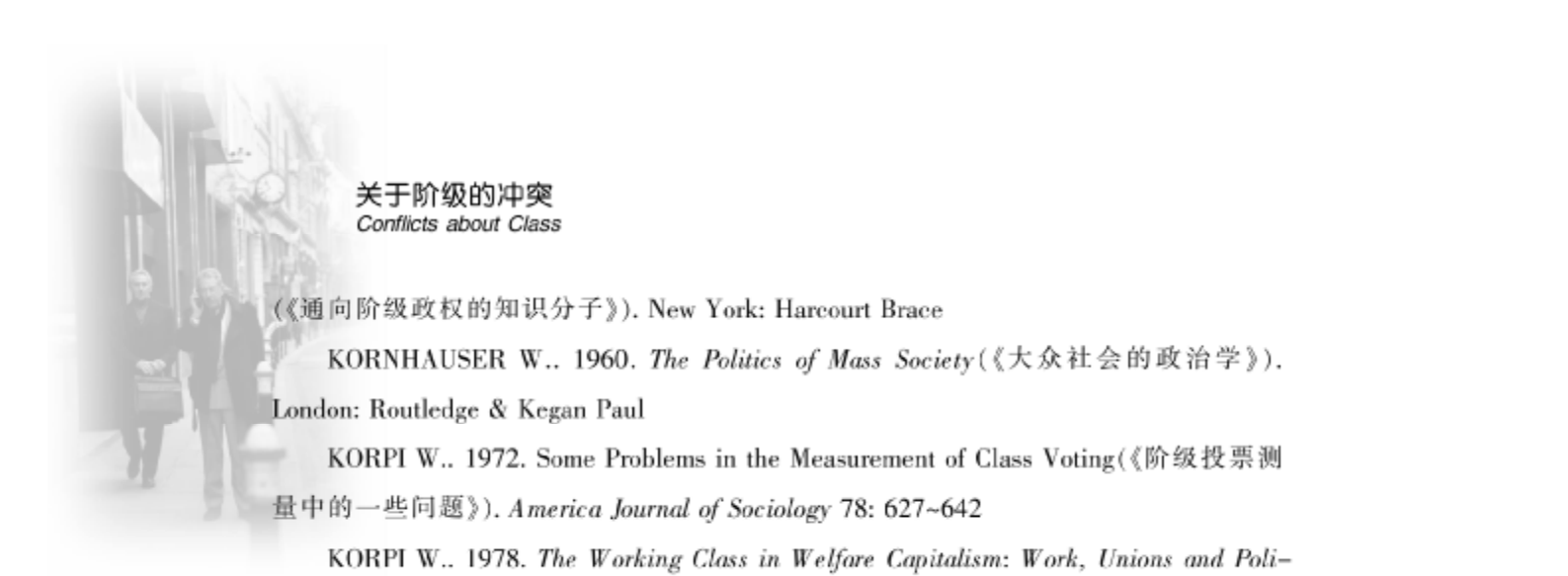
KITSCHOLT H.. 1992. The Formation of Party Systems in East Central Europe(《中东欧政党制度的形成》). *Politics and Society* 20, 7~50

KITSCHOLT H..1994.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OCKA J.. 1980. *The Rise of the Modern Industrial Enterprise in Germany*(《德国现代工业企业的兴起》).See Chandler, A. D. and Daems, H. (eds), 1980

KONRAD G. and SZELENYI I..1979.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关于阶级的冲突  
*Conflicts about Class*

(《通向阶级政权的知识分子》).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KORNHAUSER W.. 1960. *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大众社会的政治学》).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KORPI W.. 1972. Some Problems in the Measurement of Class Voting(《阶级投票测量中的一些问题》). *America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627~642

KORPI W.. 1978. *The Working Class in Welfare Capitalism: Work, Unions and Politics in Sweden*(《福利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瑞典的工作、工会和政治》).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KORPI W.. 1983. *The Democratic Class Struggle* (《民主的阶级斗争》).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KOSSALECK R.. 1988. *Critique and Crisis*(《批判和危机》). Oxford: Berg

KOZULIN A.. 1990. *Vygotsky's Psychology: a Biography of Ideas*(《维戈茨基心理学:思想传》).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KRYSHANTANOVSKAYA O.. 1993. The Emerging Business Elite(《兴起中的商业精英》). See Lane D. (ed.). 1993

KUHN A. and WOLPE A. (eds). 1978. *Feminism and Materialism*(《女权主义和唯物主义》).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KUTTNER R.. 1983. The Declining Middle(《衰落的中间阶级》). *Atlantic Monthly*, July: 60~72

LACLAU E. and MOUFFE C.. 1985. *Hegemony and Social Strategy*(《霸权和社会策略》). London: Vers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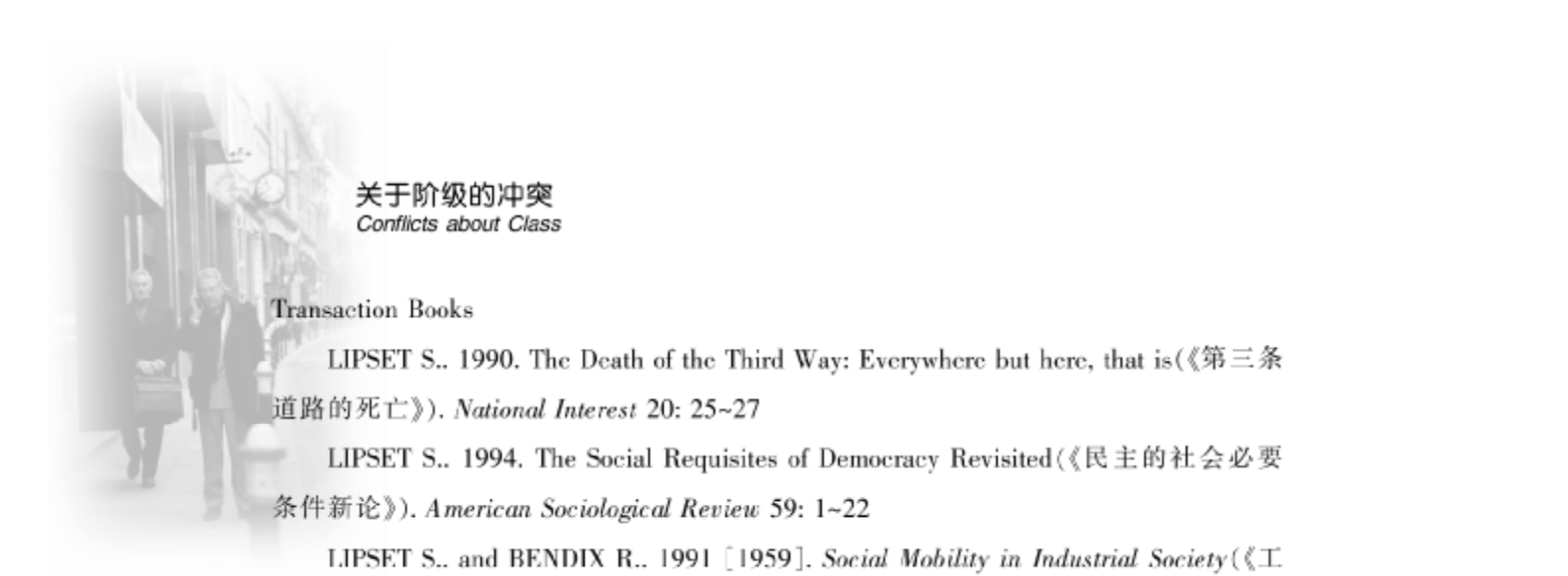
LAKATOS, I. 1970. Fals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科学研究计划的反证和方法论》). In: I. Lakatos and A. Musgrave (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批评和知识增长》).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NDES D.S.. 1965. Japan and Europe: Contrasts in Industrialization(《日本和欧洲:工业化比较》). In: W. Lockwood (ed.). *The State and Economic Enterprise in Japan: Essay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93~182

LANDES D. S.. 1969. *The Unbound Prometheus*(《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NE C.. 1992.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Common Challenges - Diverse Responses(《工业结构和成就:共同挑战—不同反应》). In: J. Bailey (ed. ). *Social Europe* (《社会欧洲》). London: Longman

- LANE D. (ed.). 1993. *Russia in Flux*(《变迁中的俄罗斯》).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LASH S.. 1990. *Sociology of Postmodernism*(《后现代主义社会学》). London: Routledge
- LASH S.. and URRY J.. 1987. *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LAVER M., MARSH M. and SINNOT R.. 1987. Patterns of Party Support(《政党支持模式》). In: Laver M., Mair P. and Sinnot R. (eds).*How Ireland Voted: The Irish General Election of 1987*. Dublin: Poolber Press
- LEE D.. 1994. Class as a Social Fact(《作为社会事实的阶级》). *Sociology* 28 (2): 397~415
- LEHMBRUCH G.. 1977. Liberal Corporatism and Party Government(《自由合作主义和政党治理》).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0: 91~126
- LEHMBRUCH G. and SCHMITTER P. (eds). 1982. *Patterns of Corporatist Policy-Making*(《合作主义决策模式》). London: Sage
- LEIULSFRUD H. and WOODWARD A.. 1987. Women at Class Crossroads(《面临阶级抉择的妇女》). *Sociology* 21: 393~412
- LENIN V. I. 1916.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LEVY F.. 1988. *Dollars and Dreams: The Changing American Income Distribution*(《美元和梦想:变化中的美国收入分配》).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LEWIS O.. 1968. The Culture of Poverty(《贫困的文化》). In: D. P. Moynihan (ed.). *Understanding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 LEWIS P.. 1993. Civil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East-Central Europe(《市民社会和中东欧政党的发展》).*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9, 5~20
- LINDBLOM C.. 1977. *Politics and Markets*(《政治和市场》). New York: Basic Books
- LINDER M. and HOUGHTON J.. 1990. Self-Employment and the Petty Bourgeoisie: Comment on Steinmetz and Wright(《自雇和小资产阶级:论斯坦因梅茨和怀特》).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 727~735
- LIPSET S.. 1960.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 New York: Doubleda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1981
- LIPSET S.. 1985. *Consensus and Conflict*(《一致和冲突》). New Brunswick, NJ:



关于阶级的冲突  
*Conflicts about Class*

Transaction Books

LIPSET S.. 1990. The Death of the Third Way: Everywhere but here, that is(《第三条道路的死亡》). *National Interest* 20: 25~27

LIPSET S.. 1994. Th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Revisited(《民主的社会必要条件新论》).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9: 1~22

LIPSET S.. and BENDIX R.. 1991 [1959]. *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y*(《工业社会的社会流动性》).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LIPSET S. and ROKKAN S. (eds). 1967.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政党制度和投票者联盟:跨国观察》). New York: Free Press

LIPSET S. and SCHNEIDER W.. 1983. *The Confidence Gap*(《信心鸿沟》). New York: Free Press.

LIVINGSTONE D.. 1983. *Class Ideologies and Educational Futures*(《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教育的未来》).Sussex: Falmer

LOCKWOOD D.. 1958. *The Black-Coated Worker*(《黑领工人》).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OCKWOOD D.. 1966. Sources of Variation in Working-Class Images of Societ(《工人阶级社会形象变化的根源》). *Sociological Review*, 14 (3): 244~267

LOCKWOOD D.. 1981. The Weakest Link in the Chain: Some Comments on the Marxist Theory of Action (《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对马克思主义行动理论的一些评论》).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Work*, 435~481

LOCKWOOD D.. 1986. Class, Status and Gender(《阶级、社会地位和性别》).In: R. Crompton and M. Mann (eds), 1986: 11~21

LOCKWOOD D.. 1992. *Solidarity and Schism: The Problem of Disorder*(《团结和分裂:“无秩序问题”》). In: Durkheimian and Marxist Sociolog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LOCKWOOD W. .1968.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日本的经济的发展》).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UKER K.. 1984. *Abor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Motherhood* (《堕胎和母性政治》).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UKES S.. 1984. The Future of British Socialism?(《英国社会主义的未来?》). In: B. Pimlott (ed.). *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t Thought*. London: Heinemann

LYOTARD J. F..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后现代的条件:关于知识的报告》).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LYOTARD. J. F.. 1988. *Peregrinations. Law, Form, Event*(《游历:法律、形式和事

件》).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CCAHERY J., PICCIOTTO S. and SCOTT C. (eds). 1993. *Corporate Control and Accountability*(《企业控制和责任》).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CCLOSKEY H. and BRILL A.. 1983. *Dimensions of Tolerance: What Americans Believe about Civil Liberties*(《宽容的维度:美国人相信什么样的公民自由》).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MACDONALD K. I. 1974. The Hall-Jones Scale: A Note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ain British Prestige Coding(《豪—琼斯标准:对主要英国名人圈的解释》). In: J. M. Ridge (ed.). *Mobility in Britain Reconsidered*, Oxford: Clarendon. 97-115

MACDONALD K. and RIDGE J.. 1987. Social Mobility(《社会流动性》). In: A. H. Halsey (ed.). *Trends in British Society Since 1990*, 2<sup>nd</sup> edn, London: Macmillan

MCINTOSH M., MACIVER M., ABELE D. and NOLLE D.. 1995. Minority Rights and Majority Rule: Ethnic Tolerance in Romania and Bulgaria(《少数权利和多数统治: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种族宽容》). *Social Forces* 73: 939-967

MCMAHON J. and TSCHETTER J.. 1986. The Declining Middle Class: A Further Analysis(《衰落的中间阶级:进一步的分析》). *Monthly Labor Review*, Sept: 22-28

MCPHERSON A. and WILLMS D.. 1987. Equalisation and Improvement: Some Effects of Comprehensive Reorganisation in Scotland(《平等化和进步:苏格兰综合性重组的一些影响》). *Sociology*, 21, 509-539

MCRAE S.. 1986. *Cross-Class Families*(《跨阶级家庭》).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IR P..1979. The Autonomy of the Politica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rish Party System(《政治自治:爱尔兰政党体制的发展》). *Comparative Politics* 11: 445-465

MAIR P.. 1992. Explaining the Absence of Class Politics in Ireland(《对爱尔兰缺乏阶级政治的解读》). In: J. Goldthorpe and C. Whelan (eds).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Society in Ireland*, London: The British Academy

MANN K.. 1992. *The Making of an English 'Underclass'?*(《英国“下层阶级”的形成?》).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MANN M.. 1970. The Social Cohesion of Liberal Democracy(《自由民主政体的社会凝聚力》).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5, 423-439

MANN M.. 1973. *Consciousness and Action among the Western Working Class*(《西方工人阶级的意识和行动》). London: Macmillan

MANN M.. 1986.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社会权力的源泉》).2 vols, Cam-

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NN M.. 1987. Ruling Class Strategies and Citizenship (《统治阶级策略和公民权》). *Sociology*, 21, 339~354

MANZA J.. 1992. Classes, Status Groups, and Social Closure: A Critique of Neo-Weberian Social Theory (《阶级、地位群体和社会闭合:新韦伯主义社会理论批判》).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Social Theory* 12: 275~302

MARCEAU J.. 1977. *Class and Status in France: Economic Change and Social Im-mobility* (《法国的阶级和社会地位:经济变化和社会非流动性》).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ARCEAU J.. 1977. *Class and Status in France* (《法国的阶级和社会地位》).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RCEAU J.. 1989. *France* (《法国》). See Bottomore and Brym 1989

MARCEAU J.. 1989. *A Family Business? The Making of 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lite* (《家庭商业? 国际商业精英的形成》).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RE R. D.. 1980. Social Background and Educational Continuation Decisions (《社会背景和延续教育的决策》).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75: 295~305

MARE R. D.. 1981.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教育分层的变化和稳定性》).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6: 72~87

MARKLAND S.. 1990. Structures of Modern Poverty (《现代贫困的结构》). *Acta Sociologica* 33: 125~140

MARSH A.. 1975. The Silent Revolution, Value Prioritie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in Britain (《英国的无声革命、价值优先性和生活质量》).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9

MARSH C.. 1986. *Occupationally-Based Measures of Social Class* (《建立在职业基础上的社会阶级测度》). London: Social Research Association

MARSHALL G.. 1983. Some Remarks on the Study of Working-Class Consciousness (《关于工人阶级意识的一些评论》). *Politics and Society* 12. 263~301 reprinted in D. Rose (ed.), 1988

MARSHALL G.. 1988. Classes in Britain: Official and Marxist (《英国的阶级:官方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4: 141~154

MARSHALL G.. 1990. John Goldthorpe and Class Analysis (《约翰·戈德索普和阶级分析》). In J. Clark, C. Modgill and S. Modgill (eds). *John H. Goldthorpe: Consensus and*

*Controvers.* London: Falmer

MARSHALL G. et al. .1985. Class, Citizenship, and Distributional Conflict in Modern Britain(《现代英国的阶级、公民和分配冲突》).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6 (2)

MARSHALL G.. 1991. In Defence of Class Analysis: A Comment on R. E. Pahl(《捍卫阶级分析:论 R. E. 帕尔》).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5 (1): 114~118

MARSHALL G.. NEWBY H., ROSE, D. and VOGLER C..1988. *Social Class in Modern Britain*(《现代英国的社会阶级》). London: Hutchinson

MARSHALL G. and ROSE D.. 1990. Out-classed by Our Critics?(《我们的批评家超越阶级了吗? 》). *Sociology* 24: 255~267

MARSHALL G. and SWIFT A.. 1992. Social Class and Social Justice(《社会阶级和社会公正》).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forthcoming

MARSHALL G., ROBERTS S., BURGOYNE, SWIFT, A. and ROUTH, D.. 1995. Class, Gender, and the Asymmetry Hypothesis(《阶级、性别和不对称假说》).*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1: 1~15

MARSHALL T.. [1949] 1973. *Class, 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阶级、公民和社会发展》). Westport: Greenwood

MARSHALL T. H.. 1981. *The Right of Welfare and Other Essays*(《福利的权利及其他论文》). London: Heinemann

MARSLAND D.. 1987. *Bias Against Business*(《对商业的偏见》). London: Educational Research Trust

MARTINELLI A. and CHIESI A. M.. 1989. Italy(《意大利》). See Botomore and Brym 1989, 109~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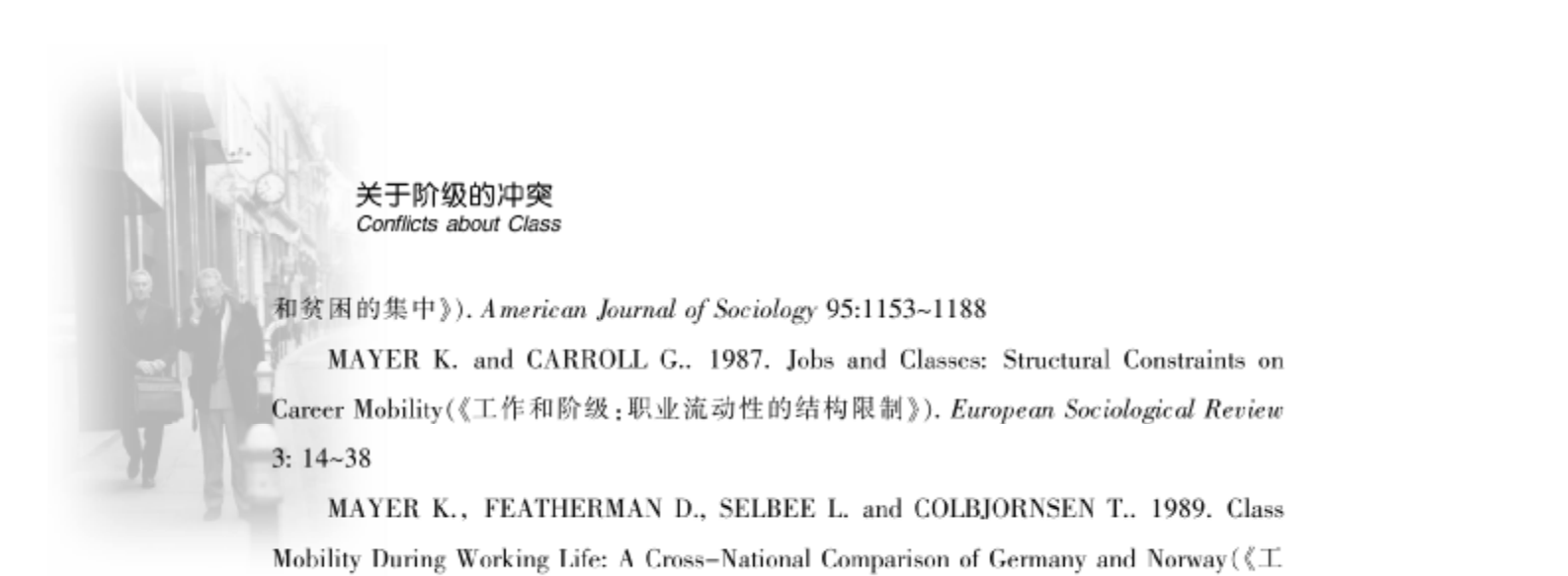
MARX K.. 1934.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Napoleon*(《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MARX K. 1976. *Capital*(《资本论》). Vol. 1, London: Penguin

MARX K. and ENGELS F.. 1968. *Selected Works*(《著作选编》).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MASSEY D. S.. 1990. American Apartheid: Segreg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derclass(《美国的种族隔离:种族隔离和下层阶级的形成》)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6: 329~357

MASSEY D. and EGGERS M.. 1990. The Ecology of Inequality: Minorities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Poverty, 1970—1980(《不平等的生态学:1970—1980年间的少数民族



关于阶级的冲突  
*Conflicts about Class*

和贫困的集中》).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1153~1188

MAYER K. and CARROLL G.. 1987. Jobs and Classes: Structural Constraints on Career Mobility(《工作和阶级:职业流动性的结构限制》).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3: 14~38

MAYER K., FEATHERMAN D., SELBEE L. and COLBJORNSEN T.. 1989. Class Mobility During Working Life: 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of Germany and Norway(《工作中的阶级流动性:德国和挪威的跨国比较》).In:M. Kohn (ed.). *Cross-National Research in Sociology*, Newbury Park: Sage

MAYNARD M.. 1994. *The Incredible Disappearing Woman: Gender and Hierarchy in Feminist and Social Thought* (mimeo)(《令人难以置信的女性消失:女权主义与社会思想中的性别与等级》). Bielefeld: Bielefeld University Press

MENSHIKOV S.. 1969. *Millionaires and Managers*(《百万富翁和经理人》).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MICHALET, C. A.. 1974. France(《法国》). See Vernon 1974, 105~125

MILIBAND R.. 1989. *Divided Societies*(《分裂的社会》).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LLER A., HESLI V. and REISINGER W.. 1994. Reassessing Mass Support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the Former USSR(《对前苏联政治、经济变化的群众支持再评估》).*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 399~411

MILLS, C. WRIGHT. 1946. The Middle Class of Middle-Sized Cities(《中等规模城市的中间阶级》).*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1: 520~529

MILLS C. WRIGHT. 1951.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白领:美国的中间阶级》).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LLS C. WRIGHT. 1959. *The Power Elite*(《权力精英》). New York: Galaxy

MILLS C. WRIGHT.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社会学的想像力》).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LWARD A. S. and SAUL B. S.. 1977.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es of Central Europe, 1850—1914*,《1850—1914年间中欧经济的发展》).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MINGIONE E 1991. The New Urban Poor and the Crisis of Citizenship/Welfare Systems in Italy(《意大利的新城市贫民以及公民权/福利制度的危机》).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ing Conference on 'Pauvreté, Immigrations et marginalités urbaines dans les sociétés avancées'. Paris, Maison Suger, May

- MINTZ B.. 1989. United States(《美国》). See Bottomore and Brym (eds) 1989
- MINTZ B. and SCHWARTZ M.. 1985. *The Power Structure of American Business* (《美国商业的权力结构》).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IZRUCHI M.. 1982. *The American Corporate Network, 1904—1974*(《1904—1974年间美国的企业网络》).Beverly Hills: Sage
- MIZRUCHI M. and SCHWARTZ M. (eds). 1987. *Intercorporate Rlations: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Business* (《企业间的关系;商业的结构分析》).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RIOKA K.. 1989. *Japan*(《日本》). See Bottomore and Brym (eds) 1989
- MORISHIMA M.. 1982. *Why Has Japan Succeeded?*(《为什么日本成功了?》).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RRIS L. D.. 1990. *The Working of the Household*(《家庭的工作》). Oxford: Polity Press
- MORRIS L. D..1995. *Social Divisions* (《社会分裂》).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ress
- MOSSER A.. 1983. Concentration and the Finance of Austrian Industrial Combines, 1880—1914(《1880—1914年间奥地利工业联合的集中和资金》). in Teichova and Cottrell 1983
- MOYNIHAN D. P.. 1973. *The Politics of a Guaranteed Income* (《保障收入的政治学》). New York: Random House
- MOYNIHAN D. P.. 1989. Towards a Post-Industrial Social Policy(《走向后工业社会政策》).*Public Interest* 98: 16-27
- MULLER W. and KARLE W.. 1990. Social Selection in Educational Systems in Europe(《欧洲教育制度的社会选择》). Paper presented to ISA Research Committee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Madrid
- MURRAY C.. 1984. *Losing Ground*(《退却》). New York: Basic Books
- MURRAY C.. 1990. *The Emerging British Underclass* (《正在兴起的英国下层阶级》).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 MURRAY F.. 1983. The Decentralisation of Production—The Decline of the Mass-Collective Worker?(《生产的非集中化:大规模集体工人的衰落》).*Capital and Class* 19: 74~99
- MURRAY F.. 1987. Flexible Specialisation and the “Third Italy”(《弹性的专门化以及“第三个意大利”》). *Capital and Class* 33: 84-95



关于阶级的冲突  
*Conflicts about Class*

MYLES J. 1988. The Expanding Middle: Some Canadian Evidence on the Deskillling Debate(《扩大的中间阶级:关于非技术工人讨论的一些加拿大的依据》).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35: 335~364

MYLES J. 1990. States, Labour Markets and Life Cycles(《国家、劳动市场和生命周期》).In :R. Friedland and S. Robertson (eds). *Beyond the Marketplace: Rethinking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 de Gruyter. 271~298

MYLES J., PICOT P. and WANNELL T. 1993. Does Postindustrialism Matter? The Canadian Experience(《后工业主义至关重要吗? 加拿大的经历》). In Esping-Anderson (ed.) 1993, pp. 171~194

MYLES J. and TUREGUN, A. 1994. 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Structure(《阶级结构比较研究》).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 103~124

NAISBITT J. and ABURDENE, P. 1990. *Megatrends 2000* (《2000 年大趋势》). London: Sidgwick and Jackson

NAYLOR R. T. 1975. *The History of Canadian Business 1867—1914*(《1867—1914 年间加拿大商业史》) .vols 1, 2. Toronto: Lorimer

NEWBY H. 1977. *The Deferential Worker*(《顺从的工人》). London: Allen Lane

NEWBY H. 1982. *The State of Research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Britain*(《英国社会分层研究状况》). Lond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NIEUWBEERTA P. and DE GRAAF N. D. 1996. Traditional Class Voting and the Influence of Varying Class Structures in 16 Western Countries: 1956—1990 (《1956—1990 年间 16 个西方国家中传统的阶级投票以及阶级结构变化的影响》).In:Evans (ed.) 1996

NISBET R. 1959.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Social Class(《社会阶级的衰落》). *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 2 (1): 1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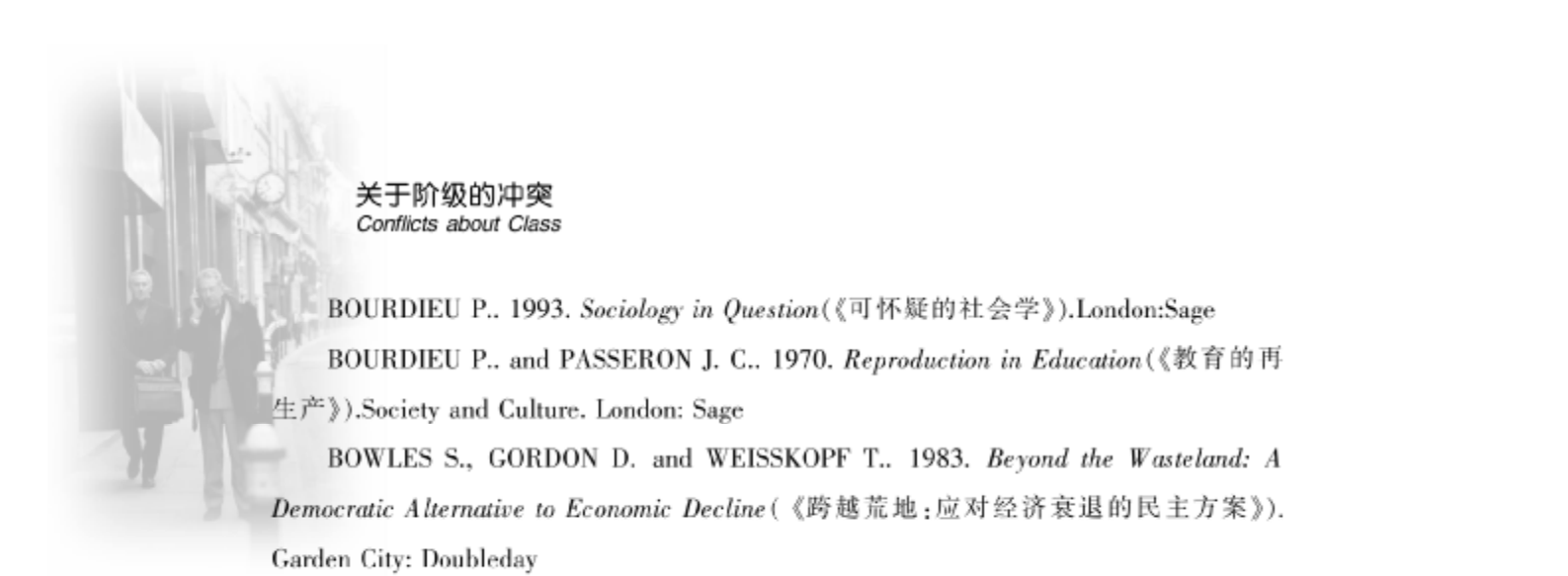
NUMAZAKI L. 1986. Networks of Taiwanese Business: A Preliminary Analysis(《台湾的商业网:一个初步的分析》). *China Quarterly*, 12

NUMAZAKI L. 1991. The Role of Personal Networks in the Making of Taiwan's Guanxiqiye(《台湾关系企业形成中个人网络的角色》). In :Hamilton (ed.) 1991

NUMAZAKI L. 1992. *Networks and Partnership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Chinese Business Elite in Taiwan* (《网络与合作: 中国商业精英在台湾的社会组织》).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for Degree of PhD

O'CONNOR J. 1973. *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 (《国家的财政危机》).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OECD. 1992. *Labour Force Statistics, 1970—1990*(《1970—1990年间的劳动力统计数据》).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OECD 1985. Employment in Small and Large Firms: Where have the Jobs come from? (《小企业和大企业中的雇佣:工作从哪里来?》). *Employment Outlook*, Sept.: 64~82
- OFFE C. 1984.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福利国家的矛盾》). London: Hutchinson
- OFFE C. 1985. *Disorganized Capitalism*(《瓦解的资本主义》).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OFFE C. 1985. Work: the Key Sociological Category?(《工作: 关键的社会学分类?》). In: Offe 1985
- OHLIN G.. 1974. *Sweden*(《瑞典》). See Vernon 1974, 126~141
- OLSEN M..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集体行动的逻辑》).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RNSTEIN M.. 1983.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 in Canada(《加拿大阶级的发展》). In: J. P. Grayson (ed.).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社会学引论》). Toronto: Gage, 216~259
- ORNSTEIN M.. 1989.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Canadian Capitalist Clas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比较观点中加拿大资本主义阶级的社会组织》).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26: 151~177
- OSSOWSKI S.. 1963. *Class Structure in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社会意识中的阶级结构》).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OST D.. 1993. The Politics of Interest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利益政治》). *Theory and Society* 22: 453~485
- OST D.. 1995. Labour, Class and Deocracy: Shaping Political Antagonism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y(《劳工、阶级和民主:塑造后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对抗》). In: B. Crawford (ed.) *Markets, States, and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PAHL R.. 1984. *Divisions of Labour*(《劳动的分裂》).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PAHL R.. 1988. Some Remarks on Informal Work, Social Polarization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关于非正式工作、社会两极化和一些评论》).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2, 247~267
- PAHL R.. E.. 1991. R. E. Pahl Replies(《答 R. E. 帕尔》).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5 (1): 127~129



关于阶级的冲突  
*Conflicts about Class*

PAKULSKI J.. 1986. *Bureaucracy and the Soviet System*(《官僚主义和苏维埃体制》).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19 (1):3~24

PAKULSKI J.. 1993. *Mass Social Movements and Social Class*(《群众性社会运动和社会阶级》).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8 (2)

PALMADE G.. P.. 1961. *French Capit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世纪的法国资本主义》). Newton Abbot: David & Charles, 1972

PARKIN F.. 1971. *Clas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Order*(《阶级不平等和政治秩序》). New York: Praeger

PARKIN F.. 1979. *Marxism and Class Theory: A Bourgeois Critique*(《马克思主义和阶级理论:一种资产阶级批判》). London: Tavistock.

PARSONS T.. 1937.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社会行动的结构》). New York: McGraw-Hill.

PARSONS T.. 1949. *Social Classes and Class Conflict in the Light of Recent Sociological Theory*(《新近社会学理论中的社会阶级和阶级冲突》). In: T. Parsons (ed.). *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54

PATEMAN C.. 1988. *The Sexual Contract*(《性契约》).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YNE J.. 1987. *Does Unemployment Run in Families?*(《失业进入家庭中了么?》). *Sociology* 21, 199~214

PENN R.. 1981. *The Nuffield Class Categorisation*(《纽菲尔德阶级分类》). *Sociology* 15, 2: 265~271

PERKIN H.. 1989.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 Society*(《职业社会的兴起》). London: Routledge.

PERLO V.. 1957. *The Empire of High Finance*(《高度金融帝国》).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PETERS T. and WATERMAN R.. 1982. *In Search of Excellence*(《追寻卓越》) New York: Warner Books.

PHILLIPS K.. 1991. *The Politics of Rich and Poor: Wealth and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in the Reagan Aftermath* (《贫富的政治学:里根之后的财富和美国选举》). New York: Harper

PHILLIPS K.. 1993. *Boiling Point: Democrats, Republicans and the Decline of Middle Class Prosperity*(《沸点: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和中间阶级繁荣发展的衰落》). New York: Random House

- PICKVANCE C.. 1977. From Social Base to Social Force : Some Analytical Issues in the Study of Urban Protest(《从社会基础到社会力量:城市反抗力量研究中的一些分析议题》). In M. Harloe (ed.), *Captive Cities*, Chichester: Wiley, pp. 175~186
- PIORE M. and SABEL C.. 1984.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ossibilities for Prosperity*(《第二次工业划分:繁荣的可能性》). New York: Basic
- PIZZORNO A.. 1978. Political Exchange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in Industrial Conflict (《工业冲突中的政治交流和集体认同》). In: Colin Crouch and Alessandro Pizzorno (eds). *The Resurgence of Class Conflicts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968*. Vol 2. London: Macmillan.
- PLANT S.. 1992. *The Most Radical Gesture: The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in a Post-Modern Age*(《最激进的姿态:后现代岁月的情境国际》). London: Routledge
- POULANTZAS N.. 1975.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 London: NLB
- PRANDY K.. 1990. The Revised Cambridge Scale of Occupation(《修正的剑桥职业标准》). *Sociology* 24, 629~655
- PRINGEL R.. 1988. *Secretaries Talk*(《部长大臣谈话录》) London: Verso
- PRODI R.. 1974. *Italy*(《意大利》). See Vernon 1974. 45~63
- PRZEWORSKI A.. and SPRAGUE J.. 1986. *Paper Stones: A History of Electoral Socialism*(《选举社会主义的历史》).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ADAEV V. and SHKARATAN A.. 1992. Etacratism: Power and Property—Evidence from the Soviet Experience(《国家社会主义:权力和财产——以苏联经历为依据》).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7 (3): 301~316
- RAFIERY A. and HOUT M. 1993. 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xpansion, Reform, and Opportunity in Irish Education, 1921—1975 (《最大限度的不平等:1921—1975年间爱尔兰教育的扩展、改革和机会》).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6: 41~62
- RAINNIE A.. 1985. Small Firms, Big Problem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mall Businesses (《小企业,大问题:小商业的政治经济学》). *Capital and Class* 25: 140~168
- RAWLS J.. 1972. *A Theory of Justice* (《正义论》).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REDDING S. G.. 1990. *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中国资本主义的精神》).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REICH R.. 1991. *The Work of Nations*(《国家的工作》). New York: Knopf
- REID I.. 1981. *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in Britain*(《英国的社会阶级差异》). London: Grant MacIntyre

关于阶级的冲突  
*Conflicts about Class*

REISINGER W. MILLER A. HESLI V. and HILL MAYER K.. 1994. Political Value in Russia, Ukraine and Lithuania: Sources and Implications for Democracy(《俄罗斯、乌克兰和立陶宛的政治价值：民主的根源和含义》).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4, 183~223

RENNER K. [1953] 1978. The Service Class(《服务阶级》). In T. Bottomore and P. Goode (eds). *Austro-Marxism*. Oxford: Clarendon. 249~252

RENNER K.. 1953. *Wandlungen der Modernen Gessellschaft: zwei Abhandlungen u-ber die Probleme der Nachkriegszeit*. Vienna: Wiener Volksbuchhandlung

REX J. and Moore. R.. 1967. *Race, Community and Conflict*(《种族、社会和冲突》).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ICHTA R.. et al. 1969. *Civilization at the Crossroads*(《处于十字路口的文明社会》). White Plains N. Y.: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RIDGE J.. 1974. Editorial Commentary on O. D. Duncan's Proposals for Reanalysis of the 1949 Survey(《对 O. D. 邓肯关于“1949 年调查再分析”建议的编者按》). In J. M. Ridge (ed.). *Mobility in Britain Reconsider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3~26

RIGBY T. H.. 1990. *The Changing Soviet System*(《变动中的苏维埃体制》).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RINGDAL K. and HINES K. .1996. Patterns in Class Voting in Norway 1957—1989: Decline or “Trendless Fluctuation”? (《1957—1989 年挪威的阶级投票模式：衰落或“无倾向波动”？》). in Evans (ed.) 1996

ROBERTS K. COOK F., CLARK S. and SEMEONOFF E.. 1977. *The Fragmentary Class Structure*(《碎片化的阶级结构》). London: Heinemann

ROBERTSON D.. 1984. *Class and the British Electorate*(《阶级和英国选举》). Oxford: Blackwell

ROBERTSON R.. 1992.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 London: Sage

ROCHE M.. 1992. *Rethinking Citizenship: Welfare, Ideology and Change in Modern Society*(《公民权再思考：现代社会的福利、意识形态和变化》). Cambridge: Polity Press

ROCHESTER A.. 1936. *Rulers of America*(《美国的统治者》).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ROEMER J.. 1982. 'New Directions in the Marxist Theory of Exploitation(《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的新方向》). *Politics and Society*, 11 (3)

ROEMER J.. 1982. *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剥削和阶级的一般

理论》).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SE D. (ed.). 1988.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Economic Change*(《社会分层和经济变革》). London: Hutchinson

ROSE R. and MCALLISTER I.. 1986. *Voters Begin to Choose: From Closed Class to Open Elections in Britain*(《投票人开始选择:英国从限于少数人的阶级到公开选举》). London: Sage

ROSENTHAL N.. 1985. The Shrinking Middle Class: Myth or Reality? (《缩小的中间阶级:神话或现实?》) *Monthly Labor Review March*: 3~10

RUNCIMAN W. G.. 1990. How many Classes are there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Society?(《当代英国社会有多少阶级?》). *Sociology* 24, 377~396

RUSTERHOLZ P.. 1985. The Banks in the Centre: Integration in Decentralised Switzerland(《处于中心的银行:分权化瑞士的一体化》). In Stokman *et al.* 1985

SABEL C.. 1982. *Work and Politics*(《工作和政治》).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RLVIK B. and CREWE I.. 1983. *A Decade of Dealignment* (《非结盟的十年》).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RTORI G.. 1970. 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比较政治学中概念的错误形成》).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LXIV (4): 1033~1053

SAUNDERS P.. 1978. Domestic Property and Social Class(《家庭财产和社会阶级》).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8, 202~207

SAUNDERS P.. 1981.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社会理论和城市问题》). rev. ed., 1987. London: Unwin Hy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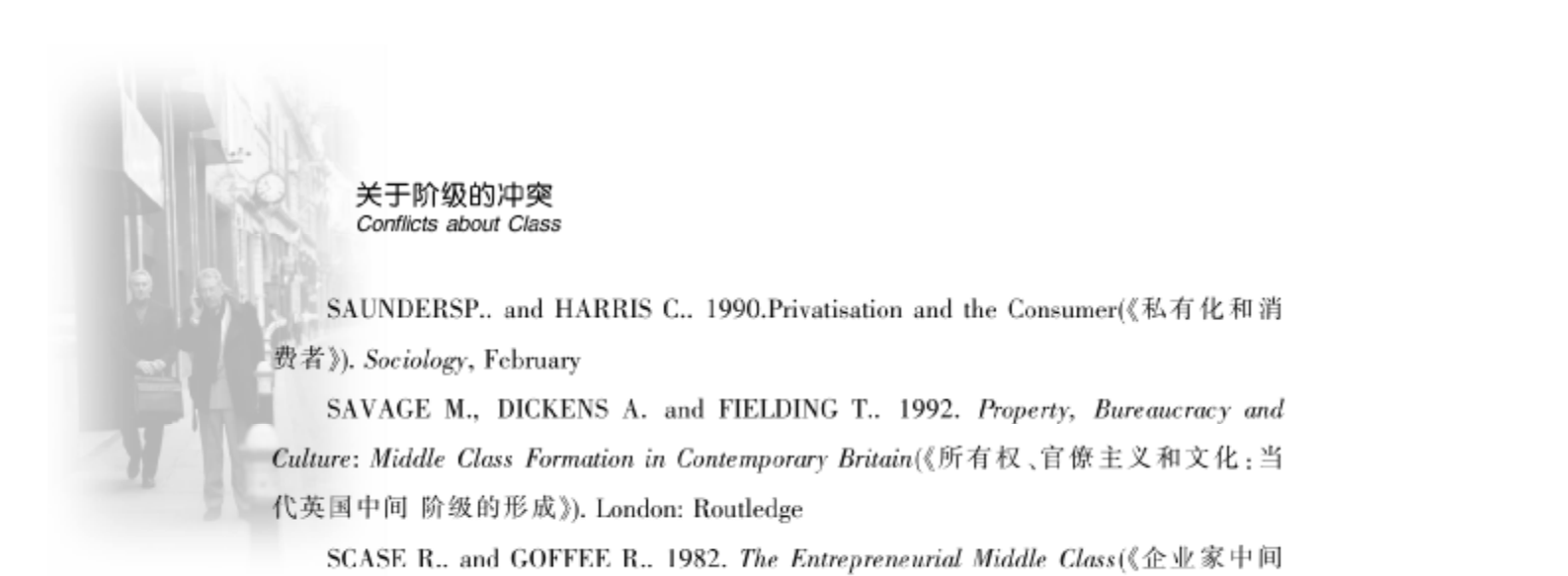
SAUNDERS P.. 1984. Beyond Housing Classes: The Soc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in Means of Consumption(《超越住宅阶级:消费方式中私有产权的社会学意义》).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8: 202~207

SAUNDERS P..1989. Left Write in Sociology(《社会学中的左翼著述》).*Network*, 44, May, Nos 3~4

SAUNDERS P.. 1990. *A Nation of Home Owners*(《家庭所有者的国家》). London: Unwin

SAUNDERS P.. 1990. *Social Class and Stratification*(《社会阶级和分层》) .London: Routledge

SAUNDERS P.. 1995.Might Britain be a Meritocracy (《英国可能是知识精英政治吗?》). *Sociology* 29 (1): 23~41



关于阶级的冲突  
*Conflicts about Class*

SAUNDERS P. and HARRIS C.. 1990. Privatisation and the Consumer(《私有化和消费者》). *Sociology*, February

SAVAGE M., DICKENS A. and FIELDING T.. 1992. *Property, Bureaucracy and Culture: Middle Class 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Britain*(《所有权、官僚主义和文化:当代英国中间阶级的形成》). London: Routledge

SCASE R. and GOFFEE R.. 1982. *The Entrepreneurial Middle Class*(《企业家中间阶级》). London: Croom Helm

SCHARPF F. W.. 1984.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on Full Employment Strategies: Sweden, Austria and West Germany, 1973—1982(《完全就业战略的经济和制度限制:1973—1982年的瑞典、奥地利和西德》). In Goldthorpe (ed.) 1984

SCHMITTER P. C. and LEHMBRUCH G. (eds). 1979. *Trends Towards Corporatist Inter-Mediation*(《合作主义的调和趋向》). London: Sage

SCHMITTER P.. 1974.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仍然是合作主义的世纪吗?》). *Review of Politics* 36: 85~131

SCHOPFLIN G.. 1993. The Road from Post-Communism(《后共产主义之路》). In S. Whitefield (ed.) *The New Institutional Architecture of Eastern Europe*. London: Macmillan

SCOTT A.. 1986. Industrialisation, Gender Segregation and Stratification Theory(《工业化、性别隔离和分层理论》). In Crompton and Mann (eds) 1986

SCOTT J.. 1982. *The Upper Classes*(《上层阶级》). London: Macmillan

SCOTT J.. 1985. *Corporations, Classes and Capitalism*(《企业、阶级和资本主义》). 2nd edn. London: Hutchinson

SCOTT J.. 1986. *Capitalist Property and Financial Power* (《资本家财产和金融权力》). Brighton: Wheatsheaf

SCOTT J.. 1987. Intercorporate Structure in Western Europe (《西欧的相互合作结构》). In: Mizuchi and Schwartz, 1987

SCOTT J.. 1990. Corporate Control and Corporate Rule (《企业控制和企业统治》).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1, 3

SCOTT J.(ed.) 1990. *The Sociology of Elites*(《精英社会学》). 3 vols. Aldershot: Edward Elgar

SCOTT J.. 1991. *Who Rules Britain?*(《谁统治英国?》). Cambridge: Polity Press

SCOTT J.. 1993. Corporate Groups and Network Structure(《合作群体和网络结构》). In: McCahery et al. (eds). 1993

SCOTT J.. 1993. *Poverty and Wealth: Citizenship, Poverty and Privilege*(《贫困和财

富:公民权、贫困和特权》). Harlow: Longman.

SCOTT J. 1996. *Stratification and Power: Structures of Class, Status and Command* (《分层和权力:阶级结构、地位和命令》). Cambridge: Polity Press

SCOTT J. and GRIFF C.. 1984. *Directors of Industry*(《工业的指导者》). Cambridge: Polity Press

SCOTT J. and GRIFF C.. 1985. Bank Spheres of Influence in the British Corporate Network(《英国企业网中银行领域的影响》). In: Stokman et al. 1985. 215~233

SEGAL L.. 1987. *Is the Future Female?*(《未来是女性的吗? 》). London: Virago

SENNETT R. and COBB J.. 1972. *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隐藏的阶级创伤》).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HAFIR M.. 1994. Ethnic Tension Runs High in Romania(《罗马尼亚的民族紧张情绪高涨》). *RFE/RL Research Report* 3: 32, 24~32

SHAIKEN H.. 1984. *Work Transformed: Automation and Labor in the Computer Age* (《工作转型:电脑时代的自动化和劳动》).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SHAPRE A.. 1983. The Evolution of Class Structure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anada, 1961—1981(《1961—1981年加拿大阶级结构和收入分配的演变》).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Can. Polit. Sci. Assoc., University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SHAVIT Y. and BLOSSFELD H. P. (eds). 1992. *Persistent Inequality: Changing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irteen Countries* (《持续的不平等:13个国家中不断变化的教育成就》).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SHILLING C.. 1993. *The Body and Social Theory*(《身体和社会理论》). London: Sage

SHILS E.. 1982. The Political Class in the Age of the Mass Society(《大众社会年代的政治阶级》). In M. M. Czudnowski (ed.). *Does Who Governs Matter?* DeKalb, Illinois: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SHORROCKS A. F.. 1987. U. K. Wealth Distribution: Current Evidence and Future Prospects(《英国的财富分配:当前情况和未来前景》). In E. Wolff (e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Weal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9~50

SHRONFEILD A.. 1969. *Modern Capitalism: The Changing Balance of Public and Private Power*(《现代资本主义:变化中的公共和私人权力均衡》).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UTT J. WHITTINGTON R.. 1987. Fragmentation Strategies and the Rise of Small Units: Cases from the North West(《分散化战略和小单位的兴起:以西北部为例》). *Re-*



*gional Studies* 21: 13~23

SCIA A.. 1988. *Weber, Irrationality and Social Order*(《韦伯、非理性和社会秩序》).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ILVER H. (ed.). 1973. *Equal Opportunity in Education: A Reader in Social Class and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教育中的平等机会：对社会阶级和教育机会的评论》). London: Methuen

SMEEDING T.. 1991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s of Inequality and Poverty Position* (《不平等和贫困的跨国比较》). In Osberg, L. (ed.).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rmonk, NY: Sharpe. 39~59

SMITH C.. 1987. *Technical Workers: Class, Labour and Trade Unionism*(《技术工人：阶级、劳工和工联主义》). London: Macmillan

SMITH D. J. (ed.). 1992. *Understanding the Underclass*(《理解下层阶级》). London: Policy Studies Institute

SNIDERMAN P., BRODY R. and TETLOCK P. 1991. *Reasoning and Choice: Explorations in Political Psychology*(《推理和选择：政治心理学考察》).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OLOMOS J.. 1989. *Race and Racism in Contemporary Britain*(《当代英国的种族和种族主义》). London: Macmillan

SØRENSEN A.. 1991. On the Usefulness of Class Analysis in Research on Social Mobility and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论社会流动性和社会经济不平等研究中阶级分析的有用性》). *Acta Sociologica* 34: 71~87

SPANT R.. 1987. *Wealth Distribution in Sweden: 1920—1983*(《1920—1983年瑞典的财富分配》). In: Wolff, E. (e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Wealth* (《家庭财富分配的国际比较》).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5~71

SPOHN W. and BODEMANN, Y. M.. 1989.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In: T. B. Bottomore and R. J. Brym, eds. 1989

STACEY M.. 1981. *The Division of Labour Revisited* (《劳动分工新论》) .In:P. Abrams et al. (eds). *Practice and Progress: British Sociology 1950-1980*, London: Allen & Unwin

STANWORTH M..1984. *Women and Class Analysis: A Reply to John Goldthorpe* (《妇女和阶级分析：答约翰·戈德索普》).*Sociology* 18, 2: 159~170

STANWORTH P. and GIDDENS A. (eds). 1974. *Elites and Power in British Society*

(《英国社会的精英和权力》).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EDMAN JONES G. 1974. Working Class Culture and Working Class Politics(《工人阶级文化和工人阶级政治》).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7

STEINMETZ G. and WRIGHT E. O.. 1989. The fall and rise of the petty bourgeoisie: Changing patterns of self-employment in the postwar United States (《小资产阶级的衰落和兴起:战后美国变动中的自雇模式》).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973-1-18

STEINMETZ G. and WRIGHT E.. 1990. Reply to Linder and Houghton(《答林德和霍顿》).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6, 727-735

STEPHENS J. D.. 1979. *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London: Macmillan

STEWART A., PRANDY K. and BLACKBURN R.. 1980.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Occupations*(《社会分层和职业》).London: Macmillan

STOKMAN F., ZIEGLER R. and SCOTT J. 1985. *Networks of Corporate Powe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en Countries* (《企业权力网:10个国家的比较分析》). Cambridge: Polity Press

STOKMAN F., WASSEUR F., ELSAS D.. 1985. The Dutch Network: Types of Interlocks and Network Structure(《荷兰的网络:连锁的类型和网络结构》). See Stokman et al. 1985: 112-130

STOLZENBERG R.. 1978. Bringing the Boss Back In: Employer Size, Employee Schooling, and Socioeconomic Achievement(《让老板回来:雇主的规模、雇员教育和社会经济成就》).*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 813-8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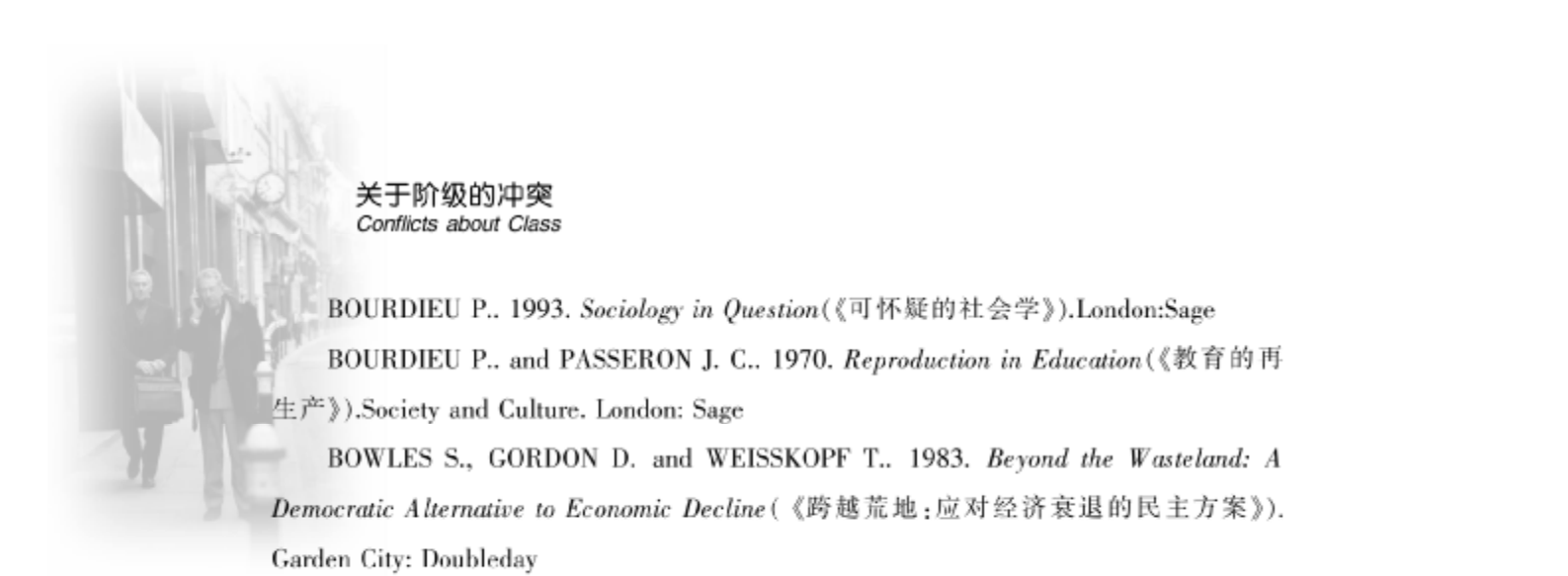
SWARTZ D.. 1985. French Interlocking Directorships: Financial and Industrial Capital(《法国的连锁管理: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 In: Stokman et al. 1985

TAWNEY R.. 1922. *Secondary Education for All: A Policy for Labour*(《面向所有人的中等教育:一项劳工政策》). edited for the Education Advisory Committee of the Labour Party. London: Allen & Unwin

TAYLOR-GOUBY 1991. Attachment to the Welfare State(《从属福利国家》). In: R. Jowell et al. (eds). *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the 8<sup>th</sup> Report*, London: Social and Community Planning Research

TEDIN K. and YAP, O.. 1993. The Gender Factor in Soviet Politics: Survey Evidence from Greater Moscow(《苏联政治中的性别因素:大莫斯科的调查结果》).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46, 179-211

TEICHOVA A. 1992. Rivals and Partners: Reflections on Banking and Industry in



关于阶级的冲突  
*Conflicts about Class*

Europe, 1880—1938(《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对 1880—1938 年欧洲银行业和工业的反思》).In: Cottrell et al. 1992

TEICHOVA A. and COTTRELL P. (eds). 1983. *International Banks and Central Europe, 1918—1939*, 《1918—1939 年的国际银行和中欧》.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THISTLE S.. 1992. *Between Two Worlds*(《在两个世界之间》),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THOMPSON E. P.. 1968.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Lonodn: Penguin (Second Revised Edition)

THOMPSON E. P.. 1964. Time, Work 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时间、工作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 *Past and Present*

THOMPSON E. P.. 1965.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英国人的特性》).In: R. Miliband and J. Saville (eds). *Socialist Register No. 2*. Merlin Press: London: 331~361

THUROW L.. 1983. *Dangerous Currents: The State of Economics*(《危险的潮流:经济学的状态》).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ILLY R.. 1974. The Growth of Large Scale Enterprise in Germany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 世纪中叶以来德国大企业的发展》). In: Daems and Van der Wee (eds) 1974

TILLY R. H.. 1986. German Banking, 1850—1914: Development Assistance for the Strong(《1850—1914 年的德国银行业:对强者发展的援助》).*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5

TODD J. and BUTCHER, B.. 1982. *Electoral Registration in 1981*(《1981 年的选举登记》). London: Office of Population Censuses and Surveys

TOMINOMORI K.. 1979. Big Business Groups and Finance Capital in Post-War Japan(《战后日本的大商业集团和金融资本》).*Hokudai Economic Papers* 9

TOURAINÉ A.. 1985.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社会运动研究导论》). *Social Research* 52 (4): 749~788

TOWNSEND P.. 1979. *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英国的贫困》).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TOWNSEND P.. 1991. *The Poor and Poorer...*(《穷人和更穷的人……》). Bristol: Department of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Planning, Bristol University

TOWNSEND P.. 1993. Underclass and Overclass: The Widening Gulf(《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扩大的鸿沟》). In: G. Payne and M. Cross (eds) *Sociology in Action*, London:

Macmillan

TOWNSEND P. and DAVIDSON N. (eds). 1992. *Inequalities in Health*(《健康方面的不平等》).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TOWNSEND P., CORRIGAN P. and KOWARZICK U. 1987. *Poverty and Labour in London*(《伦敦的贫困和劳工》). London: Low Pay Unit

TREIMAN D. J.. 1970. Industrialism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工业主义和社会分层》). In E. O. Laumann (ed.).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for the 1970s*. New York: Bobbs-Merrill

TREIMAN D. J. and YIP, K.-B. 1989.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in 21 Countries(《21个国家的教育和职业成就》).In: M. Kohn (ed.), *Cross-National Research in Sociology*, Newbury Park: Sage

TURNER B.. 1981. *For Weber: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Fate*(《献给韦伯:关于命运社会学的文集》).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TURNER B.. 1986. *Equality*(《平等》). London: Tavistock

TURNER B.. 1988. *Status*(《社会地位》).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TURNER B.. 1989. Ageing, Status Politics and Sociological Theory(《时变、地位政治和社会学理论》).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0 (2): 588-606

TURNER B.. 1990. *Theories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理论》).London: Sage

TURNER B.. 1994. *Orientalism, Postmodernism and Globalism*(《东方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全球主义》).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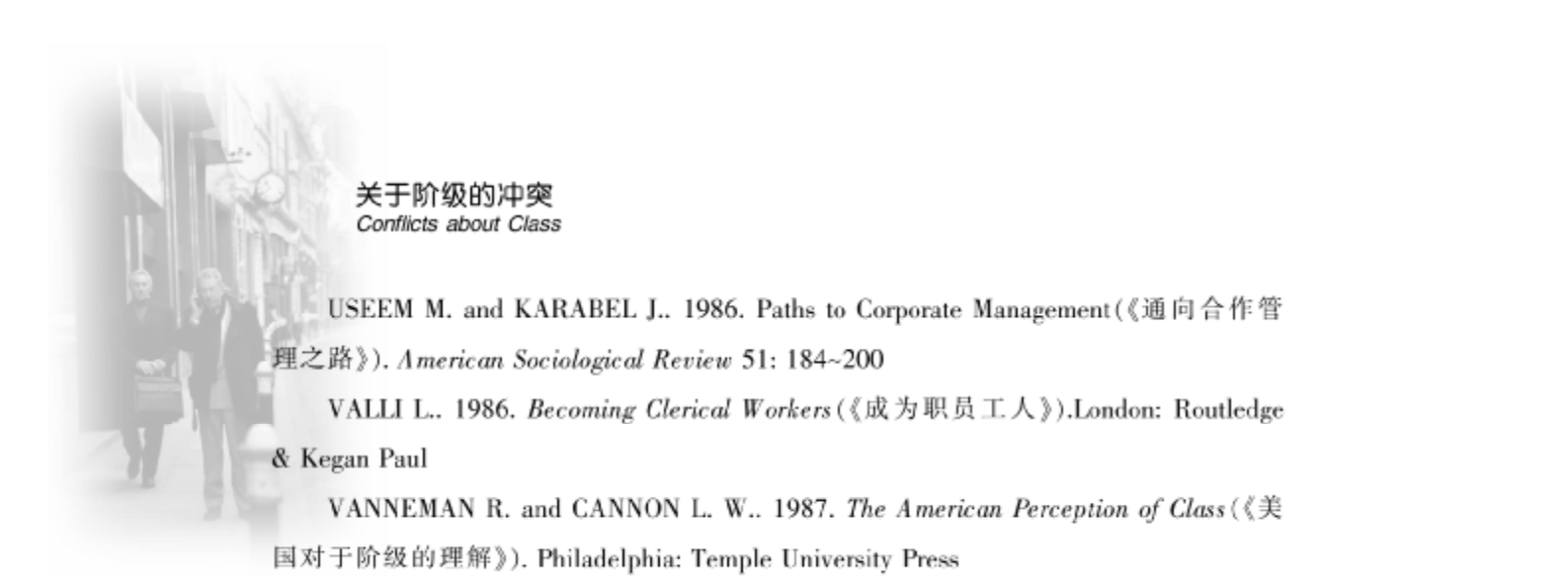
TURNER B.. 1994. The Postmodernization of the Life Course: Towards a New Social Gerontology(《生命过程的后现代化:新社会老年学》).*Australian Journal of Aging*, Vol. 13 (3): 109-111

TURNER B.. 1996. *Citizenship and Capitalism—The Debate over Reformism*(《公民权和资本主义——关于改良主义的争论》). London: Allen & Unwin

TURNER B. and HAMILTON, P. (eds). 1994. *Citizenship, Critical Concepts*(《公民权——批判性概念》).2 Vols, London: Routledge

TYLECOTE A.. 1992. *The Long Wave in the World Economy*(《世界经济的长波》). London: Routledge

USEEM M.. 1984. *The Inner Circle—Large Corporations and the Rise of Business Political Activity in the US and UK* (《核心集团——英美大企业和商业政治行为的兴起》).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关于阶级的冲突  
*Conflicts about Class*

USEEM M. and KARABEL J.. 1986. Paths to Corporate Management(《通向合作管理之路》).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184~200

VALLI L.. 1986. *Becoming Clerical Workers*(《成为职员工人》).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VANNEMAN R. and CANNON L. W.. 1987. *The American Perception of Class*(《美国对于阶级的理解》).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VERNON R. (ed.). 1974. *Big Business and the State: Changing Relations in Western Europe*(《大商业和国家:变动中的西欧关系》).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VILLAREJO D.. 1961. Stock Ownership and the Control of Corporations, Parts I—III(《股权和企业控制,第1—3部分》). *New University Thought*, Vol. 2. Reprinted in Scott 1990, Vol. 2

WACQUANT L.. 1993. Red Belt, Black Belt: Articulating Color, Class, and Place in Chicago's Ghetto and Parisian Periphery(《红色地带、黑色地带:论芝加哥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巴黎边缘地区的有色人种、阶级和地位》). Unpublished manuscript. Forthcoming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WALBY S.. 1986. *Patriarchy at Work*(《工作中的家长制》). Cambridge: Polity

WALBY S.. 1990. *Theorising Patriarchy*(《家长制的理论化》). Cambridge: Polity

WALKER A.. 1991. Poverty and the Underclass(《贫困和下层阶级》). In: Haralambos, M. (ed.). *Developments in Sociology* Vol. 7, Ormskirk, Causeway Press

WANNELL T.. 1991. Trend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Employment by Employer Size(《依照雇主规模分配工作的发展趋向》). Research Paper 39. Analytical Studies Branch, Stat., Canada, Ottawa

WATERS M.. 1989. Citizenship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Structured Social Inequality(《公民权和结构性社会不平等的内容》).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30 (3—4): 159~180

WATERS M.. 1991. Collapse and Convergence in Class Theory(《阶级理论的崩溃和趋同》). *Theory and Society* 20: 141~172

WATSON P.. 1993. Eastern Europe's Silent Revolution: Gender(《东欧的沉默革命:性别》). *Sociology* 27: 471~487

WEAKLIEM D.. 1991. The Two Lefts?—Occupation and Party Choice in France, Italy, and the Netherlands(《两个左翼?——法国、意大利与荷兰的职业和政党选择》).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6 (May): 1327~1361

WEAKLIEM D.. and HEATH, A. F. 1996. Class Voting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Definitions, Models and Data(《英国和美国的阶级投票:定义、模式和数据》). In: G. Evans (ed.) 1996

WEBER M.. 1914. The Economy and the Arena of Normative and De Facto Powers (《经济、规范性领域和实际权力》). Part Two of *Economy and Society* in Weber 1978

WEBER M.. 1920. Conceptual Exposition(《概念的说明》). Part One of *Economy and Society* in Weber 1978

WEBER M.. 1948. *From Max Weber*(《马克斯·韦伯以来》).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WEBER M..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经济和社会》). 2 vols (trans. G. Roth and C. Witti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EISS L.. 1984. The Italian State and Small Business(《意大利和小商业》)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5: 214~241

WEIZMAN L.. 1985. *The Divorce Revolution*(《离婚革命》).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ESTERGAARD J. H.. 1992. About and Beyond the “underclass”(《“下层阶级”及其超越》). BSA Presidential Address, *Sociology*, November

WESTERGAARD J. H.. 1995. *Who Gets What?*(《谁得到了什么?》). Cambridge: Polity Press

WESTERGAARD J.. and RESLER, H. 1975. *Class in a Capitalist Society*(《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 Harmondsworth: Pengu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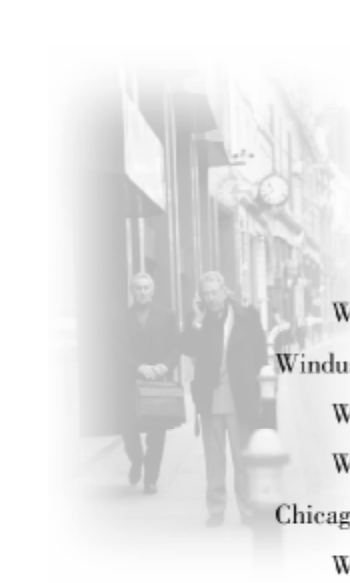
WESTERGAARD J., NOBLE, I. and WALKER, A. 1989. *After Redundancy*(《冗余之后》). Oxford: Polity Press

WHITEFIELD S.. and EVANS, G. 1994. The Social Background to the December Elections in Russia: Public Attitudes and the Transition Experience(《俄罗斯12月选举的社会背景:公众的态度和转变经历》). *Post-Soviet Affairs* 10, 38~60

WHITEFIELD S. and EVANS G.. 1994. The Ideological Bases of Political Competition in Eastern Europe(《东欧政治竞争的意识形态基础》).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New York, September 1994

WHITEHEAD M.. 1987. *The Health Divide: Inequalities in Health in the 1980s*(《健康的分化:20世纪80年代健康的不平等》). London, Health Education Council

WHYTE J. H. 1974. Ireland: Politics Without Social Bases(《爱尔兰:没有社会基础的政治》). In: R. Rose (ed.). *Electoral Behaviour: A Comparative Handbook*, New York: Free Press



关于阶级的冲突  
*Conflicts about Class*

WILLIAMS R.. 1973.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国家和城市》). London: Chatto & Windus

WILLIAMS R.. 1976. *Keywords*(《关键字》). London: Fontana

WILSON W.. 1978. *The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Race* (《衰退的种族影响》).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ILSON W..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真正的穷人:城市中心区、下层阶级和公共政策》).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ILSON W. 1991. Studying Inner-City Dislocations(《城市中心区的断层研究》).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1~14

WINIECKI J.. 1994. East-Central Europe: A Regional Survey — the Czech Republic, Hungary, Poland and Slovakia in 1993(《中东欧:一项地区性调查——1993年的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 *Europe-Asia Studies* 46, 709~734

WOLFF E.. 1991.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Wealth: Methodological Issues, Time Trends, and Cross-Sectional Comparisons(《家庭财富的分配:方法论问题、时间趋向和截面比较》). In: L. Osberg (ed.).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Armonk, NY: Sharpe. 92~133

WONG G.. 1991. Business Groups in a Dynamic Environment: Hong Kong, 1976—1986(《动态环境中的商业集团:1976—1986年的香港》). In: Hamilton (ed.) 1991

WONG S.. 1985. The Chinese Family Firm: A Model(《华人的家族企业:一种模式》).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6

WONG S.. 1988. *Emigrant Entrepreneurs*(《移民企业家》).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ONG S.. 1991. Chinese Entrepreneurs and Business Trust(《中国的企业家和商业信用》). In Hamilton (ed.) 1991

WONG R.. and HAUSER, R. 1992. Trends in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Hungary under Socialism (《社会主义匈牙利的职业流动趋向》).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1: 419~444

WOOD S. (ed.). 1982. *The Degradation of Work?*(《工作的退化?》). London: Hutchinson

WOOD S. (ed.). 1989.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k* (《工作的转型》). London: Hutchinson

WRIGHT E.. 1978. *Class, Crisis, and State*(《阶级、危机和国家》). London: New Left

Books

WRIGHT E.. 1979. *Class Structure and Income Determination*(《阶级结构和收入决定论》).New York: Academic Press

WRIGHT E.. 1985. *Classes*(《阶级》). London: Verso

WRIGHT E.. 1989. Women in the Class Structure(《阶级结构中的妇女》). *Politics and Society* 17: 35~66

WRIGHT E.. 1989. Rethinking, Once Again, the Concept of Class Structure(《阶级结构概念再思考》). In Wright et al. *The Debate on Classes*, London: Verso

WRIGHT E.. 1990. Explanation and Utopia in Marxism and Feminism(《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中的解释和乌托邦》).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August 11~15

WRIGHT E.. COSTELLO, C., HACHEN, D. and SPRAGUE, J. 1982. 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美国的阶级结构》).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 709~726

WRIGHT E. and MARTIN B.. 1987.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1960—1980(《1960—1980年美国阶级结构的转型》).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 1~29

XENOS N.. 1989. *Scarcity and Modernity* (《短缺和现代性》).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YANITSKY O., forthcoming. *One Hundred Interviews with Informals*(《100个非正式访谈录》). Moscow

ZEIGLER R. RENDER, . D. and BIEHLER H.. 1985. Industry and Banking in the German Corporate Network(《德国企业网中的工业和银行业》),In Stokman et al., 1985

ZEIGLER R., REISSNER G. and BENDER D.. 1985. Austria Incorporated? (《奥地利的企业合并》).In: Stokman et al., 1985

ZEITLIN M.. 1989. *The Large Corporation and Contemporary Classes*(《大企业和当代阶级》). Cambridge: Polity Press

ZUBOFF S.. 1988. *In the Age of the Smart Machine: The Future of Work and Power*(《智能机器时代:工作和权力的未来》).New York: Basic

ZYSMAN J.. 1983. *Governments Markets and Growth: Financial Systems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Change* (《政府,市场和增长:金融制度和工业变革政治》).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